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广州起义资料

(下)



金盾出版社



七、有关广州起义的回忆录

广州暴动与工会	恽代英	(3)
斗争中的回忆	杨 殷	(5)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	(10)
访问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		
陈郁同志(节录)		(19)
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		
回忆(记录稿)		(23)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	(30)
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回忆(记录稿)		
.....		(37)
战斗中的教导团	李伯璠	(49)
我所了解的广州起义(节录)	程子华	(54)
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节录)	刘祖靖	(59)
广州起义的回忆	许子威	(75)
我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	邱维达	(77)
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		
纪略(节录)	王谨权	(80)
在广州起义的日子里	范大光	(92)

D084/02

目 录

回忆广州起义(节录).....唐 固 (97)

金奎光同志参加广州起义

的我见杜君慧 (104)

广州起义亲历记(节录).....雷云仙 (107)

永远难忘的往事.....郭 超 (114)

党啊，我听着你呼唤

——广州起义回忆(节录).....贺 诚 (116)

柯麟同志谈广州起义(节录)..... (121)

警卫团起义的前前

后后(节录).....梁秉枢 (123)

广州起义中的警卫团.....张诗教 (130)

深夜里的回忆

——访陶铸同志(节录).....江 林 (133)

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

广州起义经过(节录).....何崇校 (136)

暴动中的海员赤卫战士.....何 潮 (140)

手车工人的怒吼.....李沛群 (146)

起义中的洋务工人赤卫队.....梁国志 (154)

战火中的巡礼(节录).....施 展 (162)

目 录

- 碧血黄沙李 甫 (174)
- 东路血战记(节录)甘 来 (178)
- 我参加了暴动中的第一
联队(节录).....陈功武 (181)
- 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及点滴
见闻(节录)欧 新 (187)
- 广州起义前后(节录)魏荃贤 (190)
- 战斗的日日夜夜(节录)罗 炳 (194)
- 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座谈会
记录(节录)黄 寿 (199)
-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 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老人座谈会
记录(节录) (207)
-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 起义中的市郊一区农民
自卫军何 清 (218)
-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府林杨珠等 (221)
- 广州起义前后的花县农民
自卫军卢克文 (226)
- 观音山苦战七小时王礼芬 (229)

目 录

攻入普君圩.....梁复然 (232)

南海县农军出击大沥亲历记 ...谢颂雅 (237)

广州起义的宣传工作赖先声 (244)

永世难忘范桂霞 (247)

从运送《红旗》到广州起义.....杨 广 (253)

广州起义中的《红旗报》梁若尘 (256)

随杨殷同志参加广州暴动李少棠 (258)

广州起义亲历记(节录).....薛尚实 (262)

广州起义的片断回忆张罕因 (267)

广州起义中的劳动童子团员卞 六 (270)

省委羲皇台会议.....李沛群 (273)

广州起义中的国际济难会 .. 彭秋平 (278)

激流归大海

——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节录) 粟 裕 (281)

广州的悲剧 ——一个目睹者的记述

..... (苏)Б·А·波赫瓦林斯基 (283)

广州起义中牺牲的五名苏联领事馆

目 录

- 人员简历阿·伊·哈西斯 (305)
- 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 时谈朝鲜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问题 (308)
- 越南革命者参加广州起义的情形
- (节录)..... (310)
- 八、有关广州起义的纪念、评论、记实文章**
- 广州暴动前的准备(广东通信)罗 浮 (317)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 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 (324)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 广州工农兵大暴动(广州通讯)志 明 (328)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 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 (332)
- (一九二八年一月)
- 悼张太雷同志秋 白 (333)
- (一九二八年一月)
-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
- 广州暴动周年纪念.....秋 白 (336)
-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目 录

-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中 夏 (349)
(一九二八年二月)
- 广东暴动纪实(节录) ……韶 玉 (367)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 广州暴动周年纪念 ……罗氏纳则 (430)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 广州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上的
意义 ……问 友 (443)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 广州暴动的前夜 ……易 元 (447)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 由广州暴动的经验联想到
武装暴动的策略 ……问 友 (453)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 …… (457)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 ……慕 石 (466)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 工农的广州! …… (474)
(苏联《真理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社论)



快来援助中国革命——赤色职工

国际致各国工人书 (47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反对杀害中国劳动者,捍卫中国

革命——赤色职工国际致各国

工人书 (47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录一:国民党的电文

一、广州事变前后汪兆铭等与广州往来文电

(甲)事变前: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青电 (481)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佳电 (481)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青电 (481)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蒸电 (482)

(乙)事变后:

李章达报告汪兆铭文电 (482)

张发奎等报告汪兆铭等元电 (483)

汪兆铭给张向华等寒电 (483)



杨教育长再致本校同志一封信…………… (484)

二、杨澍松给黄埔军校的信

杨教育长致本校各同志一封信…………… (485)

附录二：广州起义期间国内外通讯社
的部分新闻、电讯

广州城红旗蔽天——苏维埃

政府正式成立…………… (485)

广州大暴动纪要…………… (486)

粤军四路攻夺广州经过(节录)…………… (493)

港警大捕共党(三则)…………… (495)

粤军四路迫城下…………… (496)

广州苏俄领事被捕(二则)…………… (498)

东方通讯社香港分社调查

广州事变之遗迹…………… (498)

附录三：国民党反动派将领

逃脱记及暴行录

广州暴动之回忆(节录)……………张发奎 (500)

广州共党的暴动(节录)……………陈公博 (509)

目 录

- 陈璧君之粤变内幕谈..... (517)
广州起义期间“江大”舰的活动.....谢作屏 (519)
广州起义之役广东机器工会的暴行...梁桂来 (520)

附录四：帝国主义者有关广州 起义的日记、电报

- 粤海关日记(译文) (523)
粤海关英籍税务司贺智兰给北京
海关总署税务司的电报(译文) (525)
广州起义大事记林鸿暖整理 (526)

七、有关广州起义的回忆录

广州暴动与工会

恽代英^①

广东有几百个工会。在这次暴动中，苏维埃政府没有将权力交给工会去做许多事情，所以没有能将全广州的工人、店员与一般贫民都发动起来。

苏维埃政府宣布要做许多事，但自己的精力顾不到，又没有正式布告将权力交给各工会去做，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有权捉拿枪毙他们所知道的反动派。即便不会仅零星捉拿一百余反动派，而且不会都送到公安局里，以至于没有处置的办法。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对于他们所需要的房屋或粮食用品，有权自由没收征发。对于大工厂、大商店、银行、钱庄，亦有权代苏维埃政府没收保管。那便不至使许多应没收的资本家财产都轻轻放过，而工人仍旧没有钱用，没有饭吃。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干涉商店，严厉禁止商店闭门罢市，顽梗不服干涉的，工会有权没收其店铺，枪杀其店东，那便不至在暴动中感觉一般商人消极反抗的困难。

应当明白允许各工会向苏维埃政府领取枪支，去做上述

^① 恽代英同志是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的工作。那便是苏维埃政府所宣布要做的事，不愁不一件件的都做到。

因为不能这样做，以致广州市的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虽然有两三万人参加暴动，大部分群众仍旧没有起来，反动势力能重新攻入广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着这个教训，在暴动中必须将权力交给下层工会、农会，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胜利是必然的，只要有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

（载《红旗》周刊1928年第3期）

斗争中的回忆

杨 殷^①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当天将破晓的时候,广州工人群众忍不住国民党兽性的白色恐怖与压迫,实行武装暴动,由夺取工会,夺取工代会,杀改组委员;铁路工人包围汪公馆,进而实行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个伟大的举动,很快又是一年了,当此一年的纪念日,我把我能记忆的壮烈斗争各情形写出,做个追悼既往,策励将来的礼物。

那天教导团先将营内的反动长官解决,便与工人所组织的赤卫队分途向敌人队伍军警机关袭击。

炮兵团为敌人重要部队,当向他进攻时,我们人数不满百人,奋勇向前,该兵团即表示服从与工人联合,将枪炮交出。

此时,各士兵与工人赤卫队会合,一路由沙河经东山过广九站而进攻八旗会馆(八旗会馆为警卫团团部和第三营驻地,警卫团第三营是起义的武装力量之一。作者所提攻八旗会馆可能是进攻八旗会馆西侧的广西会馆之误。——编者注);一路由惠爱东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队进攻,其余则分向各警区进攻。当工人袭击八旗会馆时,士兵尚未到目的地,只由一位十八岁

^① 杨殷同志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

的工人同志带领七十余人，武器则只有炸弹三颗、盒子枪一支、手枪一支，先将炸弹抛掷未炸，而反动的军队已群起反抗，故由正门无法攻进。于是工人分向各围墙爬进，徒手夺取军械一部分，觉悟士兵起而响应，始得解决。于是，沿长堤收缴海军总营、新编二师等部，敌人皆从梦中警醒，绝无抵抗。转而向肇庆会馆二十五师部^①，该部顽抗，并用手提机关枪等武器向我们队伍射击，工友伤十余人，都奋不顾身，拚死相持。

进攻公安局是分两路的，当时保安队死力抵抗。总队长李某亲自指挥，卒因工友猛烈进攻，将队长李某击毙。所驻的大队保安队，不敢抵抗，都被缴械。其时，各路工友已分将城内各区攻下，其余兵工厂、电话局、电报局、政治分会、财政厅及市各机关亦相继占领。西关七、九、十等区，亦于同日下午一时占领。所余者惟四军军部、太平沙贮藏军械处，潮州会馆二十六师师部数处（四军军部应在长堤肇庆会馆，四军第十二师留守处在文德路，四军军械处在北京南路仰忠街。——编者注）斗争最烈，亦为以上数处，而尤以四军部为烈。在十一日至十二日大小数十次冲锋，炮声隆隆，彻夜不绝，虽伤亡甚大，因工友亦死力相持，敌军卒不敢出营门一步。至铁路工人将广三路站克服，广三路工友更联合农民向沿路之敌追击。十二日许，市郊农民更派大队来会，共同作战。

十一日午后一时，忽来敌军约一团，由观音山下沿第一公园马路分两路向我们总指挥部猛攻，已到第一公园，此时在省长公署（即赤卫队总部）的工友有枪者约百余人，便即分两路

^① 肇庆会馆应为第四军军部驻地。

迎战，并约手车夫工人五十余人来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蜂拥杀来，敌卒退去，我们复夺回观音山。十二日午后九时，教导团全部因保全武装计，集中沙河向花县进击，黄埔一部武装战士亦于十三日赶到，会同向沙河进发，此时广州只存三千余武装工友，然工友仍不稍却，誓死杀敌。

十三日早八时，敌人已四面包围，东由中流砥柱^①过河向东关广九车站等地进攻，石龙方面敌军约一团，沿广九路石牌站向东门进攻；北路约两团，一路由观音山向第一公园进攻；一路夺黄沙站向西关进攻，另由河南分队过海；一路由白鹅潭帝国主义兵舰掩护渡海，入黄沙与北路敌军会合；一路由反动海军掩护在石公祠^②登岸；一路由东关登岸与东路会合。当时闻报，工友分途应战，东路由同志沈某负责，率同工友二百余人，与敌人一团对抗，伤亡在一百人以上，然犹死力支持。手车工友某同志已伤足部，犹指挥前进。敌人卒不得不退击。西路工友在太平南路只得一百余人，仍将敌军六百余击退，追杀至大新公司西堤；因石公祠敌人百余，用机关枪向后扫射，工友已伤亡五六十人，仍死守太平南路。奈太平南路一带屋内反动分子，由窗向下射击，工友又死去数十人。此时，只存二十余人，犹在西瓜园死守。其余如维新路、观音山、广九车站、东堤等处均仍支持，剧烈异常，敌人至一时仍不能进展。

下午三时后，工人因子弹告尽，敌人又愈聚愈众，渐渐迫进，然在公安局前，尤作一很剧烈斗争，敌军亦死亡不少，工人

① 中流砥柱，位于珠江河二沙头岛的东端，因岛上设有中流砥柱炮台而得名。

② 石公祠，街名，在长堤。

虽已离公安局(苏维埃政府),而敌人四面用机关枪包围,至五时尚不敢进去。工人因受四面铁桶一般包围,且弹尽援绝,尽被屠杀。

当十一日早三时,工人喊杀连天勇敢作战,反动的头领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等警惶失措,狼狈万状,张、陈均不及衣履,黄在十三日尚未穿外衣,李福林更预备红带以便投降,沙面帝国主义者更害怕异常,争相赴舰去港。

十一日早夺得各地后,均严守其无产阶级纪律,各机关缴获财物,均送苏维埃保存,各市民观状,皆表同情,多悬红布,表示一致,多送茶饭于就近作战工友。

十一日早夺得枪支约五六千支,将各赤卫队编练,而工人群众领枪去作战杀敌者不知几几,在公安局前,省长公署前约有三万余人。另各工会及各占领地作战的亦共有二、三万人。满马路都是工友,有枪的固去应战,即无枪者亦各做运输、侦探种种工作。群众的英勇坚决,如汽车工友,除运输外,都能单独作战。三天内未得一饱。海员、铁路工人都能担任指挥作战及组织群众等工作。罢工工友、人力车、菜栏、酒业、酒楼茶室、打石棚厂及各工友均勇敢杀敌而牺牲独多。

素来受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反动的头领影响的工友,如茶居、电灯局、自来水厂等工人均上工,而等候苏维埃命令,外传机器工会助反动政府向工友进攻,亦不过是反动头领雇备数十流氓,以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邀功,而谋升官发财而已。

教导团士兵固忠实于革命,而被缴械的炮兵团及保安队士兵,亦举派代表要求发枪,誓死拥护工农而参加战斗。即素来不参加政治的广东水兵,当在西瓜园开群众大会时,亦自动

的派出代表参加以示团结一致。

至于敌人残杀的状况，十三日敌人向广州包围时，在海上用兵舰的大炮向市内射击，着地开花，以至房屋焚烧极多，进城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乘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逞其凶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闻反动区长郑某亦被枪毙。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岗、东教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射。工友于高叫“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声中而血肉横飞，惨遭屠杀矣。至十六、七、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尸骸遍地，血流通渠，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得完竣。二女子被杀后加以剖心剥腹，我写至此，我心碎了！

工农兵革命的兄弟们！我们回想被惨杀情形，固然哀痛，然而已经到了我们不杀敌人，敌人亦天天向我们屠杀，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我们的政权。

（载《红旗》周刊 1928 年第 3 期）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①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武装起义，又一次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变和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虽然，这次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对这个变化有着决定影响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从诞生时起，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些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马上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响应，也给从事革命三四十年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援，镇压了陈炯明的叛

^① 叶剑英同志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军阀，安定了两广局势，使后来的北伐革命有了巩固的基地与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开始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北伐军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公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北伐战争，就此遭到失败。

北伐战争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但从工人阶级内部来说，经验不足，领导机关所犯的 error，也是遭致失败的原因。大革命一开始，还处于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那时已经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认识还是不足的，而且缺乏正确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不仅不用积极的政策去满足许多地方已经起来进行斗争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反而竭力反对群众运动，更不敢去武装群众，去积极掌握部队，而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其结果使工人阶级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而为地主、资产阶级所篡夺，同时也使党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充分的力量来防止国民党叛变，粉碎他们叛变后对革命的进攻。革命的果实便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攫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就是这样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

害,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面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识青年,遭此严重打击,虽义愤填胸,但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紧迫任务是:必须甩开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一切动摇分子,坚决地领导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八月一日党所领导的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紧要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

南昌起义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起义之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之间,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解决。很多同志仍然留恋于北伐革命战争的形式,想以此挽救革命的失败。因此,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便跟着南昌起义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七月底由武汉出发,随张发奎南下。这时候的张发奎还披着“左”派的外衣,表示愿意回广东后继续革命,但实际上早已蓄谋叛变。行至九江,张发奎害怕学员们的高涨的革命热情,把教导团缴了械。当时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仿效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教育工作,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万安,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起义,把二十六师后勤部队所押运的枪械收缴

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当时团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广州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广州是北伐军的根据地，人民素有革命传统，在那里举行起义，不但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给敌人的打击也会远远超过万安。因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第四军到达广州之后，于十一月间赶跑了桂系军阀。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广州虽然也为反革命的势力所统治，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觉悟了的广州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相反的，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举行公开与半公开的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的口号，组织了各种秘密的武装团体，采取了种种方式与反动政府和反动工会进行英勇斗争。我们回到广州后，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情绪，革命的气焰更加高涨。被国民党破坏的革命工会组织又恢复起来了，游行示威的声势越来越大，郊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广东各地的农民也展开了各种革命斗争。

广州的革命群众曾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他们希望北伐军最后剩下的这支武装能坚持革命。开头，张发奎为了夺取桂系军阀控制的广东，扩张自己的势力，还设法骗取工人的支持。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这种高涨的革命气焰时，便害怕了。最后终于脱下了“左”派的外衣，露出原来的反动面貌，并与汪精卫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

党员。这个一度曾是全国革命灯塔的城市，而今也为反革命的阴云所笼罩，黑暗代替了光明，全市为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所统治。摆在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否则革命力量必将继续受到残酷摧残。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竑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

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广东省委看到这一形势，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又通过党的关系把大批党的干部、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意与警惕，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

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行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三时左右，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当天上午，广州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便在原公安局所在地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刻颁布了革命政纲，把缴获的武器发给了参加起义的群众。青年学生和妇女组织了宣传队，有的担任了运输、侦察、救护工作。红旗几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额，墙上写满了工农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乌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的广州了。

起义头一天，发展非常顺利。傍晚，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都被起义部队占领。黄沙河对岸的石围塘数百农民，联合铁路工人，也占领了广三车站。市郊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占领了乡村。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敌人恐慌万状。

在广州起义中，又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

敌。起义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插手进行干涉。十二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又出动了炮舰，沿江向我起义部队挑衅，并不断开炮向我市区轰击，派海军陆战队在沙面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总指挥部曾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处在四面包围中的起义部队，虽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顽强的还击，反复争夺，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而奋起领导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后，曾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但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

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广州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在起义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气魄和斗争决心。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籽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南昌起义失败后，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了，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在此形势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方式，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我们当时的头脑，还被城市根据地的思想所束缚，对农民的力量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地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

取得很好的结果。

(载《星火燎原》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访问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 陈郁同志

(节录)

在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的前夕，记者访问了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陈郁同志。他在起义时是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司法委员。记者表示希望知道苏维埃政府包括司法方面做些什么工作。他笑一笑，说：当时一切为了打仗。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指示广东省委，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当时，陈郁同志是省委常务委员。省委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了在广州发动起义的决议。十二月七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通过了马上起义的决议。同时，会议上还选出了十个代表，和革命士兵、近郊农民分别选出的三个代表，组成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半，起义开始了。六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红旗在广州公安局原址升起来了。工农民主政府一成立，就发布了《告全国工农兵群众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公布了许多命令。

陈郁同志说，为什么当时广大工农兵群众不惜牺牲参加起义呢？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进行的革命和提出的政纲是代表

全体人民利益的。

陈郁同志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群众，这在当时是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首先，工农民主政府组织青壮年扩大了武装队伍。起义之初，只有骨干几千人；天亮后，参加起义的已达二万余人。在这些人中，许多都是没有枪的，我们把缴来的武器武装他们。从早到午，共发枪八千枝。

为了扩大和巩固胜利，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上午七时，就派出由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分乘汽车和缴来的铁甲车，高举红旗，在全市各街道进行宣传，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也公开出版了，还印了政府的宣言和各种文件二十五万份。八时左右，宣言和《红旗日报》就散发到了全市。

工农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大力支援战斗队伍。运输、侦察、传递消息、救护、制造军用材料和旗帜等工作，都组织群众去完成。还组织了临时饮食处，把从大堆栈中没收来的饼干，分发给起义群众，组织伙房煮饭。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工农民主政府还组织群众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工贼头目，并进行邮电检查工作。

陈郁同志说，起义群众的觉悟是很高的，一切工作都靠他们自觉去完成。

提起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陈郁同志便沉浸在深远的回忆中。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人们不仅没有被危险和困难吓倒，为了人民的解放，他们更加英勇地战斗着。工人赤卫队在斗争中前仆后继，表现了多么顽强的斗争精神。他们用土

制手榴弹、手枪，甚至铁尺、木棍，对有正规装备的反动军警以至军舰作战。他们配合教导团的一部，不到两小时，就攻下了广州公安局，并独自攻下了城内各区的敌警察署，占领了邮政局、无线电局、国民党省党部和其他反动政府的机关。在敌人反扑的时候，赤卫队逐巷逐屋同敌人争夺，直到剩下两三个人仍然坚持战斗。

这种英勇壮烈的精神，在起义之前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那时敌已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但他们何尝有半点畏缩呢！有两个青年女子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陈郁同志还记得她们的名字，一个是邓金娣，一个是罗大妹，都是共青团员，海员工人的女儿。她们在一德路散发罢工宣言，被捕后沿街高呼“共产党万岁！”其中一个在枪毙之前还高声喊道：“工人弟兄们，我们休息去了，当反革命的国民党未推倒以前，你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工作！共产党万岁！”她响亮的声音，使敌人发抖。敌人只能用叫嚣和对她们进行残酷的凌辱，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怯懦，而英雄们的声音则永远萦回在人们的心中。

陈郁同志在起义之前是海员工会负责人，他说，当时工人的革命精神，是在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培养起来的。工人在斗争中得到了一些利益，但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都被敌人夺去了。资本家不仅降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工时，还任意解雇和开除；谁要反抗，就被加上共产党的“罪名”，马上逮捕。工人们曾寄希望于武汉政府回师广东，但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策划的武汉反革命叛变，把工人的希望化为泡影。汪精卫、陈公博到广州，准备帮助张发奎以“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欺骗群众。第二天，被裁撤和驱逐的工人们包围了汪精卫在东山

住所，游行示威，要求复工；汪精卫拒绝不见，还逮捕了三十多个工人。这样刽子手们的真面目便逐渐被工人们看穿，工人的觉悟也逐渐提高了。工人们是经常在国民党军警的包围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如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就有三万工人在国民党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之下开会，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十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原定举行总罢工、总示威，但敌人到处抓人，警察、宪兵昼夜巡街。对此，工人们便分成一百个组，每组十人，分布全城，到晚上两点钟，警察都以为不会发生示威时，他们突然出现在街头，拿着红旗，散发传单，使警察措手不及。陈郁同志说，那时候，反动政府天天捉人，国民党公安局和南石头监狱，都有人满之患；但是，工人们并不畏缩，天天同敌人对垒、斗争。工人们组织了纠察队，每逢召开群众大会时，就出来保护群众，对付反动军警。在起义开始后，有一万多群众是自动来参加斗争的。

在这日日夜夜的斗争中，培养了许多坚强的战士。陈郁同志谈到这里，想起了他的战友李源和黄苏。这两位同志都是香港罢工工人，李是工人纠察队的大队指导员，黄是纠察队的小队长。起义时，两人都是一个区的赤卫队的指挥员，勇敢非常。起义失败后，李源被任为省委书记。几年后，黄苏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担任一个师的政治委员。最后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但是，烈士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追求的理想今天已经开花结果。

（永学）

（载 1957 年 12 月 11 日《南方日报》）

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①

(记录稿)

大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以后,成立十一军,叶挺同志任军长,我任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自五日以前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沿途没有注意群众工作,许多群众对起义军的性质不了解,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虽然把许多追击的敌人打垮了,却没有注意到要把敌人消灭,而自己在行军和战斗中也伤亡很大。天气炎热,士兵害病和减员现象相当严重。我军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后,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众寡悬殊,在揭阳、汤坑、流沙一带转战中遭受到挫折。失败后除董朗带一个团转入海陆丰苏区,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经赣南转粤北,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转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之外,南昌起义大部分部队被打散。我和周恩来等几个同志,则回到香港,找到了省委。

广州暴动前一星期,省委派我和杨剑英同志由香港来到广州,与原广州的黄锦辉同志一起,参加起义准备工作。当时

^① 聂荣臻同志在广州起义时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

住在八旗会馆对面的一间房子里，晚上回去时，也不敢叫门。第二天，房东看到报上消息登载，我们以米店作掩护的机关被敌人破获，搜出了手榴弹。而这间米店正是我租房子时的铺保。房东趁机敲竹杠，要我另找铺保，或另给押金，否则，要立即搬出。我给了他五十元港币之后，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这时已不是以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的时机。从广东来说，由于大革命时期党在群众中有着较深厚的基础，虽然经“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打击，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杀，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但也不平衡，当时东江的基础好，力量强些。因而，广东各地（主要是在农村）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广州暴动前，广州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斗争是不断高涨的。到十月间，张发奎军阀部队开入广东，他们为了要和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地盘，正在酝酿军阀战争。当时，广东的党组织自“四·一五”事件后，初步整顿了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教导团和警卫团有着相当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教导团方面，在一千三百多名下级军官中，有二百多个党员。教导团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的。这些情况，敌人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面临着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从现在来看，在该不该及可不可能搞暴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当时的办法不外是两条：一条办法是继续潜伏下去，待机而动，

这条办法事实上是行不通,在我们发动之前,敌人已先下手,我们实际上是等待敌人来捕杀;另一条办法,而且也只有这条办法,就是搞兵变暴动,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然后,迅速把队伍撤出来,转移到农村(比如海陆丰)去坚持武装斗争,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有需要也有可能的。中共“六大”决议上把广州暴动说成为“退兵之一战”这个结论,缺乏具体分析,不能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我至今仍对这个结论有保留。

广州暴动是以教导团为主力,警卫团也有一部分参加。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①(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在省委会议上,对暴动条件是否成熟,应如何进行暴动产生不同意见,发动暴动的具体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们认为最好选择在晚上。趁敌人戒备稍松懈,突然动作,胜利的把握较大,而他却坚持一定要在白天,并且还要搞工人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没有看到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一些工人。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在这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他以大帽子压人,批评我们是单纯军事观点。后来,在我们坚持下没有搞总罢工,暴动也是在晚上举行的。

^① 即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罗曼,也译作纽曼,罗乃曼。

在准备广州暴动过程中,收藏手榴弹的米店被敌人破坏,敌人在已部署镇压起义,我们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

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起义前才通知叶挺同志他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的。

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教导团攻下伪公安局后,我便进入公安局,张瑞华同志是四军军医处的,她参加了起义,担任救护工作。暴动这几天,我都在起义指挥部内,我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我们办公的地方在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楼下是一个大厅,我就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工作的还有省委的一些同志。

十一日凌晨起义后,珠江北岸除了长堤的敌四军军部、文德路的一个敌军机关和国民党检察队等少数机关没有攻下,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战斗。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第五军盘踞,隔江和我们打。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的国际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暴动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暴动的工人也很多,如果以这些武器把参加暴动的工人全部武装起来,可以组成一支很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转移到农村,是坚持武装斗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这样广州暴动取得胜利就会更大。

今天来看,广州暴动之所以失败,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

主要是没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同志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决心撤退，因为张太雷已在中午牺牲，省委已无人领导，我回公安局，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两人分头通知撤退，我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同志通知赤卫队。我在公安局看到恽代英、陈郁等省委同志，告诉他们敌人已打进观音山向城内前进，赶快撤退。这时正好有一批敌人冲到公园前，我和一个朝鲜同志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阵，那个朝鲜同志是个机枪手，作战很勇敢。这股敌人退去之后，在指挥部内找不到负责人，形势紧急，而暴动队伍又缺乏统一的指挥。教导团是正规部队，队伍较容易集中，一接到通知，即开始撤退。赤卫队多数分散在各区作战，较难集中，结果还有许多来不及撤出，最后在和敌人巷战中壮烈牺牲。十三日上午，国民党军阀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江，各路反革命军队大举反扑，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看来，广州起义，作为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在我们党的斗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暴动失败后，敌人很嚣张，全市宣布戒严，晚上不准群众

出门,敌人到处搜查,搞得人心惶惶。暴动工人牺牲很多,外省籍的人牺牲也多,敌人凡捉到不懂广东话可疑的人就杀。我回到住处,不敢立即进门,坐到天亮才进去,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

我到香港后不久,省委要我去韶关一趟,任务是去和朱总司令所带那支队伍取得联系,并通知他们广州暴动已失败,可向湘南一带转移。我到韶关马坝时,朱德同志已带队伍走了。锦辉同志则被派去追寻教导团,经花县附近被捕牺牲。

广州暴动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和检讨暴动失败的原因。会议由中央派李立三同志主持,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而采取惩办主义,处分了很多同志。省委把这个决议送到中央后,中央对李立三同志这个做法不同意,派周恩来同志来处理这件事,对大批处分同志提出了批评。以后,省委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广州起义,正处于革命低潮,广州市的许多群众组织受破坏,省港罢工工人很多已回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形势下,企图以城市武装暴动而长期占据广州建立广州苏维埃。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一个军事暴动,发动了兵变之后,把部队从城市撤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则是正确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广州暴动时,对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暴动只坚持了三天,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革命的人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在

城市发动了军事暴动之后，如何将斗争坚持下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必须将起义的队伍迅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发展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游击战争，在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使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斗争锻炼，以取得敌我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最后将敌人打倒。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思想。这一点，对于今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斗争来说，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1978年6月30日黎显衡、林鸿暖纪录于北京。

记录稿已经聂荣臻同志本人审阅。)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①

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复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这样的训练，直到起义前几小时仍没有停止。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① 广州起义时，徐向前同志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联队长。起义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代理红四师师长。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摩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城里格外沉寂，大街小巷显得十分肃静、紧张，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这时候各区的工人赤卫队也都集合起来了。正象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出来。

大约是夜里两三点钟，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第六联队冲出了巷口。马路上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第六联队得了几支长枪，立刻武装起来，控制了大街小巷，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上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的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第六联队的一部分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领到了很多缴获的武器、弹药，部队全部武装起来了。这时它已变成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大部分据点早已被我们占领，只有一些残余据点里的敌人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江门增援到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第六联队的任务是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作战，一部分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后面的人又搬起了弹药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跟着来的人又冲了上去。联队的党代表，在观音山反击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地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英勇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但是，他那种英雄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

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近迫，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联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第六联队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幸遇到教导团的一位姓朱的同志由此过路，他一见到我们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快，到黄花岗集合。”

我们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墟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部队向广州以北的花县方向撤退。地主的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设下埋伏，企图消灭我们。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的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象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来就杀掉；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活着的同志，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加之敌我力量相差太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在战斗中受到考验和锻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了，一千二百多人撤到了花县。

十六号，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出的部队如改编为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为一团，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成一个师。可是，编为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推选叶铺同志为师长。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人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在城外日夜围攻。我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派出打听消息的人，一天、两天，杳无音讯。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于是，便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去，那里面临大海，背靠大山，而且早已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

晚上,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发动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了海丰城,正式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象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的声音宏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两县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龙,使陆丰与普宁联成一片。此外,还打通了向东与潮阳游击队的联系。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人民政权存在下去的，他们不久就开始了海、陆丰红色区域的“围剿”。黄旭初部队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占据了海、陆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地区。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这支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仗攻城，不注意巩固根据地，再加上对工农武装割据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积极建设革命武装，因而，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缩小。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下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山盖。正象唐代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斗争着。

（载《星火燎原》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回忆

(记录稿)

我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一篇简单的回忆《广州暴动及其准备》，已经将我能记忆的事实写出来了。现在又过了三十余年，当然不会记什么新事实来加以补充，不过那篇回忆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本文未提暴动是怎样镇压下去的，其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须另有专文评论之。”我当时之所以不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恐怕把领导上的缺点写多了，会被反对暴动者利用，写少了，又不真实，所以我就完全不写。而且那本纪念广州暴动的小册子^①又是公开刊物，所以我便不想写了。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我在这里把当时没有说的话，说出来。

“四·一二”和“四·一五”国民党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后，我们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愤恨的，恨不得马上起来和蒋介石拼命。无奈他有军队和武器，我们却连破枪也不多，又没有军事训练，那晚上去攻公安局的时候，我还是在半路拿到一个警察的枪，根本还不会开枪，就跟着队伍去冲公安局了。工人中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是不会开枪的。因为中国的兵是雇佣兵，不是征兵制，

^① 指1930年12月25日由无产阶级书店出版的《广州公社》。

工农没有军事训练的机会，武装暴动时就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很自然的。大家都会想到一、二年前我们以为只要争取群众，国民党有军队是不要紧，此时悔之已晚。

虽然如此，大家都是想暴动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一则是复仇，二则是建立新的国家。

国民党开刀的时候，我还在汉口，这是党的五次代表大会之后，领导上决定我回广州。我在五月二十一日离开武汉，五月二十四日到上海。六月七、八号左右离上海到香港，不记得中央有没有和我谈过话，只记得有人叫我找鲍顾问，我找到了鲍顾问。他告诉我，回到广州要组织各种破坏工作，如破坏水陆交通、工厂等，使反动政权不能维持。他又叫我找汪精卫，汪说陈树人在香港，可与他联系，又给了我一张八千元的香港支票作为活动经费。

鲍顾问的话很合我的胃口。我很兴奋来到香港，因“四·一五”之后许多同志都逃到香港，广州还留下一个市委，当时在香港的杨殷、陈权和其他的人我都不大记得了。我把支票交给杨殷，由他托人取出来，交给党用，当然不给陈树人了。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有了个行动委员会，我和杨殷同陈树人等会过一次面，以后就没有见过了。

大家都觉得进行破坏工作是对的，不过也感觉困难。六月底，我就到广州去了，经常与市委书记吴毅、工委书记周文雍一起商量工作。一般都是个人接头，开小会，不开大会。“四·一五”之后的一切斗争（见我的回忆和别人的著作），都是由他们布置的，我来了也有我的一份。周文雍负责广州工人代表会和工人赤卫队工作，当时的工人斗争是很高涨的。

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是黄锦辉，他原来是周恩来任军委时的军委秘书，他介绍了教导团的情况，还谈到了叶剑英的情况，我记得他说叶剑英很接近我们，问题好象是要吸收他入党。为了这件事我曾经会过叶剑英一面(原来不相识的)。

不久，大概是八月底，张太雷来了，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开过“八·七”会议，推翻了陈独秀，成立以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等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又知道中央认为当时是直接革命局势，应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成立苏维埃政权，大家都赞成这个政策。我只怀疑“苏维埃”三个字是否广大群众所能理解，不过中央既然用它，其中必有缘故。我们是按照中央的意思，继续工作，实行暴动。

广州的主要工作是：党内的组织宣传工作，广州工代会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反对改组委员，反对雇主的斗争；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反对驱逐工人出宿舍的斗争，曾因此放火烧了几间宿舍；赤卫队工作，包括广州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的赤卫队；出版刊物《红旗》等，散发传单。

我记得在十月或十一月初，曾经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去过一次，但到上海后的情形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和周恩来一起，乘一路电车到四川路参加会议，车经南京路时遇见两个青年在车上，他们同周恩来彼此招呼，我想不妙，车一到站，我就叫周恩来下车，眼看两个青年没有跟下来，我们才绕小路到目的地。在那里，遇到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德国共产党员，罗当天就要离沪回国，纽曼留下来。我记得某天晚上到过拉祖英娃家里，纽曼也在那里，向他们报告了广州斗争的情形。

回到广州不久，纽曼和另外一个外国同志来了，据说此人是暴动专家。这是汪(精卫)、张(发奎)执政的时候，群众的斗争也激烈，在我的回忆中也有记载。我们就谈起组织暴动了。我们是指两个外国同志、太雷和我，决定成立一个三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太雷、文雍和我。太雷除全盘工作之外，还担任军事工作，文雍负责赤卫队工作。

我们决定暴动的原因是：我们领导下的广州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经过历次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教导团完全可跟党走，敌人在市内的兵力薄弱，海陆丰苏维埃已成立，省内各处农民中我们都有基础，因此认为有力量击溃广州的敌军，再联合农民暴动来扩大势力。现在看起来显然是幼稚的，但是当时确实以为有成功的希望，广州成功，全国的局势也可以扭转过来。

记得纽曼曾经说过，苏共就要开大会，如果广州能支持八天，也可以在大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还记得在一次有一、二十个党员的会议上讨论暴动的时候，有一个印刷工人的领袖(名字不记得了)发言，觉得不能暴动。但是他是唯一这样想法的人，会议没有采取他的意见。还记得有一次决定暴动之后，太雷和我两人在一起，他问我是否应该暴动，我说当然。这样一来，他作为省委书记，当然也不顾一人反对了。事后常常想起这两件事，悔恨自己不应该这样不肯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此没有商量余地的样子。

我以为太雷当时想重新考虑是否暴动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不过恐怕被认为临阵动摇而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当时赤卫队的武器这样少，又没有军事训练，总罢工也罢不起来，即使

罢了,也只是一部分,因为重要的产业,都在机器工会手里,手工业工会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广东总工会手里。海陆丰也太远,其他各地的农民暴动也没有把握。近郊比较起来,不如其他地方农民那样强(这恐怕是各大城市,近郊农民的一个特点),也许太雷还有其他的考虑。

因此暴动的主要战斗力量就放在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千七八百人的身上,工人在暴动的过程中,取得武器后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太薄弱了。敌人方面当时虽有张、李之争,但是共产党领导暴动时,他们可以暂时联合反共,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海军虽然薄弱,但是抓在敌人手里,对我们也是极危险的。此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兵舰停泊在白鹅潭,事实上使我们无法渡河打河南。因此反革命有可能使用河南作为反攻的根据地。

有人说,当时应该逮捕住在东山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这肯定是对的,但是事实上工人赤卫队武装薄弱,没有希望缴他们卫队的械,而教导团的任务繁重,也没有余力到东山,甚至在长堤敌人的军部也无法攻下,因而牵制了我们的行动,由进攻转为防守,事先以为河北的敌人肃清后,就可以分兵渡河攻打李福林部队,但是长堤攻不下,就无法分兵渡河,由进攻转为防守,这是任何武装暴动的死路。当时不是不知道这条道理,而是力量薄弱,无法继续进攻。

赤卫队在夺取政府机关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全盘的了解,我是跟着教导团打公安局的。到了公安局没有看见什么赤卫队,而是由教导团开了几枪,就冲进公安局了。其它的机关是怎样占领的,希望知道的同志谈谈,我的印象好象是赤卫

队没有枪，无力单独攻打军事机关，而只能在自己的军队到达后，才能随着军队进攻。

上面这段话，是随着自己的思路写下来的，很凌乱，只能表示我现在的想法，以为当时暴动的领导人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和高估了农民会随广州暴动而起的可能性。

此外，在领导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暴动前，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要叶挺领导军事，杨殷领导肃反。他们当时都在香港，革命委员会以为他们可以在暴动前几天回广州就可以了，早回来有多点被捕的危险，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暴动不是一件简单事情，拿上手就能做的，而是需要每个参加者，尤其是负责人，事先详细研究讨论的。所以叶挺在暴动前第一天晚上的会议上抱着头，不发一言，正表现了他对于这次暴动应该怎样进行，事先没有时间详细考虑。何况这又是一场巷战，与普通战争不同，叶挺也是没有经验的。韶玉在他的文章《广东暴动纪实》中说叶挺迟迟不到广州，暴动后又不积极，是怠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公道的，难怪叶挺一气就跑到德国去了。一九二八年冬，我到柏林参加反帝同盟的会议，曾经看见他。当时在柏林的有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但是叶挺并不同他们来往，而是同我们在柏林的同志们来往。廖承志当时也在柏林，当然知道更详细，叶挺和我谈话中还是念念不忘广州暴动，甚至说我们要使用毒气对付敌人，因为他们的兵力大，这不过是他当时脱离了党的领导，在失望中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距离广暴一年之后，还在想怎样战胜敌人，敌我界限是划得清楚的，抗日战争中，他的立场更是证明他对党的忠诚。

杨殷在肃反工作上也使人感觉他不够积极，这也难怪。肃反是一件需要仔细准备的工作。他来到广州不到一两日就暴动，那里有时间来筹备呢？

写到这里就想起当时不要总同盟罢工，只要军事行动，不细心组织工作，而以为暴动后各地农民会自发暴动起来，为了秘密起见，革委只要三人，而其他主要负责人都可以临时加入——这一切都说明领导人的错误心理。那就是：重视军事，轻视群众，不重视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幻想群众的自发性；重视秘密，而轻视各级领导人对暴动要充分赞成，要有信心，要有时间考虑和准备。我们要把当时工、农和我们影响下的军队的革命热忱和我们领导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负责的孤注一掷的侥幸心理截然分开。不能因为前者而认为领导也对，也不能因为后者而认为群众当时不是暴动而是盲动。当时工、农和我们领导的军队的确是同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随时可以起来和它斗争，如果党的领导正确，这支力量至少在广东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不过毛主席的路线当时还没有被全党认识，在中央当时关于革命形势高涨和暴动夺取大城市的路线下，广州领导同志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三人之中我的错误特别大。

暴动前还讨论了叶剑英的问题，是否事先告诉他暴动的打算、时间和计划，他当时似乎还不是党员^①，我们以为他虽

^①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党史资料》第七期传记(四)《叶剑英传》记述：叶剑英同志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跟我们走,但是在敌人军队中毕竟是有相当地位,不宜把我们暴动的计划告诉他。所以叶剑英事先是不知道的。我记得十一日早晨,我在公安局门前看见叶剑英和另外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了)来到公安局门前人群中,他同我打了招呼,我把他带给太雷还是叶挺记不清了。

暴动后,我们很顺利地占领了许多重要机关,但是中央银行旁的军部无法攻下,因为这个军部面临长堤;河上有敌舰游动,我们无法从正面攻,后面又有别的房屋,敌人居高临下,很易防守,我们屡攻不下,受了极大牵制,当时想攻下这个军部后就渡河攻河南,但是始终攻不下,我们的军队,不能继续进攻,这就注定了暴动的失败,不但进攻河南或其它军事行动成为不可能,甚至全副力量放在如何消灭敌人这个据点,以致政治工作、群众工作都受到影响。第一天的群众大会没有开成,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很好地分出一部分人去作工会工作。有许多自己来到司令部的群众,也没有很好组织起来,军事工作直到失败都没有什么进展。

第一天晚上,太雷在公安局的办公室内召集会议,他讲了话之后,叶挺没有发言,他坐在桌边用两手撑着下巴,情形很不好。后来总算决定第二天早上四时进攻敌人长堤的军部,中午召集群众大会,但是仍然攻不下来!

中午开群众大会时,似乎我和太雷一起坐汽车去的,后来又怎样回到公安局,我就记不得了。只记得下午一、二时,有二、三百罢工纠察队集合在公安局的场地上,我和工作同志一起将他们编制好了,我就同他们讲话,然后他们就按计划开到黄沙粤汉铁路去作战。他们走后,天色已暗,大约是下午四、

五点钟，我回到公安局办公室，一看什么负责人都没有，有人告诉我，刚才敌军从大北门冲到距公安局不远，被我军击退了，叶挺等到财厅屋顶楼上去观战了，张太雷上前线了。到黄昏时，有两名工人到来说，刚才敌人由大北门冲进来的时候，太雷亲自带队伍上前线，半路被乱枪打死，并且把太雷的一只挂表给我。军事人员一个也不在，显然情况严重了。

天黑以后，我也觉得大势已去，苦在自己不懂军事，也不知道找谁来收拾局面。我就召集在场的几个文书同志讨论，我说情况紧急，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我建议叫恽代英同志转入地下，将来为这次英勇斗争写历史，大家没有异议，通过。我们在公安局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神志恍惚，似乎是在等敌人来到时壮烈牺牲而已。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来了总参谋徐光英，他说敌人十五分钟就能来到公安局了，建议非军事人员转入地下，军队的撤退由他负责，决定撤往花县和东江。原来很泰然的情绪，被他的话破坏了，恐慌代替了沉着，在座的几个人（我不记得那几个了）只好同意他的建议，离开公安局，转入地下，以为还可以继续在广州市秘密工作。走出了公安局不远，遇见周文雍走来，我就将徐光英的话告诉他，并且说他也应该转入地下继续工作。我只记得徐光英自告奋勇地负责撤退，完全忘记了周文雍原来是负责赤卫队的，虽然曾经决定将军队和赤卫队的指挥统一起来，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办到，周文雍留下来自然是有益的，以后事态的发展我不知道了，也同大家一样从参加者的口述和回忆中知道一个概况。

另外，还应该补充这样一个事实：

广州苏维埃政府一成立,除了发表国内政治宣言以外,还发表一个对外宣言,其基本内容,据我所记得的,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反动政府所借的外债,收回租界,准备在平等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准备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在我所看见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这个对外宣言。

一九六二年四月

《对广州起义回忆》的补充

(1)广州起义,据我的记忆,是根据中央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和我们广东的情况决定的,具体点说,中央当时认为中国还是处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我们要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广州当时情况是工人不断地在和汪精卫、张发奎的政权斗争,教导团在我们手里,海陆丰苏维埃已成立,农民运动在广东各地本来就有基础。“四·一五”之后受到土豪劣绅加倍压迫必然愤恨在心,广州市敌人的兵力也空虚,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力量夺取政权,加上各地农民暴动,我们就可以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扭转全国革命的形势,我们就决定暴动,并得到中央批准,日期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在十一月初,因为暴动的准备工作似乎是只有一个多月的光景。

暴动是太雷、文雍和我决定的,没有经过省委讨论,吴毅是知道的,其余的省委委员恐怕有不少人还在香港,人名我不记得了。

(2) 暴动失败后李立三到香港，我们在广州的同志也应召分头赶到香港开会。当时同志们很不满领导，不赞成暴动的那位印刷工会的同志^①似乎很受重视，各负责人都受到不同的处分，我是派到西江去做农运，吴毅、周文雍派到广州市工作，其他的人我不记得了，立三当省委书记。

我将要出发的前两天，中央有信来叫我到上海去，中央当时已略有所闻，并认为在失败之后把矛头对着自己人不好。我到了上海，中央派邓中夏到香港来纠正立三的做法。

为了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我也到莫斯科去了，同行的有杨殷和另外两位广东同志，到了莫斯科，就听到“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退兵时的一战”，这就成为“六大”对广暴的估计。我觉得这样估计是正确的，可惜瞿秋白和李立三先后领导的中央，只采纳了这个估价，而且没有根据它的含义来做出必要的措施，而且做出了与它相反的措施。

所谓“退兵时一战”或译为“殿军之战”，俄文是 армер-гарний бай。我认为是指大军撤退时，由殿军保护其撤退，而与敌人进行的战斗，既然说“广暴”是中国革命退兵时的一战，那显然表示由于力量悬殊，中国革命不得不暂时撤退。既然撤退，那么城市里怎样还能继续暴动路线呢？

除了这个估计之外，斯大林还有一句话，我记得，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因神经极端衰弱而到郊区去休息。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了一部汽车来接我回去，这部汽车一直送到莫斯科河后面的一家普通房子里，这是下午二、三点钟模样，一

^① 指省委委员黄强亚同志。

进房门就看见斯大林和中国同志们坐在一张长台旁边，中国同志中有秋白、恩来，翻译中有王明等，米夫当然在座，谈话将结束了，我坐在斯大林对面，我不知道对斯大林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我说：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内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领导这个农民革命，其成绩的大小，将取决于它在战争过程中能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可能个别的字会错，但是意思不会记错的。

我以为，由斯大林对“广暴”的估价和上面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革命已经退兵了，今后要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革命，组织武装队伍。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同毛主席的看法完全一致的，只是第三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中央都还没有认识这点，而犯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错误。

这是我大胆的看法，作为历史资料写出的，因此错误之处，在所不计。

1962年5月1日

上文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广州时，一位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与我谈话的记录，当时没看到。这个记录，现在看后，略加修改。

黄平 1978年1月25日

于上海复旦大学

战斗中的教导团

李伯堃^①

一九二六年底，黄埔军校一部分师生到达武汉，成立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招收新生。不久，又把张治中的一个教导团（或叫学兵团）归并起来。还成立了一个女生队。

我原名李云鹏，原任军政学校军事教官，改编时第二营营长宋湘涛把我拉去当营附。

教导团的党组织活动，从武汉南下前已经停止，后来到了韶关才恢复起来。当时党的负责人是王侃予和唐维（两人都是四川人），王是政治干部，唐是学生，专任本团国民党特别党部工作。在团里，营级干部党员只有我一人，连长全部是党员，排长大部分是党员，学生党员约有二百人。到了韶关，有一天晚上，王侃予通知我到团长住室楼上开会，有干部、学生代表三、四十人参加。因叶剑英团长也出席了，我才知道他是党员。到广州后，我们联合一些进步师生，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半公开活动，开过一两次大会。为慎重计，党内活动还是采取个别联系方式，未开过人数众多的会。

十一月间，粤军向桂系开火了，张发奎为弥补兵力不足，

^① 李伯堃原名李云鹏，起义时被提为教导团团长。

又把枪枝发给教导团，并要我们负责接收驻地附近的一些桂系单位。我就是在这时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的。

有一天，王佩予约我到市内一个小院子里开会，这个地方是在永汉北路向西拐再向北拐的一个小巷内。我团去出席会议的，除我外还有几位连长。我们进入会场不久，张太雷同志来了。他中等身材，瘦瘦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给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说：“粤军和桂系之间的矛盾太大，已顾不得对付我们了。”又说：“自武汉当局背叛革命后，我党一时未有对策，有的同志主张到外蒙建立根据地，再图向南发展。”他对这种想法作了批判，并指出：“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领导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来，在这个地点，他还召集我们开过四、五次会，具体商议起义的部署问题。参加这些会议的除我团人员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是徐光英，是负责军事工作的；一是梁秉枢同志，是第四军警卫团长，他说他只能掌握一个营。

十二月初，粤军都开往西江与黄绍竑部作战，留在广州的只有我团和警卫团、炮兵团（炮兵是改编东北军的），兵力甚为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教导团反动参谋长朱勉芳请叶剑英团长向师生讲话，企图安定人心，那知叶剑英同志却大讲海陆丰农民起义的胜利和镇压土豪劣绅的情况，使群情更加振奋，朱勉芳的希望落空了。海陆丰起义后，苏维埃政府曾有人来联系，请我团派人去参加庆祝苏维埃成立大会，我团即派出代表秘密前往。

十二月十日是星期日，当天晚上在市内开了一个会，决定起义就在当夜发动，并把教导团改称红军军官教导团，任命我

为团长，叶鏞、赵希杰、饶寿柏任一、二、三营营长。分配任务如下：我带队赴沙河解决炮兵团；似由徐光英率领一部分攻打伪公安局；另一部任务我记不清了。散会时，张太雷同志介绍一位青年给我，要他携带一个包袱，同我回营。包袱内是作领导用的红布条，这是红军的标志。

十一日凌晨两点钟，张太雷、叶挺和徐光英来到四标营，在团部后边一间屋子内，宣布叶挺为红军总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队伍分头向攻击目标进发。我带领第二营和炮兵连向沙河前进，途中收缴了一个公安分署的枪。到达炮兵团后，先头部队首先开火，我部也将敌营包围起来，进行攻击，不久，便从敌营内传出：“老乡，别打啦，缴枪喽！”的声音。这时，我发现炮兵连长英勇牺牲了。他是走在队伍前头侦察敌情的，当接近炮团门卫时，他命令卫兵缴枪，卫兵进行抵抗，而他自己的手枪卡了子，因而牺牲了。敌卫兵也立即为我军击毙。

收缴武器完毕，天已明亮，叶总指挥派了一个学炮兵的朝鲜同志来，要我们把炮团事交给他负责。这位朝鲜同志不大会说中国话，是由翻译传话的。我乘汽车回市时，途中遇见的游行队伍，边走边喊口号，我在车上也跟着他们喊口号。不久，我来到设在公安局里的红军总指挥部，看见院里放着一张桌子，一位女同志正在给工人赤卫队分发枪枝并进行登记。办公室设在正面西楼下，是个三开间，北面两间没有隔开，叶挺总指挥靠北墙坐，叶剑英同志和第四军一位中校参谋都戴着红领带靠西墙坐，我同他们打过招呼后，即向叶总指挥报告收缴炮团武器的经过。那时粤汉铁路车站的残敌仍未肃清，总指挥命令我往市北山脚较高处侦察炮兵阵地，向车站发射几

炮，还嘱咐我不要打到沙面地区，以免惹起外国人干涉。于是，我立即带着炮兵连排长前去执行任务了。

我到永汉南路长堤口巡查，饶寿柏带了几个人乘着缴来的铁甲车在附近跑了几趟，肃清了一些零星残敌。这时，市内已基本上在红军控制之下，只有第四军司令部、弹药库和李济琛公馆（李本人不在广州）还未拿下。这几个据点，我们都分别派出几十人和敌人对峙着。

我巡视到一据点，发现第三连朱连长鬓边受了轻伤，绷带将一只眼睛遮住了。我劝他回去休息，他却坚持留在前线和敌作战。

苏兆征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张太雷同志办公的地方设在红军总指挥部西楼南边一间屋内。他曾要我到临时医院去慰问伤员，布置专人负责登记伤亡人员的事迹，报告苏维埃政府进行抚恤。临时医院由教导团军医处组成，地址在四标营，收容了伤员数十人，其中有梁秉枢同志。我通知了唐维同志，请他负责伤员登记工作。

我们攻下伪公安局后，即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再把伪官吏关进这些监狱中。黄昏后，几个新犯人从南楼夹道抬着一具尸体出来，叶总指挥嘱咐将尸体秘密掩埋。我问：“这是什么人？”叶说：“是白俄。”我想，他的双手一定是沾满苏联人民的鲜血了，无论跑到那里，都逃不了应得的惩罚。

入夜，我到永汉南路巡视，发现还在顽抗的敌人躲在路东的铁栅门内用机枪向我军射击，我军则利用路边楼房的砖柱作掩体，与之对峙。当时没有手榴弹，缺乏有效手段拔敌据点，令人焦急。这天晚上，苏联顾问找我陪他到无线电台去，

把广州起义的情况发往海参崴，希望苏联派船来支援。但到了电台，台长和报务人员都不知往那里去了，电报发不出去。我们同车转往四标营教导团驻地，看见各连队门前的队旗还是国民党的徽号，苏联顾问便指着队旗说了些什么，我从翻译那里明白了他的意思后，即令各连将队旗撤去。

在起义中，三次的口令都是我向张太雷同志请领转发的。十一日晨是“暴动、夺取政权”。十一日晚是“赤化、土地革命”。十二日是“肃清、巩固广州”。

十二日晨，据报敌军由韶关乘车南下已迫近北郊，总部命令我团调一个营去扼守观音山，我接到命令后，立即派第三营前去。听说去扼守观音山的还有工人赤卫队。近午，饶寿柏来求援，我命令第二营待令，同时请示叶总指挥，他指示不能再增派队伍。下午，少数反动派已潜入市区进行扰乱。因我未给饶寿柏派援军，他又到总部来向我发牢骚，要求我到前线视察。我即随他前去，登上观音山，在战壕内走了一趟。在那里，双方都无重火器，敌人仰攻，一时尚难迫近。下午四时左右，我回到总部时，张太雷同志已牺牲，其他领导同志也不见了，只见两个苏联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苏联顾问。这时，翻译告诉我说，已经决定：部队在黄昏后向花县方面撤退。听到这个消息，我即同身边的官兵廿余人，一同登上卡车，向黄花岗撤退。

我所了解的广州起义(节录)

程子华

广州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军官教导团的前身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第一分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青年。我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入伍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学校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以后又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当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兼任团长。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是汪精卫的亲信张发奎。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张发奎为了扩充实力,另找地盘,率第二方面军向江西进发。“八·一”南昌起义以后,起义军南下广东,打算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李济琛(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率部攻打起义军。张发奎趁广州空虚之机,于十月初占领广州。这时,汪精卫、张发奎冒充国民党“左派”,发动了“护党运动”。所谓“护党运动”,就是汪精卫、张发奎和桂系军阀争夺地盘进行的新军阀混战。桂系军阀在广西的部队,为了夺回广州,沿西江向广州进攻。张发奎的主力第四军被派往西江和桂系军阀作战,维持后方秩序的主要靠教导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左右，教导团党组织对所谓“护党运动”进行了讨论。大家认识到，汪精卫、张发奎已经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叛变了革命。他们声称什么“要在夹击中奋斗”，一面反对蒋介石，一面打倒共产党。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反对蒋介石是假的，消灭共产党才是真的。我们必须积极准备，在张发奎下毒手之前进行暴动。当时张发奎的主力第四军正在西江同桂系军阀作战，广州空虚，给武装起义造成了一个好时机。

当时的广州，敌人方面正在加紧部署反革命阴谋，在我们方面，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气氛十分紧张。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阶级已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准备，迎接武装起义。

十二月十日晚，教导团首先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监视教导团行动的参谋长朱勉芳和其他反动军官。深夜十二时左右，连里党的负责人传达了马上准备暴动的指示，并要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所在的一营一连，任务是攻打国民党反动派在市中心的反动堡垒伪公安局。当我们冲近该局时，工人赤卫队已经把它包围了。反动军队在铁甲车的掩护下，向工人赤卫队猖狂反扑。教导团以强大的火力压住了敌人，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砸开铁门，冲进了大院。守敌在大楼上负隅顽抗，我们迅速地消灭了守卫在楼梯口的敌人，便冲上了大楼。敌人见我们冲上了楼，一个个都战战兢兢，举手投降了。黎明前，我们已完全占领了伪公安局。起义军总指挥部就在这里，广州苏维埃政府也在这里宣告成立。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省委书

记张太雷同志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恽代英同志任秘书长。

天亮以后，起义军已基本上控制了广州市。虽然局部地区的战斗还在进行，但广州已经沸腾了。第一次解放了的广州，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革命红旗到处飘扬。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张发奎急忙从各地调兵，帝国主义从珠江口开来了炮舰，炮轰广州城，敌李福林部（当时驻扎在珠江南岸）在帝国主义炮舰的掩护下企图在珠江北岸登陆。我们接到了保卫长堤，阻击敌人的命令后，立即沿着江北长堤的小铺边打边前进。挂着英国国旗的军舰用机枪向我们扫射，火力很猛，不少战友中弹倒下了。我们在沙面一带用沙包构筑工事，向敌舰还击。兄弟部队还拉来了几门大炮，几排炮弹把敌舰打跑了，李福林部登陆的企图也未能得逞。长堤的形势缓和之后，我们被调回总指挥部作预备队，并担负保卫总指挥部的任务。

十二月十二日中午，我们在西瓜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太雷同志到会讲话。这时形势已很紧张，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围拢而来，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激烈。散会以后，张太雷同志在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到从观音山上冲下来的敌人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张太雷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广州起义的卓越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同时也激起了我们向反动势力讨还血债的复仇怒火。

战斗进行到十三日，涌入城里的敌人越来越多，一股股敌人不断向总指挥部扑来。当天早晨，我们奉命去阻击敌人。我们在四牌楼和敌人遭遇时，敌人已经控制了南北四牌楼的整

个街道。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南四牌楼，一路攻打北四牌楼。我参加攻打南四牌楼。开始时，我们沿着马路往前冲，因街道很窄，而且敌人在楼顶上向我们射击，形成交叉火力，使我们伤亡很大，难以前进。后来，我们改变了打法，和敌人展开楼房争夺战。马路两边都是二层楼房，我们和敌人逐个房间逐个房间地争夺，逐层楼逐层楼地争夺，夺得一个楼房即占领楼顶，控制一段马路，掩护队伍继续夺取其他楼房。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敌人死伤惨重，我们打得也很艰苦。直到下午，我们才完全控制了南北四牌楼，来到永汉路。这时我们的营长叶镛同志来看望我们了，他指示我们就地休息待命。我们远远望去，看到敌第四军军部弹痕累累，已被我们攻下，但攻打敌十二师师部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观音山(即越秀山)是广州的制高点，一直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在起义前观音山由张发奎的亲信部队第四军警卫团一营驻守，十一日早晨，被我起义部队占领了。中午以后，敌薛岳部、李福林部轮番来攻，几次冲上了山头。起义军英勇奋战，多次击退了敌军，重新控制了阵地。到十三日下午，起义部队已伤亡众多，敌众我寡，观音山终于被薛部的莫雄团占领了。

观音山失守后，整个广州已失去制高点，坚守已不可能。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出广州。十三日晚饭后，我们向广州东北方向突围，撤往沙河。途中遭到了资本家组织的商团的袭击，我们将他们击退后，连夜向花县前进。这时，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大家疲劳得很，边走边睡，有的同志过小山时滚进了山沟。次日晚，我们到达花县的象

山露营。第二天早上，又遇到地主的反动武装——民团来围攻。这时，刚好徐向前同志来了，他说：“民团松得很，你们就冲吧，一冲他就跑了。”我们一个冲锋，敌人果然仓惶逃命了。在花县，几乎村村有民团，我们过一村就要打一仗，所以直到十五日下午，才能到达花县县城。十六日早晨，民团又来攻城。因为民团不断骚扰我们，同志们早就憋着的一肚子怒火，这时都一齐迸发出来，猛打猛冲，打得他们死伤遍野。打过这一仗，民团知道了起义军的厉害，再也不敢来骚扰了。此后，我们每过一个村子，都看见他们在村口插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

起义部队在花县县城进行休整，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十二月十七日，召开了红四师成立大会。在会上，叶镛同志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正式成立，王侃如同志宣布师部及各团干部名单：叶镛同志为师长，王侃如同志为党代表，袁裕（袁国平）同志为参谋长，贺国忠同志为参谋处长，贺诚同志为医务处长。师下设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十团是我们营改编的，徐向前同志任党代表。红四师这支人民的军队，在经历了广州起义这场战斗洗礼后，光荣地诞生了。红四师成立以后，决定到海、陆丰苏区去，和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转移，也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节录)

刘祖靖^①

一

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这个团的前身,是大革命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有男女学生四千余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军阀夏斗寅及杨森所部于五月间先后向武汉进攻。该校在抗击夏、杨的反革命武装进攻时,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在武昌土地堂战斗中,协同叶挺部队打败了湖北军阀夏斗寅;在鄂西战斗中,协同李富春、林伯渠领导的第二军、第六军的部分队伍,打退了四川军阀杨森,保卫了武汉革命政府。同年七月中旬,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命令该校把枪交给国民党,解除了该校的武装,学生因而大量逃亡,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国民党军阀张发奎趁机利用一部分学生扩充其势力,将他们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全团学生仍有一千七百人。该团名义上隶属张发奎,但实际上是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

^① 本文作者是原教导团的战士。

组。

八月三日，教导团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武昌开拔，分别乘招商船顺流而下，被国民党军阀何键部阻止前进，当夜在黄石港停泊。警卫团乘黑夜登陆向江西开去，因未赶上南昌起义部队，遂在江西修水、铜鼓一带活动，以后成为秋收起义的第一团。教导团与何键几经交涉后，翌日晨始得继续东下，于八月四日抵达九江，却被张发奎解除了武装。张发奎对全团人员说：“你们有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可以站出来，由我派人送往南昌叶、贺那里。（注：这时我们才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贺龙、叶挺部队还在南昌，内心都很兴奋。）我们是殊途同归，决不加以迫害。如不是共产党员，则留团安心学习，在营待命。”我们都洞悉张发奎的奸计，没有一个站出来。这时，教导团的党组织作了紧急布置，凡是党员面目已经暴露的，应迅速离开；如未暴露，则坚决留下进行活动。当时，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为了保护这支革命力量不被反动派消灭，向张发奎建议兼任教导团团长，从此把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称为第四军教导团。当时张发奎为了和广东的李济琛抢地盘，打着回师广东、准备第二次北伐的旗号，率部向广东进发。叶剑英同志利用了张发奎这一行动，也带领教导团南下。教导团到南昌后，只剩下一千二百人。叶团长看到大家情绪动荡不安，对学生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整顿。他亲自向全团人员讲话，指出干革命是任重道远，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了，接着给全团发了枪支，教导团又重新武装起来了。

八月二十日，叶团长率领教导团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行至吉安，叶团长又对全团师生讲了一次话，他指出我们决不屈服，要继续革命，回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新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他亲自率领教导团行军，和战士同甘共苦，长途跋涉，很少见他骑马。

行军到广东南雄时，叶团长准备到广州开会之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抓住行军间隙进行军政教育，整顿军容，按时出操上课，恢复各项制度，因我团是军官教导团，要在第四军中起表率作用。他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会后，叶团长即赴广州开会去了。

教导团于十月初到达韶关，休整待命，准备欢度“双十”节。十月十日，上级通知八时集合，九时开会。离开会还差半小时之际，突然主席台出现一个军官，手拿一张纸条，宣称：“奉张总指挥急电，有人密告教导团要在韶关双十日举行暴动，配合贺、叶军夺取广州。为了维护后方安全，防止万一，着令教导团自动交出武器……”电文还未念完，教导团各连不约而同立即持枪跑步退出会场。国民党令二十五师包围我们，双方对峙，教导团处境危险。到了中午，教导团团党部（注：我党党组织对外还是称团党部，分头派人到各连去作说服工作，指出演成这个事件敌人是有预谋的，我们毫无准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能作孤注一掷，各连回到驻地，静候上级处理。不久，二十五师都撤回营地去了。我团各连也返回驻地，以连为单位把枪枝收集起来了。这是教导团第二次被缴枪的经过。

十月下旬,叶团长从广州来电报,令教导团开到广州,进驻四标营。叶团长又对全团进行了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并要张发奎重新发了武器。但张发奎对该团仍不放心,派他的表弟朱勉芳为教导团的教育长(参谋长)。朱勉芳是张发奎的亲信,曾留学德国学军事,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另外,还派了几名亲信到教导团担任营、连长,企图进行控制。

二

一九二七年九月末,张发奎率领第四军回师广东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爆发了粤桂战争。张发奎一方面为了巩固广东地盘,采取了以攻为守,分兵出击。另一方面,在广州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几乎每天都在逮捕和屠杀人民。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乘机在教导团内搞特务活动。面对反动派这种凶焰,广东省人民无比愤怒,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推翻反动政府的革命形势,象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会议,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十二月四日,张太雷在黄花岗召集教导团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说明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导团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与会全体人员都充满胜利的信心。但这个会议很快被隐藏在教导团的“孙文主义学会”特务向张发奎告密,说共产党要在广州举行暴动。张发奎慌了,立即调动军队回广州,企图解除教导团的武器,扑灭这次起义。

当时叶剑英是张发奎的参谋长，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计划，当面指责张发奎随便听信谣言，并声称自己是教导团的团长，更了解该团的所作所为，断言此事纯系捏造。紧接着，又暗地里告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要被敌人袭击。翌日，叶团长很早来到教导团。在全团的大会上说：我来向你们讲一个消息。很遗憾！张总指挥听信坏人告密和流言蜚语，诬指我们教导团要进行武装暴动，要推翻政府，张总指挥准备从外面调动队伍来缴你们的枪。为此，我向张总指挥当面辟谣，说是坏分子造的谣言。我们教导团的全体人员，千万要沉住气，提高警惕，切不可上当，否则，是要吃大亏的。叶团长随即作了国内形势报告，指出蒋介石已下台跑到日本，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十分激烈，新旧军阀仍在津浦路混战。接着，又介绍了全团人员最关心的——贺、叶队伍退到海陆丰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师和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等等情况。最后叶团长勉励大家好好学习，提高警惕。叶团长的这次讲话，非常重要及时，实际上是广州起义前夕的一次动员讲话。

三

广州起义前夕，敌人留守在广州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当时只有沙河炮兵团、公安局的保安队、宪兵营等，其他如第四军、十二师。

广州起义日期，原定十二月十三日，但外地敌军已向广州急进，战斗迫在眉睫。起义“指挥部”当机立断，提前于十一日行动。

起义前夕，为了麻痹敌人，教导团照常出操、上课、学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

午夜十二时后，团党支部和各连的共产党员开始行动了。首先是二连的四名学员，把反动的教育长朱勉芳镇压了。在同一时间里，各连分头把二营营长、三营营长、工兵连长以及各连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统统抓了起来，一网打尽，总共六十余人，都送入禁闭室关起来了。

十一日凌晨二时许，各连长小声地发口令把队伍带到团部前面操场集合。全团分东西两边对向站队。特务连在营房内外担任警戒，岗哨布置得很严密。这时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从团部进入队伍夹道中间。张太雷首先讲话：“今天夜间，我们要在广州举行暴动，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完全解除敌人在广州的武装，我们要成立工农民主政府。你们教导团是暴动的主力，你们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现在时间紧迫，请党代表恽代英同志讲话。”恽代英同志的出现，大家发出内心的喜悦，也增加了力量。由于没有月光，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模糊地看见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服。他说：“官长们，学生们，今晚你们叶团长很忙不能来，我来向你们讲话，我离开你们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都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在韶关，两次都被反动派解除武装。前天，你们的叶团长告诉你们，反动派又想要解除你们的武装，这回我们可不交枪了。今天我们要报仇，要暴动，要起义，要和反动派算帐，要讨还血债，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你们要勇敢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取得暴动的胜利。”（讲话大意）恽代英同

志的讲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增添了力量。接着恽代英同志给大家介绍了叶挺同志。叶挺的讲话很简单,只说:“各营、各连、各排的攻打目标,按照昨天军官会议分配的任务执行,现在按路程远近次序,分途出发。”

这次起义的战斗部署,教导团攻打的目标:第一营攻打敌公安局;第二营第四连攻打敌学兵营(原桂系的);第二营第五连和炮兵连第一排,攻打敌沙河炮兵团;第二营第六连攻打敌广九车站;第三营攻打敌第四军司令部;炮兵连第二排攻打敌省党部(护党委员会)和东校场敌公安分局;炮兵连第三排攻打敌薛岳的新编第一师司令部;通讯队攻打敌第十二师缪培南司令部;工兵连攻打敌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中央银行等机关。此外,还有约一百人的女生队,是原武汉中央军校的女生大队缩编成的。她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救护工作,同时每人也发了武器,必要时参加战斗。特务连除留一个排担任四标营的警卫外,其余到起义指挥部担任警卫。四时许,各营、连、排纷纷出动,各奔自己攻打的目标去了。

四

广州起义的战法,是采取夜间袭击,出敌不意消灭敌人。兹将各起义分队先后投入战斗的经过叙述如下:

(一)奇袭敌薛岳司令部,是教导团炮兵连第三排首先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薛岳司令部坐落在东校场西北三层大楼里,楼南驻有该师的特务营,营房没有围墙,只用篱笆围着,距离四标营最近,只须十多分钟就跑到了。敌人在营房外面放着步哨。起义部队在大门口散开后,向营内开枪射击,枪

声打破了夜空的沉寂，敌门卫莫名其妙，仓皇退入院内，没有还击。这时营内正在鼾睡的敌人，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惊慌失措，来不及穿衣服鞋子，不少人光着身体赤着脚，只穿裤叉，纷纷逃出门外，没有地形地物可以隐藏，就争先恐后钻入营房地板下去躲藏，敌门卫四人还持枪站在那里发愣，枪支很快被夺走了。起义部队迅速冲进了营房，看见各寝室的枪支都整齐地摆在枪架上，司令部大楼已空无一人，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战斗。

就这样，敌兵四、五百人便成了俘虏。起义部队派人控制了敌司令部的值班室。恰巧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敌第四军司令部值班室打来的，询问广州东郊有激烈枪声是怎么回事？起义部队伪装敌司令部的人回答：“我们这里也听到枪声，已派值班分队巡查去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次电话不是敌人打来的，而是起义“行动委员会”^①打来的。因为电话局已被起义的工人控制了，市内通讯照常。他们询问攻打薛岳司令部的战斗是否结束了？回答：已结束了，正在安置被俘人员和向他们训话。“行动委员会”说：“我们马上派汽车来搬取枪弹。”没过几分钟，来了三辆大汽车，押车的全是系有红领带的工人赤卫队员，运走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上千支步枪和很多子弹，三辆大汽车还未运完。

（二）奇袭敌学兵营的是教导团第二营第四连。他们进抵敌学兵营大门时，向敌营内打了一排子弹，敌门卫没有还击，四连很快就占领了敌营房。起义分队突入他们的寝室，才发

^① 行动委员会应为革命军事委员会。

现各学兵连没有武器；搜查至军械库时，才看到一排排的枪架摆满了枪支。原来学兵营是桂系的，有学兵四个连，已训练了半年，在十一月十八日张发奎发动政变时，被解除了武装，一直都是徒手，只有卫兵室有一个排的武器。

(三)奇袭敌省党部(护党委员会)和警察分署是教导团炮兵连第二排。他们兵分二路：一路袭击省党部，一路袭击警察分署。两路都没有开枪，直接闯入敌大门，在收缴门卫枪支后，敌人还在梦乡，起义部队在敌省党部向敌人宣告：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你们当俘虏了，任何人不准反抗。命令他们各自报出身分，不许说假。当时俘虏中有几名自称是“护党委员”，但又竭力表白自己对国民党毫无信仰，只是为了混饭吃。令他们站出来后，就把他们关起来了。

(四)强攻敌公安局，是比较激烈的战斗。十一日五时许，市内枪声大作，这是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正在攻打敌公安局时的激战。敌人仓卒占领楼房窗户、围墙、铁栅和一辆装甲车，顽强抵抗。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和罢工工人敢死队，因为对街道地形很熟，绕道公安局相邻的房屋出敌不意地接近敌人，翻越围墙进去。高喊“缴枪！”敌人马上动摇了。教导团第一营乘敌动摇之际，发起了冲锋，猛扑公安局，有的翻围墙，有的撞铁栅，很快冲进了房屋，占领了公安局。

(五)急袭敌沙河燕塘炮兵团，是教导团第二营第五连和炮兵连第一排。当他们刚接近到敌营附近，闻敌人正在吹紧急集合号音，五连和炮连一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营房，分头直扑敌军的几个寝室。敌人正慌忙起床，起义部队高喊“缴枪不杀”！他们便当了俘虏，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我炮兵连长及五连一个学员阵亡。叶挺同志原在这里指挥，看到已经胜利地解决了敌人，就马上回广州去了。

炮兵团的一千多名俘虏在大操场集合完毕时，天已大亮。该团的下级军官，有些原是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他们自动要求参加起义队伍。被允许后，他们从炮房拉出炮车，从马棚牵出牲口，套上炮车，一个零件箱也不少，共有山炮三十余门，野炮四门，重迫击炮数门，全是日本造。炮身外部涂有土黄漆，适合北方伪装景色。这些炮，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其走狗奉系军阀的，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汉政府北伐，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由奉军炮兵旅长富双英投降携带来的。此外，还缴获有马枪三、四百支。教导团第五连留在沙河担任警戒。

(六)广九车站的战斗经过。广九车站驻有敌保安队和英国兵各一个中队。攻打敌广九车站的是教导团第六连。当他们到达车站时，因敌人已发觉，与敌人打成了对峙。战斗非常激烈，久攻不下，遂要求炮兵去支援，当时我炮车纵队正经过黄花岗向市区前进，随即派了一个炮班，携带一门山炮到达六连阵地，六连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只打了几发炮弹，其中有三发命中车站，房顶和墙壁倒塌了一处，敌人见势不妙，慌忙登上铁甲车向石龙方向逃跑了。六连顺利地占领了车站。

(七)收缴敌省、市等机关的枪支，是教导团工兵连的任务。工兵连没经过战斗，就相继占领了敌省、市政府及所属机关。他们缴获了许多武器，特别是财政厅扔出的全是崭新的德国造盒子炮(驳壳枪)，共一百几十支，以后这些手枪发给排以上的军官。

(八)教导团第三营和警卫团袭击敌第四军司令部受挫。

敌第四军司令部设在长堤，由于四标营距离长堤有十余华里之远，加之广州东部地区早已打响，第三营虽加速了行军步伐，但到达长堤已是五点钟了。警卫团虽距离长堤近些，但当警卫团的队伍到达长堤时，敌人早已作好抵抗的准备，道路已被路障堵塞了，只好顺着大街直扑司令部。这时，敌人先开火了，火力又猛，一部分战士壮烈牺牲，攻击没有奏效。

接着，教导团第三营赶到，第九连是先头连，成三路纵队跑步前进，途中，听警卫团退下的人说，他们碰了钉子，伤亡很大。第三营队伍还未展开，敌人装甲车冲了上来，用重机枪猛烈射击，九连有数十名学生伤亡。第七连和第八连跟上来时，因敌火力猛烈，只好就地散开在街道两旁，利用街道两侧骑楼的走廊柱子掩护身体，无法前进。最后和敌人打成对峙。

(九)袭击敌第十二师司令部的教导团通讯队，也未成功。该司令部设在文德路房屋坚固，只有一个特务连担任警卫，由于通讯队是教导团到达广州后才成立的，战斗力不强。当他们到达敌司令部门口时，动作迟缓，致被敌发觉开枪射击，也打成隔街道对峙。终于未将该敌攻下。

此外，广州市内各警察署都是工人赤卫队打下的，收缴了不少枪支。

十一日黎明前，除了在长堤的敌第四军司令部和文德路敌第十二师司令部未攻下外，整个市区都被起义军占领了。张发奎的宪兵营也自动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挂上了红带子，有的还在街上巡逻警戒，维持秩序。

五

十一日八时许，满街出现了《红旗》号外，宣传品遍布全市。教导团的女生队，肩上挂着马枪，在街道上散发很多传单：《告市民书》、《向红色起义军致敬》、《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政纲》等等。他们分头在街头讲演，一群群人围着听讲。她们把宣传品贴在墙壁上，让人们围着观看，有的群众边看边念边讲解。主要街道挂有巨幅横额，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街小巷到处贴有“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汪精卫！”“打倒张发奎！”“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

教导团的女生队还分成若干小组，除向群众讲演外，还领导群众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歌声响彻云霄。

六

广州起义震动了国内反动派，也震动了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决心扑灭这次起义。十一日下午，停泊在沙面江中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军舰，互相打旗语，接着卸下了炮衣，将炮口朝向市区，对准天字码头一带的起义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炮弹一发接一发在市区爆炸，居民伤亡很大，房屋倒塌很多。江北岸担任防守的工人赤卫队第三、四联队和警卫团的第三营，原在这里对南岸李福林军进行警戒，防止敌人过江袭击市区，面对帝国主义军舰的残暴横行，非常气愤，但没有重武器反击帝国主义的暴行，后叶剑英副总司令下令教导团的炮兵前往还击。教导团炮兵连

第一排，率领原沙河炮兵团的士兵携带山炮数门前往，向敌舰还击了数十发炮弹。由于我们是陆战炮，只有榴弹和榴霰弹，没有破甲弹，因此，射击距离虽只有一千多公尺，但不能破坏敌舰铁甲，敌舰猖狂如故。后来，又运来了十五公分口径的重迫击炮，向敌舰射击，连续命中几艘敌舰的甲板，使敌舰上的指挥塔、炮塔及其它设备，均有破坏，敌舰水兵也有伤亡。敌舰见势不妙，才急速向白鹅潭方向驶去，在距我重迫击炮射程之外的水域游弋，继续猛烈向天字码头一带射击，烟雾弥漫，沿江一带房屋着火，烧毁了房屋数百幢。工人赤卫队、警卫团士兵和教导团炮兵，仍是前仆后继地战斗，继续向敌舰和河南国民党军队射击。

十一日下午二时许，叶剑英把教导团炮兵连长叫到总司令部，当面交代两个任务：一是到观音山（现名越秀山）去解决叛军一个连（原警卫团第二连）；二是解决叛军后，再到观音山上架炮，轰击敌第四军司令部。我军乘起义胜利之威，把山炮作了放列准备后，连长即派八班班长去与敌连长谈判，敌方也派一个排长迎下来。这个排长自称是共产党员，新到该连任职，曾劝连长起义，遭到拒绝。但敌连长现在看到全市都被起义军占领，迫于形势、无可奈何地交枪投降了。

我军即把炮拉上山顶，将炮口对准长堤方向。从山上俯瞰全市，山下房屋，鳞次栉比，不知那一座楼是第四军司令部。经随同上山的赤卫队员指点目标，炮手精确地发射了几发炮弹，均落在敌司令部房顶爆炸。敌人顿时慌乱，向江边逃窜，在帝国主义军舰火力掩护下，有的乘木船，有的登上小火轮逃跑了。这样，就结束了攻打第四军司令部的战斗。

七

观音山的争夺战。十二日十二时许，敌军从花县方向开来，其先头团首先从北面向观音山进攻，我方只有少数的工人赤卫队员在山上防守，由于寡不敌众，只好退到山下第一公园一带，继续抗击敌人。叶挺总司令和叶剑英副总司令，急传教导团李团长（由原一营营长提升）到总部接受任务，令他立即带队伍夺回观音山。李团长接受任务后，召集第一营各连连长，第三营七、八连连长，炮兵连长，工人赤卫队第一^①、六联队的负责人，传达了上级指示，规定了各连的任务，并组织了简单的进攻协同动作。下午二时，各队随即发起进攻。首先向观音山之敌进行炮击，只打了十多发炮弹，就把敌人青天白日“护党”蓝旗打倒了，敌重机枪也被打哑了，敌团长也被打伤了。敌人失去指挥，立即慌乱。我各部乘势纷纷吹起冲锋号，向敌人发起冲击。第一营向观音山主峰进攻，第七连向观音山右侧进攻，第八连为预备队。赤卫队第一联队向观音山鞍形地区进攻，赤卫队第六联队向观音山西侧进攻，我军多路冲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军支持不住，纷纷向观音山北麓逃跑，连滚带爬下山。三时半，我军收复了整个观音山阵地。不久，敌人后续部队到来，又重新向观音山阵地反扑，连续向我阵地冲击，都被我军接二连三地击退了。敌人死伤枕藉。我方也牺牲了两名连长和一些战斗员。四时许，敌我都在调整战斗部署，我方也及时补充了弹药，控制了敌人可能再次向我

^① 应为第二联队，即手车夫联队。

冲击的地区和道路。这时红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首长（可能是陈赓同志），亲临观音山阵地指挥。敌人依仗他们的优势兵力，又继续向观音山阵地冲了十余次，我军居高临下，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半山腰和山脚下，敌人弃尸很多，也不敢前来搬运，只好向我阵地猛烈地倾注子弹。但我阵地依然屹立。这次观音山战斗，是起义后敌我主力打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水压式重机枪都打得水沸冒烟了。

黄昏后，敌人派一部兵力从观音山西侧向第一公园迂回，企图从我后面进攻，当即被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发觉，就地阻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这时，我教导团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向敌侧翼实施反击，把敌人打退，我军牢牢地控制观音山阵地。

天字码头的阻击战，与观音山激战的同时，南岸敌人李福林部企图强渡珠江侵犯江北市区，他们在数挺重机枪和帝国主义军舰火力掩护下，几次进行强渡未逞。这时，英帝国主义的陆战队也在沙基登陆，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与工人赤卫队展开血战，我警卫团部分士兵和教导团炮兵协同工人赤卫队，打得非常顽强。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围攻广州市区时，市区内的反动分子也蠢蠢而动。广州资产阶级把持的广东总工会、广州机器工会、工人联合会等，都是反动派的御用工具。当十一日上午“起义指挥部”向工人发放武器时，他们混入工人队伍里，冒领了不少枪弹。这些反动分子取得武装后，更加猖狂活动，于十二日下午，乘起义军后方空虚，集合反动分子约七、八百人，配合外国敌军行动，袭击红军总司令部。这时起义军领导同志

都分别在前方指挥战斗。张太雷正在西瓜园召开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返回总司令部途中，遭到这伙反动分子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给起义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十二日夜，广州四郊都发生战斗。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北面有敌军李福林部和薛岳部进攻观音山；东面有敌军李汉魂部进攻沙河和广九车站；南面有帝国主义军舰和敌军李福林部进攻珠江北面市区；西面除英帝国主义陆战队登陆外，敌军许志锐部和薛岳部已向广三车站和长堤进攻。同时市内反动分子乘机抢劫并火烧中央银行，火光冲天。情况表明，于我不利。

鉴于上述形势，起义指挥部决定起义军退出广州，下令各部于晚上十时到黄花岗集合后，转到农村去。由于临时仓促撤退，不少起义军未接到通知，仍在与敌对峙战斗，损失很大。

此外，在十一日晨，黄埔军校的特务营也参加了起义。十二日下午，他们乘船到达广州东郊，与敌李汉魂部展开战斗，后向白云山方向转移到太和与主力会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广州起义的回忆

许子威^①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教导团。教导团里有朝鲜人、台湾人。朝鲜人是武汉军校的学生，后编入教导团，听人说崔庸健也参加了广州起义。教导团的连长都是党员，营长不是党员便是进步的军官。团长一度换过杨澍松。团参谋长朱勉芳，是张发奎派来的，很反动。还有些反动分子如周东生等，他们常散播谣言，对共产党员盯梢，从事破坏活动。团内也有国民党左派，他们同情共产党反对汪精卫，对“夹攻中奋斗”的口号很反感。

广州起义前几天，教导团的共产党员到黄花岗的荒草地上开会。张太雷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身体魁梧，戴副近视眼镜，人很英俊。在会上，他讲了话，讲的是准备暴动的问题。我们都很拥护，会后，回到团里就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我曾把一些进步书籍寄给进步的朋友，但没有写寄书人的名字。

十一日凌晨，唐嵩找我（当时我叫许垣）谈话，并给我一个红布条子，说要起义了，布置我和王若冰、连汝瑶、刘玉麟四人

^① 许子威即许垣，是教导团的班长，起义后任红四师排长。

去干掉朱勉芳。我们四人都是党员，王若冰和唐嵩是团党委委员，我是班长。我们接受任务后，就持枪往朱勉芳的宿舍，朱门外的两个卫兵毫不察觉，被我们缴械了。到了朱的寝室，朱仍睡着。我们将朱捆起来，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又把他的眼睛蒙住，一刀刺下去，他只哼了一声，便滚在地下，接着又几刀，最后我在他的胸口刺了一刀，朱便死了。在执行任务中，我们始终没有开枪。我们离开朱的宿舍时，队伍早已集合起来听领导人讲话，我们来到会场，只能听到张太雷同志最后喊口号：“广州苏维埃万岁！”在我们干掉朱勉芳的同时，教导团另一些同志已把其余的反动分子捉住关起来了，整个过程也没响过一枪。

队伍出发了，我们连队参加攻打公安局。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巷战很激烈，我们连队死了几个很好的同志。攻占公安局后，我那个班就在那儿站岗。我看见过恽代英和叶挺，恽代英认得我们是教导团的学生，他望着我们笑。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奉命由观音山撤退，经沙河撤到花县进行整编，成立红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徐向前同志是团长，我是一个排长。整编后从花县经紫金奔向海丰，到龙窝打了一仗，打得很艰苦。到紫金时捉了紫金县长，最后到了海丰，参加我党领导的东江农民大暴动。

我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

邱维达^①

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当时我任教导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率领连队去解决驻地附近的公安分署。我率部将该署包围后，就向敌人喊话，促其缴械投降。那个分署长惊魂失措，掏出手枪企图抗拒，及见四面人声沸鼎，自己已身陷重围时，不得已才命令数十个武装警察，缴出武器，举手投降。我连完成这个任务后，奉命配属第二营，向沙河燕圻第四军的炮兵团进军。我们跑步前去，将敌炮兵团四面包围起来。走在前面的陈连长和一个司号员首先冲进去，被敌人守门卫兵枪击阵亡了。我连加入战斗后，大家一鼓作气冲入了敌营。敌人从梦中惊醒，四散奔逃，乱作一团。“缴枪不杀”之声震慑着敌人，敌人无法组织抵抗，只好高举双手投降了。少数企图顽抗的敌人，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被俘，战斗在十二日拂晓时便顺利结束了。这一仗俘敌约一千人，缴获山炮廿五门，由我连押送到朱执信中学，交给驻守在该校的工人赤卫队接收处理。

到了中午，市内的敌军据点，除肇庆会馆仍有第四军留守

^① 邱维达是教导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

处少数残敌尚未肃清外，几乎全城都为我起义部队所控制。我感到前途很乐观。

十二日午后四时，总指挥部命令我回去接受新任务。在总部门口，我看见那里躺着两具尸体，其中一具是躯体肥大穿着黑呢制服的军人，据说是广州市公安局长^①，在我们进攻时顽抗被击毙的。我被引进总指挥部办公室时，叶挺和叶剑英两同志正在办公室上看地图。叶剑英团长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你知道观音山这个据点很重要吗？”我说：“这是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决不能丢失。”他接着说：“你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陈赓营的战斗，要坚决守住观音山。”

我带领部队急速前进到观音山附近，据侦察报告，已发现敌人从山上向我射击，阻我前进。我把队伍分为三个突击小队，时近黄昏，从三面向观音山制高点突击。战士们奋不顾身，冲击发起后，不到半小时，便将守敌击退，撤往观音山以北地区。我们与固守在炮台的陈赓营一部取得联系，加强工事，固守待命。

十三日凌晨，市内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从四面调回广州的反动部队，已有一部份窜入市内，发生战斗，枪炮声隆隆，多处起火，尤其是高第街，火势甚猛，大火冲天，时有枪声。我知道情况有异，立即派人前往指挥部联络，回来的人说在两小时前指挥部已向海、陆丰方向转移了。这时，我认为孤军据守已无必要，就决定冲出重围，追赶主力部队。我们且战且走，到了黄花岗附近，遇到驻守在该地的敌人堵击。我们和敌人

^① 此人不是公安局长，而是公安局的一个警官。

战斗约一小时后,我率领队伍,打开一条血路,退到墓后的山岗密林深处隐藏起来。由于突围时敌众我寡,战斗甚为激烈,我连伤亡甚大,剩下的只有我和士兵十三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五人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八人)。我们相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暴露身份,并将起义记号摘除,以保障大家生命安全。十三日午,我们被搜山的敌军发现,有的被俘,有的逃脱了。我脱险到达韶关时,从广州脱险出来的同学卢必俘告诉我说:“敌军进城后,在全城搜捕起义人员,凡衣领上有红色痕迹的,不管男女老幼,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害。从珠江长堤到朱执信学校,沿途尸积如山,血流成渠,造成恐怖世界。我的胞姐邱继文是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学生,共产党员,派到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参加起义后,她和游曦一个女班,坚守在长堤,十三日弹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还被第四军黄琪翔部暴尸于天字码头。

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纪略(节录)

王 谨 权

一、教导团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武汉政府即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取消校长制,成立校务委员会。推举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三人为常务委员,实行集体领导。恽代英代表共产党,邓演达、谭延闿代表国民党。同学们大都倾向革命,张发奎想利用军校学生为他打天下,便将军校三千多学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其中一百多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也被编了进去。我被编在第一营第一连。女生大队被宣布遣散。其中游曦、郑梅仙、周铁军、曾宪植、王炳先、骆英豪、刘光晦等三十几位同学,不愿遣散,也被编进了教导团。教导团是在武昌两湖书院成立的。张发奎自兼团长,叶剑英兼任团教育长,倪隍(云南人,当时没有到差)任团参谋长,柳际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任团部管理处处长,吴展(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第一营营长,宋湘涛任第二营营长,刘先临(河南唐河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任第三营营长。表面看,团的事情,由团部管理处处长柳际明负责,营里的事情,由营长负

责。但是，全团的教育、行政等，均由教导团中国国民党团党部领导。在教导团里，团党部执监委员和各连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叶镛、蒋日（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教导团第四连连长）、陈衍漠（湖南石门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教导团第六连连长）等就是团党部执监委员。所以，教导团国民党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这些情况，张发奎等反动派是毫不知情的。

二、教导团由鄂赴粤

“七·一五”以后，教导团于七月三十日晚上，分乘四艘轮船并牵拖着木船，离开武昌，向九江进发。船到黄石港、石灰窑一带，便听到叶、贺两将军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教导团团党部原打算就地响应，只因叶贺起义军已南下，联系不上，才没有行动。教导团的船到达九江时，张发奎命令我们把轮船和木船拴在一起停在江中，并派一只划子来把教导团营长吴展、宋湘涛、刘先临等接到指挥部去。他在靠九江一边的河岸上，布置了一个团，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对准教导团的船只。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秘密而迅速地传达了团党部的指示：“张发奎怕教导团暴动，要收缴武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各人必须抑制感情冲动，暂时交出武器……。”教导团的三个营长到达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张发奎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我。八月一日叶挺、贺龙已在南昌暴动了，请你们三位营长即速回去，收缴全部武器，送到总指挥部来。部队候令上岸……。”由于团党部早已有了指示，三位营长在船上收缴武器时，虽然未遭抗拒，但大家极为愤恨，

横眉怒目地对着派来搬运武器的那伙人。八月四日傍晚，教导团部队徒手上岸后，第三营营长刘先临（解放后已被镇压）请长假走了，副营长樊少卿（河南人，北京讲武堂毕业）便升充营长。倪隍参谋长就是这时到任的。教导团步行经吉安、赣州，翻越大庾岭，到广东南雄。为了对付土匪，张发奎又把武器发给教导团。队伍到了南雄，叶剑英教育长因事先赴广州，团里的事务由倪隍参谋长代理。

九月中旬，教导团到达韶关，团部及其直属部队一、三两营驻在城内，二营驻在城外河东岸。过了几天，团部突然接到国民党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的命令，说奉总指挥张发奎的命令，收缴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各营、连、队速把枪弹收集起来送到团部，师部即派员验收，不得延误等反动诳语。当时，教导团团党部负责人叶慵、唐维（四川人，中共党员，二十多岁，教导团学生。教导团在花县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时，任师党委书记）、甘理真（四川人，中共党员）、蒋日、陆更夫（四川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第三连连长）、唐嵩（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王若冰等同志，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有人主张马上把部队拉走，宣布起义；但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因为第二十六师驻在韶关，且队伍与敌人插花驻扎，情况对我们不利。为保存教导团这支革命队伍，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立即找自己负责联系的同学，劝导大家再一次抑制感情，暂时交出武器。这就是教导团第二次被张发奎缴械的经过。团参谋长倪隍思想落后，胆子小，加上与两湖和四川等省的官生生活习惯合不来，他请长假离开了。团参谋长职务，由第二营营长宋湘涛兼代。教导团

在韶关被缴械后,开往花县新街,在那里训练了五十天左右,即进驻广州市北较场四标营。改隶第四军建制。杨澍松(安徽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任团长,宋湘涛兼参谋长,副营长李云鹏(又名李伯堃,河北人,当时是中共党员,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升任营长。

张发奎为了消灭政敌李济琛、黄绍竑,夺取桂系在广东的地盘,十月下旬又把教导团装备起来。这次发的武器,除长短枪和重机关枪外,还有迫击炮。步枪,多是三八式,也有广东兵工厂造的枪和杂式枪。服装,一律灰色,军帽硬壳宽边。教导团进驻四标营时,成立了一个军官预备队。该队成员都是从各地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同志,他们后来多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教导团团党部还出版了进步的小刊物《准星》。

三、起义前的广州形势

八一南昌起义后,叶、贺两将军挥兵南下入粤东,张发奎借所谓追击之名,进入粤北,要夺取广东地盘。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琛因无力量拒张发奎,便决定以老上司资格,迎张南归,联合反共,妄图消灭叶、贺起义军。张发奎率部进驻广州后,首先迫使李济琛改组广东省政府,任陈公博为民政厅长,黄琪翔为军事厅长,邹敏初为财政厅长,使得李济琛成了一个空头省主席。

汪精卫等为了进一步实现夺取两广的阴谋,十一月中旬,他在东山公馆“葵园”召开了几次所谓“建设新广东,驱逐桂系军阀”的秘密会议,其中有一项关于大量罗致粤军旧袍泽及笼

络桂系旧人“推翻两黄统治”(广东黄绍竑、广西黄旭初)的决定。十一月十七日晨,汪精卫骗李济琛、曹少岩、曾仲鸣等同赴沪开会,以便张发奎、黄琪翔在粤行动。成行之日的晚上,广州市上遍贴着“驱逐桂系军阀”、“打倒黄绍竑”、“建设新广东”的标语。张发奎派兵围扑留粤的黄绍竑,黄事前已得到消息,溜出了重围,逃到香港转回广西去了。十一月十八日拂晓前,教导团把黄绍竑的十五军军部解决了,并占领了兵工厂等处。汪精卫、张发奎等就是这样以“护党运动”的名义,耍调虎离山的诡计,夺取了广东省的地盘。

张发奎夺取广州政权后,即自封为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陈公博一跃而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军事厅长黄琪翔成为广州市卫戍司令。朱晖日接任了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一到差,就借口调整人事,排除异己,把他前十一军旧部的人安插到保安总队和各分局。保安总队的编制和装备,都以第四军为标准加以充实。张发奎妄想将原第二方面军余部五万之众,用以对外征伐,扩充地盘,而把维持广州市治安的工作,完全交给朱晖日。同时,张发奎撤免了李济琛嫡系黄埔军校教育长李杨敬等人的职务,另派杨澍松为教育长,王侃予(四川人,三十多岁,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曾任武汉中央军校连指导员,继任教导团第一营的连指导员。)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宋湘涛为第六期学生第一大队长,吴展为特务营长,从而把黄埔军校控制在自己手上。张发奎说教导团是“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因为教导团是由武汉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改编的,它在武昌打败过夏斗寅、杨森,名声很大;到广州后又赶走桂系,打过硬仗;官兵年龄都在

二十左右，身体强壮，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这样的一支队伍，如果被共产党拉过去，就有炸死他自己的危险。但是如果善于控制，利用得好，就可以拿去炸他的政敌，为他东征西讨，扩大地盘。为此，张发奎在教导团也多方排挤左派军官，安插亲信。他派朱勉芳（安徽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任教育长兼参谋长，方际平接替第一营营长，以便控制教导团。

经过一场火拼，李济琛等在广州的武装，虽然全部被解除，但张发奎在广东的统治仍没有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命陈铭枢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入粤，准备进攻广州，推翻张发奎的统治。黄绍竑逃港转返回广西后，率领十五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三个师兵力，集结梧州一带，企图卷土重来。张发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先打黄绍竑，再打陈铭枢。他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开赴西江，防御桂系军队东下。留在广州市的部队，除了公安局的保安总队和各区局的警察约三千人外，只有第四军教导团及第四军新编警卫团。警卫团是十一月一日在广州新成立的，共三个营，一千二、三百人。第一营四个步兵连，官兵四百多人，是由第四军特务营扩编的。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官兵三百多人，是由李济琛的特务营改编的。一、二两营的武器都是七九步枪。第三营三个连是新成立的，除招募的新兵外，还有中共地下组织派去的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友组成。全营官兵三百多人，武器很少。张发奎这样把重兵集结于外围，使内部兵力空虚的部署，给了武装起义一个好机会。

四、起义经过

张发奎从武汉南下时，仍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招牌，说要率队回广东“继续革命”，曾欺骗过一些人。可是，当广州工人革命高涨时，张发奎便脱下“左派”的外衣，露出反动面目，与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使广州重新为反革命的阴霾所笼罩。铁的事实很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夺取政权，才是出路；否则，共产党及革命群众将受到残酷的屠杀和迫害。为此，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

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教导团的两百个积极分子，参加了张太雷等在郊外召开的秘密会议，叶镛、袁裕、王若冰、唐维、陆更夫、覃正格（湖南石门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第五连连长）、甘理真、蒋日、陈衍漠、郭声荣、唐嵩、游曦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大家一致主张暴动。他们回团后，便积极秘密进行准备工作。起义时间原定十二月十三日，汪精卫在上海听到广州工人准备起义的消息，即令张发奎匆匆从西江调回了黄琪翔，并秘密将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调回广州围歼教导团。在这紧急情况下，起义总部决定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举行起义。

十日傍晚，连长叶镛秘密召集本连部分同学开会。他说：“特务朱勉芳已把我们起义的准备活动向张发奎告密了，张发奎就要屠杀我们了！”大家听后愤怒极了，连长的话还未讲完就抢着说：“张发奎第三次来缴械，绝对不行，武器是生命，只

要我们还活着,手里的武器,再也不能让他缴去了。叶连长接着说:“我党中央,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已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屠杀,党一定会接受大家的要求的。”连长的话使同学们非常兴奋。

十二月十日的午夜,月明星稀,岗哨增加了很多人,我被唤醒在团本部大门口站岗。下半夜的普通口令是“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我接哨后约半小时,忽传来有人喊“哎哟”的声音,这是几个反革命分子被刺死了。唐嵩等同学用棉絮塞住特务朱勉芳的嘴,将他从床上拖到团指导员办公室门口,王若冰使用装在三八枪上的刺刀猛刺,朱腹部受伤,倒地气绝。同时,逮捕了第一营营长方际平、第三营营长樊少卿等反动军官和十几个反动学生,关押起来。一点钟左右,吹起了三声又短又急又尖的紧急集合哨音,当我收哨回连时,同学们已经集合起来了。大家纷纷把国民党的符号、臂章以及青天白日帽徽撕下来,把新领到的三条红布带分别扎在军帽上、颈脖和左臂上,跑步到团部大饭厅集合,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同志讲话。张太雷愤怒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罪行。还说为了挽救革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为了全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必须实行土地革命。部队在“起义啊,起义啊!”的欢呼声中,展开镰刀锤头大红旗,立即登上汽车,向作战地区驶去。我们第一营乘坐二十九辆汽车分两路驶往国民党广州市公安总局。到了维新路口,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也来了。我们在重机关枪超越射击的掩护下,利用马路两旁铺房,匍匐前进。几个拿枪的赤卫队同志也加入了战

斗。拿梭标、木棍、铁锤、铁尺、斧头、短剑和自制手榴弹的赤卫队同志跟随后面，时而大声喊：“杀呀，杀呀！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土豪劣绅！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时而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壮大声势，激励士气。敌人重机关枪子弹象雨点般打来，步枪、机枪射击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象狂风暴雨一般地响着。同志们满腔仇恨，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分南北两路攻击前进。同学们有的倒了下去，赤卫队同志即拿起他们的武器加入战斗。保安总队部和铁甲车上的敌人，因为伤亡过重，不堪我军的强大压力，打出白旗投降了。我们继续攻打公安局，利用重机关枪超越射击作掩护，想一下猛冲进去。但敌人的几挺重机关枪在两边围墙后面的掩体发射，构成交叉火网，而我们的子弹被围墙挡住，打不中敌人的射手。我们这样正面硬冲，伤亡了很多同志，还冲不进去。后来我们沿着两边围墙墙脚接近大门，向里边投手榴弹。还有的同志用肩膀作梯子，爬上墙头，把手榴弹向里面扔，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爬上墙头的同志越来越多，手榴弹如雨点般投进去，一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敌人的重机关枪被摧毁了，同志们蜂涌地冲了进去。攻占了反革命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人们欢呼着，跳跃着，革命歌声嘹亮，镰刀锤头的革命红旗插上了公安局的屋顶，随风招展。这时仰忠街军械库和第四军军部等敌军据点仍未攻下，教导团二、三、四连立即前往支援，留下我第一连清扫残敌。公安局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派折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地方。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将受尽折磨的同志救了出来。这一战斗，俘敌几十人，缴获军械库里的步枪四、五百枝和一批弹药。可惜的是使公安局长

朱晖日跳墙逃走了。我们把缴获的枪弹，都送到公安局的大院里堆放，由赤卫队同志清理散发，武装工人赤卫队。

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起义总指挥部和广州市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都设在公安局里。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出布告和苏维埃政府宣言。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城内的许多敌据点也相继解决了。但是，第四军军部和仰忠街军械库等仍未攻下。我连在清扫残敌后，又奉令驰往增援。这时工人赤卫队各联队，从总部领来长短枪八千枝，装备了自己，也奔向指定地区。市民们欢喜若狂，都叫起义军“红带友”。这时，红旗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幅。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两辆铁甲车改成的宣传车也出动了，由男女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有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有的还在墙上刷标语。一些女同志护送插着红旗的饼干车（从反动大资本家的堆栈里搜来的）和装着军械的汽车（从敌人各军械库缴获）驶来起义总部，往返运输。没有参加攻打敌人据点的工人赤卫队联队在街头巷尾警戒。我连到达长堤后，教导团先后来了四、五百人，连的建制已被打乱，只好重新编队。七连的有些同学编入我第一连，有些编入洪连长的第九连。死守肇庆会馆第四军军部的敌人，是第四军新编警卫团第一营的部队，配有重机关枪。敌人的部署是：以兵力一部守住大门外工事，其余的分布在军部大楼和坪台上防守，居高临下，进攻的确不易。我们看清了地势，问明了情况，以小部分兵力沿堤岸布防，警戒江中的敌人，其余兵力在重机枪超越射击掩护下，协同兄弟部队向敌人强攻。我军伤亡很大，仍然冒着猛烈的火力一寸一寸地前进。当我攻占了敌人大门外的工事时，敌人的枪声停了，升

起了白旗。这时在离我们约一千公尺外的江中，五、六艘英帝国主义的军舰突然从侧面向我们猛烈地开火，使我们措手不及，伤亡惨重，不得不转移阵地。教导团迫击炮连立即组织火力向来犯的英帝国主义军舰还击。我们看着血泊中的同志和江面上英帝国主义军舰，大家满腔怒火，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我第一连又奉令调往西堤一带作战了。当晚(十一日)的口令是“赤化”。

五、广州转移及海陆丰会合

在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声势面前，国民党反动派无法抵挡。但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乘英帝国主义的海军小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财政厅长邹敏初，乘日帝国主义军舰，国民党广州市卫戍司令官、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副军长谢婴白乘美帝国主义军舰，国民党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发奎乘美帝国主义海军炮舰分别逃跑了。第二天他们重新纠合起来向革命反扑。张发奎等通过陈公博勾结帝国主义，要美、英、法、日各领事馆出兵干涉。十二日英国军队约二千名，法国水兵约四百余名，日本水兵约三百多名，在沙面布防。他们的军舰在珠江游弋，向起义军示威，协同国民党的“宝璧”、“江大”两只军舰，向起义军开炮。在帝国主义炮火的掩护下，薛岳等反革命军队，猛攻观音山等处我军阵地。十二日早晨，我连奉令调去观音山增援，教导团其他部队，也多开来固守“五层楼”东西线阵地。起义军利用倾倒的城墙，和城头上的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构筑了临时防御工事。城墙脚下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沟，敌人的阵

地就在小沟对面起伏的小山岗上。敌人集中了一万多兵力猛攻，企图占领制高点，控制广州全城。敌人十数次轮番猛冲，都死伤狼藉溃败下去。争夺战极其激烈。不幸，当天下午二时，张太雷同志在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后，乘车返起义总部时，在中华路黄泥巷附近，受到从大北门窜来的敌兵的袭击，中弹牺牲了。张太雷同志的牺牲使全盘军事失却领导中心。

由于张发奎调来了江门的薛岳师、韶关的许志锐师及石龙的李汉魂师，加上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敌人很快就抢占了我军在市内的主要据点。我军浴血苦战竟日，到了当天夜间，已四面受敌。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总部命令教导团于当晚十时以后撤退，分批转移到黄花岗集合。十三日凌晨五时左右，教导团部队由黄花岗出发时，不见了代团长李云鹏。但在共产党员的坚强领导下，全体官生满怀信心，沿马路向东北方向撤退。

在广州起义的日子里

范大光^①

“看，恽代英同志来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早上一点钟，教导团突然紧急集合，队伍整理好后，有人在讲台上发现了恽代英同志，不觉又惊又喜地说出声来。和恽代英同志一起在讲台上的，还有张太雷、叶挺等同志。张太雷、恽代英两同志先后对我们讲了话。张太雷同志分析了国内和广东的形势，宣布立刻起义。恽代英同志号召我们拿出中共独立师的勇敢精神来，为打倒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政权而奋斗。讲话完毕，就把教导团几个反动军官，推到集合场的围墙边镇压了。这时各营连立即分开，各自布置任务。

原任第一连连长叶镛同志，刚调升为第一营营长，他宣布第一连的任务是攻打维新路广州公安局。他还说：“公安局是反动统治的重要据点，可能会遇到激烈的抵抗，你们要坚决勇敢，更要小心沉着。一定要攻下来！祝你们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接着，原任第二连连长，新任第一连连长陆更夫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公安局的地形、建筑物情况，并对敌方兵力作了估计，便分配任务：第一排排长王永寿同志率领第一排攻打

^① 范大光是原教导团一连的战士。

公安局，陆更夫同志自己率领第二、三两个排攻打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三点钟左右，我们从四标营出发，步行至东较场门前时，在路旁卡车上等待接运的司机同志招呼我们上了汽车，直驶至维新路公安局门口。

公安局门口的三个卫兵，看见我们深夜到来，有些惊讶，又看我们是正规部队，只稍稍提高嗓子查问：“哪一部份的？”我们回答了：“教导团的。”他们再问：“什么事情？”话音未落，雪亮的刺刀，已经刺进他们的胸膛，替我们作了回答。我们冲进大门，通过小院子，分成左右两路前进。当右路向两幢楼房之间的一条胡同冲进去时，枪弹从胡同彼端墙角两边猛烈地射过来。我们迅即卧倒，狠狠地还击。敌人的枪声稀少了，但我们一爬起来要冲过去，子弹又密密地射过来。我们就在这条胡同里，起来、卧倒，反复和敌人战斗，牺牲了几个同志。

这时，隐蔽在中央公园一带的工人赤卫队，已冲到公安局，加入我们的队伍。胡同口两边的人不少，只是胡同小，冲不过去，左路也遇到了敌人的顽抗。为了迅速解决战斗，我建议爬进窗户，从房子里转到后面去，班长王若冰马上同意了。我们把右面楼房朝马路的一个窗户捣开，一个个踏着肩膀，跳进了屋里。屋里没有人，我们留一部分人守住楼梯口，另一部分人冲上楼去。二楼是办公室，也没有人；三楼好象有人住宿，但已经吓跑了。推开后面的两个窗户一看，下面是公安局的后院，躲在胡同口墙角边顽抗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左下方。另外，约有二三十个警察，正向我们这幢房冲过来，显然是企图占领这幢楼房进行顽抗。

“手榴弹，快！”班长王若冰下命令了。

“砰！砰！砰！”从三楼窗户口飞下来的手榴弹开花了！后院里顿时烟火弥漫，敌人倒下的倒下去了，没有倒下的就躲躲闪闪，四处奔窜，一片惊叫声。倒在胡同口的那群敌人，血水肉浆，一块一块地溅满了白白的墙壁；两支驳壳枪，却完好地丢在胡同口。我们留在胡同和楼梯口的同学一齐冲出去，看见残余的敌人已经没有抵抗的能力，就高声喊“缴枪不杀！”残敌听到喊声，立即缴枪投诚。

这时，左边还有密集的枪声，我们知道那里的敌人尚未解决，就马上前往支援。我们从后院拐一个弯，通过一条胡同，再拐一个弯，便看见三四十个警察躲在一条走廊里，依靠摆放花盆的短墙作掩护，仍在顽强抵抗。我们出其不意地从后侧方向他们打了几排枪，冲过去，高声喊杀。左路的同学和赤卫队看见我们起来了，也一跃而起冲向敌人。敌人见被前后夹击，无路可逃，也就放下武器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时，发现在一条胡同尽头的围墙下，搁着几张乱七八糟的桌子和板凳，看来是敌人越墙逃跑后留下的。后来我们从被俘的警察那里知道：伪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十日晚上是在公安局住宿，但枪声一响，他就惊惶失措地越墙逃跑了。

我们协同囚犯们砸开了公安局监狱的铁门，囚犯们在悲壮的“国际歌”声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戴着手铐脚镣，欢天喜地走了出来。许多人随即参加了赤卫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我们把中间一座洋房打扫干净，一会，总司令叶挺和参谋长徐光英来了，立即开始在二楼办公。我们第一连被改为总

司令部警卫连，负责保卫工作。

捷报不断传来，各种枪炮弹药大车小车地运来，堆满了大门内外。总司令部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广州市大地图，每报来一次捷报，徐光英即在地图上找到那个被我们占领的地方，用红墨水笔画上一个圈圈，红圈圈密密麻麻，画满了整幅地图，只有第四军军部驻地还留着一块空的。天亮以前，徐光英叫王若冰领着我和阎刚去侦查第四军军部的情况。我们乘坐一辆小汽车，由维新路向东驶去。到了第四军军部附近，看见军部已横断长堤马路，堆起沙包，筑了一道防御工事。汽车驶至工事前面两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人向我们喝问口令，我们刚答“暴动”两字，枪弹便呼的一声射过来了。我们立即下车，紧靠在骑楼的砖柱边，对准工事后面还了几枪，敌人更猛烈地向我们射击。我们回来把情况报告了徐光英后，他说：“是的，那边是敌人的据点，我们的兵力不够，还没有去动他。”徐光英立即调教导团第三营已胜利完成任务回来的队伍，配合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前去进行攻击。

天还没有发亮，苏联驻广州的领事到总司令部来了。他一个一个地同我们握手，还说，他代表第三国际来向我们道贺和慰劳。

天刚亮，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原址成立了。当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额挂上大门，镰刀斧头红旗升上屋顶时，欢呼声惊天动地，响入云霄。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是恽代英，我们看到他和在武汉军校时一样，永不感到疲倦，他紧张地起草宣言、文告和法令。

太阳出来了，除第四军军部等几个据点尚在敌人手中外，

整个广州的河北已经基本上解放了。叶挺和徐光英乘坐汽车，在市中心巡视了一周，我和文明利同学随行警卫。这时，工人、学生、小贩，正在街道上悬挂红布横额，张贴标语。我们的汽车一停下，他们就走过来，围着汽车和我们攀谈。

那时，很多工人赤卫队都来苏维埃政府领取武器，院子里挤满了人。等待领枪的，都在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已领到枪的，就咔嚓咔嚓地扳动枪机。领到枪的赤卫队员，有的还不会使用，因此教导团派出了一些同学去教他们使用武器，指挥他们作战。当时，我也去了。

也许是激昂的歌声引逗，恽代英同志也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站在二楼走廊边，含笑地凝望着在院子里领枪的赤卫队。就在这个时候，我和一个赤卫队员扛起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枪械，离开了恽代英同志，离开了教导团，走出了苏维埃政府大门，满怀信心地去教工人赤卫队学本领，继续打击敌人。

回忆广州起义(节录)

唐 固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通过熟人的介绍,当上了教导团通讯队下士军需官,从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

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和汪精卫在广东发动了政变。装备很差的革命教导团便借机夺得了一批武器。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喜事啊!

起义爆发之前,在革命的教导团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文书、军需官、上士、炊事、饲养、勤务等人员被编成一个连,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①(我是其中的一员)。指挥部给我们派来了一名军官,他也参加五人会议。当时决定,每天早晨从六点到九点,所有的人,除了负责做饭的士兵以外,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那个军官将此事向团政治部做了汇报,于是向各分队的指挥员下达了有关的指示,教导团已着手实施计划了。我们委员会的五个人,每人都有权到各连的营房并要求任何人执行这一命令。

军事训练计划的面相当广:第一天,我们操练了“立正”、

^① 指士兵训练委员会。

“稍息”、点名、看齐；第二天，操练了编队形和向左右转；第三天，我们学习了上子弹和退子弹以及瞄准；第四天，操练了散兵队形和冲锋。还没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参加了广州起义。

到了十二月九日夜里还不清楚起义何时开始。诚然，我见过省委颁发的准备起义的文件，但显然为了保密，因而上面没讲起义开始的时间。就在那天，一个同志悄悄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张发奎想消灭教导团。在此前两天，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他过去曾任过我们团的团长）在教导团军官、士兵、勤杂人员全体大会上讲话时，谈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他向张发奎担保说，教导团未见有任何意外的行动。他说，需要做做执行张发奎命令的样子。然而他最后指出，在东江的广东省海陆丰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叶剑英宣布了两个口号：“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起义那天的半夜，我在床上睡不着，听到了脚步声，接着便传来嘈杂声，好象将一个人捆了起来。我立刻跳下床，穿上鞋，系上了腰带。这时一个同志跑进了营房。他递给我一条红领带。我明白起义开始了。我问那边为什么有嘈杂声，原来起义行动小组将一些反动分子逮捕了；刚才又将张发奎派来的团长捆了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发生的一切。营房里响起了哨声，军官、士兵和勤杂人员都赶紧起床。这时来了一个戴眼镜、穿普通毛料上衣的人。他登上一只凳子，向教导团的军官和士兵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号召他们参加工人的革命行动。原来这个人就是广东最著名的革命家、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他向教导团下达了参加起义的命令。教导团的各个营和我们混成连都在准备行动（尽管进攻的地点还未确定）。我

们连的连长抽出了八个人并吩咐我们在特殊命令下达之前在营房里等候。其它各分队便开出去了。大门口已经停了很多辆汽车。一部分战士坐汽车，一部分步行。

五分钟后，距第三师驻地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进攻在广州的各个角落同时开始了。

汽车很快就开回来了。一个军官向我们走来，命令我们行动。我们八个人的任务是乘车到各个指定的地点去收集枪支和子弹，并将其运到老公安局，起义总部就设在那里。我们立即前往第三师的营地。我们把汽车停在外面，便进了营房。那里存有很多军火。我们只捡步枪、马枪和子弹，满满装了两汽车，然后向广州急驰而去。在老公安局的大门口，一个宽红布横幅映入了眼帘。横幅上写着：“广州苏维埃政府”。左边挂着一个牌子：“红军总司令部”，右边挂着的牌子是：“广州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广州市，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门上贴着苏维埃政府的呼吁书和包括有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内容的政治纲领。尽管我们急如星火，但我还是看了这两个文件，然后才跑进司令部，报告武器已弄到。几个同志赶来帮我的忙，于是，我们把这些武器抬到了仓库里。我往仓库里看了看，看见那里有几大堆枪支和子弹。机枪和大炮都摆在惠爱路边。已经快到早晨五点了。赤卫队和工人队伍鱼贯来到赤卫队司令部，领取了武器后便前去参战。到早上八、九点钟时，几乎所有的枪支都发光了，而工人们还不断地前来领取。

我记得在拉最后一趟，当载有枪支的汽车还未到司令部时，我们遇上了一队未拿枪支的赤卫队员。他们每个人都戴

着红领带，队伍的前头打着红旗。他们把汽车围了起来，派一个同志来和我谈判，要求发给他们枪支。我对来的这个人解释说，没有命令，我不能这样做。但工人们已经动手从车上往下拿枪支和子弹了。我毫无办法，只得让那个同志打个收条，以便我好向指挥员交帐。在司令部里，我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由于我出色地完成了这送武器的任务，便命令我返回自己的部队，我们部队当时刚好在攻打李济琛的家。我还没来得及放几枪，指挥员谢静（音译）便命令我立即下火线，返回团司令部弄吃的来。战士们从夜里三点起，水米未进，而当时已快到中午了。我迅速向教导团跑去。在路上，我看见一帮人。他们都疲惫不堪，满脸油黑，好象刚从井下下来的矿工。他们的脚上都戴着铁镣。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最勇敢的革命战士，他们都被国民党军阀当作政治犯关进了监狱。工人和士兵们把他们从监禁中解放了出来。

我又往前走，看见一大帮人围着一些学生。这都是些宣传员，在散发呼吁书和传单。几名女工人和女学生到处发放饼干。我也领到两大盒。这时两辆载有糖果点心的汽车开来了。押车的是两名学生和一名工人。他们大声嚷着，让人们给他们让路；他们在往前线给战士们运食品。当我在大街上奔跑时，一个黄包车夫让我坐他的平板车。我尽管相当累，但不得不谢绝，因为我身上没钱。但黄包车夫对我说：“同志，我们都决定免费拉有特别记号的革命教导团的军官、士兵和勤杂人员。”他很快就把我拉到了教导团。食品都已准备好了，于是我再次上了路。当我返回时，谢指导员向各班下达了吃饭、但要时刻提防的命令。这时从司令部来了通知，说经过三

小时的浴血奋战，革命的队伍占领了全城几乎所有的机关和重要战略据点——观音山。

吃完饭后，队伍继续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里十二点，但十二师师部还是没拿下来。我们得到了指挥部新的通知：西壕口地区已几次易手，敌人的军舰不断向江岸开炮。在进攻时刮起了风，中央银行便燃起了大火。必须迅速肃清各处的残敌，准备向河南地区进攻。

我们队的队长将进攻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报告。敌人顽固据守，集结在李济琛家里不下三千人和很多弹药。给我们调派来了增援部队和大炮。我们开了炮。但炮手班训练不佳，打了十发才有二发中了目标。进攻一直持续到拂晓，但李济琛的住宅还是拿不下来。我听见队长派通讯员向团部报告去了。又来了消息说，昨天（即12月11日）下午，军阀李福林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从沙面调来了两个团，现在，这两个团正沿铁路向广州进发。我们的指挥部调走了增援部队，以便从河南岸将敌人全部击退。起义者们没能占领这一地区，因为没有渡河的船只，大炮只能隔河而射。在起义之前，在海员中间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因而他们现在在运送敌人的部队。由于我们无法向南岸的敌人进攻，我们的部队便进入了防御阵地。

我们小队继续攻打李济琛的家。已到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了。全城到处响起了枪声，在江岸上，射击的炮火一直未停。指挥部命令我们小队留下一部分人监视敌人，其余的立即前往司令部。小队长部署了警戒，以防敌人逃走。我们就在那儿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有三千人左右的一支庞大农民武装队

伍从广州郊区赶来了。他们与起义者的前锋部队一道行动，制定大规模进攻计划。这个消息使我们小队的官兵深受鼓舞。如果能早些动员几万广州郊区农民参加起义的话，那么他们就能炸毁铁路，将电报局和电话联系毁掉，切断向城里开进的敌人的去路。对广州起义者来说，这可能是极重要的援助。与此同时，我们小队在司令部附近投入了战斗。尽管我们都武装了起来，但带有刺刀的步枪不够用，整个小队只有一半人有这种武器。各条街道上都没有筑防卫工事（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敌人冲过来，那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小队就得吃苦头。我们全体官兵都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突然从左边传来了枪声，小队长向哪儿派了一些战士去，敌人以火力相迎。我们小队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俘虏了两个人。我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讯，他们供认他们是机器工会武装小队的。战士们把这两个人捆着押到了司令部。在这次起义期间，机器工会的成员们积极支持反动势力。他们忘记了工人是他们的亲兄弟。这是我们对“黄色”工会奉行的宗派主义政策的后果。结果，敌人从内部和外部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2点，司令部派了一队赤卫队员和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警备队的一个排去替换坚守在防线里的我们。通讯队都返回了教导团的营地，以便进行休息，要知道战斗不停地持续了两天两夜。当然，参加起义的其它各支部队也不轻松。

在我们坐在营房里休息时，城里，特别是观音山和江岸地区的枪声响得更厉害了。对前线各个地段的情况，我不大清

楚。近四时左右，几个战士回到了团里。我们向他们问了一些情况。他们说，敌人从北江和西江地区调来了反攻部队，看来敌人五点左右就可到广州（实际上，敌人已经在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从四面逼进了广州）。此后，便一点消息也没得到。已经听见隆隆的炮声和哒哒的机枪射击声了。广州的几个地方都起了大火。局势恶化了。晚上八点，红军总指挥部来了命令，让各部队都到司令部去。谢队长把队伍集合起来后，我们便向指定方向撤退。

（李辉译自《共产国际》第7卷1936年
第4—5期第89—100页）

金奎光同志参加广州 起义的我见

杜君慧

我是金奎光同志的爱人。他在平时每天都到我家来，但十二月上旬却连续数日没有露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清晨，忽然听到远处有密集的枪声。入午，枪声更密，杂以炮声，而且越来越近。街上的传说、议论很多：“共产党暴动了”、“共产党正在攻打市政机关”。人们还传说着：人力车夫用石头砸死国民党的伤败兵；车衣女工英勇战斗；理发工会那些“剃头佬”组织起来，出动的人真多，真能打；监狱的牢门打开了，那些刚恢复自由的政治犯，马上拿起枪来参加战斗。

我记得邻居有一位家庭妇女，因妹妹和丈夫姘居而找丈夫说理，反被诬为“谋杀亲夫”，关进了公安局的监牢。起义后，她冲出牢房跑回家，她丈夫和妹妹刚好在一起，看见她回来，吓得魂不附体，双双跪下叩头认罪。她逢人便讲共产党救了她。那时，穿长衫和穿西装的人不敢上街，怕被“红了眼的穷棒子”殴打。街上到处都是系红领带的人。红领带是参加起义的标志。当然，在如此动乱的时刻，随便找条红布围在颈上趁机闹事，抢劫百姓财物的也不乏其人。

两天以后，李福林的军队过河了。李军及外地开来的丘

八^①，抢劫屠杀，残害平民百姓，街市变成了血海，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

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武汉到广州后，奎光同志才和他们联系的。教导团的第一营(或第三营)有一个连队约二百人全是朝鲜同志。奎光同志负责这个连队党的工作和联络工作。起义时，他代表连队的朝鲜同志参加市委指挥部的工作。攻打市公安局的战斗，有不少朝鲜同志参加，其中有朴建雄(黄埔军校四届毕业生)、张志东(中大学生)、金元风(黄埔军校毕业生，后叛变)、崔庸健(教导团教官)等，有几个很好的朝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有同志说奎光同志参加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

起义次日，在广州市区西瓜园广场开大会，参加的群众很多。朝鲜同志所在的连队负责广场的防卫工作，奎光和七、八位朝鲜同志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崔庸健。

起义失败后的一个纷乱的黄昏，奎光同志突然来到我家。他灰尘满面，形容枯槁，然而却十分镇定。他是在公安局坚持到最后才撤退的。他说被围困时，很多同志被机关枪扫射牺牲了，剩下的部分同志已撤离市区，决定分别到海陆丰和香港隐蔽。还说中大宿舍有部分同志急待转移，他们衣裳、食物和钱都很困难。为了接济在中大的那些同志，我和母亲商量后，母亲拿出哥哥的衣服等物，又连夜缝制了一件中式夹袄，以便给同志们乔装出来(通常朝鲜人习惯穿西装)。母亲还尽力筹借了十元毫洋，帮助我们。

① 广州人称国民党的士兵为丘八。

我和奎光同志离开西关居民区，步出了“西瓜园”（旧地名），路上到处是血迹，被移到马路两旁的尸首愈来愈多。我们到达大佛寺广场的空地时，看到那里也密密地摆着尸体，路边则放着无数空着的人力车。这是李福林军队集中屠杀人力车工人的铁证，其惨状难于用文字言述。过了大佛寺一带，我们来到曾经激战过的文德路、文明路和永汉路，这里也横七竖八地摆着许多尸体。

我们到达中大“俄罗斯路”宿舍时已是正午，安排了同志们撤离后，我和奎光同志也一齐撤退到香港。

广州起义亲历记(节录)

雷云仙^①

教导团到广州后,换了一个新团长,名叫杨澍松。他在汪、张“护党”后,还接收黄埔军校,兼任教育长。此时,中共党组织在团内成立“士兵训练委员会”,把全团的勤杂兵伙,如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兵等三百多人组织起来,于每日午前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我是炮连九班班长,兼做这方面的训练工作。每天上课下操,团的中共党委书记叶镛、共青团支书唐维(第三连学生,四川邻水人,起义军到海陆丰后战死)都亲自到场督率训导。最后一段时间,侧重于散兵战斗的攻击、射击和夜间作战训练。起初,士兵们因为过惯了旧军队那种自由散漫,为吃饭工作,为官长服务的奴役生活,阶级意识不够明确,有部分人觉得接受训练是增加包袱。对此,党组织通过小组活动和个别谈心,进行一系列的启发、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如拨云见天,争来受训,一心一意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经过一个多月,这三百多人都成了阶级意识坚定、战斗基本动作熟练的红色士兵。在起义中为捍卫苏维埃政权、维持革命秩序和打击敌人,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有个炊事

^① 雷云仙是原教导团炮连九班班长。

兵,年逾四十,出操走“同边脚”,是个“黑眼窝”,记性也不好,认为煮饭是自己的本行,出操搞不来,学习更不成,因而灰心不干。后来经过谈心,说服,他明确了革命的意义和目的,每次操课,都早到迟退,甚至忘餐废寐地自练自学。结果仅仅三、四个星期,一个熟练士兵的基本动作就被他完全掌握了。起义时,他奉命增援观音山,随同一个班扼守一个山隘,两天两夜,不眠不食,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每当敌人扑到面前,他总是鼓起眼睛,不慌不忙地一边瞄准射击,一边怒吼:“丢那吗,干掉你!”

教导团进驻四标营不久,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来团里讲了一次话。团的迎汪仪式很简单,冷清清的。汪精卫的讲话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讲完即由张发奎陪同走了。他讲话的内容,还是强调他如何“在夹攻中奋斗”,申明要“护党救国”的苦衷。当汪重复地加重他“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时,学生中默默的回声是:“在夹攻中挨揍”。汪、张去后,黄琪翔讲话,其中有这么几句:“军长领导你们护党,如护党不成,就领你们上山当土匪去!”大概是当天晚上(十一月十五日),汪精卫用调虎离山计,骗李济琛同赴上海开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他们算定船行至黑水洋中途,张发奎、黄琪翔就在广州以“护党”为名,出其不意,夜袭桂系军阀李济琛、黄绍竑驻在广州的一切机关、部队(黄绍竑仅以身免),夺得了广东地方政权。接着出兵东江、西江,驱逐李、黄的残留部队,并向广西扩张。这时,广州空虚,黄琪翔不能不依靠教导团来镇慑后方,因此拣出库内报废的残枪发给教导团学生。我领用的一枝德造双筒枪,来复线都滑齿了,口径比七九子弹大一倍。可是我们却把

这些烂家伙当成活宝贝，尽数日之力，把它拭擦干净。我们抓紧训练突击和夜袭。大家半夜就起床，整队长跑，沿着往沙河的大路，跑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才停下休息。回团时又沿路唱着军歌：“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稳着脚步，要高举少年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沿路的张、黄驻军，起初派出人员警戒，和潜来侦察动静。以后他们习惯了，知道是教导团下早操，也就不闻不问了。这时，我团的党组织吸收各班班长，以及革命意志坚强、行动积极的学生，组织“工农兵革命同志会”来团结、教育群众。我炮连是共产党员李鞠、李桂枝（苏北人）两同志负责领导。我们的活动有多种方式：利用星期例假，到郊外去集会；平常则在熄灯后到外操场进行小组活动；也利用晨操长跑途间休息，三、五人谈心时，接受指示。这样把一千五百多个学生团结成一个整体。

最令人难忘的，是一次公开集会，“老团长”叶剑英同志亲自来讲话。在讲话中，他揭穿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开人头大会”的谎话，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胜利和成就，分析了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从而加强了全体学生对革命的信心，鼓舞了全团的士气。

一天，全团集合，杨团长带了一个穿浅灰色洋服的人上台说：“奉军长命令，派朱勉芳前来充任本团参谋长。”并介绍说朱参谋长是在德国学军事多年回国的，军长特派他来“整顿”本团教育。他还说因自己新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不能兼顾团内的事情，以后由朱参谋长完全负责“整顿”工作，要大家一致服从。朱参谋长到任，也发表“整顿”讲话。他很起劲地把德

国军国主义的教条说了一大串,重复又重复。之后,他天天在办公室里干叫,这不对,那也不对,要办这个,要办那个,甚至说:“要向军长报告!”据说,他确已向军长告密了,并传说着张、黄再次命令我们缴枪的消息。在起义准备阶段,这个朱参谋长到团后,确实起了不少的破坏作用,故起义时,首先把他镇压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晚间,各班班长以上的有关人员彻夜未睡,积极商讨和准备起义事项。起义时首先把各连的亲汪分子、军阀——张、黄的爪牙和一贯反动的内奸,分别集中管押起来。十一日晨一时许,各班低声将“工农兵革命同志会”的同志们先行唤起,作好准备后,即发出紧急集合的哨音,由班长带头,按各营预定地点集合。各级领导同志都颈系红色布带,手持驳壳枪,督率部队集合。我炮兵连与第一营在内操场集合,营指导员(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忘了名字)讲话说:“……我们天天喊打倒军阀,现在军阀爬在我们头上来了!”学生们齐声高呼:“打倒军阀!”营指导员又坚定地说:“好,我们就行动起来!”全体高呼:“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同时,大营门外传来了啪、啪、啪几响枪声,这是镇压一贯破坏革命的首恶分子,也是与兄弟部队联络的信号。随即每人发给一条红布带系在颈上,作为起义的标志,并秘传普通口令“暴动”。各营出发,分头执行任务。我炮连在新连长(新连长,似姓苏,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约九月到职,在韶关往广州途中不见,到起义前夕才又在四标营出现。)一声“炮兵连跟我来”的呼唤下,紧随第一营直奔沙河,袭击张、黄驻广州的主力部队。一路上如平时早操练习长跑一样,毫无阻拦地冲

进了沙河敌人的营房。几颗手榴弹，一阵枪响，伴着“缴枪优待”的喊声，就解除了一个团的反动武装。同志们利用战斗间隙对俘虏宣传革命的意义，并指出：“士兵们都是被压迫的，应当起来打倒军阀！”结果很多士兵请求编入行列，参加革命。在这一战役中，我炮连新连长第一个带头冲入敌营，英勇牺牲了，还有九班副班长（湖南人，同学称他为“小老弟”）两腿受了伤，其余没有损失。

当我们跑步到沙河附近将与敌接触时，大路左侧斜坡上出现了叶挺同志。他手持指挥鞭，指向敌方，压低声音不断地说：“赶快！赶快！天快亮了！”同学们在他的指挥下，好象火车头拉开了气闸，轰然一声，冲进了敌营。

解决了沙河的敌军，我连转向广州市区，肃清了通往东山医院沿路一带的反动警察武装。约十点钟前后，少数残余敌兵，在市内一幢有风火墙的大楼上，负隅顽抗。我连调第一排排长率炮兵一班，附炮一门，赶往增援。只发一弹，就正中敌楼，敌兵立掣白旗出降。这时，“广州公社”的红旗已插遍了整个岭南的英雄名城，到各处执行任务的各营连，都一一胜利归来。市区各条街道，〈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歌声此起彼伏，声震全市。

午刻，我炮连又奉命调到观音山，向西北方向警戒。徐战术教官（北方口音，年纪不大，颌下留有长须）担任团的作战指挥，他亲自到阵地来指挥我们远程试射，用炮弹搜索敌情。因未发现敌踪，故又调回四标营，作团的预备队。约中午时分，敌人一度占领了观音山。我连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同步兵二连的一个排赶去增援。我连到达山麓时，步兵二连的一个排

已发起攻击，正顿挫于山腹间。敌兵麇集山头，毫无顾忌。徐战术教官亲自督战。我炮兵班协同步枪排进行攻击，开炮轰击敌人阵地。第一弹越过了山头，修正射距后，第二弹就正中山顶，浓烟起处，敌兵土崩瓦解，向后溃散。克复观音山后，步二连的一个排（附机枪一挺）留下来扼守观音山头（今中山纪念堂背后高地），炮连一、二排调回团部作预备队，我所在的第三排前去扼守岭北（逼白云山、瘦狗岭方向）一线高地。当晚到十二日，敌人进行了无数次反扑，均被我连击退，而我军的伤亡和弹药的消耗也很大。当时，在广韶路附近，敌军成营成团地开来，并向我阵地右翼和侧后运动，因炮弹已打完，只好等敌人接近，集中步枪火力予以杀伤。为了应付敌人夜袭，在黄昏前，排长派我和同学三人回团部领取弹药。我回到团部，党的领导李鞠、李桂枝等同志都来慰问，共青团工作队长游曦同志（团支委，女性，四川巴县人，牺牲于长堤）还亲自端上茶汤。他们问明了敌情，了解战况后，都说：“炮三排有办法，打得好呀！”大家都来帮我们搬运子弹，送我们出大门，齐声“祝贺前线同志的胜利！”我们每人肩荷步枪子弹一箱（五百发），乘夜赶回观音山阵地。这时，沿途已有反动分子潜入进行破坏，在路口和山坳，时常有冷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利用地物掩护，逐段搜索前进，最后把子弹运到阵地，交与排长。他很痛快地说：“有了这些子弹，我就不愁了！”当夜敌人再度来袭，曾侵入我火线只有五六十公尺的地带，全线同志齐喊：“五十公尺，上刺刀，杀！”敌人撒腿就跑了。十三日午后三时许，全排已伤亡很大，班长只剩我一人，同学也只有几人了。这时，市区到处是混乱的枪声和火焰，团的联络已经中断半日，敌人主

力似已侵入市区。我们固守据点的火力已大大削弱，如步二连阵地上的机关枪，打了两天两夜，到午后就全无声了。敌人逐步渗入我阵地右侧空隙，迂回到我排后背，夺去制高点。在敌轻快火器的瞰制下，仅有排长带领的同学三人及来援的炊事兵一人守住阵地，我们完全有被消灭的可能。在危急中，排长从山顶北面走来，发出沉重而严峻的命令：“雷起鹏（我在教导团的学名）走！”我们立即跟着他，利用山坡退入沟底。这时，二连阵地亦已失陷。两边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向沟内射击，我们急沿弯曲的沟道绕进了市区。在市内沿街都躺着身穿灰家机棉军服（教导团士兵的服装）的尸体，各街口都有颈系白带子的便衣土匪把守着。排长领我们硬闯了几个街口，只听后面人声嘈杂，大喊：“捉共产党！”子弹从四面向我们射来。我们闯到中山大学门边，大门已关闭。看见有学生翻越栅栏回校，我们就跟着他们翻了进去。原来相识的川籍学生，临时给我们凑了几件便服改装后，便转移到姓程的同乡处，掩蔽起来。

十四日上午，我疲倦地躺在程姓学生的床上，在似睡非睡的半眠状态中，感到院内死寂得可怕。朦胧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我惊觉起视，只见一群手持短枪的敌伪宪兵挟着一些人走出校门，接着就是十几响震耳的枪声。事后，才知道敌人来校搜索，逮捕了十多个人。他们也曾到我床前，揭开帐子，瞄了一下。也许因我床前摆着一双木拖鞋，身上盖着被睡觉，很象一个生重病的学生，而侥幸被他们放过了吧！

（载《广州文史资料》第6辑）

永远难忘的往事

郭 超^①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连在观音山阵地完成了掩护教导团主力撤退的任务后，我因护送伤员到市内，终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而被捕了。敌人把我身上的财物搜刮光后，将我五花大绑，押到一个方向不明的大院^②。这大院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草坪。院内的房子已关满了人，敌人把我推到门卫口的走道上。这里除了我，还有教导团的蒋国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还有参加起义的宪兵队几个同志。大家很快便熟悉了。这时，有一个人经常在卫门口出出进进，他认识蒋国杰，听说也是黄埔学生。

我们被关押后，了解到这里每天早、午、晚三次杀人，只要枪声一响，又是一批同志牺牲。蒋国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得争取主动，设法逃生。为了逃生，我们便在那个黄埔生身上打主意。蒋国杰向他要了纸笔，我们都向伪司令部写报告，假造情况，要求释放。我们一方面希望死里逃生；一方面作就义的准备，还拟好了几个口号，备牺牲时用。一连三

① 郭超原是教导团二营战士。本文是他回忆广州起义的一段。

② 据回忆，这个大院似是在东教场。

天，我们打了三次报告。第四天中午，敌人就审问我们了。我们按报告的内容答问。我们后来被转囚南石头监狱，参加了狱中地下党组织的“逃生团”。数月后，由于蒋国杰和他的亲人的努力，我们被保释出狱，我往韶关找党组织去了。

在这个大院，关押着好几位苏联人，听说是苏联领事馆的。他们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一位是抱着婴孩的母亲，共七八个人。那是在我被关押的第二天中午，敌人押着他们去行刑，男的还带着手镣脚铐。他们一个个神态自若，脸无惧色，我们也用敬佩的目光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出了大院不久，只听得草坪上传来一排枪声，以后便不见他们回来了。这些苏联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他们是列宁、斯大林教育出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们英勇就义，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根据郭超回忆，董燕整理）

党啊，我听着你呼唤

——广州起义回忆(节录)

贺 诚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随张发奎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到广州的第二天，就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偷偷跑到永汉路(今北京路)，想找到广东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国光书店，接上党的关系。但是，物是人非，已经无法寻觅了。

在这革命转入低潮，斗争更加复杂的情况下，我该怎样行动呢？

我那时在东校场的第四军军医处任医务主任。为了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听到有关党的一些消息，我时常到北校场的教导团驻地找王侃予、陆更夫。我们都是四川人，老乡找老乡，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那时候，张发奎已经派他的亲信朱勉芳驻在教导团，并且暗中调兵遣将，形成包围之势。我们这些旁观者，常为他们担惊受怕，他们却镇定若常，陆更夫还断不了开玩笑。我说：“刀都快挨到脖子了，怎么还那么高兴？”陆更夫哈哈笑着说：“这叫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侃予兄？”王侃予点点头。我觉得话中有话，就追问说：“怎么？难道你们有什么打算？”王侃予意味深长地说：“那

就看我们‘老团长’了！”我明白，“老团长”指的是叶剑英。

过了一段时间，已经是十二月初了，教导团处境更加危险。一天，王侃予、陆更夫说找我玩。我们漫步到大东门，在附近一个茶楼二层找一个僻静之处，正巧楼上没什么人。陆更夫说：“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干吧！”我听了，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急切试探地问：“老陆，干什么？告诉我！”他看看王侃予，王侃予点点头。原来是来串通我，参加广州起义。我当即表示：“我一定参加！”

回到东校场，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我又将回到党的怀抱。尤其当我知道领导起义的有党的著名人物张太雷、叶挺，还有“老团长”叶剑英时，心里更是充满了希望。

为了迎接起义，我在暗中筹划药品、器械，等到枪响之后，立即调运出去抢救伤病员。同时，对医务处里倾向革命的同志谈话，做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抢救队伍。张瑞华同志革命意志非常坚决。我还在广州找到了在北京的老同学黄瀛秀和张志洛，后者是朝鲜人。他们都是C. Y. (共青团员)。起义的消息，使他们都很振奋。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在晨曦中，我把医务处的全体成员召集到一起，宣布参加起义。多数人表示赞同，但是反动的医务处长、书记官和军需官三人，却拚死反对。医务处长嚎叫着：“你们不要上他的当，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他还掏出手枪逼着我放弃起义。在威胁面前，我镇定如常，果断地下令逮捕了他们三个人。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做出三条建议：①参加起义；②处决这三个反动家伙；③由我去起义总部联络参加起义事宜。

在处决了三个反动家伙之后，我立即赶往起义总指挥部。一路上，看到参加起义的士兵、工人和农民赤卫队员，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向有枪声的方向跑去。有许多人坚守着路口。

总指挥部设在伪公安局。起义之后，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它就被我们攻陷了。现在，它的上空飘扬着鲜艳的红旗，人们匆匆地进进出出。

在这里，我见到了张太雷和叶挺、聂荣臻同志。当我说明来意，请求分配任务时，太雷同志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握住说：“好，好！太好了！同志，革命正需要自己的医生。赶快组织抢救队伍，不能让自己的同志在那儿白白流血！”叶挺同志从地图上抬起头，用红铅笔敲着桌子说：“还有陆军医院，设法争取过来，赶快抢救伤员！”聂荣臻同志还详细地介绍了战斗地点及组织抢救措施和要求。听了他们的指示，我答：“是！”我敬了个礼，转身就跑去了。回到驻地，医务处的十几个人，立即被分配下去，有的去陆军医院，有的去地方医院，黄瀛秀去争取女大学生参加护理工作。张志洛同志背起药箱向枪声最激烈的方向跑去。我望着他矫健的身影，心想：一个朝鲜同志，这样热爱中国的解放事业，多么可敬佩啊！

经过简短的工作之后，陆军医院开始接受伤员。在几个街口也建立起了救护站。这天下午，我跑到一个救护站，发现有上百个伤员在那儿流血、呻吟，却没有人给包扎。这是怎么回事？盛怒之下，我猛地推开包扎室，只有几个女大学生。原来，仅有的一个医生跑掉了。她们第一次看见血，看见死者，个个哆哆嗦索的，连镊子也拿不稳。

我的火压下去了。怎么能怪几个年轻的姑娘呢？我立即

从一个姑娘手中接过绷带，说：“不要怕，你们过来，看我教给你们。”我一边洗伤口，一边对他们说：“应该这样做。洗的时候动作要轻，手要稳，镊子不要碰到伤口上。他们为我们才负了伤，他们值得我们尊敬，不要怕，对不对？”

我经过一段示范和教育，她们不再害怕，工作有了秩序，进度也加快了。遇到有需做小手术的，我就连忙做。一直到派来医生，我才出来。这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我赶到陆军医院，柯麟同志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交谈了几句，互相鼓励一定坚持到底。

十二日晚上，起义失利消息接踵而来。我继续投入紧张的抢救和治疗工作。这时，市内已有部份地区被敌人占领。有的地区断电断水，我设法安排伤员转移和撤退。

十三日——起义的第三天，情况更加艰苦。张瑞华同志抢救伤员，累得精疲力尽，我劝她休息一下，她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不要紧，不能看着同志们流血啊！”

下午，长堤方向枪声越来越激烈，观音山（越秀山）也争夺得非常激烈。不久，终于传来观音山失守的消息。敌人控制了制高点，就向市内冲来。我赶到总指挥部，大部份同志已经撤退了。贺维中同志告诉我，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党决定为了保存实力，撤出广州，到海陆丰去。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们走。”他要我跟随教导团，从东北方向撤出。

巷战在激烈进行。革命者决不会轻易放弃阵地。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从窗口、门洞射击来的子弹。骑楼那方方正正的柱子，更是打击敌人的有利隐蔽物。在用桌椅、麻袋、砖石构筑的工事里，有些同志牺牲了，他们旁边倒着许多敌人

的尸体。有的同志已经断气，但他的双手仍然紧紧卡着敌人的脖子。有的在用刺刀猛刺敌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刺中，他们双双倒在血泊里，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在大东门附近巷口，我亲眼看到，一个同志拿着最后一颗手榴弹，高喊一声跳入敌群，拉响了它。在轰隆的巨响中，敌人死伤十多人，他也为美好的未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夜幕降临时，枪声已渐渐稀落下来。广州城又被敌人夺回去了。在医务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些人坚决要跟我到海陆丰去。有的人则退缩了。我告诉他们：“革命的失利是暂时的，任何反动势力都休想叫工农大众屈服。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夺回广州城，并且永远占领它。”然后，我们匆匆收拾了行李，找来一辆汽车，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向山中驶去。

后来同志们陆续到达了花县，成立了红四师，由叶镛同志担任师长，王侃予同志担当党代表。我担任了卫生处长。到海陆丰后，我担任了海陆丰工农政府卫生局长，着手开展群众医疗卫生工作。这时有的同志关心地问我：“你这大知识分子这样热爱革命，为什么不入党呢？”我向他们谈了失掉党的关系的情况。党组织认真研究了 my 表现，后来决定：让我重新入党，待有机会时再调查我原来的党的关系。我表示同意。可是，事情也真巧，我第二次入党不久，孙炳文同志到了。在他和王侃予、陆更夫等同志的证明下，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恢复了我的党籍。

(穆静整理)

柯麟同志谈广州起义

(节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夜，中山大学以毕磊同志为首的三百多位同学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医学院十多位出名的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被捕了，其中有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苏家麟、陈嗣炎、余世杰、罗其屏、李锡兰、卢福懋（医生）陈伯华（护士）等同志，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了！

在“四·一五”事变时，因我当时在爱群对面的博济医院（现附属第二医院）工作，才得以逃脱。我还帮助了中大党的负责人徐文雅（即徐彬如，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化装逃走。四月二十日左右，我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去武汉。

我们到武汉后，找到了在汉口市委工作的王机夫，他安排我们在湖中府与沈宝同、莫苍白、区夏民等住在一起。不久，湖北区委负责同志欧阳钦接见我们，介绍我到叶挺的教导大队当军医，约一个月后，又调我到第四军当医务主任。在医务处工作的有二三十人，张瑞华同志当时在那里当护士。这些同志在广暴时有一部分牺牲了。第四军军长是黄琪翔，叶剑英是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李世安是政治部主任，李人一是参谋处长。后来部队南下，途经九江、赣州之间，叶剑英同志

参加了党。最初,我是准备当介绍人的,后来改由李世安(脱党在港)、李人一(叛变已死)两人介绍。

广州暴动时,我在第四军第三病院工作(院址是在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当时,警卫团团长江秉枢在解决一营的反动军官时受了伤,送来医院医治。为了更好地掩护他医治,我又将他转送到广东公医院。

由于没有经验,缺乏军事知识,在起义中没有把住在东山的黄琪翔、张发奎抓起来,而被他们逃到河南,重新组织力量,否则敌人的反攻不会来得这样迅速。同时张太雷同志被敌人击中牺牲了,不然,起义也不会这样容易失败。

广州暴动失败后,我撤到了香港,和叶剑英同志一起住在大埔圩。我在香港住了八个多月。

(黄等辉、叶惠南1964年9月纪录整理)

警卫团起义的前前后后

(节录)

梁秉枢

广州起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以及工人赤卫队为主力，继南昌“八·一”起义之后，发动的一次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武装革命暴动。这次暴动，虽然三天便告失败了，但它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中，影响巨大，留给广州市人民的印象更是光荣的、永远不能忘记的。这次起义，我是参加者，根据目睹和见闻，回忆出来，仅供编史的同志参考。

一、起义前广州的概况(略——编者注)

二、驻广州的反动部队兵力和驻地

敌方第四军司令部(军长黄琪翔)和军参谋长叶剑英(党员)驻在肇庆会馆。福军(军长李福林)一个警卫营，驻在河南海幢寺。炮兵一团(团长李垣华，二团团长沙觉新)驻沙河。教导第一师，即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之第三团(团长莫雄)驻在中山路陈家祠，约一千四百人。保安总队三个大队约千多人，驻在维新路警察总局对面(即今之公安局)及惠福东路大佛寺和西关等处。

三、起义部队的编成、人数和驻地

参加起义主力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的教导团，警卫团团长江秉枢率领的警卫团第三营及工人赤卫队约数千人。教导团是由武汉军校学生编成的，约二千多人，共产党员甚多，驻在北教场四标营。警卫团在当年新成立时约一千多人，共产党员也不少。该团辖三个步兵营，每营四个连。第一营是第四军特务营拨编的，是张发奎的亲信，驻在观音山脚及军部、团部。第二营是李济琛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驻在东教场、大沙头。第三营是新成立的，营长施恕之（南昌起义时他是叶挺的营长），士兵一部分自行招募，一部分由党秘密派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充当。团部和第三营驻在东堤二马路八旗会馆。

警卫团团部由下列人员组成：上校团长梁秉枢（党员），中校参谋长唐继元，团指导员陈选甫（党员），少校团副张诗教，少校军需吴瑞东，上尉参谋林天尧（党员），上尉副官吴剑侠（党员），上尉书记陈星五（党员），上尉助理员（姓名忘记，党员），第二、三营营副（姓名忘记，党员），第三营有一连长叫袁耐坚（党员），连指导员陈同生（党员）。还有第十连连长黄霖，是反动分子，被枪毙。

四、会议决定进攻部署

起义时军事负责人是叶挺同志。十日晚七时党派徐光英在旧仓巷一座楼房召集教导团、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代表开会，决定：（1）明早三时发动起义。（2）夜间普通

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3）起义人员颈上一律束红领巾作标志。（4）枪毙各团的反动军官，收缴反动部队的枪枝弹药给新兵和工人赤卫队使用。（5）教导团进攻沙河炮兵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维新路公安局、保安总队及各分局。（6）警卫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长堤肇庆会馆之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并派队往东堤一带戒严，防止敌军渡河。

警卫团在处决反动参谋长唐继元、第十连连长黄霖和守卫团部之第一营一个连长的同时，解除了反动士兵武装，即派部队配合工人赤卫队作战。一个连进攻长堤第四军司令部；另一部进攻仰忠街第四军部军械库和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留第二营就地警戒，以防敌军渡河。我军到达进攻目标时，敌人已有准备，处处布防。驻在肇庆会馆之敌，在会馆门口一带戒备，楼上各层和天台也严加防守。敌人居高临下，加上帝国主义的兵舰开炮向我军攻击，我军死伤惨重。驻守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之敌，固守据点，与我军进行巷战。因军械库备有充足枪弹，工事严密，经两日两夜战斗，不能攻下。我军到达文德路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时，敌人尚未防备，故能一举攻下。

五、胜利之后

十一日黎明后，苏维埃政府在警察总局内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主席，叶挺任总司令，宣布政纲，出安民布告并占领国民党的行政机关、银行、邮局及水电部门。党的红旗在全市飘扬，街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报纸刊登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起义胜利的情况，工人和进步学生带上鲜红的领巾，宣传队在

散发传单和演讲，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此时，黑暗的广州变成了一个光明灿烂的城市。

起义时，警卫团第一营公开与我们对抗，我去解除其武装，不幸中弹受伤。团助理员将我送到大东门警察分局起义临时指挥部，恰遇张太雷、叶挺两同志在那里，他们对我极其关怀，用汽车将我送教导团，转送第四军医院（即今天文明路工人文化宫），由柯麟同志医治。不久医院附近的第四军军械库，战斗激烈，附近一带又发生火灾，有延及医院之势。次日（十二日）柯麟同志将我转移去百子路广东公医院（即今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治。柯麟同志对医院的一个护士（地下工作者，姓名已忘）说：“这位是我们的同志，请特别照顾。”所以我得到特别护理。

工会都参加了起义，如汽车工会、手车夫工会、码头工会、理发工会、酒楼茶室工会、旅业工会、搬运工会。被李德轩和曾西盛把持的机器工会和油业工会，一部分进步工人也自觉地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很多人被工贼杀害。私人汽车的司机也参加了起义，他们把车开来，用作交通运输及宣传工作。

十二日在丰宁路西瓜园操场举行了群众大会，由张太雷同志主持。散会后，张太雷同志乘车回总部经惠爱路时，突然被机器工会体育队开枪击毙，革命损失颇大。

六、敌人反攻

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敌军开始反攻^①。在帝国主义军舰掩

^① 敌人反攻时间应是十二日上午开始。

护下，驻河南的福军由岭南大学渡河，向大沙头东山方面进攻；从韶关调回的福军四十四、四十六两团进攻观音山。薛岳教导师之一部由江门调回，从石围塘渡江到黄沙登陆，向我起义军进攻。许志锐部由石龙方面调回向石牌东山进攻。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我们决定退出广州。教导团数百人和警卫团士兵百余人，由连长袁耐坚和指导员陈同生两同志率领，从沙河方面经花县撤退到海陆丰，与东江红军会合。

七、起义失败后的大屠杀（略——编者注）

八、我的脱险

我在广东公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十三日）早晨，女护士匆匆跑来告诉我说：“反动头子张发奎逃往河南后，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进行反攻。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已撤离广州。”我请她扶我到窗口观看，看见许多敌人持着青天白日旗从东山向市内攻击，枪声甚密，而起义部队已经撤退了，我才知道起义失败了。不久，医院内人声沸腾，许多反动士兵荷枪实弹闯进医院来。他们借口搜查，乘机抢劫伤病人员、医生护士的财物。我的手表、自来水笔、现金被他们全部抢光。一批去了，一批又来，什么都抢。当时情势十分严重，为免敌人发觉，我吃中午饭时故意将饭菜嚼烂，吐在痰盂和地板上，表示自己是一个普通病号，不是受伤人员，以麻痹敌人。

下午，整个医院被反动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如不设法逃脱，必遭凌辱杀害，因此我决定化装逃走。为了脱身，十二日晚上，我已叫我的胞妹给我拿来长衫、毡帽、眼镜、手杖等东西，

但漏了布鞋未拿来。当时我穿的是军皮靴，容易暴露，等我走出病房后，发现医院有一死尸，我把他足上的布鞋取下，自己穿上。这时适逢医生护士担行李外出，我便混进行李队中逃走。医院门口有数十个伤员已被敌军逮捕，敌人以为我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检查盘问，从而逃出了虎口。我坐上人力车去东山的军委会躲避，为避免他人认出，就买了当日的报纸，装着看报，借以遮掩。在这张报上，用大字刊登着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与记者的谈话。内容当然是反动的，其中有这样的话：“我（黄琪翔）对梁秉枢很好，他这次暴动，实在对我不起”等话。

我到东山军委会机关后，负责同志对我非常关怀，买了枪伤药膏（双养水和去污生肌药膏）给我医治。当晚我替他烧毁了许多文件书籍，并请他给我写了介绍信，以便与党联系。翌日（十四日）晚七时，我搭手车到芳草街同乡吴公侠家躲避。约半个月后，敌人的警戒稍为松懈了，我才和我的胞妹、小女化装成商人，乘轮赴港。船经黄埔，又被福军搜查，我平安过了关。闻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对形迹可疑之乘客，当场枪毙，投入江中。

我在香港，医好了枪伤后，就接到省委负责同志的通知，召集我和叶剑英、俞作柏两同志开会。因琼崖革命工作尚无进展，需要干部帮助工作，决定派我赴琼崖。于是我从广州湾搭民船秘密回到琼崖，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

九、起义失败的原因

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有几点：

1、因变更起义日期,准备工作不充分,也不能及时通知郊区农民前来参加,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联合反攻中,孤军无援。

2、徐光英个性太强,不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大家认为进攻反动机关,要同时动作,使敌人措手不及;他却要教导团先解决炮兵团,然后再来进攻警察总局,致使枪声一响,敌方各机关已严加戒备,结果有些机关无法攻陷。

3、大家提出要扣留张发奎或派兵包围他的公馆使他不能外出,徐光英未接纳这个合理建议,致使张发奎逃往河南,下令调部队回来反攻。

广州起义中的警卫团

张诗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起义时及事后的一些情况，因我是警卫团的少校团副，是起义的参加者，所以记忆犹新。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我所在的警卫团与教导团也在同时举事。当时我团驻地在长堤二马路八旗会馆。团的编制是：团长梁秉枢，团参谋长唐继元，团指导员陈选甫，我是少校团副，参谋长林天尧，副官吴剑侠，书记陈星五，一营长张强光，驻观音山脚，二营长李达，驻东堤及东教场，三营长施恕之，驻八旗会馆一带与团部相贴近。起义之初，由于反动家伙唐继元死心塌地要将起义情报用电话通知军部，十连长黄霖（张发奎手下的坐探）也一个劲地反对我们，因之，一举事我们就把这两个家伙枪毙了。接着，以第三营为主力，配合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工人赤卫队进攻顽固的反动据点了。

我们警卫团的任务是：第三营进攻长堤肇庆会馆第四军部；攻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夺取武器弹药，武装起义部队与革命群众；占领十二师驻文德路的后方留守处，控制市中心一带地区。第二营原地警戒，并在东堤一带设防，严防河南李福林部渡河增援市内顽军。第一营则警戒观音山一带，防止北

面敌人进城反扑。

计划本是周密可行的，但由于起义时间匆促，而敌人先有戒备，且居高临下，防守严密，占了军事优势，加上帝国主义兵舰临江开炮，攻击我们，至使我们警卫团第三营进攻上述的三处，除十二师留守处为我攻占外，其余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军军械库经两昼夜战斗，始终没有攻下。此役警卫团三营伤亡惨重，攻军部的施恕之连长也阵亡了，党的骨干和省港罢工工人及赤卫队员也伤亡众多。

参加起义的警卫团团长江秉枢同志是领导全团起义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起义时，他身先士卒，出生入死为革命到处忙碌，不辞辛劳。不幸，因一营长张强光公开反抗起义，不听命令，江秉枢同志亲自到一营去解除其武装，被敌人枪伤了。此后，团内军务全由团指导员陈选甫同志负责。我则在团内处理日常事务，还搞后勤和起义军枪械弹药补给工作。

起义时西濠口及长堤一带码头，都在我起义军手中。我们封锁往来港澳的船只，并劝阻旅客们不要上船，为巩固苏维埃政府作出贡献。行走港澳船只的员工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感召下，也纷纷罢工，走上码头，参加了向反动派斗争的行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西瓜园群众大会的召开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盛况。全城到处都是欢乐的歌声，红旗飘扬，巨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张发奎、黄琪翔！”的标语到处可见，宣传队伍于街头巷尾，此去彼来，热闹极了。人民是乐融融的，而那些一向鱼肉老百姓的财主们、地主们却提心吊胆，关门闭户在家中发抖，等候着起义者对他们的惩罚。

这次起义，由于时间紧迫，没充分调动市郊农民参加战

斗,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战斗打响后,没有扩大影响,动员更多的革命群众参加战斗行列,孤军缺援,是失败的原因之二;西瓜园群众大会开过后,张太雷同志牺牲,首脑机关失去了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失败的原因之三。这样,致使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经历了三天的血战后在十三日失败了。

十三日凌晨,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由河南渡江向大沙头反扑;观音山及东路防线,一路是薛岳部,一路是许志锐部引兵进犯。敌我双方几经争夺,终因敌众我寡,我起义部队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被迫撤离广州,从沙河经花县至东江,坚持革命,打击反动军队。起义军撤离广州,教导团官兵有一千多人。突围的警卫团战士百余人,由连长袁耐坚、陈同生两同志率领,和教导团汇合一起去了东江,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是人民的希望和可靠的支柱。

起义失败后,我躲避国民党军队搜捕,在群众掩护下留此余生的。

深夜里的回忆

——访陶铸同志(节录)

江 林

去访问陶铸同志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说：“我在那时，由党决定经叶剑英同志介绍，到新成立的警卫团去做策划起义的工作。我原在叶挺同志部队里参加过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到潮汕失败后，我跑到陆丰的甲子港，辗转逃到香港。我们这一批约三百人(多数为共产党员)，一到香港，就被英帝国主义扣留了。一个礼拜后，他们把我们引渡到广州来。

“当时，他们拿索子把我们捆起来押送到广州。一到广州，张发奎、朱晖日立即来审讯。因我们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在南昌起义前不久被派到十一军的，所以他认不出来。我们大家团结起来，都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连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有的说是文书，有的说是事务长，有的说是副官。张发奎、朱晖日看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用另一条计策来‘考验’我们。他说：‘你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军官，那就参加我的部队当兵吧’。我们说：‘好吧，反正在哪里也是吃粮当兵的’。但是，他仍旧不放心，把我们在公安局里关了一个多月，才放

出来编到工兵营当兵。我被监视派去修公路，当了近二十天的工兵后，乘隙逃了出来。

“起义本来规定是在十二月十三号，但是被敌人知道了，他们要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的第三营，并全力镇压工人运动，所以起义提前了。当时我在警卫团帮助新派去的团长蔡申熙同志率领不到六个连的兵力（该团第一营驻石井，为反动军官控制，未参加起义，第二营大部被我们缴械，只有少数参加了起义）攻打驻在长堤的张发奎的司令部，因去迟了一些，眼看着张发奎、陈公博等反动头子逃上外国军舰跑掉了。我们接受的第二个命令是防守长堤，对付河南的敌人与帝国主义者停泊在珠江河面的军舰的进攻。我们曾企图打过河南去，把被关在南石头监狱的同志营救出来。当时还没有海珠桥，帝国主义又开炮阻止我们过江，终于没有去。

“当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教导团和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攻下了很多重要的据点。警卫团为新成立不久的部队，比起他们来差些，但是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十二号晚上，国民党进行反攻了，叶挺同志命令我们把警卫团转到越秀山即镇海楼一线防守。这时候，警卫团剩下的实际上只有两百多人。当天夜里，总指挥部已发出了撤退的命令，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十三号天麻麻亮，李福林、薛岳等的部队都已进入市区。他们臂膀上缠着白布，见到缠红布的就杀。我们一看情况不对，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便决定分散向沙河方向撤退。很多同志牺牲了。我没有撤退出去，便把臂上红布摘掉，跑到住在芳草街一条巷子里、过去在陈炯明部当过副官长的老乡家里藏了起来。那个老乡很好，他同邻居也相处得很好，

邻居们根本不怀疑，他们很尽心的来掩护我。我在那里躲了二十多天，才通过私人关系从反动派的广州戒严司令部弄了一张护照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回到自己的故乡湖南。

“从十三号起，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全城。每天早上、中午或晚上，我都听见汽车从街上驶过，车上的同志有喊‘共产党万岁’口号的，有唱《国际歌》的，我听着，心里难过极了。从口号声中，《国际歌》里，可以想象到他们是怎样英勇地去牺牲、去就义的。那个老乡也经常告诉我说：很多人是在东教场牺牲的。他们的尸首有的葬在红花岗，有的扔进珠江，珠江潮落，尸首就露了出来。一些女同志死得更苦，她们被杀死后还被侮辱。

“这就是‘血腥’！不仅我们同志们的血流在这里，还有苏联同志的血也流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了岁数的同志充满阶级仇恨的原因。”

夜已很深了，陶铸同志停了好半天才又谈下去。

“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不少都葬在红花岗。先有黄花岗，后有红花岗，真是巧合。这些烈士们的血使中国已到处开遍红花，所以那年选择烈士陵园地址，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在红花岗，这是因为那里埋葬了我们先烈的骨骸，也因为‘红花’象征着先烈们的希望。”

（载1957年12月11日《南方日报》）

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广州起义经过

(节录)

何崇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杨澍松离开教导团前往黄埔，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职。他就新职时，在教导团内调用了三个人。一个是吴展，他是中共党员，黄埔第一期学生，原是教导团第三营营长，调任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另一个是王侃如，他是党员，黄埔第四期学生，原在教导团政工室工作（当年在教导团政工室工作的人员，尚记得起的有袁裕、陆更夫等人），调到黄埔做校长办公厅秘书。另一个就是我，调到黄埔做杨的随从副官。杨澍松在保定军校第五期工兵科毕业。北伐前，一向在黄埔军校做工科大队大队长。他对黄埔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

我们到黄埔后三四天，张发奎和陈公博到黄埔来对军校全体学生讲话。他们讲话后，杨澍松叫我陪送他二人乘“大南洋”电船返广州。又隔了几天，那天是星期一，照例举行“总理纪念周”，杨澍松对全校职员和全体学生作了一次较长的讲话。杨叫将他的话记录下来，并让我将他讲话整理出来给他看，他亲自仔细修改后，送交政治部主办的《黄埔三日刊》发

表,题目是《在夹攻中奋斗》,其中有“既要反对蒋介石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要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中奋斗。”

十二月十一日,正是星期日,军校的教职员,住广州的都在星期六下午回广州去了。平时,军校前的江面,从拂晓至中午,渡船总是川流不息的。可是那天天亮后,竟没有一艘渡船经过,甚至连小船也不见。杨澍松感到奇怪,要我打电话给驻省办事处询问,但电话老是打不通。将近八点半,杨着急起来,要我乘电船(小汽艇)到广州去调查。我便上了小电船向广州驶去。那天珠江上看不到一艘移动的船。电船靠岸后马路上也看不见人。办事处那个主任老头子告诉我说:“教导团起义啦!昨夜后半夜就枪声不断,只是刚刚才停下来。今天一早,有几个颈系红带的教导团学生进办事处来,告诉我他们起义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校本部一声呢?”老头子主任说:“一早就有一个教导团学生守住这里,不许我们打电话,电话铃响了,也不许我们接。”我见此情况,虽未调查清楚,但已知一个大概。我正想走向电话机摇电话报告杨澍松,一个教导团学生,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来问:“刚才有电船靠岸,见有人跑进这里来了,是谁?”我只好说:“是我,刚从黄埔来,我原来也是教导团的。”他又问:“是谁叫你来的?”我说:“是杨澍松教育长。”他说:“是那个‘五等走狗’吗?”我微微点一下头,问他:“为什么教导团起义呢?”他说:“他们又要缴我们的枪嘛!”我又问:“朱参谋长呢?”他说:“已经给我们杀了。”正说到此处,从西面传来一声枪响,他立即跑出去了。我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摇电话给杨澍松,向杨报告:“教导团已在广州起义,广州尚在交战中。”杨问:“有关于朱参谋长的消息

吗？”我说：“教导团的学生告诉我，朱参谋长已被他们杀了。”我刚说完此句，那位持枪的学生又跑进来，喝道：“不许打电话。”随即走上前将电话线扯断。我不做声，退后几步坐在椅上。他也退到门口站着。过了片刻，西面枪声大起，他又急跑出去了。老头主任就对我说：“你还是回黄埔吧，你不听他说朱参谋长也被杀了吗！”我很快冲过马路，登上电船，立即启航回去。我回到黄埔，遍找杨澍松不见，只见一向跟随他的勤务兵。他一见我，就说：“何副官，教育长等你不来，他已乘电船到虎门去了。”我想，杨澍松是逃走了。

我站在校长办公厅，遥见江面驶过一艘灰绿色的小兵舰。几分钟后，传达长手拿一封信来，总值星官叫我交给何副官。我看信封上写着“杨教育长亲启”几个字。我拆开那信，信内有一张条笺，用淡墨毛笔写上寥寥三十几个字：“共党在广州称兵作乱，正在调兵扫平中，黄埔、鱼珠一带治安，请兄主持负责。”下面署名“黄琪翔，十二月十一日午刻，于宝璧军舰。”这时，黄琪翔已坐上军舰，调兵遣将，组织反动军队，向起义者进行反扑了。

接着，我跑到王侃如的宿舍，也不见王，只见他那个十四五岁的小勤务兵。小勤务兵说他也不知道王秘书到哪里去了，我便要他去找。我正想下楼去找吴展，已望到吴匆匆地朝办公厅走来。吴问我在广州所见情形，我一一告诉他，并告诉他杨已逃往虎门去了。吴沉吟了一阵，说：“老何，你在广州时该和他们联系，我们还是将特务营拉到广州去。”吴邀我一同开往广州参加起义，我答应了。

快到下午五点，吴展派人来通知我出发。我到了码头，

看见吴展和王侃如都在船舷上站着等我了。吴展立即下令开船。

我们过了江，在鱼珠登岸时，天色已傍晚，我们就在鱼珠挨公路附近一个村庄宿营。营部设在一所祠堂内，吴展、王侃如和我都睡在一处。吴展布置了警戒后，告诉大家明早三时早饭，四时出发。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我们从鱼珠出发，沿着公路向西走。到达瘦狗岭附近，东方已露曙光，我们停下来，在公路边一个丘陵地带休息，整顿队伍。这时天色已明，吴展和我们正商议如何派人进城去联系，突然一个担任警戒的排长跑步上来报告，说西南方向发现有黑点移动。我们都站了起来。吴展拿望远镜朝那方向望了一下，说：“是人，正在向我们这边移动。”吴展立即下令准备战斗，并命第二连去占据右前方一个高地。第二连连长是崔庸健同志，当时他也去了。黄埔军校特务营，后来进入广州，参加了起义。

(1979年5月)

(载1979年12月出版《广州文史资料》第17辑)

暴动中的海员赤卫战士

何 潮

广州起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委员们，紧紧团结在张太雷同志的周围，向叛变革命的反动派，积极开展斗争。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停泊在珠江的邮船上去参加一个秘密而且重要的会议，我匆匆按时跑去。

在水气迷蒙的白鹅潭中，外国的舰船成群，游艇穿梭。有一条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上绣“邮”字的水纹旗，那就是我们约定的秘密会址。

船舱有一丈来宽，三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实，只有靠船头的两扇玻璃窗透着一丝光亮。我们三十几个人挤在船舱里，默默地吸着烟。江边上，穿黑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水上武装警察和戴着墨镜的便衣暗探，来回巡视着。

不一会，张太雷同志走进来了，我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脱口说声：“哎呀，你又来啦？”他轻松地笑了笑，说：“来啦，而且是平安无事。”

他穿着一身灰色工人装，象个洋行打字间的工人。会议开始，他站起身来，低声而又兴奋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消息，党决定在广州发起武装起义。”大家一听这消息，都

压低嗓子异口同声说：“好！”接着张太雷同志讲了起义的意义和对我们海员工人的要求。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紧张，整整开了两个小时才结束。同志们兴冲冲地陆陆续续离开邮船。

不久，“起义行动委员会”产生了。张太雷同志是总指挥，恽代英、杨殷等六、七位同志分任其他职务。

起义前，“行动委员会”在我家开会，布置起义。早饭后，张太雷来到我家。接着我们就挤在一间保姆住的小板房里开会。

大家围着一张广州市地图，研究行动日期、调配人选。还讨论了苏维埃政权问题。行动计划争执很大，有人主张同时攻打沙面租界和河南的李福林反动军队；有的则主张以攻市区为主。张太雷倾听大家意见之后，心平气静地说：“打沙面，打李福林当然好，但要估计我们的力量，要讲策略。目前，我们的力量不足，所以我同意以攻市区为主，其他地区暂时防御……。”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敌人发现我们掩藏武器的米店，被抓去的老板叛变了；决定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内部也有反动军官告密。此外，军阀张发奎还准备下令解散教导团。情况危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这天凌晨三时半，教导团首先誓师起义。誓师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霎时，工人、青年学生拿着木棍、短剑和自制手榴弹来配合行动。一时大街小巷响彻了冲杀声和振奋人心的、嘹亮的《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一下子，全市沸腾起来了。

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手车、洋务、海员、印刷、汽车、油糖、柴炭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凡参加暴动的人，颈上都围一条红领带，或手臂上扎着红袖标。市民都叫我们“红带友”。

钟华、施五郎、容灶我们几个人分头带领工人在西濠口、长堤一带码头封锁开往港、澳的“金山”、“龙山”、“广东”等轮船。我们一面劝阻旅客不要上船，一面通过在船上工作的党员，动员海员离船登岸，参加暴动。

当时，珠江江面有两艘海军炮艇驶过，我们立即开枪射击，炮艇夹着尾巴逃跑了。

原定计划，总部设在公安局，七点钟左右，听说公安局早已攻下，我们便到总部去联络。满街挂着红色横条标语。惠爱路、公园前、维新路一带，有很多“红带友”和教导团的同志，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路旁坐满了俘虏兵，摆满了迫击炮、大炮。公安局门前，已换上大红的木匾，上面写着极其醒目的几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嗨，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政权。

张太雷站在门前一张长桌旁，向围着他的人布置任务。这时，吴毅、周文雍、季布高和陈郁等同志也在那里，见了我们非常高兴，为我们在战斗中无任何不幸而欣慰。

这时，叶挺正在楼上办公室里，用红蓝铅笔在大地图上画着，因还有很多据点没有攻下，枪炮声仍断断续续的响。他见我跑上楼来，就说：“你来的正好，快带一些人到东较场军械库去搬运武器，把外边徒手工人装备起来，去支援打据点的同志。”我赶忙跑出来，和一些工人、士兵坐上一辆卡车，奔向东较场。

搬完枪支，将近中午了，周文雍对那些正在编队的工友大声叫道：“谁没有枪，拿去！”一队队工人都拥上来领了枪，新奇地、珍惜地用手掂量着。

突然，有人跑来报告说：“薛岳部队从总统府（即中山纪念堂）方向打来了！”

未等周文雍下达完命令，二、三百个工友拿着枪，就和教导团的同志一起向中山公园冲去。沿街警戒的“红带友”一听敌人来了，也自动加入战斗行列。工人们不懂战术，见到敌人，一拥而上，有的在人群中乱放枪，把自己的人打伤了。教导团的司号员连忙大喊：“别在后面打！别在后面打！打伤自己人了！”后边这才停止放枪。

敌人经我们这一反击，死伤很多，没有死的，跪在地上举手投降，把枪扔的到处都是。敌人被追到观音山（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附近，四散逃窜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枪支回来。

回来后，吴毅又叫我们去没收中央银行西堤分行。谁知我们去晚了，那里给搞的乱七八糟，一帮流氓在混水摸鱼，见我们都挂着红领巾，便爬窗跳楼，抱头鼠窜了。我们进去一看，什么都给搬光了，只剩下几个没办法打开的保险柜。我们只好回来将情况告诉给吴毅，他说：“以后再说吧！”

天将黑了，我又跑回西濠口。西堤六二三路一带大街小巷都堆满了沙包。这是教导团的同志构筑的临时工事。他们还留下一个排和我们一起警戒。

夜里，仍很紧张，我们一直在来回巡逻。

第二天，早饭后，停泊在码头边的几条轮船，由驻在沙面

的英国水兵开出海去了。但我们一见到炮艇(有国民党的,也有帝国主义的)经过沙面,就伏在沙包后射击。炮艇还击一阵,又象以前一样夹着尾巴跑了。

下午,我到总指挥部去联系事务,忽然一个工人同志匆匆跑来,急喘喘地说:“张太雷同志牺牲了。”他用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掏出张太雷同志的遗物:一只怀表、几枚双毫硬币和一些马克纸票。他望着这些物件,眼泪盈眶,喉头咽哽,泣不成声地说:“张太雷同志……开完群众大会从……西瓜园回来,在中华路……黄泥巷附近……被敌人暗杀了……。”

我听到这个噩耗,心象被沉重的铁锤击打着,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同志们越集越多,围在一起,一声不响,眼含热泪望着那只还在滴答走着的怀表……。

天黑下来了,同志们领受了新的任务逐渐散去。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西濠口,眼望波涛汹涌的珠江水,紧握手中武器,在西堤二马路、太平路一带巡查着。张太雷同志的音容笑貌,也象江水一样在我脑海里翻腾。

入夜,不时传来阵阵的枪声。半夜时分,教导团的同志撤离了那个地区。不久,有一个队员来报告说在嘉华银行楼上有人打枪。我们立即把嘉华银行包围起来。但铁闸太牢冲不进去,同志们说:“我们守住,你到总部去搬队伍来!”

我跑去总部,天已亮了。总部门口,人迹稀少,只有几个“红带友”在站岗,一个同志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搬队伍!”他说:“总部在昨夜三点钟撤走了!”我一听楞了,问:“为什么?”他说:“总部派人通知了你们啦!”我说:“没有遇见,现在怎么办?”他说:“情况变化,总部交代,要大家设法撤退。”

因为暴动提前了，外围各地的军队不能及时赶到，各县农民未完全按计划赶来支援，使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减弱了。这时，敌人薛岳部队潘枝的那个团，从芳村过河来了。美国战舰“沙克拉明拖”号与英国战舰“莫丽翁”号的海军陆战队，也协同刚从外围赶来的反动军队在长堤登陆，向市区猛烈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时，总部撤退是正确的。但现在留下的人怎么办呢？我只好根据总部的命令，跑回西濠口通知大家撤退。

我跑回家，将文件烧了，把刻蜡纸的钢板也藏起来了。这时，刚从香港回来参加暴动的五、六个同志，找到了我的家。我将情况告诉了他们，要他们设法隐蔽撤退。他们离开后，我也吩咐了家里的人疏散。枪声越来越近，我急忙化装为工人，从六二三路下了小艇，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在香港，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手车工人的怒吼

李沛群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正式成立了。这个联队以手车（即黄包车）工人为主，加上酒业、铜铁两个工会的工友。由沈青和庞子谦任正、副联队长。手车夫第三区（即分会，均为潮汕人）编为第六大队，石喜任大队长，我是党代表，陈华、黄文、冯苏同志分任小队长。

十一月下旬，市委秘书长董汉在手车夫工会召集的骨干会议上，宣布了将要举行武装暴动的消息，我们听了非常兴奋。回到车夫馆后，我们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低声地传开了。霎时，整个车夫馆都在议论着暴动这件大喜事。工友们都在暗中准备着起义用的武器。

十二月九日，在沈青的率领下，组织了一次庄严肃穆的祭奠宣誓仪式。

是日清晨，来自市内各手车夫分会的三十多名骨干，在红花岗祭奠“四·一五”牺牲的手车夫工会领袖彭世、王世文以及先后牺牲的十多位烈士。在宣誓中，书记黄益华拭着眼泪说：“敌人打断了彭世同志的腰骨，插烂了王世文同志的十个指头，可是，敌人从他们的嘴里掏不到所需要的一点东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硬骨头，是我们的榜样……。”

沈青说：“今天我们祭奠烈士，要永远纪念他们，……我们宣誓：我们要为他们报仇，要为劳苦工农大众打出一片江山！”在这临近武装起义的前夕，这誓言代表了全体手车伕工人的心愿，有如泰山之重！

十日晚上，我们在支部书记黄益华家里，召开了支部大会。沈青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晚深夜三点半钟动手，听东北角四标营枪声为号，大家一齐出动。”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纷纷表示战斗的决心。黄益华说：“同志们，为死难烈士报仇的时刻到了！为劳苦工农打江山的时候到了！打倒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的时刻到了！我们要一心一意，听从指挥调动，带领手车工友们参加战斗！”接着，由沈青分配任务，各队立即出发。我的任务是通知晚班工友集中在车伕馆待命。临走前黄益华还交给我一首《工农兵暴动歌》，要我在起义前的间隙教工友们唱。

回到车伕馆后，我嘱咐日班的工友在馆等候，便和石喜分头去把夜班的工友找回馆来。在路上，发现了一队队的伪警察和保安队，戒严搜查，伪公安局的铁甲车也到处加紧巡逻。

当晚十一时，我赶往太邱书院找沈青，向他报告了我们的准备情况，等候命令行动。沈青叫我把队伍分散，重新移到禹山市酒楼茶室总工会第四分会（现在禹山市市场新街五十八号）楼上集中，注意防止敌人发现。沈青还将攻打第五警署（即永汉分局）的任务交给我们。

回到车伕馆，把队伍三三两两移到指定地点后，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压低嗓子教大家唱歌。时间过得很慢，我一面唱歌，一面掏出对好了时间的中山挂表看看，有时还和一些同志跑

到天台上去瞭望。

“轰轰！达达，达达……。”三点多了，东北角方面突然响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石喜说了一声：“工友们！跟我来！冲呀！”接着在人群中爆发了一声“冲呀！铲平警察局！”“报仇呀！打黑狗呀！”人们象决堤的水，狂奔直泻。这时，由四川籍的铁肩同志带领着另一支队伍，也从学源里涌了出来。两支人流汇合，涌向五区区署。

当我们跑到永汉路南如茶楼的时候，前面的枪声已响了起来。原来沈青带了一支人马，从高弟街杀将出来，先向敌人开了火。我们冲到五区署对面，区署内的黑狗，仓促间向我们射击。我一个箭步上前，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呀！报仇呀！”语音未落，只见冯苏已冲过马路，扑向警署，紧接着是持竹杠的陈华，拿菜刀的石喜，以及一片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象狂涛压向区署。守门的警察一看来势凶猛，转身便溜走了。于是，这些平日饱受伪警察拳打脚踢、仇恨最深的手车伕和其他工友，冲进了警署。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黑狗爬出狗洞朝仰忠街逃命去了。沈青带着原来“赤色手枪队”的同志，沿着仰忠街、东横街追击逃敌；我们则搜索伪警署，缴获了敌人二十多支步枪，工人赤卫队立即武装起来了。冯苏和陈华各拿了一支步枪，陈华笑吟吟地抚着枪说：“抓车把的手抓枪把，真有意思！”冯苏说：“车把手抓印把子更有意思呢！”

这时天还未亮，我和陈华带着几个队员在区署门口的马路巡逻，迎面开来一部小汽车，从车上走下来的人高喊我的名字。待他走近，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原来是市委组织部长麦裕成。我记得他是因散发揭露张发奎搞“护党救国”阴谋的传单

而被捕坐牢的，想不到在起义中见面。他被反动派折磨得又黄又瘦，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我高兴地抓住他的臂膀说：“好啦！你到底出来了。”他笑着回答：“如果不是起义，我怎能出来。”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又开车往西堤去了。一会，沈青带队回来。他拾获了一把警官用的指挥刀，原来一个警官被追急了，连指挥刀也扔掉逃命而去。

我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沿永汉南路走去，冲进了伪税务机关“保商卫旅团”。里面的敌兵早被吓破了胆，呆若木鸡。沈青问道：“你们当官的呢？”一个胆子稍大的回答道：“昨晚就走了。”我们一枪不发就缴获了他们二挺机关枪和一批武器，真是喜出望外。我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些敌兵进行教育。

南堤传来了异常激烈的枪声，沈青立即带领队伍开往南堤。这里有部分教导团战士正在围攻中央银行，银行守敌负隅顽抗，他们居高临下，从楼上的窗户用机枪向下扫射。战士们伏在马路边，全身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前仆后继，战斗十分激烈。沈青立即发动工人赤卫队员，找来麻包，装满砂土，构筑工事。冯苏和石喜机灵地推来两部黄包车，把沙包放在车座上，推过去交给教导团的战友使用，使手车成了活动的掩体。教导团的战士用感激的目光接过了这些新奇的“战车”，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工人赤卫队顶呱呱！”我们高声答道：“教导团好嘢！”在团结互助的气氛中，留下了部分队员，配合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战斗。

队伍折回永汉南路，入惠福东路，转向维新北路，进入了公安局对面已被我们攻占的保安队操场。这里人很多，好一

片欢乐的景象。在这里，将新参加的同志编了队，补足了枪支弹药后，沈青便率队到广大路建立第二联队指挥部（即今广大邮局地址）。这时已近中午，沈青召集各队长开会，研究分配任务。我和手车二区（分会）第一大队队长曹基（海丰人）驻守大本营，并负责联系工作和接收前来参加战斗的新队员。正讨论间，吉祥路方面忽然枪声大作，由远而近，我们立即警惕起来。一个队员气喘喘地跑来报告：“敌人从观音山那边攻过来了！”

沈青猛然从地下跳起身，嗖的一声抽出指挥刀，跑到前面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冲上去！杀呀！”便率领队伍向吉祥路跑去。

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挺立在满城烽火之中。沈青率领冯苏、陈华、石喜和联队队员，在观音山已经奋战一天一夜了。下午九时许，沈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面用铅笔写着：“速派队增援，多带弹药。”我和曹基即组织休息待命的百多个同志，指派了带队，交代了战斗任务，到观音山增援。

我拿了沈青的字条，跑向总部，看着总部调派了一支队伍前去增援，我才安心回联队去。

午夜十一点，枪声稍停，沈青又送来了第二张字条，上面写着：“打退敌人三次进攻，阵地安然无恙，目前战事平静，我们和教导团的弟兄们一起，正在抢修被破坏了的工事。”我问通讯员说：“沈青队长怎么样？”他告诉我说：“他的眼都打红了。”我又问：“顶得住吗！”他答道：“总之，观音山是我们的！”

十三日零时后，局势急剧转变，教导团战士已奉命撤退到

黄花岗集结。一点左右，炮声骤起，夹杂着枪声、水龙机枪声，子弹从天空中嘶嘶掠过。

沈青的第三张字条又送来了，字条上沾满了砂土，象是伏在工事旁边匆匆写的：

“速派人来！”

我把仅有的队员全部调了上去。

三点多钟，第四张字条送来了，交通员全身汗水淋淋，衣角被子弹射穿了几个洞，递来的字条上也沾了好几处血迹。在斑斑血迹的字条上，跳动着沈青潦草的字迹：

“敌猛烈攻击，我队伤亡不少，正坚决阻击中。速派人来！”

我急忙跑去总部，但是，那里的人已经很少了。几间楼房里，有人在忙着收拾东西。我在办公室找到了原来在“全总”工作的戴卓民，把观音山联队作战的情况简略地谈了，要求派人前去增援。他表示人员已派光了，大家都在前线作战，坚持下去好了。

我又匆匆赶回队部，交通员已走了，曹基叫我留守，他提起步枪也就走了。队部剩下我一个人，守候到天亮。我再往总部走去，在大马站巷口见到原洋务工会劳动童子团负责人谭达。他问我那里去，我说去总部。他说：“总部的人已走光了。已经向各线发出了通知，叫大家撤退、隐蔽，你不知道吗？”我在路边愣住了，难道暴动就这样失败了？！谭达推推我说：“快走吧！枪声越响越近了。”我怀着满腔悲愤，带着谭达到车伕头胡国清的家，躲过了敌兵的搜查。第二天又转到黄益华家，他给我俩衣物和几个银元，叫我们去香港找组织。我俩就在当天下午

搭上往香港的轮船“播宝”号。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几次搜查中，眼看着不少同志被抓回广州杀害，而我却闯过了最后一道关卡，到香港去找省委。

在省委的一个秘密机关里，我意外地遇见了沈青和庞子谦，死里逃生，大家紧握双手，相对半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找了个角落坐下后，我迫切地询问战友的情况。他忍着泪向我谈起了观音山战斗的情况：

从十一日中午登上观音山后，与教导团战士并肩作战，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反扑。十二号晚上，教导团奉命撤退了，便由工人赤卫队坚守阵地。一直坚持到十三日凌晨，接到总部的撤退命令才撤出战斗。这时，剩下的只有几个人了。手车伙工人赤卫队忠诚勇敢的鲜血，染红了观音山的土地！

那是浴血苦战啊！十多廿倍于我的敌军，象蝗虫似的漫山遍野涌向我方阵地，打退一批，又来一批。手车工人们打到枪筒发热，发烫，直到烧红，最后弹尽援绝，仍抱起大石头、烂砖头砸过去，临近了，就拿起枪托、刺刀和敌人拼命！刺刀弯了，枪托烂了，就用拳头揍；受伤的同志倒下去还用牙齿咬……。

大队长石喜带领同志们坚守右翼阵地。十二日傍晚，大股敌人窜到阵地侧面，石喜和敌人白刃拼杀，右肩右腿先后负伤。一股敌兵朝他扑来，他用枪托一连砸倒两个，正要向第三个砸去，因为用力过猛，枪杆竟脱手飞去。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赤手空拳身负重伤的石喜，看准了一个敌人，扑将上去，紧紧卡住对方的咽喉，两人一齐滚下山坡……。他，壮烈地牺牲了。

我们的勇将——中队长冯苏同志，在一次反击中，带头跃出阵地，一气刺中三个敌人；不幸自己也连中数弹，鲜血把他染成一个血人，仍然挺立不倒，他用尽最后的力量，把刺刀插向一个手提驳壳枪冲上前来的敌人。这时冯苏烈士才慢慢地依着一块石壁，安详地闭上眼睛……。

听了沈青同志的叙述，我的热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下脸颊。我紧握着沈青的手，决心永远不忘手车伙同伴的仇和恨，在先烈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为完成先烈未竟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谢燕章根据口述整理)

起义中的洋务工人赤卫队

梁国志

自一九二四年反对沙面帝国主义实施《新警律》的斗争胜利后，共产党成了洋务工人的坚强后盾，代表四千多洋务工人的“洋务工会”由原来的“青年工社”、“职工总会”、“惠群公社”和“协进西餐工会”、“文员公会”联合组成，队伍逐步扩大。我们在洋人面前也挺起腰杆走路了。可是，自“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洋人也变本加厉地压迫我们，不少洋务工人被解雇、被告密、被搜捕，甚至被杀害。革命胜利的成果被夺了去，我们又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青年工社”是由周文雍、施卜等同志组织的。第一任社长是张果，第二任社长是由我负责。“青年工社”有百多个青年，大部份在斗争中起骨干作用，特别是在省港罢工和统一工会运动中起决定作用。“四·一二”后，在周文雍领导下，原来洋务工会的自卫队，继续坚持斗争，在广州起义前改编为工人赤卫队，我被任命为大队队长。

十一月一日，周文雍领导铁路和火柴业等失业工人包围东山葵园，向汪精卫开展斗争被捕。省、市委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把营救任务交由市委行动委员会执行。这个行动

由吴毅亲自部署，参加的市委委员有沈青、陈郁、黄励刚、李源和我，还有黎胜、庞子谦；开车的司机是徐寿光（惠东），我们怕影响他的情绪，只通过汽车工会党支部书记袁松通知他执行货运任务。我负责警戒工作，行动时，我带着利器在“千顷书院”附近警戒，注视着伪公安局敌情的变化。营救行动是采取“智劫”方法。“智劫”是很秘密的，对公安局和市立医院的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每一细节都详细研究，部署极其周详。劫运着周文雍的车子到了沙河打石工人的草棚店，徐寿光看清楚是周文雍时，冒了一额冷汗。

起义的日期日渐迫近，省、市领导在邮务工会属下的一艘邮政运输船上召开了重要会议，传达省委的决定。会后，我便和洋务工会的骨干如范恂、廖伟民、李少白、源顺南等在牛乳桥“青年工社”社址开会，布置攻打任务。沙基、陈塘、清平路一带是聚居洋务工人的地方，平时受尽了陈塘九区署警察的敲榨勒索，因此我们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攻打九区署上，并派日清洋行的杂工、洋务工会的骨干廖伟民负责领队进攻；把攻打杨仁南警署的任务交给了范恂；我的任务是攻打公安局。

十号晚上，我来到廖伟民的家。廖伟民的屋内已经集合了不少赤卫队员，他们正在商量攻打计划，我从他们的刚毅面孔上，看到了胜利的把握。通过他们，还知道了另一支由范恂带领的队伍，也作了充分的准备。

离开廖伟民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沙面的铁闸早已关闭。离起义还有三、四个钟头，我取道回到西濠码头，找到了赤卫队临时租来过夜的小艇，等待起义的信号。租艇是军委

会季步高的主张，为的是加强同攻打长堤六区署一带的海员工人赤卫队大队长陈楫的联系，把西关和长堤连成一片，互相策应。当晚，住在艇上的李少白、黄刚、郭成达、郭成德已睡入梦乡。我由于兴奋过度，翻来复去老是睡不着，突然，远远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急忙把他们叫醒，拔出碌架枪，命令艇家把我们送上岸去。

上岸后，我带着同志们由南向北跑去，沿途太平桥、十三行、状元坊、一德路、大新路等横街不断地冲出工人赤卫队的队伍。人们拿着刀、棍、剑、铁锤等武器涌来，汇成一股强大的人流，朝着西瓜园“警察同学会”一个方向奔去。在丰宁路口附近，我和迎面而来的曾国钧打了个招呼，他带着大队建筑工人赤卫队去进攻另一据点。我又回洋务工会察看一下留守的情况就向公安局奔去。这时，在途中见到了廖伟民，他气喘喘地说：“攻下了九区署了！”我问他怎样攻下的，他说：“容易过吃饭。”他还兴奋地告诉我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要我找汽车装运。我说现在是进攻的紧要关头，到那里去找汽车，我嘱咐他用大板车搬运。我又问起杨仁南分署的情况，他说那边的敌人负隅顽抗，已由何萱带队支援了。突然，由斜刺里窜出了源顺南的弟弟源顺贵，他是跟着哥哥在沙面洋行当厨工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步枪，自动参加战斗来了。他一见我，就吵嚷着要跟我去，我只好叫廖伟民带他去攻打杨仁南警署。他高兴得拉着廖伟民就跑，我也急忙奔向公安总局。

到了公安局，枪声已经停止了。教导团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攻占了公安局，那里出现了一派欢腾的景象。刚出狱的

政治犯，激动地和起义军拥抱，大家都流着热泪，“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声，《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歌声，响彻云霄。

我在挤拥的人群中找到了“四·一五”后被捕的洋务工会的黄苏等同志，他们被折磨得瘦骨如柴，脚上还拖着脚镣。他们见到我，紧紧地搂着我的双肩，我和同志们帮他们砸开了镣铐。接着，他们就拿起枪杆参加了战斗。

这时，一队赤卫队队员押着反动分子、改组委员进来，人们对这些坏蛋都怒目而视。有些同志嘲笑道：“好哇！你班害人虫，也该吃吃监饭了。”突然，门外起了一阵“枪毙他”的愤怒声，接着几个反动分子被一排枪声镇压了，吓得一些被押的跪下求饶。

一整天，都忙忙碌碌。一会儿，这个同志找我，一会儿枪枝弹药要发放，一会儿要处理赤卫队的事，晃眼就一天过去了。

十二日早上，我在二楼枪械库里拣子弹，陈郁也在那里一齐干。他穿一套柳条唐装，全身沾满尘灰，干得兴致勃勃，红光满面。这些子弹是准备运到各赤卫队据点和攻打第四军军部之用的。正拣着，周文雍来找我，只见他两眼满布血丝，显然是整夜没睡过。他叫我立即带人去西瓜园布置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大会会场。我把工作放下，接过他交给我的红布横额，奔向西瓜园。

西瓜园广场很宽阔，空荡无物，我计划了一下，便回洋务工会，叫来了洋务工会常委源顺洪的弟弟源顺南等几个人，又跑到附近的广东省总工会（黄色工会）去搬来餐桌台椅竹杆等

搭棚材料，拼凑成一个讲台，竖起了横额。这时，已有市民、工人、学生来了，他们秩序井然，在台前坐下来。接着，从外面开来了一部黑篷的小轿车，张太雷同志全副武装，身穿黄色军服，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周文雍等领导人也先后登上了讲台，庆祝大会便宣布开始了。张太雷同志讲话后，还有省委委员、印刷工人出身的王强亚和教导团革命士兵委员会代表等讲话。

会议的时间很短，会后我和几个洋务工人收拾好会场才返公安局。走到惠福路附近，一位赤卫队员跑来告诉我说，张太雷同志在开完庆祝会后，车行至惠爱路和大北直街附近的黄泥烂马路，被敌人伏击，中弹牺牲。我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整个人都发呆了。一个多小时前张太雷同志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脑海里萦回，我不相信他的牺牲。我急从四牌楼奔向出事地点，由南向北望去，大北直街那边烽烟滚滚，枪声密集，战斗正酣。我急由小巷折回公安局，想问个究竟，但局内的人还未接到报告，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做我的工作。

十二号晚，形势急剧转变。周文雍匆匆来找我，叫我和瓜菜工会主席文沛带队去巡逻，说有土匪趁机入城抢劫。我和文沛接受任务后，就到柴炭工会带队巡逻。

我们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赤卫队员，从惠爱路横过丰宁路，转入龙津路，果然发现两个戴着红领巾冒充赤卫队的土匪，正在围着一个妇女抢劫。我们及时营救了，可惜被那两个土匪钻空逃跑了。为了使她不再遭土匪的抢劫，我们把她送到母家。我们一直巡逻到下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到四牌楼柴炭工会休息。由于疲劳，我很快就靠着门睡入梦乡了。突然，总

部的通讯员跑来把我推醒，告诉我说，周文雍叫我立即回西关，带领全体有枪的队员，到黄沙、粤汉路沿线布防。他交给我一张烟纸，上面写着十三号的口令“肃清”两个字。我叫醒了文沛，把事情交代了一下，就朝西关走去。

九区警署被我们攻下后，便做了西关区赤卫队队部。这里的队员多数是洋务工人。我踏进队部，只见同志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我轻轻地跑到廖伟民和源顺贵跟前，把他们叫醒，讲明了布防的任务。廖伟民就一跃而起，取出铜哨子，叫大家集合，把队伍很快就整顿好。我派了两名队员去长堤和陈楫的海员赤卫大队联络，以便有情况及时呼应。

我和廖伟民带着队伍，摸黑来到梯云路尾，进行布防。对军事我是外行的，我只好隔三几丈留下几个队员，六十多个队员由梯云西路一直拉到如意坊附近。我嘱咐大家注意周围的动静和形势的变化，就和廖伟民两人负责来回巡逻照应。

乘着这个空儿，我问起解决九区和杨仁南警署的情况。廖伟民告诉我说：“十一号三点多钟，我们只有三支枪的队伍，摸到九区署门口，很快把门卫解决了。睡在宿舍里的警察还未下床，就当了俘虏。当楼上的值日警官听到响声推窗朝下面喝问“吵什么”的时候，已被赤卫队员扯住他的衣领，他回头见是赤卫队，吓得双腿扑通下跪。就这样一枪不发，攻占了九区署。至于杨仁南区署，援军去了之后，警察不敢顽抗，没多会也全被缴械投降了。”谈到攻打“警察同学会”，是洋务工人会同其他赤卫队员五、六百人围攻的，敌人倚仗有枪械不肯投降，后来总部调了几个教导团战士去，指挥得当，打得敌人晕

头转向，便缴械投降了。

转眼天已大亮，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我们还未撤岗，薛岳部的士兵已从北面跳下火车，向车站迫近。海员大队长陈楫派人来联系，说敌人从粤北、西江调来的援军，已陆续靠近，河南区那边的福军，配合后续部队登岸，帝国主义的炮舰还为敌人运兵，开始全面反扑。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积在心头之恨一齐迸发出来，大家决心和敌人干到底。

我们决定由源顺南带领三十多人的长枪队去支援海员大队守护长堤，我们短枪队立刻返总部接受新任务。

这时，敌人已有少部份窜入市区，和守卫苏维埃政府的战士展开了浴血搏斗。

短枪队走到十八甫，与福军相遇，便接上火。我们立即分散靠着楼底柱脚，和敌人展开激战。我们且战且走，终因众寡悬殊，被敌人冲散。

长枪队在源顺南带领下刚走出太平桥，就和渡河的福军、反动的机器工会体育队遭遇，展开了激战。敌人装备精良且数倍于我，在搏斗中，鲜血染红了太平桥，三十多位壮士全部牺牲！

我们被冲散后，有十多个同志向公安局方向跑去，在一德路附近又和敌人展开遭遇战。我们都是短枪队，射程不远，且子弹短缺，有几个同志在冲过路口时又牺牲了，我的身边只留下廖伟民一人。这时，四面都有抓“红带友”的喊声，我和廖伟民眼看回不了总部，又知大势已去，便把红领带收藏起来；短枪也因没有子弹，发挥不了作用，找个地方埋下，就分头隐蔽。

我辗转走到回族工友马枝家，他们因故一家人都没有参加起义。他的父亲对我很好，把我身上的起义痕迹也处理了。记得我的属下有四、五个回族工人，其中有一位阿訇，大家都叫他“四大爹”，他作战很勇敢，后来也逃到香港去了。

失败后有一段时间，我和廖伟民还回到沙面工作，所有的洋务工友都对我俩很好，还常掩护我们出入过关。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勾结，多次搜捕我和廖伟民，但我们还是活动在敌人的心脏，经常在法国领事馆内、洋行的地牢、亚细亚公司的写字楼开会。后来市委被破获，直接和我发生关系的市委委员黄励刚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周文雍等也被捕殉难，市委停止了活动，我只好回到香港去。不久，廖伟民同志也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了。我在香港负责“济难会”工作，收容起义失败后到香港的工人群众。

(谢燕章根据口述整理)

战火中的巡礼(节录)

施 展

—

十二月十日的清晨，我和苏南奉命来到黄沙阶砖巷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已黑压压挤满几十人。杨殷正在主持会议，传达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绝密指令：“……总部今天早晨下令，行动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教导团有人告密，很危险，张发奎这几天天天开会，要缴他们的枪。伤脑筋啊！”有人急问道：“我们来得及吗？”杨殷神态安详地继续说：“来得及。怎么来不及呢？刀柄还没有给他们抢去哇！麻烦当然麻烦，甚至要准备闯险！准备失败！可是我们要是怕这些还要革命吗！……”

下午，交通员虾仔把我和苏南带到禺山市一间杂货店的二楼。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绝密的军事会议就在这里举行。叶挺^①正在对着军事地图沉思，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众多的红蓝箭头和大小圆圈。指挥部的其他负责同志已经到齐。工人赤卫队队长沈青、邓苏、李连、郊区农军总指挥陈道舟和教导团士兵代表也到齐了。杨殷详尽地报告了参谋团掌握的情报以后，由叶挺宣布总部的力量部署和战斗序列。

听毕，有人问道：“河南怎么办？”

^① 叶挺同志在起义前几个小时才到广州，有否参加这次会议待考。

叶挺说：“打下河北再过去不迟。”杨殷接着笑笑说：“是呀！我们手里拿着‘天九至尊’（注：是“天九”的王牌），难道杀不倒他的‘三武鹅五’（“三武鹅五”是最小的底牌，指李福林的第五军）？”这句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我问道：“时间提前了，农军来得及赶到吗？”

“你放心，今晚我们农军便可以集中。”陈道舟回答道。

我说：“那各县的怎么办？”

杨殷说：“我已经派人前往各县通知他们提前行动了。”

军事部署就绪后，杨殷提议说：“除了硬打，我们向敌人来个政治攻势如何？把所有的共青团、劳动童子团、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仗一打响，即在全市各地高唱《国际歌》和革命歌曲，叫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大家也齐声说好，并且作为决议，交由各战线同志回去执行。

十日傍晚，杨殷命令我和苏南巡视检查各赤卫队的起义准备工作。

八点钟后，我和苏南在路上碰到回工会集中的建筑工人梁九。他对我们说：“街上又戒严，有巡逻队巡逻，有些地方不准行人通过，你们得小心点！”走到丰宁路，我和苏南便分手了。我悄悄地转入白糖桥，走进糖面工会。

工会里灯光暗淡。队长刘昌，他正在向队员们布置今晚的战斗任务——攻打西瓜园的保安队。刘昌见到我，便拉我跟他们研究进攻战术。其实，他们的布置已经相当完善了。

十一点钟，我离开了糖面工会，穿小巷来到了学宫街渭滨书院。这又是一个赤卫队集中的地方。书院大门紧闭，我拍了几下门环，大门慢慢地开了一道缝。开门人验看了我的证

明纸片，便一把将我拉了进去。

我走过偏间找联队长，只见一个队员，手里拿着一条又黑又粗的东西，摆开武功架势，把手中的家伙横扫了半个圈，所到之处，呼呼声响，确有两手功夫。其他的队员也为自己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我感到很满意。

从渭滨书院出来，我向龙藏街太邱书院走去。这是第一联队集合的地方。在离太邱书院还有一两百步远，突然一声喝道：“站住！”两个巨大的身影正从黑暗中窜出来，一前一后把我夹住。

“做什么的？”一个声音道。

“来找朋友，一个姓龚的。”我说。

“哦，原来是龙兄！”

“龚兄”就是工人，“龙”就是农友，这暗语比什么还亲。我跟着这两个大汉来到了太邱书院，里面已齐集了五六百人。

我在二厅内天井中找到了队长。他正在和两个队员对着油灯，聚精会神地看怀表。他见到我便说：“全部准备妥当，只等时间了。”

这个联队是负责攻打公安局的，队员的武器五花八门：木棍、剑仔、板刀、尖尾锉、螺丝批，还有铁条。

走出太邱书院，顺道过大南路建筑工会，再向线香街搭棚工会走去。搭棚工会这个联队由邓苏带领。我进了工会一看，队员们已经拿好各种各样的武器，缠好红布带，齐集在工会准备出发。中队长周福擎了一面红旗，站在队伍最前头。我不见邓苏，便问周福：“邓苏呢？”“他带队解决大南警署，已经走了。”周福又说：“我们这一队是攻打警官讲习所的。”我又问：

“时间快到了，你们还缺些什么？”周福说：“要是能有长短枪就好了。全队六枝短枪、八枝长枪，都给队员‘抢去’啦，弄得我这个队长反而两手空空。”听了他的话，我把我的炸嘴短枪抽了出来，递给周福：“祝你打一个漂亮仗！”周福接过枪，动动嘴唇，还未说话，外面突然传来几阵枪声。这正是起义行动的讯号！我对周福说：“好吧！动手吧，老兄！”守在门旁的队员把门拉开，周福挥动红旗，高喊“同志们，动手啦！”便领着队员们冲出门去。我跟着他们直奔警官宿舍。

二

周福左手高举红旗，右手拿着短枪，跑在队伍的最前头。队伍象一条愤怒的火龙，喊着“暴动呀！”“杀呀！”从大南路冲出永汉路，转入惠福东路到大佛寺，进攻警官讲习所。警官讲习所的卫兵仓猝举枪抗拒。跑在前头的周福举起手枪，打死了正门口的一个敌人。有枪的队员紧紧跟着他，齐集在最前头，边打边冲；拿木棍、竹刀的就在后面高喊助威。敌人的枪声也很密集，周福跑不了几步，右腿便连中几枪，鲜血直流，倒在地上了。旁边一个队员正想扶他，周福却霍地挺起身来，吃力地摇动着红旗，高喊：“打啊！同志们报仇呀！”全体队员在周福的鼓励下，涌进了警官讲习所。门前的卫兵统统被打死。这时候，我夺得一支步枪，赶到了队伍的前面，眼前忽然站出来一个手持短枪企图顽抗的敌人，我来不及瞄准，周福已经向前一跃，飞步冲上去，“挑！”一声，用旗杆的铁尖，插进了这个家伙的心窝。周福自己也因为伤势过重，慢慢坐了下来，然后又躺了下去。我吩咐两个队员看护周福，便接替他率队向内冲杀。宿舍

里三百多名警官，刚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鞋纳履，便当了俘虏。这时，队员们纷纷丢开了手中的竹刀、木棍，换上了步枪。但周福同志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了。

队伍同打下大南路警署的邓苏部会合以后，便转向文德路攻打敌军部去了。

我从周福手上取回那支炸嘴枪，独自向南堤走去。第二联队中，有一个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敢死队，他们在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队长率领下，正围攻潮州会馆敌军一个师部办事处。

敢死队共有八十多人，只有两支手枪和三个炸弹，而敌人却有三百多人，并配备了机枪等武器。敢死队员们悄悄地把会馆包围起来。先把一个炸弹从窗口掷了进去，可惜弹药失灵，没有爆炸，反而惊动了敌人。敌人慌忙用机枪、步枪拼命往外瞎打，紧紧地封锁了大门口。从正门攻进去不容易，这个年青队长便急中生智，留下一半人马和两支枪，在正门呐喊佯攻。敌人集中了全部火力，对黑麻麻的门外，猛烈射击，弹注如雨，一片硝烟。就在这个时候，队长领了三十多个队员，悄悄地带了两个炸弹，绕到会馆屋背，爬过矮墙，一齐掷过去。轰！轰！两个炸弹爆炸了，刹那间，又是烟又是火，把敌人炸死了许多，没有被炸死的，也被吓破了胆，纷纷抱头鼠窜，争先逃命。两路队伍趁着炸弹的声威，乘敌人乱不成军之际，一齐跃出，合力夹攻。那些被炸得晕头晕脑的敌人，除被打死的之外，全部做了俘虏。我们缴获了近一千支各种长短枪。

战斗结束后，安顿好俘虏，佩带好武器，这支由年轻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又和兄弟部队会合在一起，攻打敌人的海军训

练所去了。

三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战斗，除第四军军部等几个据点外，广州整个河北地区，都在起义部队控制之中。

天亮时，我赶到维新路起义总部——公安局。穿过人丛向里面走去。那座监狱的铁门已经被打开了。被囚禁的同志欢天喜地，“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声响彻大院。

人丛里忽然有一个很熟悉的喊声：“大哥，施大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新会县的两个农军队长。他们是敌军第十三师人马去围村时，撤退不及被抓走的。我们都以为他俩牺牲了，想不到竟会在此相逢。

我们正说话间，杨殷同志走过来了。他今天改变了前些时的装扮，穿了一套漂亮的绒西装，结了一条鲜红的领带，益发显得神采奕奕。我见到杨殷，忽然想起在参谋团会议中他讲的“三个钟头便可以拿下广州”这句话来，乘兴对他说：“你真是个诸葛亮，果然不出三个钟头就拿下广州了。”

“不！这是大家打得好，打得漂亮！”说完，他就登上正面那幢洋房二楼去了。

这时候，我带着两个农军队长去领枪，钻进人丛一看，我们的老交通李二姑（李少棠）正在发枪，忙得不可开交。

李二姑按照总部的指示，正在发给一个前来领枪参加战斗的赤卫队两元钱，怎知那队员只是提起枪和子弹袋，把两元钱放回桌上，李二姑忙拉住他：“喂！同志，钱怎么不拿？”

“我是来领枪参加打仗的，不是来领钱的！”李二姑向对方

解释道：“这是苏维埃政府给大家的茶水零用钱，还是拿去
吧！”

“苏维埃政府刚成立，筹一块钱多困难，留它用到别的地方吧。”对方非常固执地答。

“对呀，我们不要钱！”一群赤卫队员齐声说。他们纷纷把钱放下，拿起枪匆匆走了，剩下李二姑呆呆地站在那里。

四

七点钟，我拉着苏南，按照杨殷同志的吩咐，巡看各地尚未拿下的据点。

我们走出总部后，绕过文德路去第四军军部。那里打得最激烈，我们到达时，战斗正呈胶着状态。敌人盘踞在邻近的楼宇上，居高临下，以机枪密集扫射。第四军军部的敌人用军米砌成工事，拼死顽抗。一部分教导团士兵和赤卫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是街道狭窄，部队散不开，又没有掩护体，在敌人机枪的密集扫射下，无法进展，只好退下来。我们伤亡了不少同志，但教导团和赤卫队毫不放松，紧紧地把敌人包围起来。

太平沙方面的争夺战也很激烈。南堤中央银行的守敌，依靠坚固的楼房和海面敌舰的支援，仍在负隅顽抗。这个地方后面是民房，左右两边是店铺建筑，只有南边是马路，部队极难通过。教导团一部分士兵曾发起多次攻击，均没有进展，双方正在对峙中。

驻守西关陈家祠的敌人已被赤卫队重重包围起来。赤卫队用火力攻一阵，又发动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投降唔打！”“苏维埃系我哋工农兵政府！”“我哋当兵的都是劳苦大众，不

要替军阀同自己人打仗!”敌人已无心再战,我们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便会拿下来。这时,除了上面几个据点外,广州河北地区已全部在苏维埃政府控制之中。我与苏南立即赶回总部汇报。

回到总部,杨殷不在,只见叶挺在作战指挥部,手拿铅笔,全神贯注地看着广州地图。他不时唠唠嘴,在地图上划条线。我和苏南把看到的情况,向叶挺作了详细的汇报。叶挺仔细地听着,一边点头,一边在地图上划着圈着。他从不插话,听完后,放下铅笔,对我们说:“未来的战况如何,尚难断定,你们再沿着珠江岸边查看一下长堤一带的布防。”

五

我们重新出门。这时总部门口依然人山人海,欢腾不已。从各区缴回的枪枝弹药,堆满马路两旁。我们沿维新路直下长堤,不觉到了电力厂。

电力厂北边是店铺和住户,南边是珠江,反动的广东机器工会就在对岸。电灯局的工人赤卫队用铁桶、木桶、木箱装满泥沙,在堤岸门口筑了一道长长的工事,又厚又高,相当牢固。赤卫队员们精神抖擞,荷枪实弹,盯着河南和珠江河面,监视机器工会的活动,保卫着电厂。

离开电灯局,我和苏南决定分头走,他往东走,我往西行。

往西走不远,便到达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这个地段,沿堤边都筑有临时工事。海员赤卫队警惕百倍地在来回巡逻着。

在先施公司天台上,构筑了一门“十二生半”的大炮台,炮

口居高临下，监视着珠江河面和河南李福林的部队。这是三大公司的工人赤卫队负责的地段。

站在先施公司天台上远眺，长堤大马路、珠江河面、河上小岛(海珠公园)的景色一览无遗。长堤大马路来往的行人车辆不多，即使有人走动也是匆匆而过。海珠公园一片冷寂，河面没有船只来往，南北两岸交通断绝了。北岸许多轮船货驳，都挂起红旗。

西濠口的战斗气氛非常紧张，在街中心，用沙包叠了一个大堡垒。两支机关枪架在上面，乌黑的枪口，指着江面，还有许多步枪枕在沙包旁边。颈系红布带的赤卫队员们寸步不离的守在堡垒中，严阵以待。许多队员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江边巡逻。

我问堡垒的同志出过什么事没有？一个四十来岁的赤卫队员说：“今早天微微亮，有两只电船从河南鬼鬼祟祟的想窜过来，被我们打了回去，船上好几个家伙喂鱼去了。……”

大新公司天台，架起了迫击炮。教导团士兵正在教这个公司的赤卫队瞄准、开炮。朝西走不远便到达沙基口。这里只有几座工事，有些用木箱麻包等杂物连着骑楼柱做成掩体；有的用席包装满泥沙砌成工事，座落街心。这个地区是邮电工人守卫的。

沙基口与沙面仅一水之隔。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沙面的动静，也可以看见白鹅潭中帝国主义的军舰。此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都一律卸下炮衣，各种口径的炮口，直指广州城。各舰烟囱，浓烟滚滚，把一片大好天色，弄得昏昏沉沉。望着沙面，望着这些在我国领土领海上器横跋扈、横冲直撞的帝国主

义军舰，新仇旧恨一齐拥上心头。

“丢那妈！又装腔作势，扮鬼吓人。”一个邮电工人，手持步枪，指手顿足，对着帝国主义军舰大骂。我抑住心中的愤怒，对他说：“洋鬼子装腔作势，我们要警惕啊！但千万不要先开枪，防止他们借口寻衅。斗争要讲策略。”我忍着气，耐心地劝说他们。为了了解帝国主义的动静，我一直待到中午，才回总部去，把情况向叶挺汇报。下午，叶挺根据各路情况，加派了兵力攻打尚未拿下的据点，并发出加强晚间防卫和巡逻的命令，全力巩固苏维埃政权。

六

广州苏维埃在暴风雨中诞生，又在与疯狂反扑的敌人的战斗中度过了三个早晨。十三日早上，中外敌人，已纠合在一起，呲开獠牙，向苏维埃政权疯狂反扑了。

驻石龙的敌军从广九路赶来，向我东线袭击。沿粤汉路下来的敌军向我北面防线反扑。河南的李福林部和从外地赶来的薛岳部两个团，分别从水路在海珠公园、电灯局、西濠口、黄沙等地登陆。缪培南师自西村进犯。陆满、潘枝两团，攻进大北、小北。反动的机器工会“体育队”，也从河南分三路袭击河北。

英国的“莫丽翁”号和美国的“沙克拉明”号军舰，开炮轰击，用机枪扫射我长堤一带的哨岗和赤卫队，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和各种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起来，妄图一举扑灭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起义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在强敌面前，表现了高度的大无畏精神。

他们喊着“誓死保卫苏维埃”、“与苏维埃共存亡”的口号，同各个战线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殊死作战。敌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是敌人有增无已，而我们农军赶不及前来支援，致使各战线的工人赤卫队孤军奋战。虽然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仍然坚持战斗，直至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才忍痛撤退。

西濠口太平南一线是城内战斗最剧烈的地方，二百多赤卫队与强行登陆的福军浴血奋战，很多赤卫队员壮烈牺牲了，大家仍然坚守阵地。后来潜伏下来的机器工会体育队和工贼流氓，冒充赤卫队，占据了太平南路嘉南堂八楼，用机枪居高临下向赤卫队扫射，我们上下受敌，才被迫沿行人道且战且走，退到西瓜园和惠福路一带。

这时，已经是十三日下午了。我经惠福路返回总部，在米市街口，意外地碰到苏南，他一把拉住我说：“你不要去了，维新路总部已被敌人占领了，我险些被敌人抓住。指挥部已指令我们分散隐蔽。”

“各路赤卫队呢？”

“另有人去通知他们了。”

苏南拉住我：“敌人到处搜索，我们快藏起来。”于是我们一起折回光塔街。走了不远，碰到了敌人，打了几枪，且战且走，我和苏南又失散了。

经历了一段险阻，我由香港出狱到了澳门党的省委机关。我问机关的同志：“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平安脱险了吗？”他们告诉我说：“省委的领导张太雷同志和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梁桂华同志牺牲了。”张太雷同志的牺牲我已在十二日晚知道，我怀着悲痛的心情问：“梁桂华同志是怎样牺牲的？”他们告诉

我，梁桂华同志负责长堤一带的警戒工作，在十三日早的浴血奋战中，他身先士卒，受了重伤，送韬美医院救治；下午，广州起义军撤退后，敌人在医院把他拉出门口，壮烈牺牲了。我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领导而心情更沉痛了。

碧血黄沙

李甫^①

十三号的早晨，枪声疏落，铁路工人赤卫队大队长李连带领的一支人马，已经在车站如意坊口布防警戒了整整一个通宵。队员都疲劳极了，没有人来换班，警戒又不能放松。为了给大家休息一下，李连叫大家回工棚去睡一会，由他自己负责警戒。我回到维新路总部找杨殷，汇报黄沙车站的情况。岂料在我走后不久，车站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正在聚精会神担任着警戒的李连，看见了一队系着红带的人，有的荷着枪，有的拿着木棍，从如意坊直街向车站走来。李连最初以为是兄弟部队，但当他们走到约几十步远的地方，李连发现这一队人很陌生，于是忙问他们“是那一队的？”他们答是“自己人”，便一步步走过来。李连见他们没有回答是什么队别的，心中顿生疑惑，连忙喝他们“站住”。这时，敌人离李连只有二三十步远了，他们立即向李连包围过来。李连见来势不妙，抡起驳壳，砰！砰！打倒了前头的两个，再扣两下，又擦到两个。正准备继续射击，一条木棍向他劈头打来，李连眼快，一闪身，木棍打了个空。李连弃了驳壳，窜前一步抢过木

^① 李甫是原铁路工会委员，曾任黄沙站中共铁路支部委员。

棍，大吼一声：“打死你班契弟！”声起棍落，一个敌人头壳当堂开了白花；再一棍，又把一个拿手枪的敌人打倒了。就在这时候，李连头上被敌人击中，手中的木棍落在地上……。

这股敌人是从西村窜过来的，走在前头冒充赤卫队的就是机器工会的“体育队”。曾伟赞、王春、林绍祝和正在休息的队员，以及在库房的罗七、施昌和几个机工，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奔来。曾伟赞和王春立即指挥队伍，利用路轨、车厢、房屋、月台等作掩体，反击敌人。

敌人原以为可以长驱直入，占领车站，怎知遭到赤卫队一阵劈头猛打，走在前面的敌人纷纷倒地，其余被迫退避到附近的房屋周围。赤卫队趁着这个有利时机，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但因寡不敌众，始终没有能够把敌人赶出车站。不久，敌人增多了一队援兵。赤卫队员虽然孤军作战，但没有一个人气馁和动摇。富有打仗经验的王春，从卡车上跳下来，正和曾伟赞、林绍祝商议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突然敌人从河面军舰上向车站发炮轰击，炮弹象骤雨般倒下来，月台的屋顶被打翻了，罗七与施昌守的机车被打坏了，有几个地方着了火，许多赤卫队员牺牲了。王春冒着敌人的炮弹，跳上一个烟尘滚滚的卡车，高喊：“兄弟们打呀！同苏维埃共生死！同车站共存亡！”大家也跟着他高喊：“誓死保卫车站！”“保卫车站！苏维埃万岁！”敌人向赤卫队疯狂扑来。王春和队员们掩藏在烟尘滚滚的卡车背后，等敌人来到只有几十公尺时，王春一声喊“打！”队员们一齐猛射，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可是敌人在大炮掩护下不断反扑，王春和林绍祝相继中弹牺牲。队员也越打越少，最后剩下不足三十人，退到车站东南角，与敌人作背

水之战。敌人一步步进迫，赤卫队濒于弹尽援绝的严重境地。曾伟赞提着夹里只有三粒子弹的曲尺，周围看了一下，发现河边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外边去，就叫罗七、施昌两人把枪交给他。罗七不知什么意思，异常惊奇地盯着曾伟赞。曾伟赞说：“我的枪没子弹了，我掩护你们撤，快撤，后边有一条小路。”这时敌人又一步步逼过来，曾伟赞再次敦促时，施昌提着驳壳枪向敌人射击，把敌人顶住，转过头来，坚决地说：“曾车长，你出去找到殷叔，对他说，我们没有把车站白白让给敌人……。”罗七不容曾伟赞分说，一手抢过曾伟赞手中的曲尺，把他推了出去。曾伟赞走后，罗七他们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的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展开肉搏，因寡难胜众，他们被敌人抓住了。凶残成性的敌人把他们绑了起来，推落黄沙桥下用乱枪杀害。罗七中弹后没有立即死去，他从血泊中挣扎起来，挺立起血淋淋的身体，用尽最后的气力，高呼：“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才慢慢倒下去。

李连中弹倒下后，不久便苏醒了，霍地站起来，抓起木棍准备战斗。这时，敌人仍在他的周围，结果被逮捕了。体育队有人认出他是工会主任和队长，有“油水”，便立即把他解回匪巢。敌人对李连软硬兼施，威迫利诱。但是，李连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李连终于在一天早晨，挺起血迹斑斑的胸脯，走上了宝岗刑场。

曾伟赞带着施昌的嘱咐，历尽艰险，最后找到了杨殷。他含着泪花，抑压着悲愤，把施昌的话，把铁路工人赤卫队保卫车站的浴血苦斗详细地告诉了杨殷。

杨殷听完以后，紧紧地拉住曾伟赞的手，映了几下湿漉漉

的眼睛说：“同志们的血不会白流。你看，现在已经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来了吗！”

是的，烈士们用鲜血浇出了一个永不凋蔽的春天！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1980年整理）

东路血战记(节录)

甘 来

十三日早上五点多钟,我和汽车工人李彭、关国等一共二十多位同志,全副武装,驾驶着一辆缴获来的铁甲车,离开总指挥部(公安局),沿着惠爱路向东驰去。

车子刚转入先烈路,一架机关枪子弹就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扫过来,子弹打在铁甲车上当当地响着,站在车外的冯麟等几位同志当场就倒下去了。我们发现敌人已占据了“圣三一”学校(现传染病医院)两旁的炮楼,便马上丢下铁甲车,冲上了红花岗,在岗顶和敌人对垒。

这时,敌人正扛起军旗企图冲过马路进入市区,给我们一阵猛烈的反击压了回去。

敌人扛起的军旗是红边蓝底白心的狗牙旗。是李福林的第五军部队。我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时,在惠爱路一带担任警戒的赤卫队以及工人、农民、学生都跑上山来支援,我们已有百多二百人了。人多胆壮,大家斗志更强。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猛烈进攻,都给我们一阵又一阵的火力压着缩了回去。我们和敌人对垒了两三个钟头,敌人看见从这边冲不过,便绕道向国民党省党部(即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进攻,想包抄我们。敌人很多,有整整一个

团，我们只好边打边撤回来。到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的队伍已回到东皋大道一带坚守。敌人占据了国民党省党部。

不止一次，敌人吹起军号冲过来，我们就高呼着：“杀呀！”“为苏维埃政权战斗！”一阵猛烈的火力把他们挡了回去。同志们的斗志越来越高，受重伤的同志躺在地上不停地向敌人开枪，大声喊杀；有些背药箱的女同志，也拿起枪杆向敌人开火。在一二个钟头里，敌人冲了十多次，都给我们猛烈的火力阻击着，冲不过来。

一直坚持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已死亡了二十多人，受伤的更不少，弹药也快用完了。这时，不但没有援军来，和指挥部的联系也中断了。到处都是枪声，也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战斗情况，只好决定撤退。一听说要退，许多同志都不愿意。有的说：“要打打到底！”有的说：“死也不退！”有位穿学生裙的女同志，死抱着一个重伤的同志不放，哭着，要扶他一起退。那位重伤的同志却大声嚷着：“别管我！你们继续战斗吧！”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我们的弹药不足，再也不能犹疑了。我们把重伤的同志扶起放在偏僻的地方，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他们时，有的同志咬着牙，有的同志流着泪。我们撤退了。

我们一退，敌人就紧跟在后面冲上来。敌人恃着弹药充足，机关枪、手榴弹不停地乱打过来，打得满街飞沙走石，烟尘滚滚。我们的弹药越来越少了。只要看见某个角落敌人的火力减弱了，反扑过去，从敌人的尸体上检取枪枝、弹药。我们就靠这个办法来补充弹药，坚持战斗。一条巷一条巷地打，一条街一条街地打，和敌人进行拉锯战。

这样打，我们的损伤很大，人越来越少了。敌人被扫掉一

批又过来一批，越来越近，连他们的番号都看得见了。我们仍然坚持着战斗，没有一个人胆怯和退缩。我身边一位同志两条腿给打烂了，一套柳条衫全是鲜血，我扶他躺在墙角里，把枪给他架好，要他就在原地向敌人打；可是我一转身，他又跟着爬出街口来，死也不肯回到角落里去，却大声嚷道“要战斗到底！”敌人不停地吹冲锋号，我们也不停地喊冲喊打，枪声、号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有时退有时冲，扑过来扑过去，一直和敌人混战到下午三点多钟。

这一天，我们连一滴水也没喝过，已足足战斗了十个钟头了。大家都象雨淋过一般，全身给汗湿透，满头、满脸、满口都是泥沙。百多二百人的队伍，到这时只剩下不到三十人。我手里的驳壳枪只剩下九粒子弹。

四点钟左右，我们撤回到维新路一带。这一带静悄悄的，连一个活人都看不见。街上躺着许多牺牲了的同志，他们颈上围着红领巾，有的手里还紧握着枪杆。我们的人都撤光了，我们二十多人也只好忍痛分散撤退。

我和李彭来到四牌楼（解放中路），在我表弟的鞋铺里躲了一天，第二天便改装下乡去了。……

（载《广州起义一水手》，由肖伶根据口述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

我参加了暴动中的第一联队

(节录)

陈功武

十一月中旬，我以工人骨干的身份，参加了在西关手车伙工会召开的工代会会议。这个会由张太雷主持。第一个议程是各代表向党汇报各工会斗争的情况，接着张太雷分析了斗争形势，议决了向省市委提出暴动的要求；第二个议程是海陆丰苏维埃派来的三位农民代表，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购买武器，我们当即表示了支持。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瞿秋白同志亲自签署，批准了“广州暴动”计划后，起义的准备工作便加速进行了。

工人中的“十人小组”拔地而起。在龙藏街太邱书院里，由陈郁主持的第一个“十人小组”，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个小组。他们都在热烈地讨论形势、起义的政纲、口号和加紧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团市委和团市委领导的劳动童子团也在加紧进行训练。

十二月初，在司后街（即越华路）的一间小电影院里，装扮成群众前来参加大会的同志，脸上都带着笑容。十二点整，张太雷宣布开会。他说：“我们今天召开党和工会干部会议，通过起义的政纲！”有几个同志迟到了，张太雷同志严肃地批评

他们说：“革命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组织的决定要坚决执行，我们应该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不要以为迟到一阵不要紧，其实，这是会误大事的。”他见那几个迟到的同志接受了批评，于是把话题一转说：“……苏联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成功。今天我们起义，也有两个团士兵同情我们，如果打响之后，能够影响军阀所掌握的在梧州混战的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大家知道，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到处举行罢工、示威，争取生存的权利，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阶级觉悟一天比一天高。我们中国海员工人的罢工、省港罢工、广州工代会领导下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对世界工人运动都有影响……。”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广东、广州的敌我情况，最后说：“现在，正是我们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好时机！”

接着，张太雷将起义的政纲、口号逐条解释、宣读、通过。他还听了同志们对广州形势的讨论，并耐心地作了详细解释。会后，便积极准备，还派人去江门、佛山、英德以及东江一带同农军联络，以便他们响应起义。

十二月八日上午，我在诗书街某号接受起义指挥部一位负责人的委托，担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政治主任。他还和我研究了如何完成攻打公安局的任务。

回家后，有人给我送来了一个中山牌挂表、一个指南针和一支手电筒，准备起义应用。

十二月十日，陈铁军同志交给我三筒双毫银洋，共三十块钱，叫我下午分给赤卫队员，作为夜餐费。我发完后就回到太

邱书院待命。

本来，起义是定在十二月十三日的，不料事泄，汪精卫派他的老婆陈璧君到广州，从西江前线召回黄琪翔，准备镇压革命。在这紧急关头，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提前在十一日起义。那天是周末，那些反动头子都花天酒地去了，疏于防范，机关也成了真空，对我们极为有利。

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包括打石、电务、油业、酒米、柴炭、瓜菜、颜料、水烟筒、茶叶、起落货、汽车等工会的工人武装，约有六百人。他们只是少数人有枪枝，其他同志都是准备了一些刀、枪、棍之类的简陋武器。他们带好了起义标志——红领巾，静静地坐下来等待起义。

一会，周文雍叫我去小北直街“大安”米店取手榴弹，领条上署名“西皮”（C. P.的谐音——编者注），我带了四个工友和两个中山大学的同学前往。

“大安”米店是我党制造弹药武器的地下工厂和仓库，党派了原香港地委书记梁桂华在那里主持工作。我们在那里办好了领取手榴弹的手续，准备开门运走的时候，米店突遭二三十个警察包围了。有的同志从后墙逃脱，我带去的同志因地形不熟，有几个人被捕。我趁警官身边没有人的时候逃了出来，回到太邱书院，向周文雍等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来，才知道是米店铺主的亲戚出卖了我们。

十一日晨三时半，隐约听到了城北四标营的枪声，埋伏在各处的工人赤卫队便一跃而起，奔向进攻目标。

第一联队的战士，按预定计划分两路象铁钳一样冲向维新路，把公安局包围起来，配合教导团作战。埋伏在公园前的

一百多个劳动童子团员和共青团员，冲向公安局前后门，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公安局附近的桂香街、南朝街、西湖路、教育路等也冲出了我们的队伍。一时间，歌声、冲杀声、汽车声汇成一支雄壮的乐曲，冲散黎明前的黑暗。

攻占公安局后，同志们在楼上搜出了一个伪警长。我们命令他交出监狱锁匙，放出被囚的同志；又打开枪械库，缴获长短枪三千多支和大批子弹。这些武器原是伪公安局长朱晖日招兵买马用的，想不到竟武装了我们。

在大安米店被捕的同志也出狱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被捕后，未经审问就关进了监狱，想不到几小时之后，我们又重逢了。他们看见缴来的大批枪枝，十分高兴，各人领取了枪弹，便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时，闻讯而来的工人群众和出狱的同志纷纷要求参加战斗，杨殷和周文雍亲自给他们编队，把枪交给队长去分发。他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调了几个同志来帮助他们工作。

天亮了，我留在总部，参加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地点是在公安局大楼的楼下大厅，会场是临时布置起来的。六时多，张太雷、叶挺、杨殷、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领导同志陆续到来，于是，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始举行。

会议由张太雷主持。只见他穿着黄色军装，戴着眼镜，神采奕奕，十分英武地坐在当中。他的右边是恽代英同志，负责会议记录。叶挺坐在张太雷的左边，杨殷坐在叶挺下首，接着是陈郁、周文雍……。四周坐着工农兵代表，共约二三十人。

会上，张太雷讲话后，便通过苏维埃政府政纲。接着是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工作，周文雍报告赤卫队的组

织和战斗情况……。

最后，会议作出了决议：

一、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发表《告世界人民书》。

二、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定十一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前召开群众大会。

三、迅即打通通向海陆丰的道路，与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

会后，各委员返回各自的岗位，杨殷、周文雍、陈郁等同志陆续离开总部。恽代英埋头整理会议记录；叶挺从伪消防科的墙上撕下一张广州市地图，摊开放在会议桌上，研究作战情况。这时总部已装好电话，叶挺一手拿电话耳机，一手拿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指挥全市的战斗。

中午，预定在第一公园前召开的“拥护苏维埃政府群众大会”已陆续来了不少群众，后因敌炮兵团梁若谷部队由白云山冲过越秀山，到了吉祥路，武装的同志马上去迎击敌人，才将大会改为十二日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

十二日上午约十一时，大会在西瓜园召开。我担任司仪。会上张太雷、黄强亚等同志讲了话，还有一个自动跑来参加的海军陆战队代表讲了话。

大会散后，我回到总部，一位工友告诉我说：“张太雷同志牺牲了。”这话象晴天霹雳，我差点晕倒在地。张太雷同志的遗体放在公安局总部办公厅内，我看了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形势急转，敌人从韶关和西江前线调回的援军先后抵达近郊，已经在观音山、黄沙车站、长堤等处和我们展开激烈的战斗。起义军英勇奋击，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观音

山争夺战一直打到十三日正午。这时，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了，总指挥部下令，为保存革命力量，撤出广州，到海丰陆丰去与彭湃同志领导的革命武装汇合。教导团的同志首先向花县进军，接着，工人赤卫队和警卫团的部分同志也撤退了。未接到撤退令的同志，坚守在战斗岗位上，与十倍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包括盘踞在沙面的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海陆军战斗到底。他们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观音山上，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及点滴见闻

(节录)

欧 新

广州起义前，我在市内四牌楼（今解放中路）李朋记鞋店当学徒。时随冯赞师傅学艺。他经常教导我要分清工人与老板的关系，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店内凡欺负我的人，均遭冯之痛斥。有一次，老板李朋记打了我一巴掌，冯赞即提出强烈抗议，声言不准他再打学徒。正因为这样，我才把冯师傅视同父母，言听计从。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号晚上，冯师傅把我这个年方十七岁的学徒叫到跟前，第一次直接向我介绍共产党和革命的道理：“穷人要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我静听着他说话，并回想着平日所受的教导，加上追忆童年时代所知道的父亲参加广宁农民暴动失败后的遭遇，阶级复仇之根由衷而生，于是自然地加入了冯师傅率领的行列，参加工人赤卫队，投身革命了。

我记得冯赞被大家称为队长，是大队、中队抑或小队就不知道了。

当晚，我们在学宫街皮鞋工会集合等候命令。深夜三时，我队三十多人接到通知开入桂香街，配合教导团为主的工农

革命军,攻打维新路的敌人主要据点——市公安局。我们全队只有几支枪,只能作警戒,未参加主攻行列。我们发现革命军架设在汉记鞋店(今新星戏院对面的广播器材公司)三楼的那挺重机枪射击未中要害,无法压住敌人火力,冯赞立即派人前往该店三楼,向射击手指示方向,这么一来敌人的火力网被封锁住了,顺利地掩护地面部队攻击前进。天将破晓,我军攻占了公安局。

我们负责把从公安局救出来的革命者的脚镣和手铐砸开后,冯赞队长就同我到工农政府总指挥部(在公安局大楼内)领取工人赤卫队证章及光洋,回队发放。记得当时每人领到红袖章一个及光洋一元。

时起义方兴未艾,敌人进行捣乱,秩序很乱。永汉南路的高第街一带被外县乘机混进市内作案的土匪如袁虾九之流纵火抢劫,我队奉命驰往灭火及镇压敌匪,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秩序尚未恢复,又接命令速往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救火。冯赞亲自率队员十余人疾往,我和其他留下的队员继续维持秩序。这次分手后,我就没有见过冯师傅了。

起义失败后,敌人不分青红皂白,见到街上行人即开枪射杀,珠江为之丹赤,白鹅潭浮尸难数,大街小巷均可见到被杀的所谓“红带友”。我独自跑回四牌楼李朋记鞋店时,店门紧闭,经叩门后大家让我回到店内,但给老板训斥了一顿:“你们这么容易打倒资本家!开玩笑!”

我留在李朋记当炊事员。为了看个究竟,我背上菜篮到市集买菜,乘机溜到天字码头附近。突然,见一群反动军队荷枪实弹,押着八个十来二十岁的女青年自北南来。这些女青年

高声向路旁观众解释说：“我们是执信女子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好人（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学生尤其是女学生都很尊重的）。”听了后，路人都以同情而又怜惜。

大约快行近天字码头的时候，这群行将就义的女战士便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并高唱着《国际歌》，被激怒了的那群刽子手便拳打脚踢地打这群女战士。女学生群起反抗，刽子手们兽性大作，把女学生的衣裤全部扯烂，使之全身裸露。敌军侮辱她们一番后，即将她们杀害在码头附近。我愤慨极了。这时一个凶神恶煞的反动匪军走近尸堆，用一竹片挑烈士之胸部和下部，毫不羞耻地以此为乐，旁人敢怒而不敢言。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革命学生与我们工人赤卫队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加上起义的当天我随冯赞队长往指挥部领臂章时曾与执信女中的起义战士——飞蛾队队员有一面之缘，因而很自然地向这匪军提出抗议说：“人都死了，还要侮辱她！”这匪军马上停手注视着我，我知来势不妙，随即拿着买菜的铜板在手里一五一十地点数，他盯了我半晌，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数着铜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约走了几十米，我便假装鞋子脱落，弯下腰去穿鞋子，乘机回顾背后有无跟踪的人（如果你不借故而竟直拐过头来向后看，那就给他们怀疑而把你抓起来，以至杀掉），急急而去。

（蔡理才整理）

广州起义前后(节录)

魏 鉴 贤^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我从广东东江回到广州,组织给我的任务是在广州调查敌军动态和联系省港罢工工人。这时张发奎的部队已从江西陆续进入广东的北江南雄、韶关地区。当时,我们不清楚张发奎的意图,刚好碰到从第四军回来的欧震,他对我说:“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扩大编制后的番号,张发奎任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就要回广州来了”。于是我便留在广州,直接与住在小北的罢工工人和附近的打石工人、手车工人联系,经常和他们谈心,交换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照顾彼此生活等等。观音山麓的一些工人的茅屋里,成了我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我同数十名罢工工人、打石工人和驻在小北一带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做什么事情,工人们只要接到党的通知,就不避任何艰险,一定去完成,其中有不知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是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组织交给我们一批传单和标语,要我们在当天晚上到惠爱路(现在的中山路)和小北直街(现在的仓边路)一带张贴、散发。传单的内容号召工人,准备暴动,争取工人应有权利,夺取政权。

^① 本文作者是工人赤卫队中队长,坚守大北直街一带。

我们是在工人家属和小孩配合少数工人的掩护下做这项工作。第二天，财厅前大新公司附近和小北一带的大街小巷，到处发现我们的标语和传单，这都是小朋友们从大新公司天台游乐场和行驶在惠爱路的公共汽车上散发下来的。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息，把敌人吓坏了。

起义前夕，广州市区工人、学生和郊区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以省港罢工工人为骨干，组成了坚强的群众武装——赤卫队。我们这个中队是总指挥部直属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下有三个小队，一百多人。工人们缺乏武器，大家都抱着必然胜利的信心，要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全市许多工人组织，都分头到各地区，搜集武器。

这时反动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在西江和东江准备与桂系军阀作战。桂系黄绍竑的部队约三个师，全部撤离广东，到广西梧州去了。李济琛指挥的几个师，一部在潮汕韩江地区，一部在南路高雷地区。广州市区除张发奎总部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外，只有薛岳新编第二师的一个补充团和在后方的少数警卫部队，兵力空虚。

十二月十日下午黄昏时分，我们接到组织的通知：准备明晨（十一日）起义，要我们转知所有工人于明晨拂晓以前，携带武器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南边门口附近集合待命。

十二月十一日晨三时半左右，北较场方面传来了枪声，工人赤卫队纷纷到达指定的地点集合，参加战斗。天未破晓，教导团已顺利地攻入了公安局，其他各据点的敌人，亦被我起义部队包围起来，逐次被消灭，整个广州市区为起义部队所控制。

这一天，战斗很激烈。我们攻入公安局后，用缴获敌人的步枪武装了自己，然后集中在中央公园附近活动。中午，突然发现观音山的敌人向总指挥部射击，我起义部队立即向观音山之敌展开攻击，不到两小时，几百武装敌人就被我们消灭了。我们中队参加了战斗。这时，尚有文德路的大埔会馆（敌军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长堤肇庆会馆（敌第四军军部）、西门陈家祠（敌一个团部）、长堤广西会馆及西堤太平南路一间敌人仓库没有攻下，但被我军紧紧包围着，迫他投降。

午后，联队指令我队防卫大北门和大北直街一带，直到撤退，没有让一个敌人冲进我们的防护地带。

十二日各据点的战斗更加剧烈，北郊农会送来了一个消息说：昨晚有一列满载敌军的火车，在新街北面，被我农民赤卫队阻击，并破坏了几段铁路，使敌军未能进入广州。

午后传来了可喜的消息说：广州苏维埃政府已宣告成立了。张太雷同志在西瓜园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宣布了政纲，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欢迎。

这一天市面秩序良好，参加斗争的工人、农民、学生很活跃，《国际歌》、《少年先锋歌》雄壮的歌声，响彻全市。

十三日早晨，敌人在美、英、日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掩护下渡过珠江，我军转为守势，个别地区，已为敌人包围，进行着激烈的防御战。敌人攻入市区之后，到处杀人放火。丰宁路、长堤、双门底、正南路一带一片火海，火势向北扑来，直至永汉路哥伦布大厦附近（现在广东省石油公司）。我军一面与敌人作战，一面救火，处于极不利的形势。

中午下了一场大雨，战士们冒雨战斗，一身被淋得透湿，

红领带和红臂章脱下来的红色，染在颈上臂上，敌人把身上或衣服上染有红色的人，一律就地枪杀。有些商人，冒充起义人员，拿着红旗，拟往西濠口，搭船离开广州，亦为反动军队所杀害。市内横尸遍地，惨不忍睹。事后敌人承认，被杀害的起义人员和群众达五千七百多人，造成广州空前的大屠杀。

（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7辑）

战斗的日日夜夜(节录)

罗 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桂系军阀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驱逐了二千多名铁路工人,封闭了工会、农会、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团体,并秘密枪杀了工农骨干一百多人,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支部书记罗登贤派我到国民党海军处当汽车司机,负责工运情报。

当时盘踞在广州的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互相狗咬狗骨,战祸频繁,局势动乱。形势为我们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于是,省委作出了武装暴动的决定,并建立了起义的总指挥部。起义前夕,省委选派了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工人赤卫队编为七个联队,另外组织了一个敢死队。敢死队的队员大部分是省港罢工时模范纠察队的队员,我是模范纠察队的小队长,因此,编在敢死队里任小队长。这次起义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汽车接运教导团的同志;与教导团的同志联络上后,看到讯号立刻解决伪公安局的门警;配合集合在明星戏院(即新星电影院)的敢死队和龙藏街太邱书院的第一联队,从公园冲出攻占伪公安局;指

挥来往运输车辆。

十二月十一日起义前，天上漆黑一团，四周一片寂静。我和黎胜、陈永漫步在维新路上，侦察敌人的动静。快到公安局门口，我向陈永使了个眼色，陈永会意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放哨，我和黎胜继续向前走去。公安局门口上面装有很大瓦数的电灯，照着门口，亮得如同白昼。两个穿着黑衣的警察掂着枪，瑟缩地在门前踱步。看来没有问题，里面的黑狗定早已睡入梦乡了。我和黎胜继续往前迈步。我们的联络口令是“暴动”。我们走着走着，仔细向街两旁观察，忽然看见有个人影在闪动，原来是陈永，我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上前面去看看教导团的同志接来了没有，他会意地快步向前走去。我和黎胜漫步走到财厅前生果摊买了一包香烟，想磨磨时间等待陈永的联络消息。往陈永的方向望去，他正朝我们走来，我们加快了脚步迎上去。陈永等我们走近，低声地说：“联系上了，来了！”我们三人一起就朝公安局走去，并叫陈永去告诉早已埋伏在明星戏院的敢死队。敢死队得到消息后，很快地沿着路边向公安局摸去。我和黎胜眼看快到公安局了，便放慢了脚步。深夜三点钟左右，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天空升起了三颗明亮的讯号弹，这是起义的行动讯号。我们敢死队的同志已摸近了公安局，在黑暗处埋伏着，教导团的同志也靠两边骑楼隐蔽地迅速向公安局前进。我和黎胜快步向公安局门口走去。门口两个警察马上迎上拦阻，我们一个对付一个，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警察（我有海军处汽车司机的证件，黎胜有公安局侦缉处的证件）。当警察集中注意翻证件时，说时迟，那时快，我右手猛一拳朝黑狗太阳穴打去，黑狗摇

晃了一下就摔倒在地上，我拾起他的带刺刀的枪，照胸膛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黎胜也在同一时间把另一个警察结果了。我们埋伏着的敢死队队员跟着一涌而上，教导团的同志吹起了冲锋号，同志们端着枪，象珠江直泻的洪流，迅猛地冲进了公安局。还在梦乡的敌人刚被冲锋号惊醒，连裤子衣服也来不及穿就成了俘虏。往日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督察官，我们把他拖出了公安局大门枪毙示众。我们冲到警长老爷的住房，三拳两脚踢开了房门，警长神色慌张，正在穿衣服，看见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急往枕头底摸枪，企图顽抗，一个敢死队员眼快，一个箭步跨了上去，一枪结果了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狗命。

信号弹照亮漆黑的夜空时，整个广州城都动起来了，冲锋号声、枪声、喊杀声，瞬即象山洪暴发，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这时，工人、学生、市民一齐走上大街，一队队人群，脖子上都扎着红领带，神采奕奕。天亮时，远处的枪声越来越密，我据枪声传来的方向断定是“南堤小憩”，便把指挥繁忙的汽车运输工作交给了陈永，自己向着枪声方向跑去。到了永汉路南园附近，我看见赤卫队员挤在路上没法前进。我问了一下情况，知道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冲锋，敌人仗着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两三挺轻重机枪，拼命顽抗，我们的伤亡很大，冲不上去。前面后面的队员又往前涌，整条街都堵满了人，大家非常着急。

“南堤小憩”是军人俱乐部，是张发奎等军阀国民党高级官员，灯红酒绿、嫖赌饮吹的地方，现在在军事上却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它控制着交通要道，如果攻不下来，将对整个局势

发生很大的影响。时间已是十二点多了，我和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找来了一辆大货车。我把汽车倒过来，同志们在车厢上用沙包构筑工事，架上了三挺机枪。十多个同志，还准备了三、四十个手榴弹。一切准备妥当，进攻就开始了。我把油加足，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汽车倒着前进，到了丁字路口，拐个弯朝敌人的据点冲去。车上的三挺机枪子弹像雨点似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其他同志沿着马路两旁步步向敌人逼近，敌人像发了疯一样，也顽固地打来了密集的子彈，子弹在我们身边噗噗作响，像夏天暴雨一样洒落在马路上，路两旁的水泥柱子，被子彈打得直冒烟。有很多同志先后受伤和壮烈牺牲了。我悲愤极了，踏紧油门，掌牢方向盘，一心只想着尽快接近敌人据点，消灭这批王八蛋。汽车没有辜负我们的愿望，很快便接近了敌据点。大约离据点二十米左右，车厢上的同志，一阵密集的手榴弹投过去，瞬即炸开了花，整座楼浓烟滚滚，敌人的机枪也哑了。教导团的同志和赤卫队员，迅速地冲了上去，象海潮一样压向敌人，一阵强攻，到下午四点多钟战斗便基本结束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枪声。在我猛烈打击下，敌人节节败退。后来，帝国主义用军舰把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张发奎的残兵败将接走了。

大约晚上九点钟，陈永跑来说：“司令部叫你回去，接受重要任务。”我马上和陈永跑步回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公安局），一个身穿工人服，戴着工人帽，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同志，神采奕奕地向我走来，带着客家口音问道：“你是炳仔吗？”我气喘喘地点点头。他继续说：“现在需要你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去找一部汽车，和老周、老王等几个同志，去石牌接东江彭

溱的部队。马上就出发,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困难!”他看看我,停了一会,转过身对老周说:“好!你们去准备吧!”我随即跟老周进去,老周给了我十块光洋和一枝苏制卧龙八响。我接过枪和钱,就和老周、老王出发了。后来我从老周和老王的口中知道了给我们布置任务的那个同志就是叶剑英。我领着他们两个摸黑弄到了一部货车。这时是十二日深夜一两点钟,我已经两夜一日没有睡觉,没有吃过一点东西,疲倦得很。我摸摸额头,发烧烫手,只觉得头重脚轻,肚子十分饥饿。但是任务重要,我坚持把汽车向石碑开去,只觉得头越来越重,眼越来越花,迷迷糊糊,开到什么地方也不清楚……。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家中的床上了。我急着问我妈:“那和我一起的老周、老王在那里?”我妈回答:“不知道。”我又问:“今天是几号?”我妈答:“十四号了。”啊!我已昏睡了一日一夜了。就这样病魔缠身,一直病了三个多月,经过了两三次危险,还是治好了。病愈后一个多月,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到香港建立一个联络点,收藏地下党的一些枪枝弹药,参加由罗登贤组织的处决叛徒游德仁和反动头子谢炳的行动。

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座谈会记录

(节录)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黄 寿^①

长寿路谭新街六号(乐善戏院附近)是党的地下秘密机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张太雷、杨殷和周文雍等同志,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芳村、花地、石围塘等地也设有党的秘密机关。在芳村,除新隆沙内的竹绳店及镇东直街二十二号南山棺材店外,还在河面租了一艘大木船用作油印宣传品和集合场所。参加工作的有工人卢龙、莫根、梁通、何根、邝少孚、陈筹等和一些农民。在海南县九区木寮村梁家祠,也曾办过农民运动训练班,由黄埔军校的同志担任教务工作,也是党的活动地方。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凌晨,起义军攻克伪公安局。中午十二时,工农红军和工人赤卫队三四百人分四路攻克了石围塘,残敌四处逃跑,有的乘汽船逃往河南。我们接收了广三铁路石围塘车站和广三铁路管理局。铁路保安队有两个队退据芳村

^① 黄寿是广三铁路工人,工人赤卫队队员。

东濠。是晚十二时，我们在石围塘铁路管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前往消灭他们。十二日凌晨一时发起进攻。在战斗中敌人也曾向我军冲锋十余次，有几次冲至石围塘。为了消灭保安队，携带三箱汽油在伪区公所附近燃烧，天亮时，我们取得了胜利，战斗基本结束。是日晚上，从铁路局的长途电话里，我们知道了敌人调动的消息。李福林部的四十八、四十九团已开到广州近郊，其中一个团从三眼桥，一个团从石井兵工厂开往五眼桥，向广州反攻。我们将敌人的行动报告指挥部，杨殷指示我们要镇静对付，说明天就有援军来增援。

十三日早上，帝国主义的军舰在珠江河上来来往往，发炮轰击西濠口和黄沙等处。国民党海军江巩、江固、江北、江大等炮舰和伪机器总工会铁甲电船掩护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河，起义军受到很大威胁，被李福林部乘着的两三只电船冲了过来。渡河的反动军队每连都配有二三十个反动机器工会的人为其带路，包围赤卫队。李德轩还派体育队员配合敌军向西关反攻，第十甫与第十八甫两条街，不少起义同志牺牲了。起义失败后，我在石围塘冲出敌人包围，初跑到石围塘一间竹栏小艇掩蔽，后乘船渡河至黄沙，到大同路一同乡的木履店黄强记里掩蔽。十四日早，我由婶婶带往泮塘乡躲避。

曾伟赞(广州起义时在肃反委员会做联络员)：

我原是粤汉铁路工人，在杨殷的领导下，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清党”后，被迫离职，前往香港、澳门。十月底潜回广州，与杨殷取得联系，在肃反委员会做联络铁路工人的地下工作。

当时的失业工人多集居于黄沙一带。这个地区的工人工作作为反动派所掌握，杨殷指示：要联合印务及理发等工会，举行示威，以探听汪精卫对工人的态度。于是我们发动工人在龟岗开会，带领工人前往葵园，向汪精卫示威请愿。揭露汪精卫、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十二月初，我接受杨殷指示，在黄沙将军庙后街仁和里（现在粤汉路广州南站）七号木履店内，建立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开展地下活动，联络失业工人，还经常向杨殷汇报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杨殷指示我们监视铁路的反动分子，防止他们破坏铁路，我们联络了数十名失业工人，配备约十支手枪，执行任务。深夜听到起义的枪炮声，工人队伍集合完毕，天刚刚亮。我们派出便衣侦察敌人情况，发觉反动派李德轩把持的机器工会铁路分会的反动头子已逃往河南，粤汉铁路的伪警察也大部分逃跑了。我们先进攻粤汉铁路管理处，伪铁路警察没有抵抗，便缴了械。缴获了十多枝枪。接着进攻修元精台的伪第十区第一分署。该署只有四个伪警察守卫，很快被我们占领。黄沙被我们控制后，大队的工人赤卫队还未到达，于是我们组织失业工人维持秩序，负责晚间巡逻。并派出人员联络工人赤卫队，在如意坊一带河岸，共同守卫警戒。治安很好，居民非常欢迎。

当天，我们开始进行机车技术人员的登记，将他们组织起来，到指挥部领取枪弹，分派他们检查铁路机车及维持铁路交通。又将铁路工人约三百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编入赤卫队，由杨殷亲自领导；一部份负责接收伪铁路工作；一部份维持治安，维持铁路交通。接收铁路时，在保险柜里，接收白银五

六千元，由工人赤卫队队长送交指挥部。

十二月十二日，敌人乘电船窥探我军虚实，企图登陆反攻，被我们截击后撤退。十三日敌人开始反攻，李福林的反动军队，沿铁路线在如意坊和西村下车。敌人非常狡猾，佩戴红带伪符号，冒充起义军。起义军警惕性不够，被敌人混进，防线被突破，使起义部队遭受了损失。仅黄沙一带，就牺牲了一百多个同志。罗七等同志刚从家中冲出，便遭敌人击中殉难。这次广州起义，散失和殉难者无法统计。失败后，反动机器工会张贴布告，威胁群众不得收留起义人员，如有收藏者与共产党同罪。有很多起义人员无法掩蔽藏身，在街上被反动派逮捕枪杀了。

甘 来：

广州起义时，我与季步高、朱子路都在军事委员会工作。

四月十五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反动派摧残和勒令解散后，被迫搬至东堤的东沙角，成立地下组织——东园^①同学会。这个同学会实际上是军事委员会内部组织。我在东园同学会担任特别队的工作。曾被派往广宁县搞农民运动。后因形势变化，我又被派往东江至石龙，黄沙至韶关，石围塘至三水等地，调查敌人驻军情况。

十月间，东园同学会被反动派迫害解散，军事委员会迁往香港，继续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我亦前往香港，与纠察大队长黄荣取得联系，负责进行调查和联络前罢工工人纠察

^① 东园即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

队的人员，动员他们参加广州起义；并通过他们与广州的亲戚朋友联系，为广州起义作准备。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时，军事委员会命令参加起义的工人都到工会集中。大部份罢工纠察队的同志都集中于四牌楼（即今解放路）一间祠堂内的酒米业工会。由下午六时开始，到晚上十时，已集中了约六百人。来报到的人，都凭一张在卷烟纸上写有姓名的委令。为了不被反动派发觉，大家集中在祠堂里，关上大门，熄了电灯，安静地听候作战命令。我们的装备很差，除了一枝碌架手枪、一枝左轮手枪、几个自制的火药炸弹和一个对时间用的中山牌袋表外，都是童军棍和茶树木棍。指挥这些工人起义的，是黄荣和湖南籍的刘楚杰两人。当晚十时，我到西瓜园汽车公司、加拿大汽车公司，将汽车司机集中起来，每人发给二元生活费。后奉命我与陈荣驾驶野鸡车，伪装“游车河”（兜风），到市区各处巡视，搜集敌人和市面情况。

十一日凌晨二时，军事委员会密令西瓜园汽车工人驾驶汽车，前往北较场四标营，载运教导团去进攻各区据点。起义部队进攻长堤伪第六区署及十八甫与陈塘间的第九区署时，敌人抵抗极为顽强，但卒被起义军消灭。当我们驾车回来时，广州市伪公安局已被起义军占领了。黄荣和刘楚杰在战斗中负伤，送往东山的中山医院，由中共党员护士救治。

攻占伪公安局时，驻在伪公安局对面的伪保安队团部有中共党员卢瑞球和姚鸿儒在内响应，战斗打响时，他们立即将敌人的卫兵打死，保安队没有反抗，即缴械投降。

起义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工农红军司令部迁至

永汉北财政厅。参加起义的工人，都齐集于财政厅前，进行编队，其中很多是原省港罢工工人，他们多数曾在工人纠察队受过训，是起义工人队伍中最强的力量。编好队后，即领取枪弹，接受任务，分别到市区各处警戒。工人纠察队一部份在越秀山警戒，一部份在先烈路防御国民党第五军（即李福林军）在外县的部队回师反扑，另一部份则在南堤、西濠口监视河南的敌人。

梁梅枝：

广州起义时，我被任命为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以前，党号召全体汽车司机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起义。十二月七日晚，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杨殷、周文雍等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总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开会地址在仙湖街太邱书院。张太雷同志主持会议，说明了起义意义和目的。十二月十日下午四时左右，我接到党的通知说：本日下午六时，在公园前模范汽车公司工人宿舍和天字码头对面汽车工会，分别召开党员和群众紧急会议。党员会议由党支部书记主持，宣布起义时间改为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并发给红布条做起义的标记。会后，工会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由北区三汽车工会主席兼书记杨绩主持。他宣布全体工人当晚在工会留宿，不要外出。工人们听到这个决定，知道起义时间到了，大家情绪高涨，都表示绝对服从党和工会决定。许多工人分别找铁条、铁锤和绳子作为武器。十一日凌晨一时，工会再召集工人群众开会，正式宣布起义时间，

并指出今晚是星期六，反动官僚例假休息，敌据点内部空虚，乘其不备，于起义有利。

起义前，工会将工人编成四个大队，总领队为罗登贤，其中第一大队由金属业工会负责组成，我在大队任中队长。中队下辖十个小组，每小组五至七人。我们分配五个组包围公安局，其余五个组负责接收“加拿大”、“模范”、“国民”、“利行”、“利民”五大汽车公司的车辆，运载小北的教导团武装部队。

十一日天亮时，军事委员会命令我队前往支援进攻南堤的南园酒家（现海员俱乐部）——反动高级官僚巢穴。经过艰苦战斗，才将它攻克。我队又奉命进攻反动头子魏邦平部据守的文明路仰忠街监察院（现人民消防总局）。因敌人武器比我军好，据守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负隅顽抗，我们未能把它攻克。我队又被调到五仙门，攻占了反动机器工会盘踞的电灯厂。这时，反动派在黄沙、万福路、泰康路、长堤等处，用煤油放火烧民房、商店。指挥部为了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组织工人队伍前往救火，遇反动商团伏击，我们即同反动商团战斗。

十二日中午，广州人民在西瓜园广场召开拥护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会后在回公安局归途中，中敌人的伏击牺牲在惠爱西路西园酒家附近。周文雍立即派人到南堤通知汽车工人赤卫队派车去运遗体。我便和香港摩托工会负责人、赤卫队大队长袁松、支部书记杨绩、工会负责人黎胜、陈贯、卫炳耀和电车工会罢工归来的赤卫队队员十多人，开了一部大客车到现场。只见汽车弹痕累累，轮胎打穿泄了气，车已不能启动。张太雷的遗体靠在车厢内，脸朝南，头部中一弹，仍戴着

眼镜，胸侧中一弹，血水流淌在车内外。据负责警戒该地段的赤卫队员说：他们赶来时，张太雷还未断气。敌人是穿便衣的。

我们把张太雷、司机冼流和张太雷警卫员三具遗体运回公安局后，停放在大院内竹树傍，周文雍看过后说要开追悼会，还安慰了冼流的遗妻。

张太雷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起义军事委员会书记，他不仅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又是军事上的主要领导者，又是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人民海陆军委员兼代理主席。他的牺牲，使起义失却了领导中心和统一指挥，是起义的一个重大损失，致使没有组织好撤退。

张太雷是为了广州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我们省港罢工工人永远怀念他。

（原载1979年12月出版的《广州文史资料》第17辑）

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老人

座谈会记录

(节录)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黄养(海员工人):

我是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工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我因参加反对“改组委员会”的斗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关在维新路公安局达五六个月之久，直到广州起义才出狱。

一踏上十二月，监狱的气氛明显地变了。从虎门解来的有“嫌疑”的士兵，常有长官来看望他们，每次都带来新消息。我住的第八号监仓，伸手就能和过道对面监房交换字条。那些士兵知道我也是“政治犯”，常常一拿到字条便递给我。每当念到新消息，他们便对我说：“黄代表^①，快啦！”于是，我们便约好，随时准备行动。我们的兴奋心情在每天“放风”的时候，都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了，常常高声歌唱《国际歌》。那些白狗也一改往常恶狠狠的态度，而用恳求的口吻：“小声点，小

^① 黄养在狱中领导狱中斗争，被选为“犯人”代表。

声点，别让局长听见。”

十二月十日的晚上，大约下半夜两、三点钟左右，在朦胧中突然听到外边响起了枪声，手榴弹声也轰轰地传来了。我跳起来喊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大家立即兴奋地欢呼起来。一看，平时在过道巡逻的白狗都跑光了，糟糕的是铁门还给一把大铁锁锁着。听着外面“叭、叭”的枪声和同志们冲锋的喊杀声，我们急得要命，能拿起枪来赶上参加战斗该多痛快！

一会，队伍冲进来了，为首的一位同志一冲进来就高喊：“同志们，自由啦！”全监房立即响彻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赤卫队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口号声。等到打开大锁，我砸开脚镣走出监狱，同志们就告诉我：我的爱人缪少卿和其他几个同志，在梧州三角嘴火药厂，被白狗逮捕，壮烈牺牲了。

我的爱人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接受党的任务和我一起从香港回来的。我留在广州组织工友搞地下斗争，她被派往梧州开展工作，牺牲时才二十二岁。

我从监狱出来后，见到许多手车工人领到枪枝，都上观音山阵地支援自己的队伍去了。我领枪后，在公安局见那些残杀过革命同志的白狗——督察、侦缉、警官，没逃掉的都被押进来了。由于我熟悉监仓，便由我带领和指点关押反动分子。我不会给他们上脚镣，就命令他们自己轮着上。后来大家便推举我当看守。我们是不轻易杀人的，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坏蛋绝不姑息。由于在伪公安局当杂工和炊事员的人的检举，我们毫不犹豫地当场镇压了一个双手沾满人血的警官。

暴动的两天里我都在看守犯人，对外面的情况不大清楚，

只从回来的同志那儿听到一些消息。

第二天晚上消息紧张起来了。第三天天一亮，观音山上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西濠口发现有匪军登陆；驻在沙面的帝国主义军队和白鹅潭上的敌舰也向我们开炮，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听说司令部已迁到财厅去了，主力队伍已向海陆丰转移。我立刻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保卫战。我们爬上竹梯将一些武器搬上墙头，两个湖南籍的起义军，守着两挺水龙机关枪把住大门口。我们在楼上居高临下，枪口对准敌人。白军都缠着白色号带标志，他们冲过来，我们配合下面的水龙机枪，扫了一轮排头火，把敌人压了下去。可是他们恃着人多，匪官逼着士兵冲过来。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反扑后，伤亡逐渐增多，机枪也嘶哑了，同志们打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眼看敌军就要冲进来了，几个伙伙把我拉进了伙房，他们急忙给我装扮成伙伙，还给我铜元和菜篮，乘着公安局乱哄哄的当儿，混出大门口。不久，在亲友和同志的掩护下，才往香港找组织去。

侯桂平：

我是油业工会工人，是纠察队队员。刘尔崧是我的同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我率花县（我是花县人）、清远农军各一百多人，进攻清远县城。攻入了，但因军事组织得不好而失败，被迫逃入城郊笔架山。后来又在清远农军领导者赖松柏的率领下攻打帽皮岗。赖松柏战斗勇敢，猛冲猛打，与反动民团潘伯良部交战，不幸重伤身亡。农军因而退却，把赖松柏的遗体抬回八区安葬。后来，从海陆丰来的王充召集会议，计划

反攻。反动派在清远城知道我们无险可守，准备包围我们，形势十分恶劣，我奉命前往广州汇报。

十二月十一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找组织，见到谭平山才知道要举行暴动。起义枪声打响后，我们冲入省府(即现民政厅)，在那里设立“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我负责管理伙食。我去公安局时，见到花县农民特派员王果强带领该县的农民自卫军来参加广州起义，当天他们参加了抗击围攻观音山的敌军的战斗。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敌人，重新夺回阵地。他们还逮捕了花县恶霸冼兆雄，当即把他镇压了。

晚上，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向我们反扑。“工人赤卫队总部”门口由工农赤卫队守卫着，我们烧了许多粮册文件。十三日撤退时，我把驳壳枪和领来的白银一起放在楼梯脚下便立即离开，同工友到油栏门过夜。

因我是职员，只带红色小襟条，不带红领巾，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红色的痕迹。十四日早上，我到西濠口踏上“怡德安”轮船，瞒过了敌人多次的搜查盘问，安然脱险，回到了官涌。

第二天我又接到命令，令我速回广州地区追赶教导团，通知队伍不要从清远县过境。当时叶镛同志带领着起义部队，正准备向清远方向撤退。我找到刘清(党员)、叶文龙和陈某(已忘其名字)三人，马上坐车上银盏坳，我在银盏坳下车时被捕了。

我被捕后，敌人拿不出实据，只好把我释放。但我已被打伤，后来辗转到香港医治。

陈淑英：^①

我原是香港一间衣车店的杂工，十五岁时跟着大哥陈九榆、二哥陈权（均中共党员，已先后牺牲）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在组织的关怀下，我参加了三个月的学习，并和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一起，参加了共青团，分配搞宣传工作。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组织派我和邓荣一起假装夫妻，进行革命斗争。由于我斗争坚决，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有通缉我的名单。因认识我的人不多，故我还是一个劲地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经常参加到海员等工会打“改组委员”的斗争行列中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三点多钟，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我随赤卫队攻打惠福分局。拿着木棍冲了进去。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白狗”，还未穿好衣服，便向我们缴械投降了。

天亮以后，“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额就在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挂了起来。为了庆祝胜利，我和邓荣^②（我们已经正式结婚）到惠福路一带市场买菜煮饭。这一带的许多商店都开门营业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早开门？他们回答我说：“为了欢迎你们呀！”又说：“你们昨晚为大家打‘白狗’辛苦了，

^① 陈淑英是著名海员领袖陈权烈士的妹妹，当年是省港罢工劳动童子团的骨干。

^② 邓荣是共青团广东省委委员，1929年在广州牺牲。

我们为你们准备好菜和肉哩！”

吃过早饭，我和邓荣到惠福分局对门站岗放哨。上午九时左右，两个肥胖大汉，行动躲躲闪闪，被我们分头追截，把他们捉住，在他们身上搜出了国民党的文件。我们立即把这两个可疑分子押送到总部。到了总部大门，有几个从狱中出来的同志围了上来，认出这是两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一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刽子手。同志们愤怒地扑过去，把他推倒在地，射出了复仇的子弹，讨还了血债。

徐惠乐(汽车司机)：

我原名徐寿光，是摩托工会会员。“五卅”惨案后，我参加了省港罢工行列。当时回广州来的汽车工人有三百多名，并在广州成立金属业工会十三分部(汽车工会)，负责人是傅寿南、袁松。我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代表，由袁松、黎胜介绍入党。“四·一五”清党后，国民党反动派取消罢工工人的权利，对此我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后来，我开私人出租汽车维持生活，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十一月间，周文雍被捕入狱，党组织为了营救，令他装病，住在市立医院。党派了五位同志，其中有我和黎胜(黎是党员，由杨殷派入公安局当特别侦缉)，去营救周文雍。营救时，我的车子摆在医院门口，车牌早已抽掉。黎胜等同志进入医院用白布被单把周文雍包裹着，由李源背出来放在车上，我就迅速把车开走了。车到沙河一间农民的茅屋前停下，我才看清是周文雍。周文雍被脚镣扣着，行动不得，由同志们背着下车。我旋即把车牌子挂上，开车返回市内。事发后，反动派追查的很紧，但周文雍已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工

作了。

广州暴动前，我们开过很多会，每次都是十个八个人开，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反动派到处搜捕我们。

起义的这一天晚上，我指挥部分司机到第一公园^①附近的模范汽车公司等候，进攻公安局。我到太平南把自己的车子调回来，还雇请了一部。半夜一点多钟，两部车子都驶到四标营教导团去接负责同志到公安局。车到公安局，天刚刚亮，我们开了一个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汽车调配站。领导指定我任调配站站长，负责调配汽车，汽车进来要通知我，出去要由我放行。起义时，汽车工人很同情我们，很多司机驾着自己的汽车和老板的汽车来参加战斗。黎胜工作很忙，做了大量动员汽车工人和组织运输工作。我集中精力调配汽车，一直没时间走出大门口，两天两夜只吃了几碗稀饭，也不觉得饿。

第三天，敌人打过来，我才离开公安局。后来我去了广西，继续做司机工作。

陈 添（汽车司机）：

我在广州市公安局任局长朱晖日的小汽车司机，梁暖任公安局秘书长的司机，我胞弟陈积添也在公安局当司机。那时，杨殷已派了黎胜（党员）打入公安局当“特别侦缉”。黎胜常借故和我们接近，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阶级教育，帮助，使我们提高政治觉悟。我们都很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① 即中央公园。

当我们知道党要领导广州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候，大家都以充满喜悦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起义的前一天，梁暖通知我们到中央公园前模范汽车公司宿舍开会，决定起义时我们做内应，会后我们就回公安局等候了。

十二月十一日晨，黎胜和我们一班司机一闻枪声，立即动手缴了几个警察的枪。我们持着缴来的武器，冲向监狱，释放被囚禁的“政治犯”。这时，有些同志已打入了公安局对面的保安大队。局长朱晖日听到枪声，知道发生事变，急忙爬墙逃走。我们没抓住他，真是遗憾的很。

天亮了，我们乘着缴来的汽车，前去西门口进攻一分署，后来又去进攻光复南路杨仁里口九区二分署。那些白狗看见我们攻进去，大都爬墙钻洞逃命去了。

第二天，海味街一带战斗很激烈，英美帝国主义军舰发炮，击中民房，火光冲天，很快就漫延到泰康街。我奉命往这一带救火。我的家就住在泰康街，为了救民灭火，我没有回家，家中的亲人逃往那里，我已无法顾及了。

起义时，我缴获了保安大队长的碌架枪来武装自己。公安局军械库打开后，工人们也领取枪械，投入战斗。

起义失败后，我已不能在公安局露面了，靠着熟人的掩护，在西堤二马路升平酒店住了三天，然后设法逃往香港。

江忠建(省港罢工印刷工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十一时许，我们留穗的印刷工会罢工工友，按通知，一个个从广卫路十九号后门木楼梯走上三楼“省印刷总工会”会址秘密集中。我们听到这天晚上就

举行起义的消息，都高兴得很，互相拍打肩头，压低嗓门表示决心。记得我和王景尧、黄浩澄、陈新、谢文兰、邓启甫、孙虾、蔡剑英、冯万德、潘应濂、潘应球、潘应行、冯展明等十八个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会的同志共卅余人，组成了一个中队，队长由陈棠英（印刷工人）担任。我们每人领到两个生铁土制手榴弹，这是海员工会支援我们的。还有一些同志拿着木棍、铁棍作武器，静静地等待着起义时刻的来临。

大约凌晨二时左右，陈棠英正式宣布攻打公安局的任务。接着，陈崇英、黄天伟、谢文兰、邓启甫等同志分头带领着我们在黑夜中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公安局后门。公安局后门的铁门很高，相当坚固。前门的枪声已经打响，我们怎样攻进去呢？大家急中生智，抬来了几根粗大木头，向门侧的墙上使劲撞去，把墙撞穿了。我们喊着“冲呀！杀呀！”的口号，从墙洞冲进了公安局，与前门冲进来的同志会合。接着，我们又用铁棍、铁锤砸开了监狱的牢门，救出被监禁的革命同志。这时整个公安局内外，响彻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和《国际歌》歌声。在一片欢腾中，我们又冲向公安局对面，参加攻打保安队总队部的战斗。这些保安队员平日作威作福，打起仗来却很脓包，纷纷举手投降，保安队部很快就被我们占领了。天大亮了，我抬头一看，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旗已飘扬在公安局的房顶上。

我们又奉命去攻打惠福警察分署。分署早已被工人赤卫队包围，敌人不堪一击，便纷纷投降。可是，就在这时，一个负隅顽抗的伪警长，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同我并肩作战的青年同志冯亚。他牺牲了，我满怀悲愤，狠狠还击一枪，跳过

去把敌人撂倒，在同志们的配合下，缴获了那个敌人的驳壳枪，给冯亚报了仇。

回到公安局后，我们和海员工会的工友分乘四部汽车开往仓边街，攻打仓边监狱。监仓的狱长早已逃之夭夭。我们用铁锤、铁棍将铁锁、铁栅砸开，来到“犯人监仓”。被囚在那里的所谓政治犯，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们饿得骨瘦如柴，受过严刑拷打，但不屈不挠，意志更坚。我们冲进去时，他们高兴的挥动双手，高呼“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有一位女同志，被敌人折磨得遍体伤痕，骨头都断了。有人告诉我们，敌人审讯她时，打断了她的腿骨，但敌人仍然得不到一句口供。我从心底里尊敬这位坚强的女战士，连忙把她背出来，又请了黄包车，嘱手车工友小心送她回家，她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得流下热泪。

胜利完成攻占仓边监狱的任务后，留下了哨岗人员，我们便回公安局领取弹药。我们小队，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真是“全副武装”了。我们气昂昂、雄纠纠地回到省印刷总工会，向工会主席老冯和大队长汇报战斗情况。我们办理了队员和武器入册登记工作，又列队到附近执行巡逻任务了。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我们奉命参加防守观音山的战斗。我们驻防在观音山脚和第一公园附近，教导团战士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这时，来自北路的薛岳、莫雄部从西北方向包围了观音山，分几路向我们的阵地压来，我们一阵子弹，打得敌兵抱头鼠窜，退下去了。

我们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热爱，英勇顽强，一次又一次地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真是“以五千之众,拒十万之敌。”夜幕渐渐降临了,教导团已奉命撤退,留下工人赤卫队坚守阵地。我们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一直战斗到十三日早上。由于敌人从四方八面增兵,疯狂反扑,许多同志牺牲了。我们处于弹尽援绝的劣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撤退了。我们满怀悲愤地向印刷工会战友谢文兰烈士的遗体告别后,离开阵地,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辗转向市中心撤退。队伍被打散了,只好各自隐蔽。我将枪枝埋藏在濠畔街的破房屋下,退到西瓜园附近,混在看报纸的群众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跑来赶我们走,我便乘机离开,在海员的帮助下,搭日本“金山”号轮船,去香港找寻组织,踏上了新的征途。

起义中的市郊一区农民自卫军

何 清

广州市郊区有四个区级农会，成立最早的是第一区农会，它是一九二四年间成立的。林宝宸烈士^①是发起人，我也是十八个筹委之一。一区农会会址设在芳村谢家南边祠，北面祠则是农军大部队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训练的地方。一区农会包括芳村、花地、招村、涌口、沙涌、南安、大桥等二十四乡，参加农会的会员有一千多户，大多是农村的赤贫户和雇农。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农会领导我们进行过争取市民选举权、反对地主民团的压迫，抗交保护费和苛捐杂税等。为了保护农会会员的利益，我们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我是市郊南路农民第一区第三支队副兼小队长，曾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打田鸡（即平定滇桂军阀叛乱）和周恩来领导的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在二次东征的淡水战斗中我负了伤，被送回广州韬美医院医治，至今大腿仍留伤痕。在省港罢工中，我们还配合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反对走私资敌的斗

^① 林宝宸烈士原花县人，在市郊当雇工，在招村居住，于1924年底被地主恶霸杀害。

争。

大革命失败后，一区农会和二十四乡农会遭军阀李福林第五军及民团摧残，农会被封闭，村庄成焦土，农会会员被杀害者不计其数。有压迫就有反抗。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芳村、花地各村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准备积聚力量，起来反抗。广州起义前夕，赵自选和农运特派员袁基在芳村一带活动，把我们重新组织起来，农军本来就有步枪，知道共产党要领导我们暴动，大家非常高兴，便在夜里集中在秘密据点活动。我们市郊一区农军被编入第六联队，即与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和南海铁路沿线农军合编为工农赤卫队，联队长是赵自选，源基也是联队领导人之一。一区农军大队长是姚常^①。

起义的那天凌晨，赵自选领导我们攻打石围塘火车站及芳村花地的警署。我们百多农军围歼了李汉魂驻守车站的一连人，很快便攻占了火车站。第二天早上，接起义指挥部通知，要派兵增援总部，遂由赵自选亲率一区农军精壮者三十人渡江驰援公安局，我是其中之一员。我们坐了一条大木船横渡，留在广三火车站的还有工人赤卫队和农军二、三个中队。

队伍来到公安局，即被派往观音山抗击反扑之敌，激战整夜，教导团主力撤退后，敌众我寡，被迫撤离观音山。一区农军二十多人，且战且走，越过敌军的警戒线离开广州，我们不敢回家乡而走路南下，辗转到了中山县小杭镇。小杭镇有乡

^① 广州起义后，姚常被捕叛变，他带领特务到四乡，被捕的农会骨干、农军三百多人，致使广州市郊农会大伤元气。

农会，会长是何福，当他了解到广州起义失败，我们被逼远离广州的时候，寄予无限的同情，他发扬了阶级友爱，为我们安排食宿，并为我们筹款到澳门，我们把枪枝安顿好后，经过一番打扮，便赴澳门找寻出路。

(谢邹郎根据口述整理)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府

林杨珠 叶汝棠 林就胜 林焕明

一九二五年初，农运领导人罗享、黄谦、王岳峰、赵自选、袁基和罗绮园^①等，先后由南海县里水农会的潘顺和郭见耀带到我市郊四区聚龙村。他们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阶级教育，领导我们组织农会，向封建地主展开减租减息、拒交保护费和苛捐杂税的斗争。聚龙村是耕仔村，全村都是贫雇农，都是给地主做牛马的穷苦人。他们的宣传，有如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使我们知道了穷苦的根源。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耕仔纷纷起来闹革命，走起路来腰板也直了。那些地主豪绅见我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心中也有点害怕，也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市郊区第四区农民协会属下的聚龙村农民协会在一派大好形势中成立了。全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参加了农会，选出了林蚊棠为主席，委员有林蚊妹、林成佑、林蚊水、陈济、周志荣和林福全等。接着，又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由林成佑任中队长，林杨珠、林就胜、叶汝棠、叶押、林焕明、周河树、杨苏娣等三十多人参加。后来，林蚊棠和林成

^① 罗绮园又名哨牙罗。

佑等被选派往农讲所学习。回来后教我们操练、射击，为我们示范表演，省农会还发了枪给我们。为了反抗区内最大地主势力的何村，林成佑联合横濬、上步、田心、粤溪和鹅掌坦等几十条村的农军，围攻了何村一天，为了减少火力，我们对该村的穷苦兄弟作了口头宣传，使他们脱离了地主反动武装，我们便加紧进攻，取得了胜利，地主乖乖地进行了减租减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国民党叛变革命，石井兵工厂机器工会的工贼摩啰仔纠合了何村和附近的地主恶霸，带着反动民团和一群流氓地痞，首先到聚龙村清党。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行其极，封闭了农会，躲避不及的会员被拉去坐牢；附近的大天二(即土匪头)也乘机打家劫舍，把个聚龙村搞得乌烟瘴气。农会会员和农军被迫逃到山沟田头，昼伏夜出。我们农军把十多支步枪收藏在村头的大松树洞里，到晚上便进行秘密集中活动。那时，村里的党组织便起了核心的作用，党员林蚊棠、林成佑等，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农军也象他们一样，都能严守纪律、克服困难，对革命事业充满着信心，等待着胜利的到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晚，聚龙村农军经过林成佑的串连后，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出发，到广州参加起义了。我们把武器擦得油光发亮，以林成佑为中队长，三十多人到横濬集中。村里的青年人闻讯也自觉地赶来了。在横濬附近的农军和农会会员已纷纷到达。我们在那里吃完晚饭便集中待命。到了五更天，市内枪声隐约可闻，农军大队长王岳峰对我们说：“起义的时间到了，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恶霸，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就可以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

府,就可以取得胜利,为牺牲了的工农兄弟报仇!”夺取政权、报仇,这是我们农军的愿望。在王岳峰的带领下,有枪的走在前头,没有枪的作后备队,万众一心,朝着公安局急驰而去。

天亮了,市公安局已被起义军攻占。只见公安局内外红旗漫天,欢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农军奉命到工农指挥部整编,我们立即转移到司后街省政府内,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林成佑领来了一车枪枝弹药回来分发。农军本来就有枪,大家都择更好的背上,每人还领了二百发子弹,个个都精神饱满,边吃饭边谈着未来。这顿饭每人有几件猪肉,一块红腐乳,这是清党以来我们吃得最有意义的一顿饭,因为这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吃饭间,听得一阵密集的枪声由远而近。有人跑来说:“敌人从观音山压下来,前部已到吉祥街了!”于是,正在吃饭的农军便纷纷放下饭碗,持枪上膛冲出大门,朝吉祥街涌去。农军是训练有素的,一边冲一边卧地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纷纷败退,我们一直把敌人赶出观音山,并由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在那里防卫。

回到农军指挥部,只见押来几个反革命分子,人们纷纷上前审讯,个个都做法官,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就在门外正法,人们拍手称快。

午后,农军曾去搜捕土豪劣绅,并把他们镇压。

十二日上午,我们到西瓜园广场参加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散会后,敌人分四路围攻广州,观音山和长堤急待增援。为了保卫苏维埃政府,农军集中在西瓜园,要组织敢死队,我们都表示要誓死保卫苏维埃,抱定为苏维埃而生,为

苏维埃而死的决心，个个都争着报名。但是，敢死队不能每个人都参加，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人提出“执筹”的办法，那就是按人数写上“生”字或“死”字，凡拿到“死”字的，就参加敢死队。这是一件极其严肃而又感人的事，我们拿到“死”字的就为敢死队；拿到“生”字的就作后备队。

敢死队的队员举手宣誓，喊出了“为保卫苏维埃而献身”的最强音，便出发到观音山去了。在象岗山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几度争夺战，林杨珠对不会拿枪的同伴说：“要沉着，卧地射击，朝扛旗的打去！”扛旗的纷纷倒地，把敌人打退了。不久，敌人援兵又至，敢死队员牺牲了不少。这时，阵地上发现了四个女扮男的战士，他们一色短陆兵装的头发，穿对襟唐服，操海陆丰话，作战很勇敢，在阵地上和敌人拼刺刀。他们是那里来的我们也来不及问，后来，他们和向东追击敌人的农军一起，朝东山方向而去，不知所终。

后来，敌人援兵蜂涌而来，我们退到大北。不久，后续有了增援，我们又到长堤防守。黄昏，全城烽烟四起，帝国主义的军舰掩护李福林第五军在长堤登陆。敌人为突破堤岸线，他们耍尽阴谋，竟然冒充起义军，手持红旗，颈佩红领带渡江，船将靠岸，他们才换上白带，朝我们放枪。这一来，我们吃了亏，防线几遭突破，我们终以敢死队的精神和敌人拼搏，始将敌人击退。

十三日，广州全城已被敌人包围，我们奋死保卫苏维埃，聚龙农军的血洒在苏维埃大地上，农军被打散了。有的三三俩俩到了泮塘，被泮塘农会会员掩护，脱离了险境；有些朝东撤退，走到各县去，经八九天，才行乞回归；有一支小队失散

后到了西村，在广雅书院附近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今后去向。这支小队被黄色工会侦探跟踪，他们妄图歼灭农军，卒被农军的神奇枪法和小老虎一样的作战精神所吓退。约一个月后，屠杀起义人员的风声渐渐平息了，但林福全被捕后叛变了革命，他天天带人到各村去抓人，反动派还在叛徒手中拿到农会的档案，他们拿着相片去查对，对上的就拉去坐牢，或被枪毙。聚龙村更是人心惶惶，后来，敌人还是把叛徒处死了，这是叛徒应得的下场。

一九二八年正月初四日，农会主席林蚊棠、农军队长林成佑、还有林蚊水、林蚊妹等接上级通知到芳村邓家祠开会，研究新的任务。不幸被敌人围捕，三十多人被捕，林成佑、林蚊棠、林蚊水、林蚊妹几位聚龙村的优秀党员壮烈牺牲。

(林、燕、邹、郎根据口述整理)

广州起义前后的花县农民自卫军

卢克文

自“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叛变后，花县农民协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组织部署一切，准备随时打击和粉碎敌人的进犯。

六月十一日，反动派调第一军第二十师六十团，在反动团长李务滋的带领下，并配有大炮、重机枪来进犯花县。在花县纠合了地主会民团等反动武装共七千多人，于十二日拂晓分三路分别向元田、杨村、九湖等地区进犯。我花县农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元田、杨村被敌人突破，农军自卫军退守至联安围集中待命；九湖凤岐庄的农军，也退入渔鸠庄“王鹏大楼”固守，继续抗击敌人。

王鹏是一个年已六十，归国不久的进步华侨。他全力支持农军的斗争。敌人包围了“王鹏大楼”，用重炮轰击，由于该楼坚固，粮水弹药充足，农军斗志坚强，英勇作战，与敌人对峙三个多月后，才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奉命突围往联安围。

全县农军在联安围集中。九月中旬，反动武装一万多人分三路来进犯，我们坚持至十二月七日，因敌众我寡，且考虑到斗争的长期性，乃决定将部分农军退入山区以便随时打击

敌人,其余尽量分散掩蔽,以保存革命力量。至此,花县的革命斗争遂走向低潮。

自农军从联安围撤退,分散掩蔽后,整个花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反动派的暴力摧残下,被烧毁房屋三千一百多间,惨遭屠杀的农会会员七百五十余人,被奸污的妇女不计其数,敌人还把被摧残的少女三十五人贩卖,投入火坑……。但是,敌人的血腥暴行,动摇不了农民自卫军的斗志,在党的领导下,随即转战新华、狮岭的长岗、公益一带,袭击京广线的乐同、军田、新街等车站,控制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农军三百余人,在刘绥华、侯桂平、黄白华、刘胜侣等农运特派员领导下,连夜北进,袭击清远并占领了清远县城。但由于当时来不及与清远县的农军取得联系,随即退回花县。

十二月十日晚,我们接到了上级关于参加“广州起义”的紧急通知,欣喜若狂,立即集中三百多人,摸黑分批急赴广州,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黎明前抵达广州市郊。这时起义枪声已经打响,我们立即投入战斗。在农运特派员危少伦、侯桂平、王岳峰等同志率领下,攻入了伪省长专员公署(即现省民政厅)。捕获了血债累累的伪省府参议员、花县大恶霸大地主洗少甫,立即就地正法,群众鼓掌称快。接着,上级党要我们连夜赶回花县去。

回花县后,我们立即分队在京广铁路线上布防,将军田站南至大迳桥一段路轨拆毁,掘毁路基三十余丈,阻止国民党反动军队从韶关回师广州,掩护广州起义部队安全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队伍六百多人在叶镛同志率领下,

沿沙河、太和、竹料进入花县后，沿途遭到花县地主会反动民团武装袭击。我农军接到通知，立即前往支援，在石岩塘、水渭、仙阁一带，粉碎了反动武装三千余人的反扑。后来由刘绥华同志作向导，带领新建立的工农红军第四师，离花县经从化、增城抵达海陆丰，与彭湃同志的海陆丰起义部队会师。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整理)

观音山苦战七小时

王礼芬

自从花县农会主席王福三烈士牺牲后，地主便指挥民团武装，勾结国民党县大队，向建立了农会的“家生梯”^①村和“客村”疯狂进攻，实行烧杀抢的清乡政策。“四·一五”后更加疯狂，他们在二区推广乡一带，围绕着农会实力雄厚的鱼鸠庄（九湖乡农会所在），逐村逐庄地烧光，从氹田庄、龙田庄、南标庄、黄秀塘（客村）一直烧到上枯岭（客村）。在大火中，几千贫苦农民被害得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哭声震天。敌人经过烧杀抢掠后，还把鱼鸠庄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有七十多名骁勇善战的农民骨干集中在鱼鸠庄，由中队长细根率领，我是农会负责人，我们两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地主民团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纠集了十倍于我的兵力，日攻夜围。我们利用“王鹏”大炮楼和南炮楼与敌对峙，坚持了十多天，派去广州请援的人一个个都没有回来。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只身突围往广州找党组织求援。到了东皋大道省农会，只见门上贴了封条，到毛泽东同志主办农讲所的番禺学宫，该处也被反动军队占领了。我想起

^① 即奴隶村。

曾在横濠见过彭湃，便去那里找他，也扑了一空，所见遍地尽是瓦砾。在十多天里，徬徨无主，迫着我两手空空回花县去。

到了花县龙口附近，碰到莲塘农会长的弟弟曾焯，我问他有没有办法弄些武器弹药，他回答说早已没有了。后来我碰到农运骨干志生，他把鱼鸠庄的农军与敌人苦战，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对我详述，使我这个昂藏七尺的男子汉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场强风暴雨，把敌人在夜里照着我们炮楼的数十支“大光灯”全部吹熄打烂，匪兵只好龟缩回据点去。王细根率领十七人冲出重围，各找生路去了。冲出重围的归国华侨王鹏不听我们的劝阻，送他的妻子回娘家走避，在莲石庄被人告密后，民团团长王纪有把他抓去，在坪山壮烈牺牲。敌人杀害王鹏的惨状，我们逃出来的人听了都失声痛哭，大家当天盟誓，决心找党组织援救，为全县受难农农兄弟报仇。

我和王细根到了广州，居住在金花街中道巷五号，派人打听党的消息。这样又过了月余。

十二月十一日，传来了广州起义的枪声，我和细根不知实情，还是不敢上街去。第二天特派员陈炳辉找上门来了。他对我俩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广州起义啦！这回是我们的世界了。我们起义军已攻占河北^①一带，现在在观音山一带激战，你们赶快集合花县农军来参加战斗吧。”我见到陈炳辉，知道他是代表党组织来的，高兴极了。他叫我们集合农

① 河北是指珠江北岸。

军,我很为难,就把我们九湖乡一带农军惨遭杀害的情况向他细说。他听后狠狠地说:“反动地主刘寿鹏呀刘寿鹏,你杀害了我们这么多农民兄弟,我们一定要讨还血债。……这样吧,能集合多少人就多少人。……”

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就分头去找,但到处都碰壁,只得又回到中道巷五号。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调集十多万人马包围广州,观音山危在旦夕,陈炳辉说:“不等了,我们去增援观音山吧!”

十三日晨,我们进入观音山北麓的阵地上,看到教导团的战士正在调动,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已四面包围广州,教导团已经在撤退了。这时敌人蜂拥而来,我们狠狠地打,敌人尝到了“莲子蛋”的滋味,被我们打退了。

在阵地上,我发现特派员范少伦、刘绥华两同志也来了。大家利用战争的间隙,共诉别后的衷情。讲了一会,敌人又组织反扑。我们合计子弹已经不多,决定等敌人近了身才打。我和细根一枪一个,打得敌人害怕起来,退却下去。就这样,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而我们的同志也牺牲不少。阵地安静下来时,我和细根发现不少同志已经撤退,我摸摸子弹袋,子弹也打光了。下午二时许,我们一看形势有异,就决定撤退。我们下山后,把枪枝埋进水田里,便分道回中道巷去了。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州起义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人们前进。

(燕章、美英根据口述整理)

攻人普君圩

梁复然^①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工农兵代表会议在禺山市陈少泉杂货店二楼举行。会议快结束时，杨殷同志说：“……就这样决定：南海农民赤卫军两个团归南海县委书记陈道舟同志领导。广州起义信号发出后，农民赤卫军第一团团团长周侠生同志，负责协同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进攻路局和芳村、花地警署；得手后，回师拿下大沥，再会合农民赤卫军第二团团团长吴勤的队伍，打下佛山，控制广三路，巩固广州外围。清楚了吗？”杨殷同志讲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每一个字都钻到我们的心底里。

我回到岳林村后，焦急地等着起义的日子。不料，十一日凌晨，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事起仓促，消息一天数变。我和梁守一焦急万分，等待着军委的指示，可是，指示一直没有到来。派人去打听，只知道周侠生的部队已经配合铁路工人打下石围塘，又回师拿下了大沥。

第二天下午，吴勤派梁恒来到岳林村，要我们马上去蟠

^① 梁复然同志是当年农运特派员。解放后，是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此文系根据他写的《忆吴勤》一文改写的。

岗。我立即和梁守一、梁恒扒艇仔出发。艇靠码头时，看见吴勤早就带着十多个农民兄弟在河边等候了。我们一见面，他就责怪周侠生不出动打佛山。梁守一把周侠生已经配合广三铁路工人打下了石围塘，又回师拿下大沥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又说是起义总指挥部命令他协同周侠生去打佛山的，周不来也要去打。他身边只有十多个人，枪也不多。我觉得形势瞬息万变，周侠生未行动，一定有原因，我们应该听指挥部的命令行动。因为吴勤未满周岁的儿子是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佛山的反动派杀害的，他满腔悲愤地说：“不提革命吧，我还有家仇，不打下佛山我是五火攻心呀！”他坚持要立即打佛山，并说已知钱师父（即钱维芳，党员）、周金（党员）和敦厚、水埗的队伍，请他们拉队响应。感情激动着我，使我热血沸腾，希望立即为阶级兄弟报仇，但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事，还要慎重。我问吴勤：“普君圩驻有多少敌人，是什么队伍？”宋恒说只有三、四十个“蔗围”的烂仔。我想，这般地主武装容易对付，于是决心打！我们决定先打佛山的大门普君圩，得手后看情况再打佛山。

出发前，吴勤给了我一支左轮手枪。因为没有枪了，便叫梁守一先拿支扁担作武器，以后再给枪。我们登上横水渡过河，到了对岸的石出山。扼守佛山外围入口的石出山碉楼，在落日余辉下，象一座黑洞洞的庙堂。梁恒扛着七九步枪，走在队伍前头。快接近碉楼时，传来一声吆喝：

“那个？”

“你老豆^①！”梁恒开枪便打。

^① 即“你的老子”的意思。

顿时，乒乓射来两发子弹，一个战士当场挂了彩。吴勤大怒，叫梁恒送走了伤员，便把驳壳一挥，带头冲向碉楼。奇怪，碉楼上毫无声息，一枪不发。我们冲上二楼、三楼、四楼，楼上楼下连个影也没有。吴勤在黑魇魇的屋门角落里找到一支马枪，抛给梁守一说：“怎么样，拿去！”梁守一接过枪，十分高兴。他摸摸枪筒，还是热的，枪膛里留有火药味，还有五颗子弹。显然，刚才开枪那个家伙打了两发，看势头不对，丢下枪就跑了。

我们离开碉楼，继续前进。离普君圩越近，道路两旁的住家、店铺也越多。吴勤指挥队伍两路纵队靠边前进。队伍人不惊、狗不吠地过了石路头、弼头和竹栏。到了青云街，吴勤便命令两个队员去摸饼寮的岗哨。不久，两个队员回来说，饼寮和鸭仔廊都没人放哨，敌人都睡大觉去了。于是我们决定先往鸭仔廊。队伍到了那里，普君圩前牛肉巷口那座五街公所已经在望了。

公所楼上，灯火辉煌，人声嘈杂，晚风吹来阵阵粗俗不堪的咒骂和哗笑声，清晰可闻，“老更”们正在推牌九。在黑暗中，吴勤指着普君圩房顶上的天桥叫我看。那是吴勤的农团军“四·一五”前进驻普君圩时，为了在战斗中不受街巷限制，便于迅速移动而用木板搭起来的通道，吴勤和他的战士是很熟悉的。他叫我们在原地负责掩护，朝楼上瞄准打，他自己一个人上去。我有些担心，叫他多带几个人。他说：“人多不好办，一个人上去连鬼都不知，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说完，他一闪身就向五街公所去了。

夜很静，我们散开来，枪口对准公所的楼窗和天桥。不到

半支烟工夫，就听到吴勤大吼一声：“我系豆皮勤——炸弹！”霎时间，五街公所里，惊叫声、咒骂声、跌倒声、重物碰撞声、杯碗破碎声、天桥上奔跑脚步声、喊救命声，混成一片。我喊声“打”，一时间步枪、手枪齐发，狼奔豕突的“老更”们纷纷从天桥上呼号堕地。在灯光下，我们看见吴勤吼叫着，追打那些夺路奔逃的残敌。我们冲上去时，他依靠着一角砖墙，正打得性起，一枪一个，弹无虚发！我们很快冲上天桥，消灭了残敌，结束了战斗。

吴勤派出岗哨后，我们就回到公所里来。我问吴勤说：

“你的炸弹呢？”

“噢，这就是。”他指指嘴巴，笑了。

公所前厅摆着两张八仙桌，桌上银毫、骨牌散乱，地上鞋子、木屐东一只，西一只。摆下的烟局、烟灯都来不及吹熄，烟枪、烟枪满床乱抛，可以想见敌人奔逃时的狼狈相。在后屋墙上，挂着几支七九步枪，搭着几条子弹带。在阁楼上，揭起一张床角的被单，竟压着一支曲尺手枪，还包着两排子弹。

打普君圩的战斗已经结束，怎么不见有人响应呢！我担心地问吴勤，但他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拿起几支烟枪，在烟盘里摆成一道栏栅，说：“佛山街头街尾都有这个东西，没有内应，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是不容易攻进去的。”吴勤瞅着栏栅说：傻仔才去破栅，不会砸墙窿钻进去吗！再有一两百人就可以了。”我赞赏他这个好办法。

这时，梁恒匆匆地跑上楼来报告说：“周侠生的第一团，在大沥给民团盯住了，拉不出来，山紫村的周金在十日那晚就出了乱子，给福军抓去了，钱维芳只剩孤身一人，去了大沥。在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但张发奎跟李福林调了大队伍进行反攻，正在激烈战斗中。”

听到这些消息，整栋楼都沉寂了。我问吴勤怎样办？他想了想，挥动拳头说：“撤！”我们迅速收拾了枪枝弹药，就撤离了普君圩。

南海县农军出击大沥亲历记

谢 颂 雅

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四标营教导团的第一响来复枪声，呼唤着灿烂的黎明。市郊工农赤卫队接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的命令，立即出动，投入战斗。

前一天晚上，我在芳村联络站开了会，便回到大沥龙溪。我把起义的消息告诉农民群众以后，已经是深夜了。听到起义的消息，人们一个个都十分兴奋，不愿回家睡觉。他们立即拿来纸张和花红粉，一齐动起来，裁纸、煮浆糊、磨墨，忙着写标语。一会儿，村庄里外和铁路沿线的树杆上、电线杆上、墙壁上，到处都贴满了鲜红色的标语。

“广州苏维埃政府万岁！”

“耕者有其田！”

“打倒土豪劣绅！”

“农民们赶快起来报仇！”

农民群众在骨干的带领下，在大镇周围几十里地区，开展了组织、宣传活动。我和周侠生、陈道舟举行了紧急县委会议，摆清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战斗任务。整个南海九区和石围塘以西市郊地区，攻击敌人、配合暴动的战斗任务全部由我们农军负责。石围塘、凤溪头、芳村、花地、五眼桥这五个地方，

形成的环形地区，由源基和黄谦等同志率领的农军担任主攻。我和周侠生则分东西两路，夹攻大沥圩。如源基、黄谦部能与我们胜利会师，广州市的西郊就全部为我党掌握了，补给线可以一直延伸到三水、西江甚至更远的地区，而河南区敌人李福林部将受到来自腹背的威胁。这一仗对于暴动计划的实现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把这些情况向农军讲过后，大家斗志高昂。士兵们星夜磨刀，告别妻儿，纷纷到指定地点集中。到了深夜三点钟左右，在月色朦胧中，我率领了三十多个农军从龙溪出发，划小艇到濠口。濠口和龙溪、松岗各相距十余里，鼎足而立，大沥圩就在这个三角形斜边的中心点。因为从龙溪到大沥圩路程较远，而濠口到大沥圩则只有一箭之地，从濠口袭击敌人，是完全可以出奇制胜的。五更天，寒流迫人，但是每个人都穿着单衣，轻装行进。大家在小艇上，都用稻草裹着身子，远远望去，同运稻草的艇仔一样，以防暴露于月色之下。艇仔靠了濠口码头，我们悄悄地上岸，看见已经有四五十个武装农民在这里等着我们了。仔细一看，几个领头的原来是几年前均安染布铺那几个青年工人，都是周侠生^①的徒弟。熟人见面，心里多么高兴。队伍当即由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八十人。

第二天一早，周侠生率领的农军已经到了松岗，接近大沥圩了。八点钟左右，从大沥以西响起一排枪声，接着又是三声单响子弹划过天空。这是周侠生预先和我们约好的出击信号。在密集的枪声中两支队伍从东西两边朝着一个方向兼程疾

^① 周侠生是佛山有名的教头，武林高手。

进，象一把铁钳似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大沥圩。圩上的守敌只有一个民团局，不到五十人。那些家伙听到了枪响，又见周侠生部一个个挥动着大刀砍杀而来，吓得惊惶失措，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过二十多分钟，大沥圩便飘起了锤子镰刀旗和农会的犁头红旗了。

大沥圩解放以后，枪毙了一批来不及逃走的大恶霸，群众莫不拍手称快。九区、二区、三区、五区等地大批徒手群众，纷纷前来要求编队入伍。镇里镇外，一片忙碌。除了接收敌人的产业、机关和组织宣传外，更重要的是整理队伍，扩充力量。我们在兴仁善堂设立了九区农军总指挥部，委派林瑞精负责整编部队。革命群众都被武装起来了。大刀队、长枪队、运输队、宣传队、救护队、给养队、侦察队……也纷纷组织起来。旧日的凄凉愁苦，一扫而尽，到处是胜利的欢呼声。

当我们在大沥庆祝胜利时，消息传来，源基和黄谦等在石围塘也打了个大胜仗。这时，我们伸出去的两个铁拳，便紧紧地抱合在一起了。广州南海一带地区，至此完全掌握在起义部队之手。周侠生和我商量后，立刻选派一支精悍的农军，星夜由广三铁路用火车运至石围塘，编入那里的工农赤卫队第六联队，随黄谦一同作战，并北渡黄沙，向起义总指挥部报到。

十三日清晨，反动县长李宝祥亲自指挥民团二千多人，向大沥圩开展了猛烈的反扑。我们在大沥的武装只有二百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硬拼和死守都是不利的。为此，县委在紧急会议上决定：突围。部队分为两路：驻在仁兴善堂总部的一百余人为第一队，由周侠生、陈道舟和我率领；驻在忠义祠

的七十余人第二队，原是源基率领的，因源基已打到石围塘，不在忠义祠，便改由张霭泉率领。决定两路队伍均向西北方向突围，先到松岗集合，然后移师北上，直奔花县，与教导团部队汇合。

行动刚布置完，东南方面就响起了一阵阵密集的枪声，我们立即带着队伍忍痛撤离大沥圩。战士们心情沉重，一步一步回头，人们一句话也没有，都忙于赶路。

我和周侠生、陈道舟三人提着压满子弹的左轮枪，走在队伍后面。约走了五里多路，天已经大亮了。可是，为什么还不见张霭泉的队伍跟上来呢？……

张霭泉在忠义祠准备撤退时，队伍还没拉开，一个赤卫队员气呼呼的跑来报告说：“民团接近大沙地！我们的哨兵同他们开火了！”张霭泉一听，觉得形势严重。他知道周侠生撤退的那条路又小又烂，很难行，如果让民团过来，那就难办。他决定顶住，好让大队安全撤退。林瑞精见霭泉下了决心，就大声喊：“霭泉下命令吧！迟不得了！”张霭泉便命令大家马上向大沙地出击。七十多个赤卫队员顷刻间怒吼起来，跟着张霭泉冲出忠义祠，直向东南方向扑去。

天刚蒙蒙亮，敌人就发起了冲锋。他们的机枪子弹在天空交织成一片火网，七十多个赤卫队员隐蔽地接近了敌人。这时候，张霭泉一声喊“打”，无数复仇的子弹立刻射向敌人，那些团丁拔脚就向后跑。敌人被打伤的不必说，那些没被打伤的则怪声怪气地嚎叫起来。在火光照亮下，敌人横七竖八地摆着十多具死尸。

敌人一次接着一次的冲锋，除了多送几条命，什么也没有

捞到，但赤卫队员也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只剩下十多人。受伤的队员，血从伤口不断地涌出来，他们忍着剧痛，用全身的力量扣住枪机。在这紧急关头，张霭泉的子弹只剩下七粒，林瑞精也只剩下五粒。张霭泉对大家说：“同志们！看准了才打！一枪一个！”敌人听见我们的枪声慢慢稀落下来，便一窝蜂地向我们直扑。林瑞精在射出最后一粒子弹之后，壮烈牺牲了。一个在田边喝水的伤员，被敌人从背后打来的子弹打中牺牲了。张霭泉仇恨满胸，把手枪向腰间一插，抽出马刀，跳了出去，就和敌人拼。这时忽听到后面一声：“站住！”一枝马枪和一枝左轮在后面对准了他。他回头一看，那个拿马枪的家伙正是“四·一五”屠杀过无数兄弟、追捕过自己的邝剑平！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张霭泉一个箭步过去，刷地一下就把邝剑平的马枪夺了过来，砰的一声，邝剑平来不及看清是谁，便应声倒在污血里。张霭泉正想调转枪口打死那个拿左轮的敌人，不幸对方先响了两枪，他中弹后，挺立足有两分钟之久，才慢慢地倒下去，剩下一面血红的犁头旗，深深地插在他身边的土堆上。

周侠生见张霭泉还没跟上来，便对我和陈道舟说：“我们是不是回头看看他们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往回走。走了一里多路，就听见喊杀喊追的声音逼过来，这是些穿黑衫裤背白子弹带的民团兵丁。我们急忙掉转头来追赶队伍。敌人的子弹象暴雨般地在头上飞过，落在田里，溅起了无数水花。

民团越追越紧，只有百多公尺了。我们三人一下子卧倒在路边，向他们开了一轮火。那些胆小鬼听到枪响，纷纷猫下

腰来躲着不动。看我们起身走远了，他们才又跟上来。这样追追打打，打打追追，一直保持着百多公尺的距离。当我们赶到张边围河边时，队伍已经先程到达，很多人坐在基围上等着我们回来。周侠生看见赤卫队员们，便用两只手合起来放在嘴边做成喊话筒，对他们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快走呀！过得张边围河，就是胜利！不要等我们了！”远处传来一阵回话：“我们先过河，找船来接你们……。”于是，一百多赤卫队员一个个跳下河里，很快就游过河对岸去了。

大队的敌人紧追过来，距离已经不够一百公尺了。我闪过一边对周侠生和陈道舟说：“你们先过河，让我来对付这帮家伙！”周侠生和陈道舟从我身边向基围穿了过去，可是我这一闪身，却踏进了路边一个很深的泥潭。泥浆没过了我的膝头，拔起右脚，左脚又陷下去。

这时候，冲表村的民团已经从横边冲了过来，我立刻举起左轮向他们射去，不料一连扣了三下扳机，都没有响，原来子弹已经打光了。我把手枪插在烂泥中，准备和前来的敌人拼掉。那个走在前头的团丁见我扑下，便举枪向着我大叫。定睛一看，这人原来是冲表村打更的，他时常到我姊夫处，所以我认识他。他见我手上没枪，便搜去我身上的四个双毫币，还剥去我手上那个假金戒指。这当儿，我乘他不备，一下子把他肩上那枝旧枪夺了过来。他吓得连忙说：“哎呀！你莫来武的，这些东西我不要……”我拉开这枝旧枪弹膛一看，原来里面连一颗子弹壳也没有。

大队敌人把我围住，怎样脱身呢？恰好这民团的头子竟是冲表村的中医周少南，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心里一愣，正

想大骂他一通，不料他一见我，连忙对他的手下说：“不要伤害他，这个不是……”说完又走到我跟前来：“啊呀，你怎么会来这里呀！这么兵荒马乱的……到我家里去歇歇吧！”于是，便叫一个团丁带我到冲表村去了。

这时陈道舟和周侠生已走到河边，上了基围。他俩回过头来，望着我象是被人押着似的，都伤心地摇了摇头。冲表村的民团和从大沥追来的民团纠合在一起向张边围河岸扑去。周侠生和陈道舟在风雨交加中望着对岸的赤卫队员平安地撤走，便迈开大步向滚滚的河水走下去……。风越刮越狂，雨越下越大，雷电交加，我向张边围河中心望去，不禁大喊一声，心痛欲裂，扣紧在一起过河的周侠生和陈道舟，不幸消失在河水中……。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整理)

广州起义的宣传工作

赖先声

一九二七年九月，叶贺大军攻占汕头后，我被周恩来派任，当了七天的汕头市长。可惜汕头的红色政权却在中外反动派的合击下失败了。约在十月中旬，张太雷到汕头，和蓝裕业、我等处理好汕头的善后，便一同回香港去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发出了号召广州暴动宣言，蓝裕业等被派回潮汕、东江一带，策划组织农民暴动，响应广州起义；我则回广州负责市委宣传部的的工作。

回到广州，暴动的日子一天天靠近了，起义的宣传计划工作，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我曾就宣传工作问题请示过张太雷，他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搞好，要让全市人民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和存在。

起义前，曾在财厅附近的一条小巷我的寓所召开过一次秘宣会议，研究起义的宣传工作。肖学文照例又为会议放哨。参加的人有团市委、妇委、劳动童子团和各区工代会的负责人。团省委书记谢蔚然、宣传部和团市委的李求实、沙文求、李海筹、冯广等；妇委的陈铁军、李淑贤；工代会的戴卓民和曾国钧等，还有原国光书店的梁国梁也来了，他是管财政的。会议主要研究下列问题：一是组织宣传队；二是购买红

布,准备起义标志和横额;三是写标语;四是解决印刷品的场所问题。会议决定由妇委发动女工和女学生购买红布,负责起义标志及巨幅横额;共青团和劳动童子团负责组织各区学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二三十队不等;还由学委中选派二三十人负责写标语。最后,我留下曾国钧和戴卓民,共同研究印刷文告和宣传品的问题。曾国钧原是广州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理事,曾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各报馆的新闻工作者和印务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戴卓民对海员和印务工人也比较熟悉。于是,便把印刷苏维埃文告、传单及其他宣传品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是秘密的工作,为了保证印刷品的安全,我们还和杨殷商妥,请澳门的秘密印刷厂承担部分任务。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后,团市委在黄花岗后面的二望岗召开了二百多名团积极分子骨干会议,他们除了完成杨殷交给他们的肃反任务外,还贯彻了宣传会议工作精神。各校以原有的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骨干,组织了三四百人的宣传队伍,在十一号起义枪声打响后,在全市范围内出现,以小队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使广大市民知道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知晓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和共产党的政策。学委又从中山大学和省一中等挑选了二三十个学生,在明星戏院通宵达旦地写标语,直至十三日起义失败。

妇委方面,在陈铁军、李淑贤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许多车衣工会和土布工会女工,还有执信、女师的学生,以办喜事为名,三三俩俩到西关、惠爱路各布店购买红布,把全市的红布抢购一空,赶着制红领带。记得起义前的几个钟头,周文雍来到明星戏院,亲笔书写了一条巨幅横额,书上“广州苏维埃政

府”几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人人赞赏。

劳动童子团也由冯广、李海筹组织了宣传队,进行宣传活动。

(燕章根据赖先声及其夫人肖学文口述整理)

永世难忘

——从护理周恩来同志到参加广州起义

范桂霞

在革命风云翻滚的一九二七年，我正在中山大学附属师范读书，参加了共青团，是新学生社和妇女解放协会附师分会的骨干。“四·一五”广州国民党反革命政变风声紧迫，在通缉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组织上通知我走避。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了一个织布工友家（我原是织布女工），她给我买了去港澳的船票。到了香港，我在人地生疏的街头流浪了两天，幸天无绝人之路，在“莉园”书店见到中山大学的同学何志坚和朱英娥，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后，朱英娥就带我回她家居住，何志坚微笑着送我出店门说：“你在家里等候消息吧！”

第二天，省委秘书处派人来告诉我，组织决定调我到省委招待所工作。于是我就当上了省委招待所的服务员。当时的招待所是按革命形势的需要租赁房子的，发现问题就搬走，在招待所几个月，搬了几个地方。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我接待过董必武、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林海涵、彭湃、李立三、黄平、沈青、杨殷等中央首长和同志。

有一天，省委秘书长给我一个新任务，要我单独护理一个

重病号，并已由总务赖谷良安排好一切。赖谷良把我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间小洋房里，前座是杨石魂的住处，后座是我的“房”，我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我听领导人说过，我要护理的是“老周”。“老周”是谁呢？按照组织原则，我没有去问，我静静地等候老周的到来。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部黑色的小轿车在门前停了，杨石魂在车上背下来一个身穿长袍马褂上海富商打扮的病人，我急忙把他迎到房里来。这个人正发高烧，患着急性疟疾，神志不清，消瘦得很。这时为他雇请的医生也来了。

石魂和我把他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后，我就给他探热。我仔细端详病人，从他那虚弱而高大的身躯，消瘦而英俊的脸庞，刚毅而忍着病痛的眉宇中，认出他原来是我们崇敬的周恩来同志，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但我意识到当时的环境和任务，便不动声色地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周恩来同志打针、喂药。一连几天，我和杨石魂日夜守护在床边。尽管眼睛熬红了，眼皮在打架，但我觉得能为党的领导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健康出点力，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经过几天几夜的急救，周恩来同志才清醒过来，脱离了危险。不久，能下床走路了，大家的心象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为了使周恩来同志尽快恢复健康，我炖了鸡汁给他吃。周恩来同志见了便批评说：“党的经济这么困难，想起南昌起义后患病的战友，我怎能吃下去？……”我回答道：“这是党的决定，你是病号，在这里，得听从我的安排。”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这次服从你，以后还是要节约才好。”

十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有关广州暴动的会议，

周恩来同志决定参加，由我陪去。这天我们过海后，沿着石级慢慢地走着。周恩来同志病后初愈，身体虚弱，脚步飘浮，额头不时渗出豆粒般大的冷汗。但他坚定地迈开步，终于胜利到达会场。此后，周恩来同志就呆不住了，差不多隔天就由我陪着去开会，回来后又通宵达旦地批阅文件，起草文章。

周恩来同志在养病期间，非常关心我的进步，和我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从谈话中得知，周恩来同志是在潮汕失利后患了病，由叶挺和聂荣臻、杨石魂等同志护送到香港的。周恩来同志还询问我平时学些什么和爱好什么？并告诉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染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不良嗜好；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什么都懂，什么都学会，因为这是斗争的手段。从此，我在生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和环境，进行灵活机动的地下活动，协助党完成了各项斗争任务。

一天，我又陪同周恩来同志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参加重要会议。在会场休息室里见到了彭湃的夫人许玉庆。大家很高兴地谈论着，有一位负责同志笑着说：“广州就要暴动了，你们高兴吗？”回“家”后，我高兴得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同志询问有关情况。周恩来同志没有正面回答，他笑着反问我：“你想家了吧？快了，不久的将来，就会回广州了！”周恩来同志坚定的信心，亲切的教诲，热情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周恩来同志恢复了健康。他接到组织的通知，要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到

码头为他送行。周恩来同志用温暖而有力的手和我们握别，嘱咐我们：“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然后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送别周恩来同志后，我调回机关（在铜锣湾），与谭竹山（谭平山的妹妹）一起，保管档案材料。我也曾送文件到西营盘水坑口谭天度的住处，在那里见到区梦觉和越南人李芳德。李芳德是交通员，大家都在关心着广州暴动。

十二月初，为了迎接广州起义的到来，省委机关全体同志都行动起来，除留守的同志外，都回广州了。我被派为地下交通员，负责往广州送信。我在十日晚上回到广州，见行人稀少，又闻说戒严，考虑到安全，就偷偷地回到观莲街家里。那时我父亲因反动派搜捕不着我而被打伤内脏，被折磨死了；十三岁的二妹范美（桂笈）被囚禁在公安局狱中，家里一片凄凉景象。母亲见了我，低声饮泣，诉说反动派的暴行，我站在父亲的灵前行了三个鞠躬礼，忍着悲痛安慰母亲说：“妈，别难过，报仇的日子就快到了……。”

深夜三点钟，突然，在市北郊传来的枪声，划破了长夜的沉寂，从远到近，越来越密集。我跑到街上兴奋地迈着大步往小北直街送信，却扑了一空，原来同志们都参加起义去了。我打听到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乃急忙跑步到那里报到。在那里见到了张太雷、恽代英、杨殷、沈青等我接待过的同志，大家都兴高彩烈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谁也没有分配工作给我。有人告诉我，妹妹范美出狱了，已被送回家里去。我又急往家里走，去看看代我坐了七八个月牢房的妹妹。她是被同志们抬回家的。她本来是一个身体粗壮正在发育的姑娘，却被折磨

得站不起来。她对我诉述了在狱中的情况：

“那天‘士的党’徒侯交礼来家搜捕，找不到你，就把父亲打致吐血，然后把我押到长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二天，我们一群人被押到公安局。在女牢中，我不停地大哭大闹，后来，难友中有一位市一中的蒋大姐，她安慰我，把我当作她的小妹妹。她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后来蒋大姐壮烈牺牲了。我还认识了沈青的妹妹沈学修姐姐和卢雪云姐姐。卢是沈学修的未来嫂嫂，也在狱中关着……。”

“起义的风声传到狱中，沉寂的牢房经常传出对监狱长和伪警的嘲笑，人们脸上露出笑容。起义军攻入公安局，迅速打破了牢门，我们和起义军会师了，大家高兴得互相拥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我冲出牢房后就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家了。姐姐，你带我一起去战斗吧！”

我安慰她，劝她在家养病，待病好了再继续战斗。说罢我又回到总指挥部去。这时，敌人正从观音山偷袭下来，我们要组织人力反攻。不久，教导团的增援力量来了，他们不熟悉广州的地形和道路的名称，于是，没有分配具体任务的我，就主动去给他们带路。

十二号，我在街头看见三妹范桂爱，她带着红领带和市一师的同学正在进行宣传。后来又在公安局见到她，她象一只喜鹊似地跳来跳去，我拉着她，问她干什么去？她说：“中午开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我要组织同学们参加……。”接着，她又告诉我说：“我已经参加了共青团，你高兴吧！”我真从心底里高兴，并约好去参加大会。

在公安局,我碰到了同学冯宝铭(又名君锐),见他拿着两件古董,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去搜查伪法庭长的家时,没收归公的。我还见到中大附师的同学刘复礼、周世敏、刘荣添等,我问他们还有没有红领带,他们都回答说早已分光了。因为我找不到红领巾,从起义开始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带过,可见当时红布都给用光了。

我提前到达西瓜园会场。会场很大,挤满人群,由吴铁若(潜之)带领一批工人赤卫队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宣布开会后,我想往前挤也挤不动,只好站在外围听。外围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活动,这些坏家伙妄图破坏会场,但都被工人赤卫队监视着。张太雷讲话很生动,简明扼要。由于我站在一角,听不清楚,只听见热烈的掌声。后来,可能是由于抽人防御敌人的反扑,会越开越少人了,大会很快就结束。

当晚,听人说,张太雷同志牺牲了,国民党反动军警多路人马围攻广州,帝国主义军舰游弋珠江,互相勾结镇压革命。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革命失败了。黑暗代替了光明,然而乌云终究是遮不住太阳的。

(谢燕章根据口述整理)

从运送《红旗》到广州起义

杨 广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那天，我刚奉命到达武汉，便碰上了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按家兄杨匏安的嘱咐，我辗转由上海回到香港。在广东省委见到杨殷，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以小家庭为掩护，嘱我和我的妻子妇运干部程宛芬建立地下联络站；一是负责省委机关刊物《红旗》的运送工作。

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正酝酿在广州举行暴动，并指示各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配合，伺机夺取全省政权。这时，中央和各地来往于香港、澳门、广州的领导人渐多，情报工作和住地都要相应配合，我便和宛芬以小家庭的名义，租赁了三个地方（因香港租房子是非眷莫问的），先后建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站，接待来往人员和递送文件、交换情报等。

《红旗》半周刊听说是由恽代英和赖先声负责的，恽代英是主编，还有李求实等也负责部分工作。稿件是由杨殷交给我的，每期发稿，我便把稿经过伪装带往澳门。在澳门把稿交给杨章甫，章甫是地下印刷厂的负责人，由他安排付印。《红旗》印好后，由我带回省委。为确保刊物的安全，由杨殷交带来往香港澳门轮船上的海员负责接应。刊物都是经过伪装的，用

红红绿绿的商业招纸包裹着，然后由我带上轮船，接应我的海员便把它放在轮机室或帐房内，船泊香港，待所有的旅客都上了岸，我才在海员的掩护下把《红旗》带到发行机关——一间故衣店的楼上。

《红旗》的印刷量不多，约二三千份，发到各特委、县委后，有条件的便进行复印。

到了十二月初，省委机关开了动员会，大家都准备回广州参加暴动。这时，交我带往澳门付印的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为广州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和传单。除我按平时运回省委的部分《红旗》外，听说还由赖先声直接安排交通把这些宣传品运到广州，也是在杨殷的支持下由海员接应运送的。

约在六七日，杨殷先回广州，临行前他嘱我把《红旗》付印后便回广州去。

十一日早上，起义的枪声划破长空，震撼了死气沉沉的羊城。我兴奋地朝公安局跑去。公安局一片欢腾，在欢乐的人群里见到了恽代英，他亲切地和我握手问好。我用敬仰的目光注视着他，竟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他把我拉到公安局的北楼楼下大厅，边走边对我说：“我正缺助手，杨殷已嘱我把你安排在办公厅，我们一起来处理这里的一切吧！”说罢，他便动手收拾办公桌，我也跟着投入工作中去。

北楼的楼上是叶挺的工农红军办公室，是司令部所在，叶剑英也在那里办公。北楼下面的东厅，是公安局的弹药库。这时，工人赤卫队正缺枪枝弹药，那天早上，恽代英除了参加苏维埃第一次扩大会议外，他还带着我清理弹药。他很忙，很多人找他。三天内，从苏维埃的大事以至起义人员的吃喝他都

关心到了。记得十一号上午，起义人员滴水未进，他叫我找到泡水馆挑开水回来让大家喝，刚碰见陈铁军，她就拿着钱找人挑水去了。

第三天上午，恽代英和我都是最后撤退的。他嘱我回香港省委另行安排工作，他还鼓励我说，努力干下去，革命是要韧性的，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征服一切。

(章慕根据口述整理)

广州起义中的《红旗报》

梁若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张黄事变后几天),我得到一位姓罗的朋友(四·一二前是共产党员)介绍,在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参加校报《黄埔潮》(月刊,记得是四开两版)的编辑工作,职叙中尉,军官待遇。这个报属政治部领导,总编辑职务由自封为国民党“左派”的政治部实际负责人刘百川(江西人)兼任。编辑工作是他指定几个人分工负责的,我是被指定的人员之一。

十二月十一日,我去到第一公园前的新星电影院会见起义指挥部负责宣传的赖先声,他叫我参加《红旗报》的筹备出版工作。他没有给我配备人和物,要我自凑班子,马上开始工作。阿董是个女青年,当时已经参加了宣传队工作,在街头演讲。我很快就找到她,由她找来了一对姓丁的青年夫妇和几个印刷工友;我也回到“广州酒店”,找来了另一位姓丁的。这位姓丁的从潮州来广州,恰好碰上惊天动地的武装起义。“四·一二”之前他是中共汕头地委的宣传部长,很会写文章,笔名甦甦子,我们推他担任《红旗报》的总指挥兼主笔。我们借用原七十二行商报为《红旗报》的社址,并征用它的印刷工厂。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报馆开始编印《红旗报》第二号。创刊号

是起义当天印行的，单面四开一张，印数不多，在市内各显眼处张贴，内容刊载些什么记不清了。第二号是对开一张，首版刊载的是苏维埃的政纲、命令等，其余各版刊载起义的有关新闻，其中主要是战事及群众热烈参加起义的新闻。因急促发稿付排，各版的内容没有很好的分类，只采取综合编排法。排字工友边执字边哼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他们哼着、笑着、工作着，到下午四时左右，就将报排好，送大样到编辑室，由几个人分头进行校勘。我们满以为《红旗报》第二号快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却忽然来了通知，要我们放弃编印工作，自行撤退。听到这个意外消息，又不明全面情况，我们只好忍痛离开工厂。因此，《红旗报》第二号没有付印便宣告流产了。

（此文根据《广州文史资料》第6辑《广州起义的经历与见闻》一文节录，并在文字上稍作了删改，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末。

随杨殷同志参加广州暴动

李少棠

自从杨殷和我的侄儿李义宝帮助我提高认识，冲破封建礼教家庭的牢笼，挣脱“守寡”“克夫”的枷锁后，参加了革命，当上了杨殷的秘密交通员。我的任务是传递文件，运输武器，来往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杨殷从不让我在公共场合活动，按照机密交通人员的要求，我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四·一五”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我奉组织的指示，活动得更加隐蔽了。

由于工作需要，我和黄平民^①住在海味街十四号的机关内。我这个“家”挂满了圣像、十字架，宗教色彩很浓。对外，黄平民是我的表弟，我的三妹是“女佣”，还有三妹的八岁女儿克勤，在家也能起掩护作用，我们一家人的感情十分友爱、真挚。我的姐姐是一间教会女学校的校长，为了避免敌人对书刊信件的检查，她的信箱成了我党的通讯工具。我往来于香港、澳门和广州之间，途中的关卡都有我们的同志掩护。在九龙关口，杨殷就安排了张克清（中共党员）在那里“检关”，我带

^① 黄平民是留法学生，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南路特委书记，被捕牺牲于湛江市。

的武器就靠此得以顺利通过，畅通无阻。

一九二七年中秋节前，杨殷派我带炸药和炸弹壳去九江，交给何全翻制炸弹。我化装成返娘家的新妇，三妹化装成女佣人，挑着里面盛满弹药弹壳的金漆礼盒，一同坐船往九江。经过了几次试验，炸弹的威力不错。我把这些情况向杨殷汇报后，他哈哈大笑地说：“好哇！这是准备广州暴动时送给反动派尝的礼物。”

广州起义前的一天晚上，我从香港乘“佛山”轮回广州。十一日早上八时，我踏上了西濠口码头，就感到气氛和平日不同了。长堤看不见一部人力车，迎面而来的是一队队系着红领带的工人赤卫队武装队伍。我想：可能是起义提前了。

沿着太平路飞快转向禺山市杨殷的家，见到了杨殷的岳父陈少泉，便知道广州起义在今晨三点半钟提前二天行动了。我问明了杨殷的去向后，就急急赶往公安局。

在公安局门前，我见到了两具敌人的尸首。在公安局内，到处洋溢着革命胜利的气氛，闹哄哄的人群，革命歌声传遍了大院，我也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这时，杨殷和几位同志从院子里面出来，他一见我就笑着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答后，他嘱咐我等着他，就匆匆出门去了。

在大门内外，堆满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长短枪枝、弹药。那里挤满了领枪的人群，一队队的工人赤卫队在领枪。施展正在按名单发枪，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挤了进去和他一起干。我们还把从铁路局收缴来的银元发给每人贰元作零用。

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就是中午了。杨殷派通讯员来叫

我到楼上去，刚巧黄平民走过来，我把发枪的工作交给他，就和通讯员上楼见杨殷了。他命我去高第街找老刘。我接受了任务，拔腿就跑。

走到门口，碰到一个小名叫亚菲（即覃坚）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象只小鸟，在总部飞来飞去，忙着于工作。她见了我，撒娇地说：“二姑，我很饿了，有什么东西给我吃？”我笑她是馋嘴猫，转身就朝高第街走去，通知了老刘同志。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大包蛋糕给亚菲，她高兴地和同志们分着吃。

这时，一个年青小伙子来找我和黄平民，把我们带到杨殷办公的地方。杨殷正站在办公桌前，一手拿着电话筒，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对着面前的地图凝思。旁边有三四个同志，都在等着他。

杨殷见了黄平民，就移开话筒说：“老黄，你立刻带三四个同志去贤思分局，那里是真空。不过，要警惕敌人的诡计。”黄平民接受了任务，飞奔目的地去了。接着，杨殷又对我说：“少棠，你也去，叫黄平民注意，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后门和后路，以防万一。”杨殷的周密部署，使我暗暗敬佩。

到了贤思分局，黄平民和四位同志已经在那里收拾环境了。那座楼很宽敞，有很多房间，但里外空无一人，到处都乱糟糟的，有些房间只剩下一两件破烂的家具。我把杨殷的话对黄平民说了。随着逐个房，逐层楼地检查一遍。来到后座，从窗户向外望去，有一堵矮墙，翻过去就是横街，可以通外面马路。黄平民满意地对我说：“这里四通八达，一切都不错，请回去告诉大哥吧”（当时我们都喜欢称杨殷做大哥的）。于是，我又急步回苏维埃政府，向杨殷汇报了这一切。

十三日，敌人疯狂反扑，因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忍痛撤退了。广州起义的伟大红旗，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下离开了这座英雄城市，但是，广州起义的英雄业绩却深深地印在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心中。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我们的联络点——海味街十四号那幢房子，已被敌人烧成灰烬，我只好到亲戚家住了一宵，第二天即回西关丛桂路娘家居住。

路上我又遇见了亚菲姑娘。她挟着一包东西，我问她那是什么？她神秘地对我说：“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衣物，我一定要把它保藏起来，等待将来……。”我领会到那是起义时穿的衣服和红领带，这是一颗对革命多忠诚的心啊！为了她的安全，我叫她同我一起回家暂避。她推辞了说：“等胜利的一天，我再到你家作客去。”我们紧紧地握手而别。

按照杨殷的嘱咐，我把黄平民接到娘家暂避，全家大小都按我的嘱咐称他做表亲。我们生活得象一家人，没有引起过来家搜捕的敌人的怀疑。

过了十多天，外面风声缓和了，黄平民、三妹、她的女儿和我一行四人，随即到香港找党组织。到港后，我与省委交通部主任李沛群联络上了。他住在“人之初”凉茶店楼上。我也搬了进去，并以车缝衣服为职业，掩护地下交通工作，继续为革命而战斗着。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整理)

广州起义亲历记(节录)

薛尚实

一、参加青年赤卫队^①

那是十二月十一日早上。

靠中山公园旁边的老榕树下，有一座用木头搭起来的小巧玲珑的洋房，平时总有卫兵站岗，不许老百姓靠近。这天一清早，卫兵没有了，忽然从四面八方来了一大群妇女和一些人力车夫，有的拿刀，有的拿斧头，有的拿铁棍，奔向这座木洋房，劈的劈，砍的砍，不到一顿饭工夫，全部拆光。原来这座木洋房是黄绍竑的私产，他常带小老婆来这里住，夏天常来这里避暑，人民恨透国民党军阀，今天来把它拆得精光，出了怨气。

我正看得出神的时候，梁均钦从武装起来的青年学生队伍中走出来招呼我。他把我带到攻占了的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部，他就把昨晚的情况扼要地对我说：“听说上级原定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因临时发生两件事而提前行动。第一是小北有一间米店，是我们运送军火的一个联络站，昨天被保安队搜查，搜出步枪数十支、手榴弹两米箩，领导上怕因此误事，决定

^① 这是广州起义时共青团广州市委组织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武装队伍“青年赤卫队”。

先发制人。第二是郊区龙眼洞的农民自卫队召开会议，被公安局的眼线知道，公安局长朱晖日准备派保安大队去包围缴械，因此必须提前发动。昨晚我们在这里紧急集合，组成青年赤卫队，接着去打公安局，打了一个多钟头才把保安队缴械，朱阎王（指朱晖日）爬墙跑了，有两千多政治犯全部释放出来。以后我们被分配到观音山一带巡查，想不到就碰见你。”他接着说：“怎么样？你就参加我们这个队吧！”我表示同意，他立即向小队长汇报，并介绍我和小队长见面。小队长姓周，浙江人，瘦长个子，约二十三、四岁，我汇报了自己的简历，他听我说是上海大学的学生，还可以动员北京来的学生参加战斗，非常高兴。我立即回去找了陈廉官和候七两人一同参加青年赤卫队，由队里发给枪枝弹药和红领带，编入小队，成为队员。

我们小队共有十多人，大都是大、中学生。吃了早点，小队长吹哨集合，告诉我们：“现在大队部命令我们到大沙头布防，大家到达后，少数人站岗放哨，多数人好好休息，下午到中山公园开市民大会。我即去大队部汇报，由小队副老麦带队前往。”老麦率领我们跨上汽车前进。沿途听到长堤、十八甫方面和文德路一带不断有阵阵枪声。各马路口都有工人赤卫队持枪警戒，有的赤卫队率领居民挑水救火，秩序整然。途经原省市政府机关和各业工会所在地，屋顶上都插有红旗。特别是苏维埃政府（设在伪公安局原址）高楼上空的大红旗，临风飘扬，令人鼓舞。

我们到了大沙头原警察俱乐部，一面布岗放哨，一面进行清查，在后院铁门内查出步枪五百多支，多数可用。我们立刻派人报告总指挥部，很快派来卡车将枪支运走。约莫十点钟

光景，我们的小队长来了，传达上级命令要从我们小队调四个队员去参加工人赤卫队的编训工作，地点在惠爱中路芳草街口。我和三位同志去了。远远望见来报名参加工人赤卫队的人非常踊跃。他们按产业为单位集合，大家兴高采烈，又非常庄严肃穆，整整齐齐地站在太阳光下，等候编组。

总指挥部的代表讲话后，即开始编组，要我们帮助登记、编队，选小队长、中队长、发红领带和枪支、炸弹。参加编队的工人，以省港摆渡工人和码头苦力为最多，其次是手车夫（人力车夫，多是海陆丰人），还有榨油、金属、印刷和其他各种手工业人。编队按大队、中队、小队组成，编好队、选好队长才发武器，有的一个小队发几支枪，有的只发几颗炸弹，到末了，枪、弹发光只好不发。领到枪支的，集合起来，由教导团的战士教上子弹、瞄准、射击，领到炸弹的也分头教如何投掷。听说广九车站也在进行这项工作。编训后，我回青年赤卫队去。

我们刚走到惠爱中路，大队部来通知，要我们帮助明星电影院^①的宣传站做宣传工作。当时的宣传站设在大的戏院和中小学校里，宣传大纲、标语和口号由总指挥部统一颁发，红纸、红布是下令征用的。我们一进明星电影院，就看到许多男女学生和教师，写的写，画的画，非常紧张。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每条街上按照电灯杆的顺序挂上又长又宽的红布横幅，街旁墙壁上贴着一整张红纸只写一个字的标语、口号，非常整齐。

在十二月十一日天刚亮的时候，印务工会奉命将国民党

^① 明星电影院是起义时中共广州市委所在地。

的《民国日报》、《国民新闻》和《越华报》、《公评报》等报社查封。

二、镇压反革命

十二日一早，小队长叫我们集合，小声说：市内潜伏着不少反革命分子伺机蠢动，总指挥部决定立即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我随麦副队长率领的一部分人出发，到了一条小街，在一座整齐清洁、两楼两底的房子门前停下，叫开门，沈藻修夫妇还在梦中，我们冲开五道小门才把他抓住，送到苏维埃政府处理。路过我们队部集合点的门口，许多工人赤卫队员涌了上来，询问抓的是什么人？小队副高声说：“这是反革命分子沈藻修，是国民党市党部的清党委员、法院院长，是审判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伪法官，四·一二以来，不知有多少同志死在他的手里……”话还没有说完，一位海员赤卫队员气得高喊：“冚家铲^①，杀死他，替同志们报仇！”他边说边把沈藻修夫妇绑在电线杆上，开枪就打，另外还有几位赤卫队员也边骂边开枪，讨还了人民的一笔血债。接着小队副到队部写了一张布告：“枪毙国民党清党委员、屠杀工农学生的刽子手沈藻修一名。”一时市民围观的很多，莫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小队长带领一部分队员逮捕中山大学的反革命分子，也很顺利，梁展昌、张资江就擒后，随即解送苏维埃政府追查处理。当天晚上，苏维埃政府门前贴了一张大布告，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我们完成任务后，回到队部，积极准备在原警察俱乐部召

^① 即全家死光之意，广东俗话。

开全市青年代表会议,并在门前修理工事,防止敌人破坏。大家正在堆沙袋、砌砖块时,突然发现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棉布长衫、又高又胖的人低着头向西走。我们队里一位短小精悍的中山大学学生急忙端着枪赶上去,一面大声喊:“站住,不许动!”一面招呼大家抓反革命分子。原来这位中山大学学生认识这个人是在《民国日报》一个姓袁的总编辑,蒋介石叛变后,他一直写文章骂共产党,想不到在这里碰上,大家审问他是不是袁某某,他哑口无言,大家把他缚起来,一位队员拉开枪栓,子弹上膛,向他瞄准,他立即跪下,哀求饶命,并要求解送苏维埃政府处理。

十二点刚过,大门口开始有青年代表前来打听是否在此开会。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各单位代表来了一百多人。意想不到,苏联领事馆还派了一位国际青年代表前来出席。他一到会场,全体代表鼓掌欢迎。大家正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位主持人登上讲台,要大家静下来,接着说:今天下午全市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有许多青年代表到那里出席去了,不能到这里来;再则刚才得到情报,李福林部正集中兵力,在英、日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意图再次向我们进攻,凡是负责防守长堤的青年代表都要火速回去,因此宣布青年代表大会展期召开。这时那位国际青年朋友站起来,用中国话高喊:“同志们,布尔什维克万岁!”大家跟着鼓掌高呼:“布尔什维克万岁!”“广州苏维埃政府万岁!”代表们当即分散,我们小队仍坚守在原来的岗位上。(以下略)

(张脉奎整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二辑)

广州起义的片断回忆

张 罕 因

大革命时期，我在广西北流中学读书，受革命潮流洗礼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我被反动当局通缉，与黎寿彬辗转经香港到广州。我与梁乃全、黎寿彬一起寄居于芳园学旅。在那里，梁乃全逐渐把党、团的秘密文件给我看。梁乃全、黎寿彬、黎汉等同学都是共青团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他们到外边马路“散步”的时候，也把我带去。

十二月十日晚上，黎寿彬和黎汉从广雅中学来芳园学旅过夜。天还未亮，各处枪声大作，街上人声沸腾，时隐时伏。天刚亮，人声嘈杂，枪声越来越少，越来越远了。此时街上行人的脚步声，一阵比一阵急促，有人说：“广州暴动，广州暴动！”“啊！广州暴动了！”黎寿彬和黎汉很早就已出去，这时他俩满脸红光地回来说：“广州工人起义了，外面群情奋发，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他们又告诉我，参加起义的人，都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带，他们也给我一条，叫我系上，出去散发传单。他们给了我一批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文告、标语、传单，我便到街上去张贴。我从文告中知道：叶剑英率领的原第四军教导团学员，是红军的主力；参加起义的还有工人赤卫队。张太雷任苏维埃政府

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标语的内容有：

“拥护中国共产党！”

“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铲除苛捐杂税！”

“打倒豪绅地主！”

“打倒贪官污吏！”

“实行银行工矿企业国有化！”

“实行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男女平等！”

“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国家建友好关系！”

“同苏联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起义第二天，忽闻张太雷同志在汽车上中流弹牺牲，有如晴天霹雳，大家都感到悲痛难言。这时，我们接到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通知说，狡猾的敌人在脖子上系上红带，冒充起义人员进行反扑，命令我全体起义战士、赤卫队及有关人员，一律把红带系在右臂上。

起义第三天，因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被迫撤退。起义军撤离后，反动派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广州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和梁乃全、黎寿彬三人逃往香港，在香港住了二十多日。我们知道广西党组织号召大家回去开辟新基地，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广西。

我回到北流后，朱光（朱锡昂的侄儿，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从联络站到我处联系。一九二八年初（旧历十二月廿三日），朱锡昂召集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同志举行会议。到会者

有：朱锡昂、俞作豫、朱光、黄嘉谷、黎汉、黎寿彬、黎寿彭、容天、梁君怡等同志。会议由朱锡昂主持，首先为参加广州起义牺牲的同志默哀悼念，然后分配革命任务。

一九二九年，俞作豫带领一批同志参加了左右江、百色起义、

广州起义中的劳动童子团员

邝 六

我生长在南海县九区的一个农村里。哥哥邝少孚是中共南海县委委员，又是广三铁路工人武装纠察队的骨干。他常利用我年幼机灵，叫我给他送信、递文件。我无形中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义务通讯员。

清党前，南海县委在大镇南溪公祠的九区农会内设农校。县委委员李羽吉是农校的教师，我是农校的学生。我参加了李羽吉和姜英毅领导的劳动童子团，和邝铭、麦沃垣等在一起，经常参加农会组织的宣传、张贴标语、送信和联欢等活动。

广州起义前夕，我奉大兄邝少孚命，和二兄邝廉到龙溪联系，刚好遇到南海县县委委员谢颂雅从花地带来广州市委关于广州暴动的紧急指示。他在工农赤卫队负责宣传工作，他动员我们连夜写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肃清反革命派！”、“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我们自己的政府！”、“耕者有其田！”等等。当晚，在谢颂雅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工农赤卫队员和劳动童子团团员，趁着黑夜，沿着广三铁路，把标语贴在电杆上、墙壁上和站台上，一直由石围塘贴到接近佛山的铁路线上。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爆发后，属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

的市郊工农赤卫队，解放了芳村、秀水、石围塘一带。我和劳动童子团的同志，扛着红旗，唱着“先有马克思，后有列宁者，头颅虽小血自热，心肝虽小胆不惊，前进！前进！……”的《农民劳动童子团歌》，随着赤卫队分赴各村宣传。

“四·一五”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广三铁路工人曾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与三眼桥等地的反动民团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何树佳、陈志荣、梁通、邝少孚、何纯、刘赞等铁路骨干开着铁甲车头冲过封锁线，会合在大范的同志转到木寮村坚持地下斗争。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成立后，联队长是徐向前同志，和徐向前同志一起指挥第六联队的是赵自选同志。赵自选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又是南海县农军模范总队队长。他亲自按军队的编制把市郊工农赤卫队组织起来。该队由周侠生当团长，陈道舟任政治指导员，黄谦任第一营营长，张霭泉任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由梁通兼任，谢颂雅负责宣传。还有省农民协会候补委员、农运特派员袁基，农运特派员罗京，南海县县委委员杜敬兰等同志分别在起义中指挥队伍战斗。因此，起义枪声打响后，芳村、花地等地都发生过战斗，大部分地区控制在工农赤卫队手中。从石围塘到广三铁路沿线的小站，都有我们的足迹。

可惜，建立了三天的广州苏维埃政权，在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合击下失败了。我们在石围塘的队伍，即转移到大沥圩会合，十三日深夜至十四日凌晨，我们正拟拔队北撤时，遭到伪县长李宝祥指挥四司反动头子陈凤臣、大沥圩四堡民团局长钟若愚和新九乡联团头子邝剑平等纠集的反动武装二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袭击大沥圩，敌我双方发生激战。由于

力量悬殊,工农赤卫队张霞泉、杜敬兰、陈道舟、周侠生等一百零四人壮烈牺牲。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整理)

省委羲皇台会议

李沛群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二时，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和谭达（他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洋务工会劳动童子团负责人）在仁济路口码头上了往香港的“播宝”号轮船。在码头，我被一群反动军警由头到脚搜查一遍，亲眼看见一批批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战友被反动派押上西濠口。不一会，就传来高呼“共产党万岁！”和《国际歌》歌声，随着一阵枪声，我们的同志又牺牲了。上船后，又被搜查了六次，最后一次是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工贼李德轩带领）搜的。每搜查一次，都有一批同志被捕，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当晚十时后，船到香港上岸，又遭到港英警察、帮办、买办、工贼的检查。凡形迹可疑的人，都被关押在差馆，第二天即押送回广州，交给反动派杀害。我是在谭达的掩护下安全脱险的。

在香港，碰到不少参加过起义的战友，我把身上仅有的钱给了他们，就回省委去。在省委机关里，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一片愁云，大家都在思念着自己的战友；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有些同志生死未卜……。听说十四至十七日，敌人的屠杀更野蛮，杀了几千人，手车工人牺

牲得最多,有些中队能幸存下来的人不多,我听到这些消息真是心如刀割一样。十八日以后,来港的人越来越多,食宿也成问题。这时,省委的领导人已陆续回到机关。我们见到了沈青(即沈厚堃)和庞子谦,都为死里逃生而高兴,但提起石喜、冯苏等同志的牺牲,眼泪又忍不住夺眶而出。

约在十二月下旬,省委在西环坚尼地城羲皇台二十三号四楼机关招待所召开了广州起义总结会议。招待所只有一厅一房,会议就在这二十多平方的房子里进行。参加会议的人除了省委委员外,在厅上还有沈青的助手庞子谦和陈宥同志。陈宥是搞军运的,可能是四川人。我是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而留在厅中等待省委决定的。在会议上的发言,声音清楚地传到厅来,陈宥怕我听不懂李立三的话,还在报纸上给我写了“血债血还”四个字。就在这时,我认识了范桂霞同志,她是招待所的管理人员。

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叫大家起立,为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默哀。我们坐在厅中的几个人也同时站起来默哀。

第一天会议,李立三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就批评黄平作为广州起义三人小组领导人之一,没有很好发动群众,致使许多工人不知道广州起义,甚至起义爆发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批评黄平不负责任,特别是张太雷同志牺牲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惊惶失措,撤退命令只通知武装部队,不通知工人赤卫队,以致工人赤卫队坚守阵地,弹尽援绝,牺牲惨重。黄平不服,据理力争,说自己在白色恐怖下做了不少工作。李立三很生气,拍台大骂说:“你还不肯承认错误,我以政治局候补委员

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你!”他俩一个批,一个顶,斗争异常激烈。末了,李立三还当场宣布:“我现在决定,撤销黄平的广州市委书记职务。”

当天晚上,沈青、罗登贤、黄谦和印务工人出身的王强亚四人联名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给李立三,指出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和领导人的错误。第二天李立三在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意见书,并为它叫好。于是,斗争锋芒就集中在黄平等身上了。

我在厅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发言,有一个工人出身的省委委员极气愤地骂说:“丢那妈,知识分子就是搵笨×!”另一个说:“你班知识分子,除沈青外,都是衰仔!”于是,会上掀起了一阵反知识分子风。后来,一个一直不大发言的工人委员说:“你们争什么,我不参加你们的政治辩论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第三天,会议还是激烈地进行着,但没有深入解决广州起义的问题。听说由于李立三采取惩办主义,主观从事,杨殷、周文雍、叶挺、陈郁等同志都没有充分发表意见,就作出了处分广州起义领导人的决定,并向中央报告。

会上还作出了立即设法收容广州起义人员的决定,动员在场的同志分头负责,给每个来港的同志每天发港币贰角,作为生活费,并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当时,来港避难的同志,有些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有些由亲戚的指引,飘洋过海,离开了祖国;有些在广州或乡下有家属的,待风声渐渐过了,又回到广州或内地来了。

约在省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在机关见到了庞子谦同志。我们谈到省委会议时,他告诉我说,在会议的第一天,

李立三批评黄平的错误时，指责黄平起义前不充分发动群众，知识分子气味十足，黄平不甘示弱，顽强地顶了回去，弄得李立三非常气愤，火气冲冲。此后，整个会场便很紧张。这时，恽代英同志起来发言，他首先承认了错误，并指出工作做得不够的地方和失败的原因，提出：“我们应把广州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好，向全党公布，让大家明瞭，从中吸取血的教训，学习更多的领导暴动经验，指导今后的工作……。”恽代英同志这种革命精神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使在座的同志深受感动，一致认为要向他学习。会议结束前，李立三宣布张善铭同志代理省委书记。会后李立三即启程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广州起义”的总结情况。

这里，我还要补充我所知道的张太雷同志牺牲的经过：在省委会议召开之前，我住在油麻地我的弟弟处，他是华人行抽纱公司的侍应生。我的住处成了一个联络点，中共香港市委有不少同志来我处了解参加广州起义后来港工友的情况。有一天，一位姓戴的同志和周颂年同志（香港市委组织部的）来我处时，金属业工会属下的汽车司机陈全也来了。陈全无意中谈起张太雷同志牺牲的事，我急忙问他：“你说什么？张太雷同志牺牲了？”他说：“是呀！我是为张太雷同志开小汽车的司机。十二号下午，西瓜园群众大会散后，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还有一位军事顾问和他的警卫员坐上小汽车，我开着车从西瓜园沿丰宁路进入惠爱路，朝维新路方向行驶，不料车子过了光孝街农工厅后，在油栏门至玛瑙巷（或××巷）附近，遇到一排保安队（或体育队）反动武装冲出来，他们见小车车头插着红旗，便进行截击，车子被打坏了。坐在南边的军事顾

问及其警卫员迅速向南边骑楼走去，倚柱掩护还击；坐在北边的张太雷同志及其警卫员从北边下去，首当其冲，身中数弹，重伤倒地。警卫员来不及还击，已中弹当场牺牲了。我跳到南边骑楼下掩蔽。在附近站岗的赤卫队同志闻声赶来，追击匪徒，同时找来了车，把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的遗体运往总指挥部。”他还说：“如果不是张太雷同志牺牲，广州起义恐怕不会失败得这么快。”在座的同志听了，都自觉地站起来默哀，纪念这位把生命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战士。

我大约又忙了一个星期，省委就通知我回广州搞收容工作。回到广州，市委书记麦裕成同志分配我到文德北路亲睦里四号东区区委会任组织委员。东区区委书记是黄鸾祥同志，宣传委员是曾国钧同志。市委交给我一份广州起义前党员的名单，我每天都按名单和地址逐家逐户寻找失散的革命同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困难，鼓励他们挺起胸膛，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洗劫的广州，群众都很害怕，收容工作在极端困难中进行着。没几天，周文雍、陈铁军同志被捕，“春季骚动”活动的传单又落在敌人手里，敌人顺藤摸瓜，致使正在参加市委召开的各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的全体同志被捕牺牲。其中有中区区委书记刘冠南、东区区委书记黄鸾祥。当夜，市委秘书处交通宋维静同志通知我走避。

由于市委被破获，我联系好的同志得不到组织的安排，我只好回香港向省委报告情况。从此，我又在省委的领导下，在漫漫的长夜中，迎着困难前进。

（谢燕章根据口述整理）

广州起义中的国际济难会

彭秋平

起义失败后，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反动军警岗哨林立，暗探密布，警车穿梭巡回，日夜挨户搜捕，奸细、叛徒（广州市公安局的所谓“高探”，就是这些叛徒的化身）四出，出卖同志。广州各区地下党组织多被破坏，未及撤出的共产党员和起义的革命工农兵群众，人数尚不少，如何把这些仍在难中的同志抢救出来，使之转危为安，广州国际济难会曾作过积极的工作。

国际济难会是国际性的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①它在广州的组织活动，开始于第一次大革命前后，“四·一五”清党后，有了新发展。它的组织与活动，当时是秘密的。我曾参加过其中的工作。国际济难会在广州的人员，我接触过的主要有日本人木村氏，印度人莫米丁教授，朝鲜人金昌溜（黄埔六期生）、越南人阮爱莲女医生等等，经常出面与我接谈业务的是木村氏及其助手静江子（女）。该站在广州市区原有十多个区站，由于叛徒出卖，相继被破坏，实际上开展活动的只有两

^① 据罗明同志反映：大革命时期，广州确有国际济难会组织，各省也有这个组织的机构。该会各机构的经费由第三国际拨给。

三个区站，而西关区站是仅存的最后一个。区站人员以“老广州”及社会关系多，对革命忠诚的人充当，都是义务职。关于经费，原则上是靠各国群众义捐筹募，但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各区站制订了紧急措施，经济上以就地自筹自给为主。从“四·一五”清党起，西关区站首先活动，中间曾一度停顿过，广州起义失败后又恢复了活动。我是西关区的主持人，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容广州起义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革命同志（包括国际人士），并引导其安全出关；二是接济在各监狱、集中营（南石头）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生活（用探监、递送衣服药物等方法联系）。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三个月中，我区站收容的人员有：警卫团未及撤出的刘博万（湖南人）、方奋德（广东惠阳人）、李克刚（湖南人）、陶铸的警卫员关胜（广东人）等十七人；地下党员邝伯衡（海南人）、彭义、彭辉（均海陆丰人），越南革命党人胡永福、阮敬民、余乃浩（均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此外，还有工人赤卫队队长黄拯民（高州人）、廖志（福建人）、工兵营王昆山、陈浩全（湖南人）等四十多人。所收容的人员都由我区供给衣物，发给路费，转移各地（有的去上海、广西、井冈山，有的去香港）。那时，我主要是靠父兄的经济支援，并利用他们在商业上的社会关系，经常化装，变换姓名，来往于香港、澳门、开平、台山、江门、三埠间，把一批又一批的受难革命同志掩护到安全地方去。还在南海县九江东方办了一间颇具规模的“秋萍”小学校（秋萍，是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改用的名字），以作收容所，由谭剑卿（黄埔军校学员）、邝伯衡主其事，并种菜、养鱼、养三鸟、养猪，为开辟给养地尽力。此种工作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

三月后，西关区站因叛徒告密，被揭发解体了。在济难会帮助下，我一度走避北海市，后在北海又被十九路军中的叛徒告密，逃回广州。同年五月，借日本河村井繁夫人惠津子的掩护逃到日本。我离开广州后，国际济难会在广州仅存的一个西关区站也最后结束了。

激流归大海

——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节录)

栗 裕

.....

十二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载《人民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广州的悲剧

——一个目睹者的记述

(苏)Б·А·波赫瓦林斯基

(Б·А·Похвалинский)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动身前往中国，担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蒋介石消灭了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人组织，从那时起，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轨道，它已变成争取从外国暴力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工农革命。也就是从那时起，工农的鲜血流成了河。

在其它一些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其中在广州，蒋介石的老战友李济琛于四月十五日也发动了类似的政变。他破坏了所有的工人工会组织，枪杀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把近一千人投入了监狱。

当我在五月份来到广州时，我未见到昔日革命广州的任何痕迹。广州的全部政权都掌握在军事专制者李济琛手里，他十分卖力地要将自己的反动计划进行到底，广州工人哪怕表现出一点点积极性，他都要予以根除。

当然，李济琛对工人阶级的这一背叛是不会加深他对一

个政权掌握在工人手里的国家的同情的。因此，我作为苏联代表，在广州的处境是不轻松的。李济琛一面对苏联领事保持表面上的礼节，然而同时，他为了阻挠领事馆工作，干了他所有能干的事：邮政和电报的军事检查官经常扣压领事馆的电报和信件；公安局不断迫害居住在广州的苏联公民；为苏联贸易机构的工作设置各种障碍，等等。

实际上，领事馆的全部工作都围绕设法解决和消除所有这些无理取闹和障碍而进行。但是，这一工作的结果并不大。

由于他们不断无理取闹，已经根本无法工作下去了。于是，我们被迫接连撤消了在广州的贸易机构（商务代表处、苏联商船队代办处、石油辛迪加办事处），而在八月，中国公安局又袭击并关闭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机构塔斯社。

飘扬在领事馆上空的红旗吸引了广州劳动人民，同时也使反动分子感到恐慌。他们仿佛觉得这面红旗是工人进行所有活动的罪恶之源。后来在十二月份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只是要找个合适的借口。

广州工人的起义便成了他们的这种借口，他们立即加以利用，但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说……

• • •

我是领事代表，当然只能作为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的旁观者，因此，不是所有的这次镇压的事实和场面我都很清楚，但即使我亲眼所见的一些东西就足够弄清发生的事件了。

我们的领事馆没有设在城里，而是在广州的城郊，在东山。我几乎每天都驱车进城，而且几乎每次进城都能在大街上碰到一队队士兵押着一批一批的工人赴刑场。这些行列在

广州已经司空见惯，大街上的人群几乎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这些押送行列都要到位于城郊，距东山和我们领事馆不远的西广场。有一次，我从城里回来时，又碰上了这么一队人，当时他们正在广场上。我停下汽车，跟着一小帮偶然路过的人一起跑去观看杀人的场面。我所见到的景况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被带到广场上的，从服装来看，是三名工人，两名知识分子，可能是两名学生。他们被反绑着双手，两眼发呆，蹒跚地走着，押送队不时用枪托推他们。他们被带到广场边上，在一个不大的小土岗附近停下来，面朝土岗，接着又被人们一推而跪了下来。在后边，五个士兵立即站好了队，甚至好象没等下命令就举枪朝跪着的几个人开了火。他们都倒了下来。有两个人一动不动了，有两个人向前倒下之后，又转过身来，开始抽搐，第五个人大声地喊叫着，想站起来。又打了三枪，那后两个人便一动不动了，然而第五个人翻过身以后，手和头仍在抽搐。这时一个军官走到他跟前，用手枪第三次向他开了枪。但打完之后，他仍然活着，眼皮一眨一眨的。但这个军官没有再耗费子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安然地带进了城……。广场上留下了五具尸体，确切点说，是四具尸体和一个还在眨眼的人。我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很多人站在那儿，哀伤地垂下头。有几伙人热烈地聊了起来，而还有那么几个坏蛋一边看着弥留者的抽搐，一边放声大笑。我几乎箭步奔回汽车。我问开车的中国司机，那些尸体到底怎么办。他回答说，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就有死者的家属或者同志，他们现在就可以把尸体弄走……。我尔后再也不想到这个广场来了。尽管我们同过去一样，在大街上经常碰见一队一队无可幸免的同志。有时

被押送的有五、六个人，有时有十个人，时少时多，但从未少过三个人。广州的各家报纸，关于这些处决的消息一概不登，只是在大批处决的时候，香港的英国报纸才作为受人敬重的李济琛将军果断镇压赤色造反分子的例子报道一下。

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迫使工人们采取了对付行动。除了自己队伍内部的和地下的组织之外，出现了一些企图向特别残暴的将军讨还同志血债的暗杀小组。行动这样分散和耗费力量去追缉某一个将军，盖因广州的共产党遭到李济琛的破坏所至。一九二七年夏，广州的党几乎成了毫无战斗力的组织。这是有很多原因的，然而主要原因是党不善于开展四月十五日政变后应开展的工作，即地下工作。在那以前，党是公开活动的，党的所有组织都合法存在，然而一下子被迫转入地下，这方面还毫无经验，因而使组织遭到了瓦解。工人中建立了一些单干的敢死小组，尽管党曾加以阻止，但对一些将军，主要对李济琛，还是组织了几次暗杀。对李济琛共组织了三次暗杀，但都因技术不佳，准备不周，最后未能成功。据我所知，在总共那些次暗杀中，只成功了一次：杀死了一个广州特别残暴的警官。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使得反动派更加疯狂了，要是有一人参加了活动，上百名无辜工人要跟着吃苦头。

整个夏天和秋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工人的处境要求人们必须找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发地，积极地筹备反对刽子手的起义。诚然，共产党因遭破坏还未完全恢复过来，因而她未必能指望起义大获全胜，因为反动派还相当强大，工人的力量相当薄弱。但工人们不想再等了。每时每刻都有遭到逮捕和枪决的危险，已经陷入绝望境

地的工人，把参加起义看成是或者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不是反束着手，而是手拿着枪献身捐躯的唯一机会。

起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夜里爆发。早上三点左右，我们被步枪、机枪和大炮的猛烈射击声所惊醒，从那时起，枪炮声几乎三天未停。

起义持续了两天——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最初时在城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如果不算同白匪部队进行的激烈巷战的话，那么这两天里，整个广州都掌握在起义的工人手里。但是，逼进广州的反动政府军于十二月十二日夜里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没有触及领事馆。我已说过，我们都住在城边上，在城郊东山。起义一开始，我们立即与城里完全隔绝了。城里几乎每条街道上都在进行着战斗，步枪、机枪扫射不停；向广州进攻的反动军队不断用大炮轰击城市，城里各个地方都因此起了大火，但没有人去救，到十二月十一日晚，广州的上空一片火光。

根本谈不上我们有人还能进城。甚至那些想绕道广州数不胜数的偏僻小巷进城的中国雇员，由于穿行太危险，都被迫返回了东山。这样，我们只能听城里的消息，或者观看我们城边上的动静。平时一条繁华的中国街道从十二月十一日早上起便几乎空无一人了，偶尔有那么几个匆匆来去的过客，时而有端着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工人赤卫队的巡逻队走过。这两天大街上出现的几乎所有人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带。时而有满载武装赤卫队员的汽车进城出城。这些汽车显然是在匆忙

的起义过程中缴获的，都由一些毫无经验的司机驾驶。经常从我们旁边驶过的一些汽车只三个车轮有胶皮外带，而第四个轮子的铁车轮便辗压着马路，一路上轰轰作响。

一个生动的场面打破了这种单调的生活。第一天的下午，在距领事馆不远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武装工人。他们在那儿逗留了两个小时，后来，我们目睹的乱糟糟的这群人变成了武装部队。开始时举行了一个小集会，后来便开始了训练。很多工人显然是第一次拿枪。富有经验的同志教不懂枪法的人射击，然后他们用半小时的时间训练走步，训练完后，他们便排好队，扛着枪进城参加战斗去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未必还健在。

他们在从领事馆旁走过时，都摘下帽子，并高声喊着，向我们的旗帜致意。

到起义爆发时，在广州只剩下了一个苏联的机构——总领事馆，而且人数不多。

我们一直坚持工作的环境，恶劣而又充满敌意。起义之后，大家又为领事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起来。我们都不相信起义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广州外围的反动派的势力太强大了。他们迟早会攻进城里，当然，他们在那儿是不会放过报复他们所仇视的苏联领事馆的机会的。

但是，后果将是怎样的呢？在此前不久，也是这些国民党的将军们，关闭了我们在邻近省的长沙市的领事馆，驱逐了领事馆的全体人员。那么，在凶残的白匪攻进城后，广州的中国当局也极有可能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与我们断交并将我们

驱逐出境。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对将来的事情特别加以考虑。在起义的日子里，我们就面临着来自我们驻地的极为现实的危险。起义的中心在城里，起义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那里。而东山则是自己顾自己，因为旧的警察无影无踪了，巡逻队和载有赤卫队的汽车只白天偶尔来一来，而到了夜里，看不到任何警卫部队。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点，开始掠夺百姓。我们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被抢和被杀者的喊叫和哀号；每天夜里枪声都不断。

匪徒的不断袭击也威胁着领事馆。我们采取了自卫措施。我和家眷、副领事哈西斯(Хассис)、秘书乌科洛夫(Уколов)及家眷都住在领事馆。其他的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楼里。后来他们丢下了自己的房间，也搬进了领事馆。我们都用一些武器武装了起来——有的人配备有勃朗宁手枪，有的人随身领着斗犬，有一个同志甚至找到了一支大毛瑟枪。夜里，我们轮班站岗。

幸运的是我们躲过了这个危险，到十二月十三日晚，我们一切平安无事。

十二月十二日夜里，在将近十三日拂晓时，枪声渐渐稀疏了，革命队伍撤出了广州。

十二月十三日早上，有几个小时，全城死一般地寂静，大街上空无一人，后来又断断续续响起了枪声。

快到九点时，出现了几伙赤卫队员，他们都在往城外跑，跑散了之后，便藏进了附近的山冈里。

早上十点左右，一大队正规部队，经过领事馆，从东山向

城里开去。每个士兵都系着白领带，这清楚地说明了起义的命运。

他们走过之后，东山的各条街道立刻热闹起来，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出现了，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脖子上都系着白领带。

我们一直在注意着这帮人。我们看着这些人被编成了队伍，但这只是白匪队伍。他们跑向城里，去参加那里进行的可怕的屠杀。

关于城里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几乎就在领事馆前边，一伙系白领带的人抓住了一名未来得及或者不愿摘下自己的红领带的工人。他们把他捆了起来，一直殴打他，并在领事馆对面的大街上把他枪杀了。整个下午还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这三具尸体就这样在我们附近整整放了一天。

情况已经很清楚，我们只好等着，不知究竟怎样处治我们。作为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积极开展活动。在东山驻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所有这些外国人在起义的第一天就乘一艘英国炮艇从东山逃到了沙面^①。毋庸置疑，我们谁也没有敢想用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我们苏联的代表们跟英国炮艇本来走的就不是一条路，我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在起义的日子里，枪林弹雨把我们与城里隔绝了，而在十三日，我们便被一伙警察和士兵更严密地包围了。我们立刻就确信了这一点，因为白匪军队开过去之后，我们的一个中国

^① 沙面是东山对面城边的一个岛屿，是英国和法国在广州的租界。从东山到沙面，可以穿过城里，也可以走水路。——原注

雇员鲁同志想从领事馆出去一趟。但半小时后他又返了回来并说，哪儿也走不了了，因为我们已被监视而且四面都被把守住了。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慌，因为我们已预料到这一点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同时，这使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们除了象过去一样闭门不出和等待以外，毫无别的办法。

不言而喻，大家的情绪都很低沉，但应当指出，情绪低沉的主要原因是想到起义遭到了失败，即将有大批人牺牲，而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担忧。

我们一直监视着大街上的情况，谈论当晚会有什么事，分派值班。

晚七点过后，大家如同平常一样，聚集到位于领事馆楼下的大饭厅里吃晚饭。

近八点左右，当我们还呆在饭厅里时，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里跑来，告诉说，我们已被士兵包围了。

我让同志们留在原地不动，然后迅速跑上楼，从阳台上可以清楚地望见我们楼房面朝着的两条大街。当时天已黑了，但我们可望见挤满了领事馆墙前两条大街的一大帮武装士兵。这时我想，显然会有出乎我们预料的别的什么事发生，但会是什么事呢？……

我迅速跑下楼，对同志们说，抵抗是毫无用处的。我大声命令工作人员波波夫（Полов）同志将事先准备好的国家秘密文件烧毁，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然后我自己同刚才提到的那个姓鲁的（他掌握着大门的钥匙）朝院子外的大门走去。

一帮武装士兵在有栅栏的大门外发疯似地狂呼乱叫。懂英文的鲁翻译说，这些人要求开开大门。我企图通过鲁同志同站在门外的一个军官说说话，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胡喊乱叫、已瞄准的手枪和让开门的命令。我估计文件应该烧完了，于是就让鲁同志打开大门。

人群狂呼乱叫地一涌而至。他们抓住我，进行了搜身，把兜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去，然后把手绑上了。他们摘下了我的眼镜，这样，就把我彻底缴了械，因为我看不见都在领事馆里搞什么名堂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大街上，把我靠在对面的墙上，周围清出了一块地方；一队士兵按照命令，把枪对准了我。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假枪毙。原来，这是防止我“逃跑”的一种方法。他们把被绑起来的鲁同志带到了我跟前，跟我挨着。鲁同志坦然地把士兵的喊叫翻译出来给我听，说他们现在要把我们都枪毙。楼房里传出了喊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把其他的同志往出带，一个个都被绑了起来。乌科洛娃(Уколова)和我的妻子都怀抱着孩子，但也被连孩子一起绑了起来。他们让我们在墙边呆了不一会儿，接着把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地绑了起来，把我们一对一对拴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

我们走了不一会儿，在距领事馆半俄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我以前谈到的那个西大广场。曾和我拴在一起的鲁同志把士兵们的谈话又翻译给我，说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广场枪毙。的确，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带进一个通往人所共知的广场的小胡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前往广场。这个广场周围有很多军事机关——各司令部、营房。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楼前，后来才知

道，这是一个师部。在这个师部附近，我们俩被松了绑，然后他们又开始给每个人都松了绑，但这只是为了用从师部里专门拿出的绳子来替代在领事馆绑我们的士兵的宽腰带。他们绑得很紧，将两手深深地向后背了过去，但我和死去的伊万诺夫（Иванов）同志特别“幸运”。我们俩最先被绑起来并被带到师部的前厅。一个当官的走到我们跟前，摸了摸我们的绳子，觉得我们绑得太松。他踢了绑我们的那个士兵一脚，命令另一个士兵重绑。双手刺骨的疼痛表明，这个士兵极认真地执行了命令。

其他的同志逃过了这种“考试”，相比较来说，他们被绑得“合乎人情”。所有的人都被带到了前厅。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几乎占了整个第一层楼。在入口的对面是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半圆形一俄尺高的类似舞台的东西。我们都被带到这个高台子上，并开始猛撞我们，让我们坐到这栅栏前，背朝着房间，然后把余下的绳子头拴在栅栏上，同时用绳子在我们的胸脯上紧紧捆了几道。接着又紧紧地，令人疼痛难忍地把每个人的双脚捆了起来。除此之外，有几个人（所有的中国人、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和波波夫）被在脖子上重捆了几道绳子，把头紧紧拴到栅栏上，这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乌科洛娃和我的妻子例外：她们都被捆到臂下，两手能自由活动，以便她们能抱孩子；孩子这次没有挨绑。但因此，当场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受的事。在我的妻子坐下并被绑到栅栏上以后，孩子被狠狠地扔到她的膝盖上。但受了惊的小女孩跳了起来，朝一个军官挥舞着小手并喊叫起来。这个军官跑到她跟前，拽起她的头发，使劲地要把她扔到地板上。妻子猛然大叫了

一声。这个军官，显然为了惩罚，把她的双手向栅栏伸平，并紧紧捆上了。她就这样象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度过了一夜。已经吓呆了的孩子爬到母亲跟前，躺在了她的膝盖上。兽性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小女孩整个晚上都很“安宁”。

此外，还给我们派来了六个人的岗哨，那个管事的军官还从一个士兵手里拿起一支步枪，面带表情地向岗哨交待如果我们想“逃跑”应怎样干掉我们。

在这里，在栅栏旁边，我第一次看了看并数了数有谁跟我在一起。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几乎都在这儿：副领事А·И·哈西斯、秘书В·А·乌科洛夫、密码译员Ф·И·波波夫、翻译П·П·马卡罗夫、办事员К·С·伊万诺夫、打字员Н·М·库丽奇兹卡娅(Кульчицкая)、我的妻子А·Д·波赫瓦林斯卡娅(Похвалинская)、五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Светлана)、乌科洛夫的妻子М·Н·乌科洛娃(Уколова)及两岁的女儿埃拉(Элла)，还有二等秘书Г·М·别尔曼(Берман)的妻子。

在这里的中国人有提到的那个姓鲁的更夫、领事馆的信使阿瓦、姓罗的花工、王厨师、厨师的助手，姓邢的十一岁小孩、我女儿的保姆王。

在袭击期间，领事馆里还有十一个中国雇员，七个男的，四个女的。这些同志的命运我现在也不清楚；同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同我们一起带来。可能是把他们留下当向导和搬东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把他们枪毙了。

把我们捆到栅栏上不久，人们就开始从领事馆往前厅搬东西，有公家的，也有我们私人的。那些能够转头并不象我

那样眼神不好的同志看见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东西，从写字台到孩子玩的洋娃娃和留声机都搬来了。留声机当场就打开了，在这座司令部的楼房里，整整一夜未断歌声和美国孤步舞曲。

我们坐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帮军官走到我们面前，通过马卡罗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要求，要我说出领事馆里有多少钱。我回答说，不放开我们，我什么也不说。这几个军官提高了声调，威胁着要我回答。

我的同志们，主要是些妇女，被发生的这一切吓坏了，害怕会有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都向我喊道：“您说吧，B. A. ① 您说吧！他们会折磨您的。”还没等回答，这几个中国人就走了。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人，要我交出开保险柜的钥匙。这简直是侮辱人，因为我们已经被仔细搜了五遍身，我们所有的能拿的东西都被拿走了。他们命令再一次搜我的身，最后将我的鞋和袜子都脱了下来。

此后整整一夜里，一伙一伙的军官和士兵不时地到我们这儿来，笑嘻嘻地看看我们，然后又离开。

由于疼痛，我经常失去知觉，而在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通过我们这儿的中国人向他们提要求，要求能来个管事的人，以便谈判，但他们只是一笑了之。

我们就这样整整坐了一夜。

手越来越疼，难以忍受到了发狂的地步。我们坐下后大约过了两小时，我们便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了。可能大家都有

① B·A·是本文作者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译注

这样的想法：可别呻吟和叫喊，以免再让刽子手开心取乐。当有人支持不住并开始呻吟的时候，我们不时地彼此传递一些振奋人心的话。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力气，身体最好，但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被捆得最紧的伊万诺夫同志在天快亮时也支持不住了。由于疼痛，他不时地几乎大声吼叫。

对我自己的情况我还记得，我当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忍着疼痛未作声。我一直出冷汗。由于疼痛，我不时失去知觉，也由于疼痛，又不断苏醒过来。我当时用头撞击铁栅栏，以使用另一处的疼痛多少减轻手上的剧痛。被紧紧捆绑的双手都浮肿并麻木了。每当恢复知觉的时候，都害怕手会萎缩。当时已深深感到自己不仅两手，还有自己的生命肯定完蛋了。当时也顾不得鼓起勇气，克制剧痛，活动手指，以便加强血液循环了。我根本不记得后半夜是怎么度过的。我醒过来的时候已是早上了。当时天已大亮，已快到早上八点了。根据同我们坐在一起的中国人的请求，岗哨开始把我们一个个松绑并带往厕所。

在这时，手上的疼痛好象减轻了，可是我的双手已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一个士兵给我松开绑以后，我只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站了起来并好不容易才站住。双手发青，肿得吓人，绳子捆的地方起了大水泡。显然，这些水泡的痕迹长久留了下来。此后，我很长时间抬不起胳膊，手指尖失去了触觉的能力。

从厕所回来之后，又让我们坐到老地方，但捆得松了一些，只捆到胳膊。双手都能自己活动，就这样，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的折磨结束了。

在这里，我又开始要求每个走到我们跟前来的军官做出解释。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谁也不想与我们交谈。

终于在十点左右，一帮军官走到我们跟前，其中一个穿上校军服的领头的操着英文让我们向他通报我们的姓名。

我为有这个机会感到高兴，当即向他表示抗议，要求他做出解释。这个上校非常客气地回答说，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姓名，跟我们谈谈。我们都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们把我们都记下来后，都转身走了；而对我的呼吁，那个上校只一挥手就了事了。

又过了近两个小时。

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那帮军官又来了，还是由那个上校率领，并带了一大队配带手枪的士兵。

这个上校的客气劲儿荡然无存了。他粗鲁地说他现在就点名，要求我们都要答应。

他以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声调第一个点了哈西斯同志的名——“哈西斯先生”。接着一些士兵向哈西斯扑来，把他从栅栏上解下，将他的双手反捆上了。

然后，还是这个军官依次点了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小孩的名。

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说：“您是总领事吗？”不 等我回答，他接着就走了。离我不远坐着的阿瓦对我说，他们几个人是被拉出去枪毙的。其他几名中国人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个上校听到这个之后，向我走来，安慰说：“不，不，没这回事。”

但这次残暴解人的整个情况证实了中国人的话。此时此

刻，我相信我也会被带走的。我把女儿叫来（她从早上起已经被允许在我们之间来回走了），让她亲亲我，我当时想，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她了。但令我十分惊奇的是，我留了下来。

但这时把最后一个中国人松了绑，连推带搡，粗暴地把这些人都带走了。人们这才明白，他们是要把我们分开，大家开始争相互道永别。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很好，很坚强。除了通常的令人不安的“永别了，同志们”这些话以外，乌科洛夫还向妻子大声喊道：“你要把女儿培养成苏维埃公民。”马卡罗夫喊道：“留下来的同志们，请你们把我们的名字传下去。”哈西斯唱起了《国际歌》，其他人也不合谐地跟着他唱了起来，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他们被拉出去枪毙是肯定无疑的。但被拉走的人的妻子和孩子都同我一起留了下来。这样，我不得不劝说她们，说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只是把这些同志关进监狱。她们相信并安静下来了，可能是她们都想相信……。

同志们都被枪杀了，我对这一点并不怀疑。但是怎样被枪杀的呢？开始时我认为他们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枪杀的，因为在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听见了几阵排枪响。

但我在被释放后才得知，原来，这几阵排枪声是当着俄国同志的面枪杀我们的中国雇员鲁、阿瓦、罗、姓王的妇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枪声。

而那些俄国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他们身背这些牌子被带往城里。大街上一帮被起义惹怒并吓坏了的商贩欣然响应牌子上的号召：一路上尽

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向他们身上吐唾沫等等。

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①，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②……。

留下的人——我、四个妇女、两个孩子——的境况毫无变化。我们仍被绑着坐到了栅栏旁边。只是看守我们的减少到了两个人。孩子们围着我们跑来跑去，要吃要喝。岗哨显然猜到了这一点，给我们拿来了水和饭。我们喂饱了孩子，自己当然什么也不想吃。

下午五点左右，那个手枪队又来了，只是由另外一个军官率领。他们又把我们 from 栅栏上解下，将我们的双手使劲儿地反绑了起来。我们被从司令部带往广场。这时又出现了解走那些同志时出现的那种场面；我们都肯定相信我们也是被拉出去枪毙的。几个妇女哭了起来。原来并非如此。一辆领事馆的汽车意想不到地开来了，车上挂着中国旗。我们都被弄上车，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来个手枪队员坐上了汽车和汽车的踏板。我们每个人，其中包括孩子，胸口都对着手枪。司机

① 一俄里等于 1.06 公里。——译注

② 根据(苏)Г·М·鲍罗瓦娅 1966 年在《亚非人民》第 3 期上所写的《在革命的广州——纪念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同志》一文回忆，这五位苏联同志是在 1927 年 12 月 14 日被枪杀的。她是在离开中国广州上轮船时从中国报童手中买的报上看到了被杀害的五位苏联同志的照片，上面用英文记载了上述时间。

旁边坐着一个机枪手，手里握着的那挺机枪一直对着我们。他们带我们穿过了全城。

在车上，我目睹了大火带来的巨大破坏：我们几乎是在被彻底烧焦的废墟中行驶。据中国官方统计，在这三天中，有一千七百所房子被烧毁。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驶往城外的满载尸体的平板马车。在大街的街面和人行道上，还有很多未被清走的尸体。毫不奇怪，仅在第一周里，在广州的大街上遭枪杀和在广场上被处死的就有二千多人。

我们被带到另一个设在码头上的司令部，七个人都被安置在司令部后院一个四步见方，臭气薰天、半明半暗的斗室里。旁边就是一个中国厕所，脏得不得了。我们在这个脏不可及、气味难闻的斗室里坐了五天。由于有蚊子，几乎无法睡觉。每天夜里都安排值班，而且值班者还要为睡觉者驱赶蚊子。此外，天已冷了起来，而我们都穿得很单薄，因为十二月十三日那天非常暖和。

每天给我们吃的是米饭和白水，有时还给茶。吃的东西简直难以下咽。

真是奇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没一个人生病。

十二月十八日，我们又转到另一个房间，就在这个司令部的三层楼上。这个房间稍大和明亮一些，有铺板和被子。只是吃的更差了。在下边时，我们显然距厨房不远，因而能按时给饭。而在上边，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完全听任岗哨的。有一些当班的给拿吃的，有一些则不给拿，有时我们就没吃没喝地干坐着。当然，孩子们对此反应更大一些，他们大叫着：“我

要吃的，我要喝水。”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折磨。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美国电影公司的代表在一些中国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要求允许给我们拍照。为了能尽量把关于我们的情况的消息报道出去，我同意了拍照。我当时想同他们俩谈谈，他们也愿意交谈，但那几个中国人打断了谈话，提醒他俩说，允许他俩见我们只是为了拍照。

十二月二十四日，德国驻广州总领事克鲁尔先生(Круль)在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朱兆兴(音译)的陪同下来了。克鲁尔说苏联政府已请求德国采取可能的措施保护我们，他就是受本国政府的委托前来了解我们的境况和我们的要求的。他通报说，中国当局已向他许了诺，要把我们从司令部转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在那儿可以经常见面，他可以向我们提供必要的物品。而为了到这个司令部来，他奔走了四天。

参加见面的朱补充说，我们转移的事已被批准，我们将于明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转到外交部驻地去。

在同克鲁尔的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外边的一些新消息，特别是我们与南方政府断交的消息。在克鲁尔和朱离开的时候，朱又一次重申，他明天上午十点钟亲自来把我们接到他那儿去。

当我把这次谈话传达给我的那些同伴们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即将时来运转了。

已经近夜里十点了。我们怀着新的感受开始躺下睡觉，孩子们都已躺下了。

突然一大队士兵在一个显然喝醉了酒的军官的指挥下闯进了我们屋里。他让我们立即出去。我们大家当时的心情难

于言表。我们不由自主地把这次突然夜里解人同几小时前刚刚听到的明天转到好地方的许诺进行了对比。

我们猜想可能是军事当局决定消除我们的存在给他们带来的不安,消灭我们,用这种方法使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可能惹怒了他们的德国总领事,承认既成事实。

有一个特征更证实了这个想法。一个妇女想随身带上被子,但那个军官粗鲁地夺了下来,让就穿着那一身走。

受惊的孩子们哭叫不止,妇女们睁大了眼睛,面色苍白,这又出现了一个场面——神经系统跟十二月十三日时的不一样了。

尽管后来证实是我们错了,只不过是使用这种方法把我们司令部转移到公安局去,但抱定一死的人们的紧张心情仍未减缓。这可以说是一次心理枪决。

我们由两辆汽车带到了公安局,在这里,除了没有上绑绳外(这次没有绑我们),境况跟第一次几乎一模一样。开始时,我们在院子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四周围了一大帮好奇的、厚颜无耻的警察。

然后,我们还得受一次可怕的考验。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被带到公安局的拘留所,安置在一个小地窖里。我在文学作品里了解了这些地窖的情况并甚至见过地窖的照片,但我们对这些可怕的事,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类似半窑洞的地方,后面砌有结结实实的墙,墙的两侧是直立着的互相挨得不很紧凑的木桩,这些木桩把我们与其它一些这样的小屋子隔开了,前面是用木桩钉起来的栅栏,每个木桩相互间隔两米远。这个土窑的一个角上有一个“厕所”——一个粪便四溢的土坑,

在另一个角上，有一个圆木制的铺板。总而言之，我们原先在司令部的那个斗室比这个屋子要舒适。

此外，大老鼠各屋乱窜，将几名妇女都吓昏了。

还好，不断受这迁移之惊的孩子们很快就在大人怀里睡着了。而我们则整整坐和站了一夜，直到天亮。

差不多直到中午，我们才被带到公安局的一间大屋子。在离开广州之前，我们一直呆在那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德国领事克鲁尔又来找我，说中国当局终于决定打发我们回国，说他现在就去打听回国的时间。

此后，他，或者他的助手每天都来给我们送物品、衣服和报纸。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明天早晨我们将乘轮船离开广州。

果真，十二月三十日早上，我们终于被从我们的监狱中带了出来，坐上一辆汽车，在一大帮警察的押送下，被拉到码头，在那儿作为旅客登上了载我们离开广州的轮船。

我们幸存者经受的这一可怕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 * *

我们要离开了，但我们把我们同志的尸体却留在了广州，留在了城外一个不知名的坑穴里。他们的尸体是同上千名中国工人的尸体一起被抛到那儿去的，以后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尸体，以供隆重安葬了。

但是，他们的牺牲并不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同志的鲜血在革命斗争中第一次染红了中国的土地，与中国工人流成河的鲜血汇合到了一起。

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当他们最后积蓄足够的力量，消灭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就会为自己的和为我们的牺牲者报仇。

我们的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我们今后将以极大的关怀和同情的心情关注中国劳动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英勇斗争。

（李辉译自《广州公社》一书，莫斯科 1967 年版）

Б·А·波赫瓦林斯基自广州回国后，于 1928 年 3 月 2 日向苏联《真理报》记者简略地介绍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遭袭击的情况，随后便写成此文，于 1928 年夏在莫斯科印成小册子出版发行。——译注

广州起义中牺牲的 五名苏联领事馆人员简历

阿·伊·哈西斯

阿勃拉姆·伊萨科维奇·哈西斯 (Абрам Исакович Хассис) 生于一八九四年, 一九一六年入党, 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 担任过几年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 后离开红军, 被派到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 一九二四年毕业。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 哈西斯同志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工作。一九二五年二月, 他被任命为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 尔后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秘书。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哈西斯同志被任命为驻广州副领事。

(《真理报》1927年12月22日)

В·А·乌科洛夫

……乌科洛夫(Уколов)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人运动。由于参加革命组织, 沙皇政府将他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勒那河。他历尽千辛万苦, 从勒那河逃到澳大利亚, 在那儿与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阿尔捷姆(Артем)]同志和其他侨居的同志一道积极参加了工人革命运动。乌科洛夫同志作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 在煤矿、码头和铁路上工作

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受到澳大利亚当局的迫害。在澳大利亚,乌科洛夫同志认真学习了英语。

十月革命成功后,乌科洛夫同志回到苏联。他返回祖国后,全身投入了革命工作。

国内战争期间,我们在北部方面军遇见了任军司令部负责人的乌科洛夫同志……。北部方面军撤消以后,乌科洛夫同志转到苏联其它国防方面军部队。国内战争接近尾声时,乌科洛夫同志最初转到劳动总局,尔后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他在战斗岗位上牺牲之前,一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广州的负责人……

(《真理报》1928年1月3日)

费·伊·波波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波波夫(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пов)于一八九六年出生在乌菲姆斯基省斯捷尔利塔马克县。他的一家都是庄稼人,他自己则当了一名木工。一九一九年,波波夫同志应征参加了红军,在各个战场上战斗了两年的时间。一九二〇年二月,波波夫同志入了党,复员后(一九二二年)立即开始在外交人员委员部任密码译员。一九二二年,波波夫同志被派到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处工作,在这里,在乌尔格(现在的乌兰巴托)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尔后,他被从蒙古调到苏联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处,在这里,他又被派到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担任密码译员。

(《真理报》1927年12月31日)

巴·巴·马卡罗夫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马卡罗夫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Макаров) 于一八九七年出生在顿河哥萨克家庭里，念完了实科中学。为了逃避白匪征兵，马卡罗夫同志当了水手(从一九一八年十月直到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九二三年，马卡罗夫前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满洲全权代表处担任翻译。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马卡罗夫同志转到广州。在这里，他由于精通中文，便在苏联领事馆担任翻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卡罗夫同志不是党员。

(《真理报》1928年12月31日)

康·谢·伊万诺夫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于一八九四年出生在弗拉基米尔省，农中毕业，一九一九年加入共产党，尔后应征加入红军技术兵部队。一九二一年复员之后，伊万诺夫开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任外交信使，一九二四年，被派往苏联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处。在这里，伊万诺夫同志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担任外交信使。一九二五年，他再次被派回外交人民委员部。同年六月一日，他被调到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起担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办事员……。

(《真理报》1927年12月31日)

(李辉译自《广州公社》一书，莫斯科1967年版)

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时谈朝鲜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问题

广州起义，也有朝鲜人参加，现在没有活着的。“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革命力量实行镇压，当时李济琛奉蒋介石之命，就在广州等地开始镇压。当时李济琛的势力在广东，所以由他负责。那时广州的黄埔军校有很多革命青年，其中朝鲜人有二百多；李济琛叛变革命后，当时汪精卫仍装着要革命，所以二百多朝鲜人都跑往武汉，我仍留在黄埔。以后在武汉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也有一百五十余名朝鲜同志参加。

当时汪精卫手下的军长张发奎，奉命攻占广州，他一到广东，李济琛就撤退。当时黄埔成立了特务营，有二百多人，其中朝鲜人一百五十多。广州起义时，黄埔特务营也参加了起义。

广州起义后，第一天我们胜利了，第二天部分地区被敌人攻占，当时张太雷同志在广州东山负责指挥，后来他的指挥所转移，张太雷同志在转移时中弹牺牲^①。

^① 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总指挥。十一日[※]晨，未攻占公安局前，指挥部设在东山警察分署，起义军攻占公安局后随即迁到公安局。张太雷是在十二日下午，到西瓜园广场参加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回总部途中，在惠爱西路附近被敌人袭击牺牲的。另一说是张太雷已回总部，得悉敌人反扑，即赴大北前线指挥，中弹牺牲。

广州起义时，上级指示黄埔特务营的任务是：监视反动武装，组织特务配合工人的活动。当时特务营共有三个连，我是第二连连长。特务营组织好后，上级又指示，不要这样分散力量，要集中去沙河，抵抗反动派的进攻。

参加特务营的一百五十余位朝鲜同志在起义后大部分牺牲了。据事后知悉，这一百五十余位朝鲜同志攻打沙河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在攻下之后，是就地不动，还是移动，不清楚，后为反动派包围，特务营的同志都牺牲了。这件事发生后第一天，我率特务营第二连又去攻占沙河，因情况不熟悉，进攻后，大部被敌人歼灭，因此到沙河的第三天就撤退了。广州起义的第三天，广州警卫团的主力亦被敌人歼灭，但还保存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后撤退到石龙。

（1963年6月8日）

越南革命者参加广州起义的情形

(节录)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黎国望、黎铁雄、冯志坚、陈文恭……等同志站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参加起义。其中如冯志坚同志,经过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市内的激烈战斗后,还到海陆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冯志坚同志曾经在海陆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职务,直接指挥一支庞大的游击队伍。

广州起义后,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同志和黄埔军校越南学员被捕者达二十四人,其中有胡松茂、黎维店、陈文恭(国英)……等同志。

(载《永生的人们》,越南文学院编,

1961年8月出版)

当时,我们八个少年参加了中国的少年先锋队,和“C. P.”、“C. Y.”共同工作。到街上呼口号,贴标语,发传单。赤卫队曾冲入大新公司(现在中山五路处)砸烂铁闸,把里面的饼干取出来分给贫民。我们少先队是把守门口的。当时,战斗最激烈的是惠福西路和长堤一带。

广州起义失败后,越南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有的

押在黄埔炮台,有的押在伪卫戍司令部,有的押在伪公安局。李自重和胡松茂同志和我被押在卫戍司令部的一个房间。我被囚禁了半年,因为是当小鬼队,年纪小,又是越南侨民,所以释放了。

那时,参加了广东革命运动牺牲的烈士有:方士雄(是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学员)。张云岭受伤(是赤卫队队长)。

(《越侨黄南谈话纪要》,1972年3月27日)

广州市处于白色恐怖下,敌人以清查户口为名,到处逮捕人。我们越南同志居住的东皋大道仁兴街五号、七号都受到严密的搜查。广州起义时有越籍三人:黎国望(现名黎铁雄,前驻朝鲜大使,已退休居河内)、刘国龙(在上海参加中共工作,被敌人围捕跳楼自杀)及季××(可能是季梦山)。他们都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在叶剑英团长领导的教导团工作。起义那天,他们三人全副武装,带着红领带回仁兴街,引起这条街的坏分子向公安警察密报,因此我们住地被包围,逮捕数人,后经过斗争,敌人又找不到凭证而释放。

广州起义后,越南的同志,在中共组织协助下,有八人秘密送往东江,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工农赤卫队武装斗争(因此时期东江赤卫队缺乏军事人员领导战斗)。他们都以别名,假借广东钦州籍贯,故无人知其系越南人。因白色恐怖笼罩羊城,我们越南爱国志士陆续离开穗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迁港,我被派往暹罗,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使人最为沉痛的,是当时黄埔军校在“清党”的幌子下杀害共产主义的理想者,不知多少无名英雄壮烈牺牲了!据从黄埔回来的越籍

学生告知,敌人血腥镇压不择手段,某日早操后借故“点名”,然后宣布:“凡是共产党员上前三步!”越籍青年学生三人勇敢地和中国共产党人排在一个行列,而被敌人带走!他们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为无名英雄而流泪!中越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越侨李存的回忆,1972年7月1日)

在广州起义中,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参加了赤卫队,晚上带枪回家,给反动派看见了,故起义失败后,伪警们包围了仁兴街十二号,搜查房屋,把我们的同志逮捕了十三人。敌人来之前半日,幸有打更的工人把反动派要来搜查的消息告诉我们,使我能把家中的共产党书籍和子弹、枪、红布等物收拾好。有十二人被反动派抓去坐牢,其中有的被押到越秀南分局,有的被押到现在的郊区分局。当时范文同和几个同志在仁兴街十三号学习,因敌人没有搜十三号,所以这四个同志没被捕。

(《越侨李芳德谈话纪要》,1972年3月29日)

广州起义时,听说越南也有好些人参加,具体是什么人不清楚。因他们不同朝鲜人,朝鲜人集中为一个连队,而越南人则是分散参加的。起义失败后,他们各自走散了,有的人跑去香港找胡志明。听说洪水^①、胡萍也参加了广州起义。

(《李沛群谈话纪要》,1972年5月20日)

① 洪水,越南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了海陆丰,以后又转到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曾参加长征。解放后回越南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冬，在白色恐怖下，反动政权大肆捕杀革命青年，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广州。越南革命同盟会组织成员亦全部被国民党逮捕。

因越南友人的受害引起广州市律师谢英伯的愤激，他驳斥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越南友人，恢复他们应有的自由。由于谢英伯正义有力地驳斥，越南友人获得释放，但越南革命组织成员被全部驱逐出境。此后越南革命同盟迁到香港九龙城，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杨谨的回忆，1972年6月19日）

八、有关广州起义的纪念、 评论、纪实文章

广州暴动前的准备 (广东通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罗 浮

统治阶级统治势力的动摇崩溃，工农民众革命情绪极端的高涨，这是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暴动的条件。只要领导工农民众的革命的党——共产党，在主观上有领导暴动的力量，这种暴动一定是很伟大而普遍的，足以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夺取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苏维埃。

广东自张、黄回粤后，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冲突，使统治势力不能在整个的统一的权力支配之下，而发生时时爆裂崩败的危机。这就是说，自张、黄回粤后，粤中的政权，即发生张、李争夺的暗礁。因张、李攘夺统治势力的冲突，使统治阶级的势力，日趋于根本动摇崩溃的危途。同时，张、李因政权的冲突，双方更都很积极的扩张实力，因扩张实力的欲求，于是更加紧的去剥削工农民众的血汗，以充扩张实力的饷需。于是各项的税捐，各色的纸币，便风起云涌的增加起来了。

当然，工农劳苦民众受到这种极端的剥削，虽然统治阶级用政治极大的压力，但是反抗的斗争，总是接连不断的兴起。何况广东的工农民众，是有长久历史的斗争。何况工农民众，是一致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坚决斗争。

广东统治阶级的力量之动摇崩溃，工农民众革命情绪之极端高涨，如是广东已具备有客观的暴动条件了；共产党，在张、李十一月十七日战争爆发以前，即决定以暴动手段，破坏广州敌人的武装势力，更以全省农民整个的暴动，解决全省的敌军，而建立广东工农兵的政权。即不然，至少亦须借此扫除广州的反动势力，并获得多少武装，以进行广州附近的农村革命。

张、李的冲突，竟于十一月十七日爆发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更因此而陷于混乱的局面之下。城市工人群众，对于经济斗争，恢复阶级工会，打工贼等的行动，也更急剧的作英勇的斗争。十八日即举行一盛大的示威运动，大会上通过下列八个决议：

一、国民党现在是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李济琛、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是在广东执行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现在张发奎、黄琪翔的所谓护党战争，即是与李济琛、黄绍竑争地盘的战争。我们必须打倒李济琛、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的军阀政权，工农兵暴动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

二、为要建立工农兵的革命的领导，由大会正式产生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

三、恢复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权，打倒工贼改组委员会，夺回各工会。直接行动争回各工会原有的利益条件。

四、拥护省港罢工，反抗国民党政府勾结省港帝国主义解散罢工，维持饭堂、宿舍，切实保障工友职业，津贴一律发现金。

五、释放四月十五日后一切政治犯。

六、实行八小时劳动，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参加工厂管理。

七、武装工农，恢复工人自卫队。

八、实力援助市郊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土地，铲除封建反革命基础。

大会以后，继之以游行，警察慑于群众的威武，丝毫不敢加以干涉，至中途适遇黄琪翔的一连炮队，工人大呼：“打倒李济琛”“打倒摧残工农的新军阀”“工农兵代表会万岁”等等口号；该队兵士不特不与工人为难，反深表同情于工人代表会，群众自动的开枪击毙改组会内反动分子一人，伤一人，军警始终未敢至会干涉。这个示威运动，群众之勇敢与群众之力量，一方引起广大民众的奋起，一方给张、黄一个巨大的威吓与打击。

在这示威运动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革命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与统治阶级势力的动摇和软弱，于是更证明在十七日事变前共产党决议之精确，认为广州目前固然是不能立即夺取政权，但积极准备及骚动以发动广大群众是必要的。因此共产党决定根据下列条件（自然不是要这些条件完全具备然后动作）实行广州暴动夺取政权：

一、积极发展群众的经济斗争，以至杀工贼改组委员，夺取工会一直达到最高点——工人自己起来暴动。

二、敌人的统治摇动，社会秩序，敌人已无力维持。

三、张、李战争，到最厉害的时候。

四、各地农民暴动起来与广州一致。

五、一般市民开始厌恶军阀战争，最低限度，不表示积极

反对我们。

现在再述及张、李战争爆发后之广东政治局面：

(甲)李(济琛)黄(绍竑)之积极准备反攻。黄绍竑军队已集中西江,十三师陈章甫在江门已宣布讨伐黄琪翔;江门、新会一带,计有三十七团云瀛桥,三十八团李务滋,三十九团陈章甫及补充团一团共四团;肇庆则有严博球、韩汉英、王友仁等三团;北江则桂军又想折路回桂,加厚西江兵力。其积极反攻之准备,无非想夺回广州,以建立更反动之政权。张(发奎)、黄(琪翔)已拼命派军赴西江御战,广州已非常空虚,只剩保安队千人,教导团一团、警卫团一团而已;张、黄目前正在积极招募新兵,以图维持市面之治安。

(乙)陈济棠之反张、黄。陈济棠在东江已独立,宣布讨伐张、黄,谓其勾结共党。现陈部已调往潮梅,汕头,非常空虚。

(丙)伍廷颺之宣布独立。俞作柏招抚北江桂军,只招得一个团长与营长,士卒则已逃散。伍廷颺等已宣布独立。

(丁)金融之紊乱。中行纸币在中山、汕头等处,已被陈章甫、陈济棠调空。广州纸币则日趋低落,商店不愿找钱,甚至一元纸币亦不肯找出。张发奎虽苦苦声明自己不是C.P.,并且三磕头向商人求在经济上帮助,但商人始终无圆满之表示,因此金融之紊乱,竟至不堪言状。

(戊)各方革命势力之浩大。海陆丰土地革命运动之日益扩大,更使紫金、五华、普宁各处有盛大之发展,农民革命运动之高涨,更增加城市工人斗争之剧急。故广州工人之抛掷炸弹,袭击工贼,示威游行(廿三、廿四日罢工工友大会运动维持罢工),散发传单等行动,无日不在扩大与发展之中。

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很显然的，统治阶级已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力量，同时工农革命的情绪，已至高度的狂热，即市民亦感到军阀混战之可厌。客观的情势，已指示暴动的必要，所以共产党即决定立即暴动。广州工人起来保卫广州，以抗李、黄军队之重入广州，同时推倒张、黄之反动统治，坚决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在未实行暴动以前，暴动的准备是必要而严重的工作。共产党是工农兵士群众的先锋队，自然不客气的担负起领导并准备暴动的重大责任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暴动战略，大约有底下几点：

（一）发展更广大的群众，由经济斗争示威游行以至于暴动。

（二）组织赤卫队，以作暴动的准备。

（三）加紧张发奎军队内部的工作，使敌人一部分的武装加入革命方面来。

（四）市郊农民暴动。

（五）海陆丰暴动，即向惠州方面移动，宝安、东莞亦同时动作。

共产党于此局面之下，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兵一致的起来为苏维埃而奋斗。

为扩大宣传，为发动群众起见，共产党并发出下列主要的口号：（一）武装工人抵抗李、黄；（二）组织赤卫军；（三）建立工农兵政权；（四）打倒李、黄、汪、张；（五）宣布黄琪翔、朱晖日死刑；（六）恢复广州工人代表会；（七）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权利而奋斗；（八）保护广州等。

以上所述的很足证明客观上已备有暴动的条件。以下再述主观上的力量。

“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这是共产党目前决定的策略与口号，而准备工农贫民兵士的武装暴动，打倒叛徒新军阀，尤为共产党领导群众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唯一出路。所以广东的共产党人，对于反军阀的战争与领导群众起来暴动的工作，是非常加紧而积极进行的。此时广东各地革命势力的状况，可简叙如下：

一、海陆丰因李汉魂与陈济棠之相持，对于民众的政权，简直无遑过问，同时工农群众亦极力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海陆丰的政权，落在工农的手中已逾一月。最近得海陆丰方面传来消息，工农民众的力量，更扩大而发展，捷胜城则于十八日被工农攻下，大杀豪绅地主，十九日回师，汕尾农民群众之表示热烈欢迎，为空前之热烈。廿一日所开武装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示威大会，到者十万人，更为空前之盛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十八日开盛大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决定：第一、决定分配土地标准；第二、选出苏维埃政府委员；第三、通过各种通电宣言；第四、通过尽力肃清反动势力，以及其他重要议决案。群众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琼崖方面，在乡村里，有极伟大的革命势力。琼崖的农民，多系佃农，对于没收土地是极端的接受与欢迎的，农民的武装，常备军则有千余人，而预备队则有数千人。敌人方面之武装势力，只黄寰球一千二百人，及民团三百余人而已。

三、普宁的农民，极为英勇，农民武装，计有四、五千，能立即集中者有千余人，最近又获有叶、贺遗下之水机关枪及其他

精利之快枪极多。群众的势力正准备着扩大运动，以与海陆丰连贯起来，并向邻县发展，以直趋潮、汕。

四、西江方面，工农群众的兴起，亦在一天扩大一天，现正在发展革命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使工农群众更加紧的发动，以与肇庆方面发生一贯的动作。并乘李、张战争紧急时，与肇庆共起夺取他们的武装。

总上的略述，广东在最近政治局面之下，在客观上统治阶级之混战崩溃，工农劳苦民众革命情绪之最高度的飞涨，以及城市商人之厌恶军阀战争与剥削，都造成了暴动条件之客观性；同时在工农及共产党，主观上有此相当之准备，伟大的暴动将很急的爆发，领导工农兵共同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势力，而坚决的英勇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载《布尔塞维克》第9期)

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霹雳一声，十二月十一日的早晨，广州工农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突然举行伟大的暴动，占领全广州市。

这次广州的暴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截至今日(十四日)为止，广州尚在革命势力的扩张和反革命势力的反攻，互相争持难分胜负的局面，——然而，不管广州市能保持着并伸张革命势力至全广东省乃至全中国，抑或不久即为反革命军队，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薛岳等重新占据，造成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但广州工农兵这次暴动，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则可断言的。

综观这二日各报所载关于这次暴动的消息，我们很快的就可看出几点最重大的意义：

第一，中国革命潮流确实是一天一天的高涨，中国革命确实是深入而扩大，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不是停顿。自从叶、贺革命军在广东东江溃败以来，一般反革命派都以为从此革命潮流趋于低落了，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及政客，就放胆互相混战起来，为瓜分地盘，争得剥削压迫工农贫民的权利。现在

广州的暴动，恰好就是事实的反驳这种错误的见解，而说明：不仅是农民暴动普遍于全中国各省，不仅是东江五六县农民组织苏维埃政府，实行分配土地，而且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也为工农兵暴动所占领，也成立了广东苏维埃政府——广东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这些而且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第二，广大群众自己的力量举行暴动，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不过成一种辅助的力量。以前大规模的暴动，不是完全拿有组织的军队为暴动的唯一武力，至少也是靠他为暴动的主力，这样自然近于军事投机，而减少了暴动之群众的意义。前次东江暴动，以武装农民为攻城的主力，而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则仅为辅助的武力，已经就纠正过去错误了；而这次广州暴动，则据报载参加的军队仅仅是第四军教导团中的三营，其余占领全广州市，抗拒反革命派反攻等，都是极广大的工农贫民群众自己的力量。这是真正“平民式”的，广大民众自动手的，非军事投机的暴动。

第三，这次暴动说明土地革命在中国革命中占何等重要的位置！广东本不是全国模范的产业工人区域，然而广东能够率先举起苏维埃的旗帜，其最重大的原因，就是广东大【批】农民群众之崛起。广东是农民运动历史最长久的区域，东江农民已经取得了土地，全广东农民亦正暴动起来，自【己】动手的分配土地；广东工农兵明明白白看见：唯有根本推翻豪绅地主的经济权力——中国的土地制度，然后【才】能完成中国革命，亦唯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国民党的统治，【然】后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形成了此次广州暴动之

惊人的力量。

第四，中国革命之最适宜的政权形式，只有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这次广州暴动中，显然是最群众的最适宜于指导暴动发展革命的政权形式。这种大城市的政权形式之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从此苏维埃将为全国暴动之政权的模范，这次广州暴动成功固不用说，即不幸而陷于失败，但苏维埃旗帜已经高擎起来，以数千或数万工农兵的血为此新的产儿洗礼了。

第五，豪绅资产阶级万不能以假改良政策欺骗群众了。张发奎、黄琪翔及其“党代表”汪精卫等，屡次欲以假改良政策欺骗全国工农贫民群众，极力表示他们与李济琛、蒋介石等不同；这次暴动起来，明显证明，广东的工农贫民群众绝对不受此假改良政策所欺骗，看汪精卫、张发奎等完全与其他的国民党军阀政客一样，一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全国的工农贫民当然也是这样的见解。反革命的国民党只好承认这种假改良政策是无用的了，所以公开的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公开的宣言“与各国联合共同反对第三国际”（投降于帝国主义）。

这次广州工农兵伟大的暴动，证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新战略是绝对正确的。这次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新战略之实行。是此次会议指出“目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是此次会议严厉纠正过去军事投机的错误，是此次会议决定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纲，是此次会议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是此次会议估定假改良政策之反动稳定毫无可能。这完全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能领导中国工农贫民革命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工农兵将继广州工农兵而起，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之统治，建立苏维埃中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载《布尔塞维克》第9期）

广州工农兵大暴动(广州通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志 明

国民党公开背叛革命后，他内部不断的分崩离析，正反映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曾稳定过，各派各系的新军阀都为争夺地盘互相冲突着，混战着，全国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局面。一般工农群众受地主资本家残酷的剥削，革命的情绪一天天提高起来。各地农民暴动相继爆发。

统治阶级自身的动摇、崩溃和被统治阶级的一天天革命化，是酿成民众大暴动的客观条件。广东省内自从新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等于上月十七日宣布“护党”，实行政变以后，统治阶级的势力更陷于纷乱和动摇的状态。一方面李济琛、黄绍竑为夺回广州的地盘，积极准备反攻，陈济棠、伍廷颺等也宣言反对张、黄，因之东、北、西三江都卷入战争的漩涡，而西江方面尤为吃紧，张发奎尽调其主力的军队赴西江应战，广州异常空虚，只剩下保安队和教导团等数千人留守；同时广州的金融又发生了恐慌，纸币低落，市面物价飞涨，但另一方面工农阶级的势力，都骤形浩大，张、黄等实行政变的第二天，广州的工人即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提出打倒李济琛、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等口号。海陆丰一带的农民也起来暴动，组织了

苏维埃政府，实行分配土地。凡此都表现统治阶级的统治势力已不能维持下去，而英勇的广东工农群众和工农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领导之下，突然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了反动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伟大的新纪元。

十二月十一日早晨三时许，先由一部分倾向革命的军队（教导团）发动，解除东郊莫雄部^①的枪械，四乡的农民即时蜂拥入城，和工人赤卫队一致进攻公安局，一时枪声四起，震动全市，到天明便把公安局占领了，于是打开狱门，释放囚犯，两千多被囚的工农也释放出来。其他各警区的保安队也都被缴械。邮、电、银行以及各重要行政机关一概落入工农手中。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逃往河南。经过一番血战后，李福林的军队也退到河南去。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铁路工人、海员、苦力、人力车夫和手工业者都随手武装起来，参加作战。广三、广九、粤汉三路的车站也被工人占据。印刷工人则占据了各报馆，改发《红旗日报》。马路上遍贴“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工农政府给工人衣食住”、“八小时工作”、“没收一切土地”、“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资本家和地主”、“打倒叛徒蒋介石、汪精卫、李济琛、张发奎”……等革命的标语。暴动的群众捶碎了统治阶级的所谓秩序。当天下午二时，在第一公园召集工农兵代表会^②，马上宣布广州苏维埃正式成立，为政治

① 当时莫雄部不是驻在东郊，而是驻在西郊陈家祠，该部也未被缴械。

② 此会因敌人进袭观音山，到会的群众都去参加增援观音山战斗，大会于次日在西瓜园广场举行。

上最高机关,委员多系工农分子,公布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取消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劳动并保障失业者,当押无条件交还贫民等,这样广州的政权完全转到工农阶级掌握中来。为保障此政权,便由这些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组织了新的工农革命军。

在仇视苏维埃这鲜红的旗帜之下,一切反革命军队联合起来,向图谋解放的工农群众反攻了。十二日李福林、朱晖日的军队渡河反攻,工农军奋勇应战,仍旧把他们击退。直到十三日,反革命的军队云集,把广州包围得水泄不通;晨五时,薛岳的军队由北路向观音山方面进攻;八时,李福林等的军队得帝国主义的援助,分四路渡河,向东堤、南堤、西堤、黄沙等处进攻;下午一时,西濠口一路工农军首先不支,同时薛岳军队已由北路攻入,直逼公安局,工农军知道不能死守,才冲出重围,暂时退出广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者当然同声庆祝他们重得胜利。

综观这次广州暴动,工农兵的政权虽未能持久,首尾只存在了三天,可是他给全国工农群众以新的希望,新的勇气,使他们从此更认识了政权的意义。何况广东省内各县的农民暴动继续在发展,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府正在渐次扩大;其他各省关于农民暴动的消息也纷纷传来。广州工农兵大暴动并没有失败!

固然,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是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中国人民谋解放的好友——苏联绝交了。广州的资产阶级、军阀严厉行白色恐怖,每天大批的枪杀共产党员、团员和工农,到现在被杀的已有六七千人之多,为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

世界上仅有的大屠杀。资产阶级残酷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但中国的工农阶级不会忘记这个，终有一天是要替这些死难的战士们复仇的！

(载《无产青年》第4期)

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

（一九二八年一月）

广州伟大的暴动，几万工农兵士群众参加的暴动，曾经创造中国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李福林等，得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侥幸战胜广州的苏维埃政府；这些军阀，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为保持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起见，竟大施屠杀，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五六天之中，杀死了五千七百多人。这些工友、农友以及革命的兵士，为拥护广州的苏维埃政府而死了，为拥护自己的政权而死了。但是，无论反革命派如何残杀，我们工农兵士的革命意志，是始终坚决的；我们号召全中国三万万余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积极诚恳的致敬礼于革命的先锋——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人的工、农、兵士，并且继续他们英勇的精神起来奋斗，不达到解放的目的，誓不中止！

（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悼张太雷同志

(一九二八年一月)

秋 白

张太雷同志死于广州暴动时反革命军阀的乱枪之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理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太雷同志，被反革命军阀的惨杀而死了！广州十二月十日晚上的暴动，负主要的指挥责任的是张太雷同志。当天晚上，革命的兵士进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解除广州反革命的炮兵营的武装，占领反革命政府的机关，十一日天明的时候，差不多全广州市已经完全为工人赤卫队所占领，反革命军队大半解除武装；成批的兵士群众，到工人赤卫队来投效。于是当天便开革命群众的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同志在暴动前之三四天，每天晚上亲自到革命兵士的秘密会议，去做报告，去组织他们。暴动胜利之后，他便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指定，提出于广州工农兵代表会，一致通过而被委任为军事平民委员长^①；又因选任的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苏兆征同志，尚在海丰未能赶到，由他暂代。他受共产党的指挥而组织广州的暴动，能够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极其

^① 即人民海陆军委员。

艰苦的工作。暴动的前后，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

十一日他便听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广州市赤卫队，极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和革命的群众猛力攻击长堤一带的反革命机关，并且极力要打过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灭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势力。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军舰及反革命的国民党军舰的阻挡，这历次的攻击始终没有成功。十二日晨，因为开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张太雷同志出席报告。这时候，李福林的军队，已经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在僻远处渡珠江，绕道广州北部来攻击。广州市内的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大半都开到北部去应战。所以敌人又能乘虚攻袭公安局——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等到张太雷同志从群众大会回到总指挥机关的时候，这机关已被敌人占领，敌人便用乱枪向他的车子射击。结果，太雷同志身中三枪，最后一枪中在心窝，胸膛炸裂而死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

虽然当时群众和赤卫队又重新将公安局夺回；但是十二日那天晚上，反革命军队已经战胜，革命的工农军不得不退出广州，到花县一带去。而张太雷同志瞑目的时候，广州暴动还没有完全失败呢。

张太雷生于一八九八年，他的家乡在江苏常州；他父亲是一个小商人，^①很早便死了。他那时还没有十岁。他的母亲一直是借债度日。他在这种困苦的家庭中，勉强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各种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起云涌的起来。张太雷就参加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① 太雷的父亲原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洗煤台任文牍。

以及后来共产党成立时之最初组织。他加入党之后，便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他曾经派赴莫斯科出席于共产国际之第三次大会。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时，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时，被任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一九二五年春即调往广州，与陈延年同志共同工作，担任《人民周刊》的编辑，同时帮助鲍罗庭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时，他被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紧急会议，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员会的书记。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

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载《布尔塞维克》第12期）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

——广州暴动周年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秋 白

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他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工农兵的暴动，成立了东亚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他是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反革命势力所摧残了，几千百的英勇的广州公社烈士被残杀了，中国革命的最好的领袖张太雷、周文雍等都成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工农群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都在纪念广州的烈士，都在继续广州公社的斗争。十二月十一日将要成为世界的革命纪念日，他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荣的一日。广东的广州，从此成了苏维埃革命的广州了！

一 苏维埃与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经过极迅速极猛烈的斗争，发动了极广大的群众——这一革命过程之中阶级分化的表演亦是非常之剧烈与迅速。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他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亦就同为他这两种任务而决定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参加，而为民族资产阶级所利用，这是一九二四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及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事实。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抵制仇货”，示威游行，无数次的学生会议，罢课罢市，一直到“五卅”的上海总同盟罢工，广东省港的大罢工，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的夺回英租界，他的发展是非常之猛烈的了，他的发动群众是极广大的了。但是，一般中国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自然要激起广大的农民斗争，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地主豪绅的政权与封建关系推翻之后，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基础方能彻底肃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及经济发展上是极深切的与地主豪绅相勾结的；因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深入，不但必然要转成土地革命之发展，并且不能不危害到民族资产阶级。此其一。其二，一般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在最初，当然中国资产阶级，甚至北洋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压迫之下的豪绅地主都会参加，都想利用的。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既然不能永久限于示威游行，抵货罢工，而必须汇合起来，组织成革命的中心，成立广泛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以至代表这种政治联盟的革命政府，于是即发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组织。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一）中国革命初发展时，有代表反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政治联盟之国民党及其政府；（二）中国革命的深入与发展之过程中，国民党或者成为工农势力独占的政治组织——政权形式，或者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独占的反革命政权之形式，因为当初广

泛的政治联盟，到此已不能不分化而至于完全破裂，豪绅资产阶级不能不反动了。

当武汉时代，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渐渐的由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变成了反革命的旗帜的时候，革命的群众虽然还在自发的斗争，但是，革命的指导机关已经动摇犹豫，不能率领群众斗争，以彻底打击反革命的势力。于是革命受着接连的巨大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沪、粤反动，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的武汉反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叶、贺失败。当这种时候，广州的工人，久经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一，首先提出鲜明的口号：“青天白色〔日〕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只有镰刀斧头的红色旗，是我们革命的旗帜。”（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的示威）

总之，国民党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变成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这是广州工人群众所明显的看到的了。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间英、日、美各国帝国主义决然的联合进攻中国革命之后，受着极巨大的压迫。因为，列强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势力，共同进攻革命势力，于是早迟不免叛变的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更快的投降反动，自己抢着做保障“外人生命财产”，维持“安宁秩序”的帝国主义统治之健将。反革命营垒之中，因为中国社会阶级的相互结合形势变更而增加了新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久已要想完全扑灭工农革命势力的地主豪绅性的国民党将军（李济琛起一直到唐生智），便大胆的攻击，公开的反动，将国民党完全变成反动的政党，先后宣布清党——开除一切革命的工农及共产党以及普通的革命分子。

中国的工农革命势力之伸张，促成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的工农群众已经将国民党相当的变成了群众的政治联盟，变成了特殊的政权形式。中国群众亦就不会轻易放弃国民党的旗帜的：他们从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政变之后，曾经经过无数次的英勇的斗争，要想将国民党最终的变成群众的革命的组织，要从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之中产生革命的群众独裁的新的政权。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暴动，实现了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同时，湖南、湖北等省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同样运用国民党的旗帜，事实上建立起工农民众的革命独裁——帝国主义与军阀资产阶级都惶恐失措的叫骂“这是第二政府”！这很明显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领导权之斗争。

上海暴动失败之后，无产阶级在力争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之中受着一次巨大的失败。沪、粤的反动使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激发更剧烈的斗争。当时广东五华、海陆丰的农民暴动起来，广州的广九、粤汉、广三铁路工人武装的反抗李济琛，以及武汉工农的积极赞助武汉政府镇压反革命，尤其是反蒋的斗争，这都是工农群众竭力保持革命胜利而要使革命深入的过程之中开辟新的前途。随后，武汉政府之下反动势力也进攻起来，那时，最明显的这种斗争，便是马夜事变之后，四方农军的十万扑城。这些斗争——上海暴动，广州反动后之工农武装反抗，马夜事变后之长沙扑城——虽然革命指导机关的策略并不明显，并无坚定的建立工农独裁的目标，但是，客观上群众的斗争是自发的向着这一道路进行：上海暴动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党形式之市民会议政府，广东的工农

武装反抗是以国民党工农讨逆军的名义要领导起武汉反对南京的革命战争，长沙扑城是农民答复许克祥解散湖南的国民党省政府之战争。工农群众自己斗争之中得来的胜利——是要占领国民党而形成工农独裁的新政权，这是他们斗争进一步的前途。直到南昌暴动，革命的旗帜仍旧是国民党，斗争的形式，仍旧是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争夺国民党，斗争的实质就是工农民权独裁与豪绅资产阶级反动之间的斗争。

可是，历史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斗争之中无产阶级是受着屡次的失败，每次斗争之后，革命势力客观上是往后退却。同时，国民党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他的旗帜已经被豪绅资产阶级所占领，而最终的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

于是广州暴动，便高高的举起苏维埃的旗帜。苏维埃旗帜的意义，便是证明中国革命中阶级分化的剧烈，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力量，完全变成赞助并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并且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剧烈和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都震恐失措，急急抛弃革命的旗帜，归降到反动营垒之中。苏维埃旗帜的出现于殖民地，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上反对封建的革命斗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能够实行；殖民地上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真正势力，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胜利，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群众的独裁政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不但是被白色恐怖所包办了，而且已经不能适合这种历史使命了。因此，苏维埃的旗帜便由广州暴动的工农兵所举起了。他指示东方各国受压迫与剥削的群众：最终的解放，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是可能的。

二 广州公社之英勇的斗争

中国工农群众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伟大的艰巨的斗争之中，自发的要争取政权。然而政治上的目标是不十分明显的。国民党形式之下的斗争，虽然客观上始终发展到了政权的斗争，但是革命的指导机关当时是过于薄弱，不能领导群众去认识斗争的目标。

广州公社的特殊意义，便在于他指出：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必须要建立革命的群众独裁——苏维埃。广州的工人代表会，包含各种职业的工人群众，他自己选出苏维埃的执行委员，广州革命的兵士以及市郊的农民，也都选举自己的执行委员，这些执行委员组织广州的苏维埃，指挥暴动，形成革命的政权。中国的民众第一次见着：普通的“下等人”——工农兵士自己的代表，能够组织政权，管理“国家大事”，只有如此，才叫做革命。广州苏维埃公布没收地主土地的法令，公布颁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的口号。这使几万万农民和兵士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出路：只有在世界的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只有赞助中国共产党，他们能够组织广大的群众力量，去战胜豪绅地主和军阀。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也在广州暴动之中看见将来胜利的模范：除非是武装暴动胜利，不能实行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反革命资本家的银行、企业……一直到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在殖民地落后国家之中，开辟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广州公社的伟大意义，是深入于中国劳动群众的意识之中。

广州公社的存在期间不过三天，英勇的广州工人不能开

展他的革命事业。广州暴动之中，群众的热烈参加与英勇的斗争，都被反动势力所摧残了。可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广州暴动之中的英勇的模范，可能的疏忽，以至很大的错误，都值得研究的，都必须研究的，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要加以慎重的注意，而获得他的教训。

对于广州暴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说是共产党的盲动，国民党的刽子手杀人凶犯胡汉民等说他是共产党“扰乱北伐后防”的阴谋。甚至杜洛茨基也说“广州暴动是纯纯粹粹的盲动，是绝对的军事冒险”。何以如此呢？难道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了吗？如果凡是失败的暴动，凡是因此而牺牲很大的暴动，都称之为盲动，那么，自有天地以来，无产阶级暴动的胜利，还只有一次——就是十月革命，其余的暴动都是盲动了！不是的，决不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所以他们称之为盲动的，而是因为广州暴动足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而这些人（社会民主党及国民党）正在热心拥护帝国主义的 对华统治呢！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说：

“大会认为将广州暴动认做盲动的企图是绝对错误的。广州暴动虽是中国革命过去时期中中国无产阶级之英勇的退兵时的一战（Arriergard Fight），虽然指导方面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仍旧是革命之新的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军事冒险和盲动是甚么？——就是不得群众赞助的暴动。难道广州暴动不得群众的赞助么？

广州暴动之前，正是全中国反动派内部纠纷混战的时候；

武汉方面有桂系军阀与唐生智派的战争；南京方面正是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倒台而蒋汪各派纠纷互斗的时候；广州方面尤其是桂系军阀与张发奎派直接战争的时候。工农民众在广东久经李济琛的压迫，已经几次起来武装反抗。广州市的工人示威与罢工运动，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不断的发展。海陆丰则十一月初苏维埃政府已经占领县城，海南岛的农民暴动也已发展了好几个月。兵士群众间的革命情绪，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正在开始发动。暴动的当时，工人代表会之下的一般工人群众都是热烈的同情、赞助以至积极的参加（十二月十一至十二日，工人群众拥护在暴动参谋部之前要求领枪的，自早至晚总有四五千，实际上发出的枪也确实不下八千）。“广东总工会”之下的群众工会以及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汪精卫派）之下的群众也都要求参加。甚至完全在资本家指导之下的机器公会的群众也鲜明的表示中立。只有资本家所办的机器公会之雇用的打手（所谓机器体育队）开枪攻击暴动军。暴动之中有一千二三百兵士的自觉的参加，随后，政府军队中的兵士转到暴动方面来的，又有三千人光景。广州市郊以及花县、东莞、佛山等等地方的农民，都在这几天（十二月十三日）暴动起来，他们暴动的所以失败，大半是因为广州已经失败了。海陆丰的革命军队没有开到广州，也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原来是有了些准备的。不但工农兵士群众积极的赞助广州暴动，而且广州暴动显然的得着贫民小资产阶级的同情，甚至一部分贫苦的知识阶级的赞助。

广州暴动中群众的英勇的斗争，真是东亚历史上的空前的事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从初期的国

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起直到广州暴动，他所发动的群众是非常之广大，尤其是在广东——革命的发源地。三五年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群众的组织，如省港罢工以及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显然是“国民党时期”革命发展的成绩。广州暴动中，工农兵士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与拥护，显然是革命初期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正确策略之结果。

可是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策略之中，也有机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机会主义余毒，对于广州暴动中的错误与缺点，也有显然的影响。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便是完全不注意群众之中对于革命独裁的宣传与解释，群众夺取政权的意义是非常之模糊。因此而有很奇特的现象：在北伐时北方群众之中“等候北伐来解放”宣传无意之中减弱许多群众的积极性；武汉时代李济、蒋介石叛变之后，上海群众可以等待东征，广东群众可以等待南伐。武汉反动之后广东又可以等待叶、贺南征。对于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国民党的群众的下级党部之自发的变成政治机关之现象，不去加以领导，甚至加以抑制。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有久年的全国的性质。因此，虽然广州群众自己觉悟起来，自己提出苏维埃红旗的口号，可是往年的对于夺取政权之消极态度，仍旧保存着自己的影响于落后的群众之中。广州暴动前政治上准备的不充分，亦就包含在宣传“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之意义尚未能深入群众——极广泛的群众之中。至于组织上：暴动参谋部、工人赤卫队、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以及宣传鼓动的系统与工作——自然更有许多弱点。我们这篇文章之中来不及一一详论。

错误之中的主要点,却是暴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一直取得进攻的形势。暴动军主力所攻击的地方,并非敌人的要枢。于是经过一些时候,李福林的军队由河南过江,暴动军便陷于反攻为守的形势。革命初期,对于国民革命军之中的兵士运动,绝对不加注意,这也留着很大的影响。反革命军队中的兵士运动是太不充分。革命方面虽然已经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赞助,但是李福林的兵力并未动摇,加以英、日帝国主义积极的组织反动势力,直接帮助他们反攻广州的暴动,于是广州暴动便失败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广州暴动之中,我们看见的是:——变军阀的混战为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军阀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推翻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反革命各派各种势力的联合,超过了革命的势力,战胜了革命势力。但是应当知道:广州暴动已经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受着三次巨大的失败之后,已经在许多次工农群众武装反抗,以求保持革命胜利,要使革命转入更高的阶段,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而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独裁,而屡屡失败之后。广州暴动之前的这些斗争:广东四月间工农的武装反抗李济琛变叛,湖南五月间的长沙扑城,湖南、湖北九月间的农民秋收暴动,八月一日南昌暴动与叶、贺南征……等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保持革命而要使他进于更高阶段的斗争,他是有完全的权利来实行这种斗争的。这些斗争的最高的表演,树立新的阶段之旗帜的,便是广州的苏维埃暴动。广州暴动的失败,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屡次要想抬头起来的新的新的高潮,受着最终的打击,而广州暴动的本身便成为过去革

命高潮之退兵时的一战，同时，也使他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广州——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广州，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最高发展的广州，是两年久经战斗的省港罢工工人的广州。广州——是孙文改组国民党及国民党最初组织国民政府的广州，是国民党还是革命组织时最初建立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政府的广州。同时，广州——亦是最初发展农民运动的中心，最早听见农民的土地革命呼声的广州。广州是工人、农民与革命的兵士军队结合联盟的最早的表演地。不但如此，广州是中国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相互矛盾表演得最剧烈的地方，他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北方官僚买办阶级互相矛盾互相斗争得最长久的地方，他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互相冲突的焦点之一（省港罢工时的实例）；同时，他也是英国帝国主义剥削南部中国的总口岸，他是在香港与沙面帝国主义舰队的直接监视之下。广州暴动虽然在蒋、桂、汪各派国民党政客军阀互争的时候，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到绝对崩溃的程度。武汉、上海无产阶级经过严重打击之后，还没有能恢复自己的气力。因此种种，广州无产阶级当时斗争的环境是非常之艰巨。广州工人与农民兵士的力量，这一次是没有能战胜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广州暴动到如今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时期，更加艰苦的争取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这时期之中收集积聚自己的力量，领导农民群众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伟大的强有力的国内的革命联盟者——对于中国

无产阶级，便是中国几万万的农民。中国资产阶级是决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广州暴动正是表示只有无产阶级能解放中国农民于封建关系之下，也只有如此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广州公社的英勇的战士，在这解放斗争之中牺牲了，我们的张太雷、周文雍等以及五千七百带红领带而被杀的广州工人，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战死，在英勇的斗争之中牺牲了。中国工农的责任，不但是纪念他们，并且是继续他们所开始的事业，继续他们的斗争！

“伟大的人物，革命的战士，不但用自己的生命和斗争去从事于伟大的事业，而且往往用自己的死和血去填平达到胜利之艰难荆棘的道路。”中国工人的胜利之道路铺满了最好的战士与领袖的尸首，流满了他们的鲜血！国民党帝国主义等等反革命的刽子手将孙文变成杀人凶犯卖国赃贼，如胡汉民、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汪精卫、张发奎之流的老祖宗，将革命的广州变成屠宰革命工农的场所。他们必然要重重的偿还这些战士的血呵！

至于广州暴动的国际的意义，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殖民地问题结论之中（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莫斯科《真理报》）就说的：

“如果以为没有殖民地小民族的暴动，没有欧洲小民族的暴动，没有一部分具有种种成见习气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不觉悟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民族君主等等的压迫之运动，就可以有社会革命，如果这样想法，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只有如此之迂腐可笑的人，才会

去骂爱尔兰暴动是盲动。谁要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他永世也等不着的。这种人只是口头上是革命家，不了解真正的革命的”。（列宁）

马克思就说过的：如果德国会有第二次农民战争，那么，革命进行起来便很好了；马克思就说到所谓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二版”的。现在马克思的希望是在实现起来，而且是在世界的规模之中实现起来。我们现在有中国的农民战争，我们一定将要有印度的，罗马尼亚的，阿拉伯的以及一般东方国家之内的农民战争。马克思对于农民战争的态度是如此的。我想，马克思对于农民战争的这种态度，也就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应当如何去观察中国革命与广州暴动，国际的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去对待中国革命和广州暴动。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已经在他的告中国工农书里，说出这种态度，让我引他的话来结束我的结论罢：

“广州暴动已经深入劳动群众的意识之中，这是中国工人之伟大的英勇的模范。将来广泛的工农群众暴动，组织在列宁主义的彻底坚决的策略之下的，得着国际无产阶级之赞助的——必定要成为中国之胜利的十月革命。”

统一独立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受压迫民族的暴动胜利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1期）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一九二八年二月)

中 夏

一、 广州暴动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便决定武装暴动，为武汉反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至广州暴动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方才正式决定。当时情形是这样：

在反动阶级方面，国民党的内部已经公开发生的战争，就全国而言，有所谓南京政府与唐生智的战争，时局已经非常混乱；就广东而言，广东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正准备打倒广西派军阀李济琛、黄绍竑的政变与战争，一触即发，广东各县已有数处小的战争，时局异常紧张。

在革命民众方面，工人由普通罢工示威，转变为打杀工贼与抵抗警察的武装斗争。群众常常走到街上，农民发生三次暴动，9月叶贺攻入潮汕时发生一次秋收抗租暴动，10月发生土地革命暴动，海陆丰得着完全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中国阶级因勒捐派款以及战争，确有厌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情绪，表示动摇，其先进分子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广州驻军确有大部分对工人表示同情。

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的威信确已增高，与群众结合同生共死的亲切关系，有调动群众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广州暴动与广东张黄举行政变刚刚同一天。那时中央在上海本来还未得到张黄政变的消息，但已估定张黄政变日内必然发生。中央很郑重给广东省委以训令，谓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的唯一出路，只有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汇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更提议下列具体办法，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

- 1、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私人战争。

- 2、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自主的公开各地革命工会组织，召集产业的职业的地区的工会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之开始），开始一切斗争，实现各项要求，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但当斗争期中，各工会原有之秘密组织仍须严格保存。并在罢工期中利用机会建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雏形。

- 3、海陆丰之工农军应号召农民群众尽量扩充志愿兵额，利用陈济棠、黄琪翔军队在东江的战争或用陈黄集中东江作进攻惠州扑得广州之计划。但此项计划实施时，必须使工农革命军沿途号召农民杀死豪绅分配土地以扩大土地革命。

- 4、广州三条铁路的反动机器工会领袖，在此次政变号召革命工人自动铲除，并夺取铁路管理以响应广州市工人罢

工运动。

5、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民运动，须注意各地暴动向广州方面之会合及水陆交通之破坏与乡村暴动之蔓延相并而行。

6、广东南路海南的农民暴动已在各地蜂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样使这些暴动能获得农民群众之广大参加，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破坏统治阶级的统一局面；同时须积极根本改变乡村中之一切旧有关系。

7、广东的北路西路为两广实力派目前战争的所在之地，这两处农民暴动应使之发动为破坏军队之主干，不当拉夫，不卖米粮，破坏铁路河运，截留两方谋探，煽动两方军心，夺取军队武装，并引导兵士离开队伍而加入农民群众革命军以扩大并巩固农工暴动在这一个区域的胜利。

8、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民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农民暴动。

9、在全省各县工农暴动各主要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各县的手工业工人都须同时兼顾到，由经济斗争或是全部分的政治斗争发展到全城暴动。

10、依据本党军事运动的新方向，广东省委应训令所有军事同志极力向军队下层活动，并设法煽动士兵使之在战斗中哗变反抗，散入农民群众中，成为农民革命军，当其战争溃败时，宜领导农民夺取武装，武装自己。

11、总之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一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

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有些人怀疑中央是否与闻广州暴动,其实是误会的。中央所示与闻的只是暴动日期问题,这是因时机紧迫,交通不便,有以致之。

二、 广州暴动的准备

广东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到中央训令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当时是全体一致赞成中央决议的。并决定发表号召暴动宣言及暴动的口号,又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从军事组织技术工作中他们准备工作诚如共产国际所指出还不充分,虽然全部都布置还没能运用周密,还没能组织完备,还没能实行无缺,然而省委确实尽了他的力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我们此地只举出几个大者来做例:

1、纠正等待主义的错误,广东省委对于暴动政治上的准备,可说早在中央提出武装暴动政策为党的行动之普遍方针的时候便已进行了。那时叶贺南征,广东省委便去准备叶贺军队打到潮汕时,潮汕暴动响应;打到惠州时,惠州暴动响应,打到广州时,广州暴动响应;此时省委便做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自然这个计划一望而知如是以叶贺军队为主力,而工农变成了一种仅仅响应的副力,这是一个大错误。迨叶贺失败,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而先进行各县的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于是海陆丰便先广州暴动取得了胜利。

2、启发群众的政治斗争。四月李济叛变以后,省委曾不断地引导群众斗争,如四月二十三日之政治罢工;六月十九

日省港罢工纪念与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纪念之两次示威大会。自然此时的口号仅仅反对白色恐怖、要求释放政治犯、肃清反革命，而未提出打倒国民党，更未提出苏维埃政权，但省委对于引导群众斗争是随时注意的。

十月叶贺失败了，省委在政治上更是进一步的准备，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引到群众斗争。其中最大的是十月十四日的海员示威运动。先是江门、汕头海员经济罢工，广州的海员总工会为李济琛所派的改组委所盘踞，海员得不到援助，于是十月十四日便联络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在广州举行四万余人的大示威运动，开会后，游街巡行，行经海员总工会门首，群众便蜂拥闯入工会，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二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影响所及，广州各公会都纷纷自动夺取工会，夺取广州工人代表会会所时，亦发生与警察武装冲突，互有死亡，反动政府十九日来一压迫，工人失败。此外，国庆纪念，工人群众是参加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工会群众又举行示威。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高呼着“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定计强迫解散省港罢工工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虽然取消香港之封锁，实际上罢工仍未解决，罢工工人仍留居省城，约三万余人，此次被汪张解散，封闭罢工工人的公共食堂和公共居舍。罢工工人举行示威，并自动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

十一月十七日，张黄政变后，省委已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张黄召集的所谓护党运动大会，事实是等于阅兵，然而工人群众忽然闯入参加，高举红旗，向士兵高呼“打倒国民党”、

“广州苏维埃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兵士表示同情，张发奎气极，下令捕拿工人，兵士不肯动手，卒由张之卫兵捕数人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省委公开发表宣言，号召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提出下列口号：

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居住；没收大资产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兵士；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抗军阀；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琛、黄绍竑；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会议政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与苏联联合万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将这些口号联为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斗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

3、纠正过早暴动的倾向，十月十四日海员大示威以后，群众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十九日反动政府便来一个压迫，此时工人非常悲愤，工人中有主张立即暴动者，省委认为时机尚早，此时尚无准备，故指出我们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的必要。由此可见省委并非轻举妄动者流了。

4、打破左派国民党的幻想，此时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

尚以左派国民党自居,为打倒他们的政敌李济琛,想借民众势力以为助,故用许多左倾口号以欺骗群众。自然此时民众不少为其所惑。省委除一面竭力宣传汪精卫在武汉反动事实外,同时一面又领导失业铁路工人(四月十五后被李济琛开除的)及其群众数千人向汪精卫要求恢复职业。当时有人反对省委此种计划谓一方面反汪,一方面又向汪请愿,自相矛盾,徒然混乱群众视听。但省委坚决如此执行,结果如何呢?汪精卫不特不能允许工人要求,而且调动军警捕拿工人领袖,于是群众自然在自己政治经验中认识了所谓左派的真面目,由和平请愿变成示威包围,高呼“打倒汪精卫”。张发奎几次欲找共产党谈判,省委毫未犹豫加以拒绝,并向群众公布,于是张发奎的所谓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5、赤卫队的编制,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后,即着手赤卫的编制,组织两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极端秘密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夫一连)。此外又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之用,又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药,少数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工人。又建立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

6、苏维埃的组织,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的时候才成立。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六十余人联席会议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的兵士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选出三人(但只有一人参加了苏维埃工作)。此外共产党亦有代表参加。工人占三分之二。举行

暴动的最终决定,是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并且还通过了举行暴动计划。此时可知说广州苏维埃未经过选举,是不合事实了。

7、教导团的夺取,省委对兵士中的工作仅仅只限于广州市内驻军,而驻在市外及外县的兵士并未发生关系。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十二连本是由武汉调来广州的,其中大部分的军事学校学生的知识分子,经省委的活动,他们中除少数高级军官外,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此外,则警卫团,炮兵营,黄埔军官学校都有一部分受共产党影响。在暴动前的一星期,曾开二百兵士会议,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的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兵士口号,得着群众热烈的拥护。

总结起来说,省委所做的准备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省委已经做了的,是我们宝贵的经验,当然不可抹杀。平情而论,这些做了的工作,是值得赞美的,决非毫无能力的所能梦见。

三、广州暴动失败原因

伟大的东方殖民地上第一个出现的广州苏维埃存在了三天,终于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队、军舰、民团联合的环攻之下颠覆了。广州暴动一起来,使得帝国主义震惊危惧,使得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恐慌发狂,帝国主义使用尽了所有可能帮助国民党军阀,日本水兵登陆,开枪射击赤军,使得长堤反革命军队难以肃清,英国的军舰、商船救出许多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到河南或香港,使得他们能

从容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苏维埃，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也派兵登陆；反革命的海军与河南的李福林便在英、美、日、法的军舰的掩护及运送的条件下，得以攻击广州。国民党各派军阀亦为广州暴动胜利所震吓，立刻放去互战且联合起来拼命的来扑灭他们所毒恨的苏维埃政权。就客观原因而论，自然是敌人力量大过革命力量，所以苏维埃政府不能不失败。然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主观原因，因为研究主观原因可以使得我们得到极大教训。所以我关于这一点的研究，不厌求详。

A. 暴动的社会基础与发动群众问题

这次暴动之中，并非所有的广州工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人甚至说广州暴动仅仅只有五千人参加，这是有意的极端诬蔑。积极参加暴动者的确有两万人以上。平情而论，广州暴动虽然有两万人参加，我们仍可说是社会基础不广，比方说在国民党未叛变以前，经共产党所组织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之下的工人群众便约近二十万人，虽经过李济、汪精卫、张发奎屡次的不断的打击，然而仅只两万人参加暴动，实觉太少。省委在暴动前后确尽了不少的努力，约举于下：

1、经过党的系统，党在暴动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二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第一次讨论总同盟罢工，到会的三十多人中多数总罢工可以做到，嗣后各支部书记陆续报告罢工困难，在第二次会议中便移转方向讨论暴动时的政纲和暴动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的可能程度。在各支部中党又分别召集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暴动的方法、罢工的发动和赤卫队的扩大组织。

2、经过工会系统，工代会亦在那一星期中开过代表会两

次：第一次亦讨论总罢工问题，到会四十多代表多数认罢工可能，第二次选举苏维埃委员。

3、赤卫队多依联队的区别开各队长联席会议，会议中侧重政治报告和组织扩大的讨论。

4、党的指导机关和工代表、特委会、赤卫队委员会，更是日日在开会，暴动的决定是经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并全体承认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是当时必须采取的政策。

5、暴动时赤卫队是按联队分区域集合。每一联队几乎全体都是徒手群众，而每一联队组织之外，还跟随着许多徒手群众。

6、暴动前决定了召集群众大会于暴动胜利后，但缺少详细的召集方法。总罢工的命令决定于群众的军事行动起来后，即以工代会名义发布，并召集群众大会拥护苏维埃政权。

7、暴动前通过各支部的任务，是（一）宣传暴动意义；（二）准备总罢工；（三）号召群众参加赤卫队。

8、暴动开始后，十一、十二两日召集群众大会未成，改开代表会议，到三百余人。党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亦两次均流会。但赤卫队总部聚集一千余人，多徒手的积极的工人，甚至领制等编制、暴动总机关的门口，却川流不息地有工人前往领枪，自动地参加暴动。各街各巷都见有捆红布带的工人。

群众没有如火山爆烈般广大地起来，究其原因安在。

客观方面

1、广州工人群众向来是分裂的。不但产业工人中分出了机器工会的组织，便在手工业工人店员中，于广东总工会所属之外还增加了所谓左派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因此，此时在工

代表会直接指挥之下的工会不过六十余了。虽然这三个反动工会并没有真能取得若干群众，至少反动派可利用这些会名义来阻止所属工会参加一切革命运动。削弱了工代会所号召的力量。

2、广州工人运动两年以来都有省港罢工工人领导。自一九二六年十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取消对香港封锁以后，尚有三万人留居省城。广州市一切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罢工工人的行动成了唯一的领导者。暴动前一月便被汪精卫定计强迫解散，力量便已分散，赤卫队的秘密组织留存在罢工工人的只得五百人。所以反动派解散罢工工人一事，实给我们发动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致命伤。

主观方面

1、暴动前没有总同盟罢工。中央与省委虽然都曾决定总同盟罢工，但因客观困难终未实现。当时未坚决执行总罢工而改变为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自然因恐反动派借口战争戒严时间便对群众施以无情的屠杀。结果总罢工依然是一暴动。此时我们的准备还未妥善，因此索性迟数日，总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先罢工而后暴动。本是暴动艺术常轨，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实乃变例；暴动前无总罢工，群众不能周知，暴动开始后便转入作战状态，交通上更增加许多障碍，这亦是广州暴动时集合群众比较困难的原因。

2、暴动时没有适于发动群众的灵便组织。广州产业工人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以机器〔工会〕的分裂运动，多部分群众是被划分了出去。结果工代会属下的工会最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他们每一工会的群众都是遍布了全市，平常示威

集会，各工会参加的群众，多半只就其工会附近所能通知的为数，远的便不能在他的旗帜之下集会。加上党在手工业工和店员群众中的组织也是按照工会的系统划分支部，每一支部所管辖的党员也同样遍布了全市，党没有采用街道支部的组织形式，来集中这些散乱的手工业和店员群众，所以党的支部除掉海员，汽车，邮务，印务，铁路(失业工人)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到赤卫队中去，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去了，于是群众的发动自更少人领导了。上层指导机关与下层群众中间失去了联系，就因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暴动时会发生这个困难，没有采用适宜的组织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在客观上又是阻碍了群众的发动工作。

除此之外：社会基础不广还有其他原因：

1、党对黄色工会政策不对。从前广东党对于黄色工会就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有时对黄色工会完全取仇视的态度，对于黄色工会会员完全置之不理；有时与黄色工会取联合战线的策略，然而只有上层机关联合而没有下层群众的联合，甚至因恐怕黄色工会上层领袖的怀疑、嫉忌，而完全停止下层群众中的活动，由来已久，不是旦夕可以改正的，不过有人说黄色工会会员完全与苏维埃立于反对的地位，亦是与事实不符。一方面机器工会领袖统率他的武装体育队(约近千人)帮助白军进攻苏维埃是事实；同时另一方面广东总工会和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下面的群众很多自动的走到苏维埃方面来，就是机器工会会员亦多表示中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未对苏维埃罢工或怠工)也是事实。广州工人群众是一向分裂的，而

这次暴动却收到了对黄色工会下之一部分群众的领导的功效，暴动失败后，黄色工会下的群众有的说为何早不通知他，假使我们早在他们中努力工作，他们必更有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暴动或对反动领袖反对苏维埃的行动加以制止。

2、对市郊农民运动的工作不好。党在外县的农民中虽有好几处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海陆丰；但是市郊及中路农民运动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农村中没有共产党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这次暴动市郊农民有数百人占领广三铁路车站，兵工厂附近亦有数百人起来，然而没有立刻发动几十万的市郊农民暴动，围护广州并截击白军；而海陆丰集处又远水不能救近火，于是广州的暴动便陷于孤立。

3、对兵士运动的工作不足。党在国民党未反动前，简直没有兵士运动，仅只军官拉拢。国民党反动后，又来不及做兵士运动，老实说，党也没有兵士运动的经验，中国军队是雇佣制度，在兵士中的工作自然比较困难。党在准备暴动期间，仅只在广州驻军中做了工作，而且教导团甚至整个参加暴动，至于广州市外的白军中就没有丝毫的工作了，故兵士群众参加暴动的不过数千人。

这些都是使得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的原因。

B、选择暴动时期问题

这一点同志之间争论颇大，说暴动时期不适当的同志最有力的论据是用引列宁关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之事变的话，列宁说：

七月三日至五日的时期是或者可以夺取政权的，因为“敌

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加我们以暴动的罪名而以暴动者处理我们的。从这个地方,并不能就做出个结论说:那时候夺取政权是于我们有利的。因为使暴动胜利之客观条件返未具备。

是否能引用列宁的话适用于广州暴动,当然要问 是否当时圣彼得堡的状况与此时广州的状况完全一样 或者差不多。

我们现在提出几个事实来:

1、你们不说广州暴动因为铁路没有罢工以致李福林得用铁路由韶关调回军队向广州进攻,是一个错误吗?我可告诉你,三条铁路本来是共产党的势力;但四月十五日以后,李济琛先下手开除革命工人至一千余人之多,换用黄色机器工会会员,铁路已非我有,遑论罢工?

2、我们大家不是公认广东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吗?我可告诉你,留在广州的三万余人的省港工人,事实上是两年来广州的政治斗争的唯一的领导者,但十一月汪精卫、张发奎又先下手将其强迫解散,使我们在暴动中减少一个伟大的力量。

3、你如说暴动时间应该稍为延迟一些,最低限度也要等到张发奎、李济琛军阀开始激烈战争的时候。好的,可告诉你,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已经电致张发奎,并派其婆兼程赴粤,要张发奎先下手,决心解散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教导团,决心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领袖,决心封闭工会及禁止工人活动,并决心搜查苏联领事馆,以至驱逐苏联领事出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张发奎亦决定日内就干。

这个时候,很清楚的,还是依然让反动派先下手根本消

灭我们势力呢？还是我们先下手消灭他们呢？何况群众已经愤激，反动派压迫一来，群众必然是散乱的各自为战，结果依然等于暴动，这时候，还是让群众分散的暴动给反动各个击破归于流产呢？还是我们计划的暴动先给反动派一大打击力争胜利呢？省委原决定暴动日期应在两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但因时机迫切，不能不提早于十一日先下手暴动，事实上我们先下手已取得胜利，虽然只有三天；不然，我们的势力再被反动派来一个空前的打击，那末连三天苏维埃的胜利都不会有。

是不是当时圣彼得堡状况如此时的广州状况完全一样，或者差不多？我想，并不一样，并不差不多。

广州暴动失败原因正多（另见上下文），决不关于选择时期问题，我们认为广州暴动的时期非此不可，就是说，省委将暴动时期提早是对的。

我们在此联想到批评广州暴动的另一意见，他说广州暴动失败之一，是因当时没有没收银行存款，好的，这正合乎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批评，但是事实上广州暴动却因攻打银行费时太久，以至延搁对河南及其他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如果象巴黎公社一样认为没收银行似乎不合理，那当然不对，然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宣言明明有没收银行的字样。我上面引用列宁的话如此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批评不同的事件。同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C、军事技术上的错误

中国非征兵制度，工人阶级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们差不多都是在暴动之后第一次开始练习开枪的，此次广州暴动，夺

取敌人的机关枪只使用一部分，二十五尊大炮只使用四、五尊。这些都是减少军事上的效能。虽然如此，当时指导机关对于军事上实做了不少的错误。

1、没有同时爆发。广州暴动虽然坚决、勇敢、无妥协前进，突然进攻，是其优点，但是没有同时爆发，如河南、黄埔（此处并且有一部分军力）、石龙等处没有同时爆发，既可壮大声势亦可扰乱敌人后方。

2、没有立即捕杀反动军事领袖。捕杀了敌人军事领袖，至少可暂时使得敌人军队失掉指挥，张皇失措，不至很快的来进攻我们，广州暴动没有顾及这一着，如张发奎、黄琪翔都居在东山，只须少数队伍便可捕杀，我们没有早做，以致他们得以逃河南发电调西江军队回省进攻我们。

3、没有占领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不仅有大批枪械，而且此地是西北面屏蔽广州要地，我们也没有派一部分红军联络已经起来的农民围攻占领，亦一失算。

4、没有堆集街上障碍物，以致敌人来攻时顺利无碍。

军事上既有这多错误，于是广州暴动不到半天便反攻为守，一个暴动假使到了反攻为守，大事已去了一半了。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一重要原因。

我们在此地要反对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是说广州暴动的失败偏重军事、偏重武器，于是得一结论，说广州暴动是军事投机，或说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这种见解是有害于暴动的。什么是军事投机？严格地说，必须是专门勾结军队靠之作一切工作以代替群众自动地斗争，宽泛地说，也须是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或竟至阻止群众斗争至少也是不理群众而一意靠一些

外来的武力去发动斗争，才能认为是军事投机，广州暴动并不是这样，如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军事重要作用与价值。军事投机一辞在中国党中随处使用，遗害无穷。

总起结来说，在主观上社会基础尚不十分广大，军事技术又做了不少的错误，这些东西便更促成了广东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失败。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认清楚，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我们优越几倍，即使国民党军阀因战争而削弱或崩溃其兵力，然而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兵舰曾封锁过武汉，曾经炮击过南京，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旗子，现在广州暴动是苏维埃旗子了，谁能担保，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轰击广州城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得一结论，敌人势力既优越我们数倍，例如普列哈诺夫的高叫“你们不应该拿枪呀！”这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这样想。我们必须郑重的认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只有发动伟大的工人以及农民兵士的群众可以战胜；只有认清我们当前的战斗是极其困难艰苦的斗争，是极残酷的肉搏。从此而得其结论，决不是抛去战斗，而是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百倍的加强指导与考察的力量，百倍的英勇的精神，以战胜“资产阶级”世界及中国一切种种反革命的势力。

固然我们不能担保操必胜之权，共产国际党说得对：广州暴动是中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必要尝试。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

反对有人对于广州暴动认为是“过早的行动”，是“盲目”、是“军官投机”、是“游戏艺术”之一切企图与阴谋。

四、 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中国革命的转变非常迅速，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又很幼稚（才只成立八年）在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策略，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我们决不隐瞒我们的错误。我们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广州暴动给予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存在三天而失败，然而他已渗透了全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心理之中。国民党革命已经完结了，此后便已开始苏维埃的革命。我们热烈高呼：

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在全亚洲全世界遍插起来！

（载无产阶级书店印行的《广州公社》一书，
1930年12月25日出版）

广东暴动纪实(节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韶 玉^①

(一)引 言

—

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斗争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声庆祝“十月革命”十周纪念的欢忻〔欣〕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后著名的中国的领土内，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巢，同时又是民族革命及工农运动的策源地的广州城里，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它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夺取政权这种“艺术”，已经不仅是巴黎工人具有决心去进行的事业，它已成为了“文化落后”“还不够管理国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计”、“苦力”们的直接行动；苏维埃这面旗帜已经不仅飘颻〔扬〕在占地球六分

① 韶玉是王明的笔名。

之一的面积的苏俄领土上，它已变成了几千万中国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红色目标！

苏维埃旗帜在殖民地国家中第一次出现，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农民兵士缔结同盟英勇的起来夺取政权，苏维埃政府存在的五十余点钟内的英勇斗争与伟大创造，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以无量勇气、决心和经验。每个革命的工农都抱着很详细的研究广东暴动的事实，以便继续和完成广州工农兵事业的热望！

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的老爷先生们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关于广东暴动的实际情形，工农兵的斗争英勇与创造的力量，中外报纸都一字不提。欧美资产阶级以及它的走狗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登载一点关于暴动的消息，其目的只在描写“共产党的暴徒”、“过激派”、“赤俄煽动者”……“杀人”、“放火”、“抢劫”等，以欺骗本国工人，以引起一般人对于“赤俄”、“赤党”、“暴徒”、强盗等切齿仇恨！法国《小巴黎报》及《乐诺纳报》的言论便是很好的例证！

巴黎十三日（十二月——作者注）《小巴黎报》评论共产党占领广州事，谓“各处压迫之赤党少数分子，已在广州施行其报复手段，俄国煽动者数名将煽惑广州潜伏之过激派巢穴及劳工协会，但该种劫掠残杀纵火举动，断无改变南方运动之能力。共产党既无军械，又缺武装，欲战胜富绅及中等社会所助之国民党军队，实无希望。”

《乐诺纳报》谓：“粤事之爆发，或能将中国之大好商埠，变为荒芜之地云。”（标点仍原有形式——作者注。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载之《法人之粤变观》）

每日出十四页的近水楼台的《香港日报》对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传单，一点不登载，其中除去中国其他各地报纸同样的简单纪载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事实上的材料，十二月十四日新闻栏内载有苏维埃政府传单中政治纲领五条，而其标题则为《广东政府纲领》（把政府二字用括弧括起），接着一栏小标题便是《过激主义者的疯狂》。

中国各报虽然不自觉的喊出：“中国史上空前大变——广州苏维埃革命第一幕”（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共产党军突占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十二月十三日《顺天时报》），“广州共产党起事”（十二月十三日《申报》）……等等，然而登载的也只是些零鳞碎爪，并且极尽造谣、侮〔侮〕蔑、煽惑之能事。

当我们企图真实地叙述广东暴动经过时，深感觉到具体材料之缺乏，然而根据我们手头现有的材料，及一般报纸上无意流露出的不可隐蔽的事实，我们亦可给广东暴动一个显明的概念。

二

广东暴动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中，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证实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之可能，所以它毫无疑问的是整个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之第一幕。广东暴动，一方面是中国工农为保持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中已得胜利之退兵时的一战，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所以它毫无疑问的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的产儿。但因本文任务和篇幅限制的

关系，关于世界革命与广东暴动之联系和线索，只能略而不提。至于暴动前中国和广东的一般政治经济概况，及阶级斗争的实景，以及暴动后之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等，在本文中不能不占相当的篇幅；否则我们便难了解为什么在中国革命一般的遭受暂时失败的条件下，暴〔爆〕发了工农直接夺取政权的英勇暴动？为什么这一暴动爆发在广东？广州工人运动怎样由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发展到最高形式——武装暴动？广州工人觉悟，怎样由一般的政治经济要求，发展到最高程度——夺取政权？以及暴动后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将按着什么方向去发展？

（二）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

一、 暴动前的中国一般状况

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领导权之斗争，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八十万工人武装占领上海，以导引北伐军前进之时，已发展到最高峰，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这一问题，即中国革命是按非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这一问题，需要这两个阶级各以其实力来回答。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武装叛变，就是代表中国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叛变出而投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买办阶级的反革命的营垒中，并企图以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的血来淹没春笋怒发般的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便企图缔结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政治联盟，利用资产阶级军阀等的各种冲突，建立起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武汉)，以对抗新的反动中心(南京政府)，而使革命向前发展。

武汉政府只是在很短时期之内在群众革命情形高压之下，企图反对反动的南京政府。可是因为工农运动之扩大和深入，帝国主义之利诱与威吓，政府领导人物之阶级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上之机会主义政策等之关系，武汉政府很快的公开的(自马日事变起)向南京道上走。汪精卫七月十五日公开的叛变，就是代表整个上层小资产阶级投降民族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完成了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的事业。

中国工农群众在其先锋队(中共)领导之下，企图以武装力量抵抗反革命的进攻，并保持革命的胜利，于是有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南昌暴动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又加上指导机关之错误，结果遭受了失败，完结了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之旗帜的整个历史阶段。

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以后，对于革命的主要客观任务(国家统一、民族解放、土地问题、劳动问题)一点也无法解决，反而增加纠纷；对于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工、商、农业、财政、交通)，一样也无力振兴，反而益形凋蔽；对于一般人民的急切需要(废除厘金关卡、蠲免苛税杂捐、安置失业等)，一件也不能满足，反而增多痛苦；对于劳苦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不断的军阀战争，不仅不能消弭，反而加深和扩大；对于帝国主义则公开的献媚求欢(蒋介石赴日本，唐生智、汪精卫交回汉浔英租界，李济琛会香港总督)，对于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则拼命的逮捕和枪杀。宁汉合并，不仅未能挽救政局的纷乱，只是加速南京

政府与唐生智的战争；南昌暴动的压倒，并未能促进反革命之团结，只是紧张广东派与广西派的武装冲突。

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无法稳定，中间阶级朝夕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工农群众所受的政治经济之压迫与剥削与日俱增，整个阶级斗争发展之过程，指示给劳动群众看国民党的各派都是劳动群众的仇敌，青天白日旗已经是白色恐怖之旗帜，使劳动群众觉悟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只有用工农群众武装暴动以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武汉反动后（特别是叶贺暴动失败后），乡村间不断爆发的游击战争与武装冲突，城市中经常发现的红色恐怖与武装准备，都是表示工农群众时刻准备着实现阶级斗争的艺术——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定下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更确定的指出准备好的联结好的武装暴动之必要，同时提出苏维埃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形式之口号，毫无疑问的是代表当时工农群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与急切的革命需要，决非惧怕工农革命直接为统治阶级嚙丧的第三党等所谓为的“超时代的政策”。因为反动力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暂时的团结与对待革命阶级行动的一致，因为革命力量（工农组织）惨酷的被破坏与先进分子肉体的被消灭，同时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之不统一，劳苦群众处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之下，当然难于很快的实现一个包括全国主要区域的总暴动。然而在阶级斗争发展到空前剧烈、群众情绪紧张到空前愤激的状况之下，在政治经济零乱和开始在数省甚至一省之内有胜利的建立革命政权之可能的中国环境之内，如果在某个省区内，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持久而深邃，群众组织发展

得比较长期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发展得比较扩大和深入，群众斗争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还能继续着向前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觉悟到武装暴动的必要和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有了相当的准备；同时，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发展到统治异常摇动给工农群众以“可趁之机”，则工农群众便立即企图以自己的铁腕和鲜血来推翻当地当时之政权而代以自己阶级的统治，这是必不可免和必要的，绝不能如机会主义之流加以“盲动主义”之估计！

二、暴动前的广东局势

广东省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与全中国先进各区域是按着一条一定的路线发展的，广东工农的政治觉悟也是随着全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步骤而提高的；不过广东许多特殊条件（见本文上段）及本省内阶级斗争的许多直接教训，使广东工人走上全国工农的先锋地位。

四月十五日李济琛在广东开始继续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叛变，捕杀先进的革命群众（共产党与工农）数千人，广东工人虽然在空前白色恐怖之下，由赤色工代会领导着进行英勇的斗争，可是自四月二十三日反对李济琛叛变之广州工人政治总罢工直到六月江门、新南海轮船罢工，都是反抗压迫和阶级自卫的争斗。海员在省城、香港、汕头、澳门、江门各地虽然有“维持义勇团”的组织，但其口号仅限于“保障工人在船作工”（见邓君与广州海员工人领导者梁君之谈话记录）。广州工人虽有“自救团”之组织，但其目的不过是：1. 自卫工会组织，2.

反抗压迫，3. 杀工贼，4. 响应革命军回粤（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对中国总工会召集之全国工会代表特别会议之报告）。当时总的政治目标与全国一致，就是希望武汉政府战胜南京政府。

武汉反动之后，全国工农均属瞩目于叶贺暴动的胜利：“广州工人得了叶贺回粤的消息之后，工人多数希望速打回广州来，而自救团之组织已由一千余人发展到二千余了。同时将来划分九个地方，响应叶贺军队回粤，而革命委员会亦发出布告宣言：‘我们工人在这时候积极准备暴动……’”（见同上报告）

武汉反动后之初期，全国工农对于所谓“左派国民党”还保留有几分幻想，南昌暴动还是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作号召，便是显明的实证。“张发奎、黄琪翔在叶贺正攻入潮汕时，已率所谓第二方面军入广州，同时，宣布他们的新政策：1. 建设新广东，2. 释放忠实同志。一方面不宣布打倒叶贺。这个时候，广州工人倒受他们宣传影响，惊疑他们与叶贺有关系的……我们极力去宣传，说这是张发奎戴假面具的，是愚弄民众的，但是工人们仍然未十分相信……”（见同上报告）。

广州工人虽然在很短时期内对号称“国民党左派”之张发奎、黄琪翔、汪精卫有多多少少地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在他们实际斗争的经验中逐渐的很快的根本打破。十月十一日因反对新南海开除工人所号召之同人大会，散会后之示威游行上发见了秘密数月之工人代表会的红旗，武装打死改组委员及占领海员工会旧址，但口号还只是：“打倒李济聚，打倒改组委员，工会由工人自理，反对改组等”（见同上报告）。十月十四

日在广州市工人的示威运动中,虽然先进的工人们已高呼出:“青天白日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只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是我们革命的旗帜!”但十月十七日的各工会总代表会议的主要口号,还只是:“释放一切工友职员;恢复一切原有利益条件;集会、言论、罢工、身体一切的自由;工会交回工人办理;反对官派等”(见同上报告)。但是,当张发奎对每个集会示威都回答以军队、警察、铁甲车队和侦探工贼时,当他实行以武力制止十月二十一日在市郊农民与罢工工人准备的总罢工巡行时,当他“到海员工会围捕,将罢工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及海员工会职员人捕去四十三人并通令缉拿余犯”时,当他十一月七日武装解散广州工人庆祝苏联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张发奎的面具破了……使一般工人明白,张发奎也是一样的压迫工人,比李济琛还厉害一些”(见同上报告)。当十一月十一日三铁路(广九、粤汉、广三)工人及火柴工人几千群众包围东山汪精卫住宅,要求恢复原有工作而被用军警回答时,广州工人才完全坚决的站在他们当时呼出的口号之下,“打倒汪精卫、张发奎、李济琛,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共产党万岁!……”(见同上报告),而英勇作战!

十一月十七日政变,产出的汪精卫、张发奎广东政权,与李济琛政权没有异样:对于革命的工人群众则除以武力捕杀外,同样的利用“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广州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等工贼机关,以帮助资本家“推翻原有劳动条件”并强迫工人加入反动工会;对省港罢工工人(广东工人的先锋队伍)实行解散和驱逐出境,封闭他们的饭堂宿舍,取消一九二五年省港罢工所得到的一切权利;对外政策是对“帝国主义

者采取亲善的方针，封闭一切对外机关，甚至资产阶级的机关，禁止抵制英日货物，并且寡廉鲜耻的向苏联使馆抗议，因使警察占领公使馆一部分（见M君的《广东暴动的意义与教训》一文——一九二八年三月莫斯科《真理报》载）；对小商人曾经以罢市请愿方式极力抵抗的苛税杂捐，不仅不能减免，并且有加无已；对于保有的一部革命力量，以阴谋暗算企图绝灭根株（预计在暴动前夜解除教导团武装及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与赤色工会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对于金融紊乱与物价高昂，不仅是办法毫无，而且是加深创痛，拚命搜括抢夺，积极准备和进行巩固广东地盘的军阀战争！

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所领导之赤色广州工人代表会之威权与影响，随着统治阶级的反动、动摇和崩溃的程度而与日俱长。当工人利用汪精卫、张发奎所玩弄的“护党运动”游行时，便高呼“打倒国民党！广东苏维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见同上论文）。

“自张发奎政变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涌腾，又举行了一个游街示威大会与一部分的罢工，被驱逐的省港罢工工人便放火焚烧资产阶级的房屋（也不顾党里的指令），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散发违禁传单，强迫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十二月的第一周，群众的热情达到了最高点，海员开始罢工，公共汽车夫亦起来用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方法表示自己的反抗……邮政局职员也决定罢工，最先进的工人开始用炸弹和手榴弹武装起来了，准备走革命的道路。”（见同上论文）“……我们的先锋队——自救团已改了赤卫队，由二千人已发展四千了……”（见同上报告）。

广东省曾经过多次的农民大暴动，第一次是在李济琛叛变时，第二次是叶贺军队攻到汕头时，第三次是秋收以后，农民群众与一部分叶贺残部的革命军队(约一千五百人)联合起来举行的大暴动。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和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破坏一切私有的田边田界，焚烧一切契约借约，夺取一切私有者的田地交给乡村的农民苏维埃，然后分给耕田者；杀戮地主、豪绅与反革命者)。东江一带如海丰、陆丰、鹅埠、普宁、碣石等处充满了农民暴动的浪涛，长期的或短期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十一月七日海丰工农兵与城市贫民开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大会为征求外援派了一个差遣带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工人，农民苏维埃拿出没收地主的两千块钱，到广东去买枪枝，以帮助工人暴动。北江与沿海一带，如琶口、海南岛、香港、铁路、石龙、汕头附近以及广东、福建交界处之一部分，多多少少是发生了很大的农民暴动”(见同上论文)。

广东兵士中的先进部分(如第四军的教导团等)，不仅对于将军们与反革命军官之非人的残酷待遇发生不满，不仅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战争发生厌恨，同时也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与广东工人代表会十月间所号召国民党党军的普通宣言表示同情，也不仅对于“护党运动”示威中的工人宣传的口号表示接受；同时，坚决主张与资产阶级叛徒斗争。在十二月初，全国的兵士，公开的说出开非法会议，为共产党的政策而争斗，需要组织暴动。统治阶级最亲信的广州城内宪兵连也公开的向共产党的接洽代表说：“你们暴动，我们是不成问题的！”(此接洽代表亲向作者说的)

暴动前的广东，因全国政局影响及本省各种条件而形成了上述的状况。当张发奎、李济琛冲突到以兵戎相见时，即当自汕头到武汉，从北江到南岸都酝酿着，而且进行着粤桂军阀战争，大部武力都调遣出发，而省城比较的表现空虚之时；当汪精卫密遣老婆陈璧君袖函张发奎献计之时，即反革命连日密议解散教导团武装，枪毙狱中革命者，搜杀共产党中坚分子，再一次大规模地更残酷的屠杀先进的工农分子之时：必不可免的要爆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开始的震动全世界的广州工农兵大暴动！

(三) 暴动经过

一、暴动之第一日

(1) 一声霹雳惊破敌人胆

教导团全团士兵，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暴动组织者张太雷同志及其他苏维埃代表、赤卫队代表的热烈的讲演以后，当场枪杀反动军官十五人，竭诚宣誓推翻国民党政府和服从广东苏维埃的命令。在热烈的“暴动呵”欢呼声中展开斧头镰刀大红旗，按照预定计划走向各连分配的作战地点。同时，几千工人赤卫队，撑起红旗，围着红领带，带着红领章，持步枪、手榴弹者当前，持刀斧徒手者随后，一队队地，按着预定地点出发，枪弹声大作，呼喊震天，“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变”——工农兵暴动正式开始！

星稀月朗，市寂人稀，十二月十一日夜间的三点三十分——丝毫不错，恰是革命委员所指定的时候！

这时的枪声、弹声、呐喊声，对于统治阶级的老爷们（自张发奎至陈公博）简直是晴空霹雳。因为对于广州将要爆发暴动这件事，虽然汪精卫有青（九日）电到粤，虽然陈公博曾得有上海密报（谓广东暴动日期在十二月十五日），事前的确知道，并且连日秘议对付办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但从陈公博十日下午七时与谢婴白同赴海员工会改组之欢宴，八时参与黄琪翔为方鼎英部唐星副师长钱行（见同上材料）的事实，以及暴动开始时由广州及香港传出之消息都是黄琪翔团缴莫雄械，黄琪翔与朱晖日冲突（英文《香港日报》及中国各报均然），公安局职员还以为是囚犯越狱（见《民国日报》公安局职员谈话）等等事实看来，广东统治阶级对于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爆发暴动这件事，实在是事前一点一滴也未曾知道。

正因为统治阶级已经知道广州城内将要爆发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同时又不知道这一暴动的确定日期，所以当暴动开始时，不仅统治阶级走狗御用人的警察、军队都望风而逃，就是统治阶级的首领也都闻风鼠窜（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均当夜逃走）。

（2）两点钟内“赤化”广州城

三点三十分同时发动的教导团士兵与工人赤卫队，遵照原定下列计划实行作战：

1、赤卫队分为七个联队，担任攻打七个区域：“第一联队车伕工人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邮务五金工人攻打七、六、二警区署；第三联队粮食工人攻打太平戏院保安队；第四联队

建筑工人攻打大佛寺保安队及四区署；其余三联队攻击各区署……”(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召集之全国工会代表特别会议之报告)。“同时，也有特别队伍之组织，如破坏交通队、破坏电线电灯队……”；又有“汽车交通队，则准备载队伍及运物等……”(见同上特委报告之补充)。

2、教导团的三营士兵的分配是：“第一营担任解除邻近教导团的步兵团之武装；第二营担任解除驻在沙河之炮兵团及步兵营之武装；第三营开赴公安局……”(见A君报告)。

工人群众鼓起无限的勇气与热情，抛掷手榴弹，开射步枪，狂风扫败叶似的占了各机关，缴获许多警察的枪枝；虽然公安局有铁甲车及机关枪的掩护，但也未受大的牺牲，便能立刻攻下。

第一二两营教导团士兵“黑夜突击步兵团与炮兵团，很得心应手的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夺获大炮约三十门，缴得步枪一千五百枝”(见A君报告)。

我们的革命兵士及赤卫队能够这样迅速的占领各机关，与运输工人准备好了的几百辆汽车、公共汽车、运货车、小摩托车的帮助有极大的关系。

“工人的队伍占领了邮政局、电报局、无线电局、军营、全城各区的警察署、国民党省党部及其余全城军事要点……”(见M君《广东暴动的意义与教训》一文——载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莫斯科《真理报》)

赤卫队打开各囚狱，释放一切政治犯，“计公安局未决男女犯八百名，司法厅监狱女犯六百名，分监七百名，广东监狱

七百名，其他各处羁押犯人四百名，军事委员会军事犯二百名……”(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其中的共产党员及黄埔学生都马上武装起来，并自愿加入红军”(见M君论文)。

“约莫经过二点钟的时光，全城都落到暴动者的掌握中了。只在城市中心还有几处未能拿到：炮台式的李济琛的住宅，二、四及十二军的司令部……”(见A君的报告)。但据特委报告则谓：“还有三个军事机关未攻下：一是第四军司令部(八旗会馆)，一个是二十四师司令部(在仰忠街)，一个是观音山”；据特委报告补充则谓：“……其未攻下者还有：1.第四军部，2.第二师部，3.军械处，4.军事厅”；据叶挺报告则谓“惟广九车站、第四军部、观音山未下”。不过，总而言之，整个的广州城在暴动两点钟之后除了很少数的地方以外，完全落在胜利的暴动者的掌握之中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全城已经落在共产党手中，以公安局为大本营，各马路均悬有红布横额，书：“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反革命的张发奎、黄琪翔”、“劳动政府给工人衣食”、“八小时工作”、“工人监督生产”等字样，并有汽车多辆，巡行各马路，散发各种传单，其题有一为《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略谓：

“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势力，经过一次英勇的争斗，夺取了广东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都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了这次的暴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了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卫队的械，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队，用手枪长枪等，占据了一切反动政府的机关；许多革命队，占据了广州一切军事要

隘；现在他们已占据了第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粤汉、粤三、广九车站，其他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见十二月十三日《晨报》）

“广州工人代表会立即建立在学宫街渭滨书院处，而红军总指挥部则在公安局，赤卫队指挥处则设在旧省公署内，共产党部设在明星戏院内，苏维埃政府也设在公安局内……”（见特委报告）。转瞬之间白色恐怖的广州变成红色的广州了！真是“孙中山的广州变成列宁的广州了！”

（3）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及其活动

广州工人根据国际和本国阶级斗争的经验，知道工人阶级不能利用旧有的政权机关，来达到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他们必须破坏旧有的政权机关，同时，他们知道不仅破坏旧有政权机关，还要建设新的适合于被压迫阶级实行统治的政权机关，所以当它们一占领和破坏广州市一切旧的政权机关时，立刻（五六点钟时）——见特委报告补充——便成立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以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苏维埃政府的委员是十六人，都是在暴动前秘密状况下由工农兵团体选举出来的：“十个工人代表是由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选出来的，革命的兵士派来三个兵士作代表，广州近郊农民协会派来三个农民代表（但只有一个人早点到了，并且积极参加活动）。”（见M君论文）

据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载，苏维埃革命政府职员如下：

主	席	苏兆征(未到前张太雷代)						
内	务	委	员	黄平(兼外交)				
肃	清	反	动	委	员	杨	殷	
劳		动				周	文	雍
土		地				彭	湃	
司		法				陈	郁	
经		济				何	来	
海	陆	军				张	太	雷
秘	书	长				恽	代	英
总	司	令				叶	挺	
总	参	谋				徐	光	英

大家都知道,苏兆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职工运动著名的领袖,何来是省港罢工时港政府坚决的对抗者,彭湃是海陆丰农民领袖,其他职员也都是著名的为工农群众热烈爱护的革命领袖,所以即就政府职员成份一项看来,也可证实这一政府是工农阶级利益忠实的拥护者。因此,反动的广州《民国日报》也不自觉的喊出:“……早晨八点钟时,整个广州的反革命力量已经被肃清,广东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宣布成立,成为广州的最高政治机关,因此就建设了一个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政权,广州居民都拥护这个与广东一切反动力量斗争的新政府……”

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发表告全中国工人农民和兵士们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宣布了整个对内对外的政纲(政纲见后),以昭示自己的阶级面目和满足劳苦群众的需要。

苏维埃政府在军事倥偬和全局粗定的局面之下，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群众，进行扩大暴动和巩固胜利的工作：

宣传方面

“新闻工人，即行罢工，一切消息机关，完全停止”（见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使反革命失去宣传之工具，同时，立即出版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旗》。

“市中贴有各种宣传标语，其所标为：打倒农民工人的仇敌李济琛、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农人耕有田，工人食有米；能予民众以和平者惟苏维埃之农工兵士而已……”（见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

“……印务总工会，亦发出传单……”（见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

“七时已组织宣传队……”（见特委报告补充）

组织方面

“七时天明，全市工人参加已达二万余人，于是将各队伍重新编过……”（见特委报告）。

“七时已组织宣传队，没收粮食队，交通队。”（见特委报告补充）

检查邮电——“谁没有入门证，便不能进邮政局和电报局……”（见十二月十某日广州《民国日报》）。

防守各街巷要隘——“迨晨六七时之间，则闻枪声四起，密如串炮……已知事起非常，乃即派干员入城侦探，探见各街口各路口已满布军队及工人男女学生，荷枪实弹，禁止行人通

过,严阵以待,颈绕红巾,又喝口令……”(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载:《莫雄部军官口述剿共之经过》)。

“十二时在第一公园召集苏维埃大会,但因是日群众多愿去攻打敌人,以致参加人数甚少。”(见《工代特委报告》)

武装方面

“在占领城市以后,立即组织工人队,所有在沙河军营内夺得之武器与火炮,均集中在革命委员会的司令部之内(即旧公安局内——作者附注)”(见A君报告)

“如果共产党员在街上遇见从囚牢出来的犯人,以及工人、苦力等,便给他们武器和红色徽章……”(见十二月十某日广州《民国日报》)。

“许多无武器的工人,跑往公安局领枪……”(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告广东同志书》)。

“广州工人在革命的军官与兵士同志的指导之下……不仅学习应用手枪、长枪,并且学习应用很新式的战争武器——机关枪、速射炮、铁甲车……”(见M君论文)。

“……同样,在军事俘虏和国民党政府被解除武装的兵士间作煽动工作,结果数百的俘虏兵士和军官宣布愿意加入红军,重新拿起军械为苏维埃而奋斗……”(见M君论文)。

经济方面

“……派队没收粮食……”(见《工代特委报告》)。

通告商民售卖生活必需品——因此,“所有商店的营业都停止了,但可以买到肉、鱼以及其他必需的食品……”(见十二

月某日广州《民国日报》)。

不顾长堤一带猛烈炮火的攻击,尽力企图占领中央银行。

对待反革命

“市街上遇有穿长衫者,即目为土豪劣绅,须受身体检查……”(见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工人相率往各反共工会复仇,如机器总工会所属各分会,广东工总会,悉被捣毁……”(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

“又检查市内之反动派,女子共产党员亦参预其事,时有二八妙龄女郎,拦阻欲行避难之伟丈夫,而检查其家财。”(见十二月二十一日《顺天时报》)

搜查东山及葵园——十二月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中说:“十一日余离葵园约半小时(大约上午七时左右,因据陈公博自述,他是六时三十分离开葵园的——作者附注),有便衣束红带者五人,带同教导团三十余人围缴葵园军械,驻园宪兵一小排,不能抵抗,枪械全被缴去,其时余妻仍寓葵园,但共匪以余尚居东山而非寓葵园,只向东山私宅搜索……”。

“……广州苏维埃在它的革命政权之下,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铲除境内反革命及其侦探。奋斗的工人表现一种很大的猛烈和雄勇,以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拘捕和枪杀了许多有名的剥削者、反动者、警察、叛徒、侦探……和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军官……”(见M君论文)。

只有由劳动群众自己的力量诞生出来的苏维埃政府,在

它存在的第一日之中，在劳动群众自发的伟大创造力的活动下，才能执行上述的各种工作！

(4) 暴动中的农民、妇女与青年

许多人以为在广东暴动中，农民、妇女与青年未曾起来参加的。不过参加人数的多少，固然是一重要的问题；但农民、妇女与青年曾经参加这次的英勇斗争，并且参加人的行动都很英勇而积极，这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关于妇女与青年

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说：“中大学生小部分加入，共产党妇女持红旗沿途高呼解放口号”。

十二月十八日《晨报》载：“市内青年同男女学生，各提新式驳壳枪加入作战”。

十二月十四日《顺天时报》载：“……时有二八妙龄女郎拦阻欲行避逃之伟丈夫，而检查其家财”。

M君论文中说：“……特别要指出的，就是无论在暴动前和暴动后，无产阶级之青年（在中国少共指导之下的）和无产阶级的妇女非常积极的参加革命。”

在红军队伍中拿着武器斗争的女共产党员和女工，在码头上英国海军的眼前拘捕了白军的逃兵，指导了供给苏维埃军队饮食的需要，对军事委员和军事参谋部的技术上的帮助，做了红旗子和运输，参加了政治宣传工作和作了红色的看护妇……”

关于农民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载：“……同时东西南三方面农军蜂拥入市”。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载：“……现市内商店一律闭门，市中除头缠红布之武装工人农民，及手持锄锹之农民外，绝无行人……”。

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共匪暴乱时三大铁路情形补述》中说：“……三大铁路中以广三铁路损失为最烈。查十一日十二时，客车抵石围塘，车载有农匪，即持械向车头袭击……距石围塘上街山村小蛇园各处匪闻声疾至，猛力向车头袭击……”。

又同日该报载——《兵工厂工友剿灭共匪之补述》中说：“……正调动间，忽据探报：横泽集合大帮农团在该处誓师……”。

特委报告补充说：“农民起来的已有芳村、花地、西村等处，亦次第占领乡村”。

叶挺报告中说：“广三铁路车站已于十一日为数百农民占领，但因海军阻隔，很难与广州之我军联络。”

此外，“在广东暴动时，东江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正在向外发展，东江革命委员会决定以红军第二师及农军一部向惠州移动，准备与广州取联络，……”（见王君谈话记录）。

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及劳动的青年妇女，当无产阶级起来武装夺取政权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5) 帝国主义与各种反革命力量之动作

1、英日帝国主义在广东暴动的第一日之工作中心是：把一切反革命的中心人物都由广州救济到香港或河南去，以便组织反苏维埃的进攻（由公安局逃出之朱晖日，便是由英军渡舰走的，见王君谈话记录）；同时，准备着公开干涉和帮助反动的国民党军阀镇压暴动。

十二月十三日《大公报》载：“……因恐惧故，水手都谢绝驾驶开往香港之船，有英国军舰保护船只靠近码头。”

又十四日该报载——东方社香港十二日电：“……海员工会即下令罢工，搭乘各轮船之海员，一律下船而去，与香港之联络船全部停开，但因避难拥挤之故，由停泊沙面之英舰水兵运转一只华船，昨夜（十一日夜——作者）更深始到港……”。

同日该报载：“……沙面将与一切外部之交通断绝，宣布临时戒严，前方有日英军舰担任警备……”。

北京《益世报》十二月十五日载：“……十一日夜日本陆战队入广州城”。

2、广东反动的军政领袖在暴动第一日的中心工作是：会议、拍电、遣兵调将，希望立刻消灭苏维埃政府。

据十二月二十日广州《民国日报》载——《第五军陈副官长口述之护党军回师灭共情形》说：“……方证实系共产党肇变，即再由电话报告军长，同时张总指挥发奎、黄军长琪翔、邹厅长敏初等由河北渡河往大塘与军长会面，军长即由大塘赶回海幢寺军部，共商讨共办法，是时已天亮。陈委员公博亦继到军部会商，后各下令调军，李军长即拍电往韶关，调陆周两

团、江门潘团、佛山林营李营等回省，黄军长调肇庆部队旋师，此电幸早发出一小时，过一小时后，电报局已为共匪占领矣……”。

又同日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说：“……李福林同志在大塘用电话通知第五军部专船往江门催取援兵，至十时余，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邹敏初各同志皆由大塘来，海军处处长冯肇箴同志亦自宝璧舰来会，当时所感困苦者，则李济琛以攻湘之故，将第五军全调乐、韶，以致河南无兵可调，其时长堤中央银行之火已发，余等目睹惨状，手无援兵，至为焦灼，不得已与张发奎、黄琪翔、冯肇箴诸同志至土敏土厂，登宝璧舰，张发奎与余居留宝璧，黄琪翔则乘江大舰沿河西下，炮轰长堤之敌。余等在宝璧舰发命令二道，一由小舰传达肇庆，催调二十六师，一以电船催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部队回省……”。

“十一日粤汉铁路车站被工人赤卫队占领，搜获李福林于是日早拍至韶关调兵一团回江村车站（距广州四五十里）进攻广州的电报。”（见叶挺报告）

3、机器工会的工作是：组织敢死队，准备为反革命效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载——《机器工会工友协剿共匪之经过》说：“本月十日晚十一时许，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电知本会，闻共逆密谋作乱……四时许，广州市面已发现枪声，知共产党起事……即于十一日早晨速函召各支分会会员到会……立刻宣誓讨共，并由干部挑选精诚勇敢者为头队敢死队。此外，所有会员二千余人为护党讨共头队敢死队，每队五十人，共有五队，专任冲锋渡河；后预备队每队

五十人，共有十队，专任保护本会及掩护头队敢死队渡河之责……”。

苏维埃广州十二日的混战与十三日之惨败，已潜伏在十一日各个反革命活动之中了！

(6)红白激战

十一日下午及夜间还有好几处继续或开始着红色工人、兵士和臂缠白袖章的国民党的官兵的激战：

第一，据黄平同志说：观音山及中央银行本日均为红军占领，未攻下的四军军部（有二百个拚死的兵士以机关枪掩护作战）、李济琛住宅、广九车站等处，均继续着激烈的战争；长堤一带时遭张发奎指挥之江大舰的炮火袭击。

第二，赤卫队为占领电灯局，与普浪码头附近电轮及天台二楼上之三队机器工人（头队敢死队二十五人加后队敢死队五十人）激战（见十二月廿一日广州《国民新闻》）。

第三，河南李福林两团士兵，以炮舰掩护，于十一日晚开始沿广九路线进攻；但几次进攻，都被红军击退，因而转回河南原防（见十二月某日广州《民国日报》及叶挺报告）。

由此可见，十一日夜晚之广州局面是：苏维埃政府尽力企图肃清广州市内之残敌；反革命势力开始企图夺回广州市面之反攻。

(7)暴动前力量之对比

被压迫阶级之暴动群众，无论在何时何地，在暴动未开始之前，其武装上之数量与质量，总是不如统治阶级的。所以如

果仅以武装力量之相差为广东暴动失败主要原因的意见，固然是绝对的不正确；然而如果与中外资产阶级各报同一见解，即以为“共产军所以成功如此之易者，因广州军队殆已全部开至西江，广州城中兵力单薄”（见十二月二十三日之《晨报》），则其意见亦不过是相对的正确；既与当时事实不相符，又抹杀了统治阶级武装之易于崩溃，及革命的工农兵士的英勇致胜的事实。据我们手头现有的材料，可以证明当暴动开始时，统治阶级在广州城内之武装力量是要超过暴动者五——六倍以上。

1、据叶挺报告

我们的武力：

教导团一团（约一千二百人）

军械局守备兵一连（未参加暴动）

黄埔特务营两连（未参加暴动）

宪兵一连（因通知不周到被教导团缴械）

工人赤卫队组织约三千人，但枪械仅五十枝上下。

敌人的武力：

第四军警卫团两营

兵工厂守兵一营

新编第二师有兵一团结约八百人

新编第三师有兵一团结约六百余人

炮兵团约五百余人

步兵团约六百人

警察武装约一千枝

机器工会有枪约一百枝

(河南李福林军两团,黄埔军校有学生千余)

(附注)据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载——《机器工会协剿共匪之经过》,证明机器工会会员有二千余人(据可靠材料,事实上只有一千余人——作者注),参加镇压暴动的行动,其中有七百五十人组织在敢死队内。

2、据A君的报告

广州内力量对比如下:

红色方面教导团约一千二百人

由各工会会员组织成的赤卫队约二千人

武器——二十九枝盒子枪

二百个炸弹

白色方面广州城内剩下的有新兵四千人

警察约一千五百人

3、据特委报告

第一日参加者: 工人二万余人

军队一千六百余人

农民二千人

工人武器:

炸弹二十个

手枪十五枝及一切刀、棍、剑、铁尺等

军队完全枪枝,机关枪无,农民不知

即是:据叶挺报告,革命方面参加作战的人数约为四千二百(三千赤卫队加一千二百教导团兵士),枪枝一千二百五十只(一千二百教导团的加五十只工人的)。

反革命方面参加作战的人数约为七千(步兵、炮兵、警察六千人加机器工会一千余人), 武装有步枪约四千六百只(步兵约三千五百只, 警察约一千只, 机器工会约一百只), 炮至少约三十余门(据以后教导团缴得该团炮的数目)。

据 A 君报告, 革命方面参加暴动作战人数为三千二百, 武器为盒子枪二十九只、炸弹二百个; 反革命方面人数为五千——六千, 枪枝约四千——五千。

据特委报告, 参加暴动人数为二万三千六百, 武器为炸弹二十个, 手枪十五枝, 刀、棍、剑、铁尺等, 步枪一千六百余枝(军队一千六百加农民的)。

总而言之: 革命方面的武器是, 手枪与盒子炮至多不过三十只, 炸弹至多不过二百个, 一人步枪至多不过五十枝, 兵士枪枝至多不过一千六百枝; 反革命方面的武器则至少有四千六百——五千以上的步枪, 还加上至少三十五尊以上的大炮。

至于使用武器的技能, 虽有一部分的新兵, 但比较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使用武器的中国工人群众, 总多少要高明一点吧。

然而为什么广州城在两点钟以内成为暴动工人的广州呢? 这是统治阶级军队在暴动者热烈情绪和英勇争斗之下易于动摇和崩溃的原故, 而广州城决不是广州革命工人兵士垂手而得的!

二、暴动之第二日

(1) 反革命合力攻广州

反革命之各种力量(帝国主义, 原来互相仇视之各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许志锐等, 海军反赤两舰江大、宝

璧,警察,民团,机器工会下之一部分反动工人),因工农兵暴动胜利的威吓,立即团结起来,拚命的向苏维埃的广州市进攻。十二日早晨河南李福林军分兵两路渡河,一路由腊德,总指挥李芳率部队四营,会同四军及新编第二、三两师一部分,渡河向东门进攻;一路由河南戏院码头,林营长小亚率领全营部队,首先由正面渡河……新编第二师部队则继续渡河(见十二月二十某日广州《民国日报》载——《第五军陈副官长口述护党军四师灭共情形》)。此外“某要人赴沙面,从那里通知在某外国军船上之新调来的军队到河南(此处调来军队为黄埔黄慕松团、虎门许志锐团、江门潘枝团——作者注)——见十二月某日广州《民国日报》。午刻应李福林昨日电调之韶关周定宽、陆满两团,佛山林营李营均已开拔回省(见同上陈某口述)。驻留瘦狗岭之莫雄团第一、二两营向西门进攻,第三营向观音山进攻(见十二月十一日《国民新闻》——《莫雄部军官口述缴共经过》)。“中国炮舰游弋于江中向江滩开炮射击”(见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日本炮舰亦向我们猛烈射击”(见叶挺报告)。“驻粤领事团于十二日情形紧急之际,曾举行会议,议决实行自卫(?),英兵二千名,法水兵四百名,日本水兵三百余名,因日法英领事之调令,现已分守沙面,向华界为严重之戒备(?)……”(见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败逃的警察集中在九个区域内与赤卫队激战(见十二月某日广州《民国日报》)。民团从北部来攻(见A君报告)。机器工会的反动工人与赤卫队互相射击,时起时止(见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民国新闻》)。

几千的武装革命工人和士兵,一方面继续作肃清残敌的

战争,四军部二十四师师部等均未攻下(据工代特委报告);他方面抵抗四面包围之三团七营及新编两师之一部分军队之进攻。同时又受帝国主义军舰及中国海军炮火之轰击,更加上警察民团武装机器工人的扰乱,以致在军事上形成反攻为守的形势了。然而以炮舰掩护着进攻的李福林军的四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未能登岸(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敌人所有的进攻在下午六点钟时完全被击退(见A君报告)。革命工人和兵士杀贼的奋勇,真非意想所及的!

(2)红白军激战要塞

观音山地势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市;公安局暴动前是反革命的中心政治机关之一,暴动后变为高悬工农兵联合办事处匾额之苏维埃政府。在军事政治上,这两个地方的得失,有极大的影响和意义,所以当陆满团午刻由韶关赶到时,即猛扑观音山(见十二月二十五日广州《民国日报》)。约下午一、二时左右,莫雄团第三营又进占观音山;莫雄部虽获暂时胜利,终被红军工人兵士赶下山头去(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陆团则“血战数小时,冲锋十余次”,仅能“占领附近该山之红墩”,观音山正中的炮台,始终在赤军手里,时已入暮,是夜两方遥击,彻夜不绝(见十二月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朱晖日曾三次企图占领公安局,次次均失利(见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由韶关调来之周定宽团在攻占黄沙车站之后,即乘势猛扑公安局,虽已达到距公安局二百步之处(见A君报告),但终被由南边调来之教导团一营兵士击退(见叶挺报告)。

(3) 苏维埃政府之活动

苏维埃政府,虽然处在这样戎马仓皇的情形之下,却依然从容的积极的领导群众活动着,据我们手头现有材料看出苏维埃政府本日曾领导群众进行下列工作:

1、召集苏维埃大会

十一日上午十二时在第一公园召集第一次群众大会,因是日群众都愿去攻打敌人而到会者甚少。广州工人代表会于十一日夜曾召集全体职员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召集群众大会之方法。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在西瓜园举行工农兵大会,到会者约万人,在这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府之成立及政纲(见工代特委报告)。到会群众对于工农兵团体在秘密时期中选出之苏维埃代表名单表示热烈的拥护,对于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宣言政纲表示热烈的欢迎。

2、改编警卫团成为五连(见叶挺报告),分配各联队驻防地点(见工代特委报告)。

3、没收粮食(见工代特委报告)。

4、捉拿反动派,各工会恢复办公,没收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会址(见同上报告)。

5、训练俘虏之敌人,准备给械编伍(见工代特委报告补充)。

6、颁布如下的纪念死难烈士的宣言(原文见本书,此处略——本书编者注)。

(4) 张太雷之死与军事危机

张太雷不仅是广东暴动政治上组织上的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同时还是暴动军事上主要的指挥者。他是广东苏维埃政府的代理主席和海陆军总长，他的一呼一吸都与广东苏维埃政府息息相关的，不幸他在西瓜园群众大会的归途中，在惠爱街上遇见了由大北门来的敌兵一队，以致死在汽车上（见叶挺报告），于是全盘军事指挥便失去了头绪。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一九〇五”（即俄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失败的莫斯科暴动——作者注），并且“始终未能确定的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他在报告中亲自这样写的——作者注）；又加之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所以太雷死后，红军与赤卫队便失去了统一的实际的领导和指挥。此时战争最烈者为观音山、长堤及西关（见王君谈话纪录）。本日虽将教导团改编成五连，宪兵一连，也加入作战（见叶挺报告），以及释放的政治犯一部约六百人武装应援观音山及长堤，但其余各处无生力军增加（见王君谈话纪录）。教导团两日伤亡约三百余名，天将黑时，该团团长与伤败之学生很多，拥回公安局来，表示无法再战，“工人赤卫队组织松懈”，又因“军事人材太缺乏，始终未能充实下级干部人材，使成为战斗组织”（见叶挺报告）。虽然有些“赤卫队从新编配，并派军事的人材当队长及指挥，因为工人对军事方面不懂，同时因语言不通的关系，作战时亦各自为战”（见《工代特委报告补充》）。“二千余的俘虏，也因无下级干部不能改编，大炮二十余门，亦

大都不会使用，机关枪二十余支，使用的也很少，教导团及赤卫队均不习于巷战，致不设防御工事，令工会负责同志组织三百名工人，作各处防御工作，但毫无成绩……工人军事智识甚浅，多不会射击……”（均见叶挺报告）。敌军方面虽屡战皆北，但各地援兵纷纷应调而来，有加无已。

十二日下午苏维埃政府在军事上已陷于楚歌四面的重围之中了！

（5）苏维埃政府之政纲

苏维埃政府的政纲，是在它存立之始所发布的〈告中国工农群众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宣言〉当中，及苏维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员会的命令中零碎发表的。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M君论文及中外报纸等），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对工农兵一般劳苦贫民有如下政纲。

广州苏维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广州革命工人用自己的血肉生命领导兵士农民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政府当然首先就要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政府的工人政纲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

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

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

工人监督生产。

国家保证工资。

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

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组织。

解散一切法西斯蒂的职工会组织。

立刻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同时，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全无产阶级利益而帮助苏维埃政权。

工人阶级懂得：不把整个社会从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苏维埃政府对农民、兵士及一般劳苦贫民都有鲜明的政纲。

农民的政纲是：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

杀尽一切地主豪绅。

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

消灭一切山边田界。

各村各区即成立苏维埃政权。

同时，即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东苏维埃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丰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暴动领袖彭湃为广东苏维埃政府之农民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工农革命军。

兵士的政纲是：

国有土地分给兵士及失业人民耕种。

各军队部应组织兵士委员会。

组织工农红军。

改良兵士生活。

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是：

劳动群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

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住。

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

取消劳动者的一切税捐、债务和息金(取消中国年底的还账)，没收当铺，将物品无报酬的转给劳动群众。

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政纲，是中国工农兵及一般劳苦贫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们继续着为实现这些政纲而争斗。

此外，苏维埃政府有一条鲜明的对外政纲，就是：“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这句简单的条文，其意义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欢呼，以及全世界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发抖的！

三、暴动之第三日

(1)为公社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太雷死后，军事失却领导中心，赤卫队、红军及一切革命工人拚死力与四面包围之各种强敌竟夜(十二日)激战；约十二日夜间，暴动指导者因误听敌人已至小北和十五分钟便到的报告，下令退却。于是教导团、炮兵连之一部分及赤卫队之一部分，便听命向东退却。赤卫队大部分因为各地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它还不是一个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编制既临时变更，指挥又不集中，巷战的情形无人周知，所以不能象教导团一样的全部安全退出。留在城内之赤卫队与革命工人单独的抵抗各方面之枪林弹雨。

本日上午四时，河南李福林军与昨夜由公益江门开到省

河的潘枝团与薛岳部（潘薛约三千人）以及驻黄埔之黄慕松部，大举反攻。据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载：“其作战计划，系仿照年前平杨希闵、刘震寰时办法，共分四路：第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河，进攻西濠口。第二路由广三驳轮运兵至黄沙登陆，以接应由北路南下之周陆两部。此两路均由第五军担任。第三路由土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由薛岳部担任。第四路由腊德渡河，沿广九路进攻，向东堤夹击，由驻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黄慕松部担任”。同时自江西撤退之缪培南、吴奇伟师约四千五百人，向北江制造局、西村一带猛攻（见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此外，“每路以两炮舰掩护，由张、黄、朱、李四人亲在舰上指挥”（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机器工会的反革命工人所组织之头队敢死队与后队敢死队，分三大队渡河来攻：“第一大队向海幢寺冲锋过河北后，即从靖海路进攻。第二大队绕黄沙，同石井兵工厂工人由沙基直冲西濠口……。第三大队由五仙门渡河，驾电轮及普浪电船乘载队员冲锋……”（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帝国主义方面，英国领事郝尔，借救济侨民为名，带同队伍，武装攻入广州市（见十二月十五日《晨报》）。

因此，可见未曾退出之一部分赤卫队与革命工人群众，在十三日早晨与大约二师（本日到省的十五师李群——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机器工会的工友协剿共匪经过》，加吴奇伟师），五团、七营及新编第二师之一部军队，至少中外八隻军舰（河南各军以两炮舰掩护进攻，据报纸所载，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军舰有“江大”与“宝璧”，其它数舰大概是乘火打劫的外国军舰），一千多反动的机器工会的武装工人以及

民团警察等作战！工人的武装还有许多是竹刀木枪！

上午八时，河南白军，四路同时冲锋（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步枪与水旱机关枪齐发，炮声隆隆，硝烟触鼻，流弹横飞，纷如雨下，所有附近各处，完全断绝交通，路上绝无人行，即居于屋内者，亦因火线太密，屏息不敢稍动。”（见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广州特约通信员执中的通信）赤卫军“据长堤河畔，堆沙包为垒抵拒，互战至十时许，然因市内有机噐工人千余名，齐出响应省军，向长堤一带攻击，以致前后受敌，遂不能支。但省军分途登岸，……革命军数人仍与巷战，直至二时许，始向小北及东部退走。”（均见同上通信）

观音山方面陆团于十三日早“再行冲锋，肉搏逼进，各路军队，同时并进。”（见十二月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莫雄团自拂晓增援后，以第三营附机关枪十排，向观音山反攻，而以第一营于大小北江一带包围，第二营则由上西门惠爱路进攻，三路齐集，势如排山……”“革命工人虽殊死战，但卒于本日（十三日）早八时被该团完全占领观音山……”（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

观音山既失，反革命力量乃群扑公安局，莫雄团由观音山向德宣路、吉祥路、惠爱路、四牌楼一带冲入，赤卫队“藉所设之机关枪阵地，死力抵抗”，“战争最为剧烈，该团用五次冲锋”（见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革命工人方始退却，此时黄沙已为周团占领，黄沙方面的赤卫队，因前后受敌，……退入西门”（见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占领西濠口之第五军之一部，虽然遭受退入嘉南堂的赤卫队，仍由楼上开枪扫下，但终因众寡不敌，以致该部得由维新路向公安局进逼，保守公安

局之赤卫队和革命工人们，奋勇御敌，用机关枪横射；刚打退敌兵时，机器工会第二队敢死队，又接连着第二次冲锋，同时“适四处大敌包围”，以致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被白军占领（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报》）。时约上午十二时左右，直到下午五时许，始不见便衣红带之赤色军人与手缠徽章之国民党的军队巷战，所有未能或不愿即时逃避之参加暴动者——武装的徒手的革命工人、一小部分兵士悉数被枪杀！广州苏维埃战士的英勇牺牲精神可以比之巴黎公社社员而无愧！张发奎李福林辈之残酷凶狠手段比之刽子梯也尔（Тбер）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了！在暴动一开始时，即被革命兵士完全抛在街上而代之以红领带之国民党的徽章，被劳动群众一概撕碎的白色恐怖的象征的青天白日旗，又重新出现于广州市上，广州的劳动群众又要任已被苏维埃政府宣告死刑了的国民政府来宰割了！

（2）苏维埃政府的余威

反动军队蜂蚁般的包围着苏维埃政府，但大家都抖颤着不敢进去；因为房顶上还随风招展着一面斧头镰刀大红旗，他们不知道这一面大红旗下还掩护着好些劳苦群众！他们情急智生，架炮来打这面大红旗，直到这旗被炮火打倒了，他们中有些人才敢向里面去伸头探脑！

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听着：斧子镰刀大红旗在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领土上已经飘扬了十一年！在广州城内也招展了三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心目中永远招展着！吓死你们！让你们颤抖而死吧！

(四) 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

一、暴动后的白色恐怖

(1) 谁把广州市变成“鬼城”？

工农兵的刽子手们合力攻下广州后，立即发出下列布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号夜间，在驻粤苏联公使馆唆使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人，号召本地匪徒和变节的军队，搜杀广东全城，焚烧重要商业区域，占领行政机关，肆行抢劫屠杀。

广东政府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夜以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薛岳、朱晖日领导之革命军，完全击败并消灭广东之共产主义，翌日恢复和平秩序”。（译自十二月十六日英文《香港日报》——Hongkong Daily Press）

中外反动报纸都闭起眼睛同声同调的唱它们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造谣侮蔑的老调。把广州城“杀人”、“放火”、“抢劫”的行动，都堆在“暴徒们”的身上！

革命者本来不是原则上反对“杀人”、“放火”、“抢劫”的，并且坚决的认为“杀反革命”，“军事上必要的放火”，“没收（剥削者和压迫者认为抢劫的）地主及大资产阶级的财产”，都是革命过程中必要或必不可免的行动。不过这次广州暴动者，对于许多非杀不可的人，却放而不杀；许多应没收的财产，却放着未动；而许多不愿意焚烧的地方，却被反革命的炮火焚烧！

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可以拿许多材料来证明。先就“杀人”这一件事说：关于暴动者方面，据中国各报所载，自始至终最多杀人不到二百一十，且在搏战时所杀者二百余，杀

反革命派只5人。“赤军仇视警察，被杀二百余名”（见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农工攻入粤市后，枪炮如串珠，公安局前战甚久，守卫被杀数名……”（见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中大学生被捕杀者三人，均为本党（国民党）忠实信徒、中大特别支部区分部执行委员，以努力党的工作，遂招共党之忌……”（见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事后追忆，所勉自慰者，则此次朱晖日、缪培南、薛岳、黄镇球、谢婴白诸同志，虽困处赤色恐怖，幸护保存，所最悲愤者，则沈藻修同志夫妇，竟罹于难……”（见十二月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

此外，苏维埃政府（旧公安局）内在暴动时，捕禁反动派七十七人（广州《民国日报》有整个名单）未杀，以致在失败时，他们出来引导反革命者屠杀暴动的工人（见《中共中央通讯》第十九期《广东专号》）。

只有疯痴白癫的人才会说：“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要杀人，让人家尽量的杀你们吧！”只有反革命派和其走狗才会说：“工农刽子手的有名反动派都不许杀呵！”

历史上无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宽大的多。巴黎公社未曾坚决的肃清反革命，以致遭受极残酷的失败和屠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莫斯科暴动的工人捉了许多少年士官生，在他们声明不再反动后就放了，以致他们跑到各地去组织反动的白军，延长内战；广州暴动的工人，不在暴动开始时即捕杀东山反革命的巨魁和已被捉获的反革命者，以致他们倒转来给暴动工人以大屠杀。这些教训值得每个革命战士深深的记忆着！

关于反动方面，中国各报都忍不住高呼：“广州市空前大恐怖”！“人类世界未曾见不忍言之惨状”！“鬼城惨象，不堪回首广州城市”！

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载：“福军夺回广州……杀戮共党五千余人”！该报又说“凡与此次暴动有关及负有嫌疑之数千人，均遭杀戮”！

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载：“有女共党多人，以被用棉花包裹用火油焚毙……”。

十二月十九日《大公报》载：“……剪发即赤化……反赤军曾拘捕剪发女子，十四日当即宣布按剪发罪枪毙之，宣布之罪状理由云，该女子等之短发即为赤化之证据！”

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又说：“……剪发女子罹于难者仍有数起……”“十二月十七日至少有华人六百人，因有共党嫌疑被处死刑”！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说：据“又一其他调查……除抵抗之兵士警官外，被共产党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迨不能不归罪于自称自卫军之李福林军及薛岳军，与右派工人会之广东工会及机器工会等之复仇的与报私愤的行为也”。据十二月十八日《晨报》载——广州十六日路透社电：“自剿灭农工暴动后，今日之广州真可称为‘鬼城’！据当屠杀时所摄之写真，见有运货车多辆载共产党尸体，高垒至三四重，络绎行过街市，运往葬地，马路伏尸累累，堆积道侧”。关于惨杀情景，十二月十一日《顺天时报》载：——日本记者（《每日新闻》德富记者——作者注）实地视察记中有几段写得最为凄切动人，兹节录于下：

“……正欲转入小巷，忽见路旁全身尽土之仰卧工人尸体，不禁为之却走数步，熟视之，则见其头上围有赤巾，其为共产党战士无疑，其前额部及右颊已不知去向矣，苍蝇喧聚，争食其肉，抑何惨耶？睹此情景，已无勇气前进……”

“由此西瓜园不远，共党军被李福林军猛击奋斗，至最后而被全灭之激战地也。崩坍砖壁之后，林木之旁，不论路上，不论河中，死尸伏满，余由此即驰车而过，至长堤之广州卫生局前，有工人二十四五名，用粗绳系列，悄然垂头丧气坐地，视往来之群众，似形怨望，其中突然有颜色浅黑，短发，状类工人之男子，如狂欲行，起立，发声高呼，欲将行过其前之一男子抓住，即向守备军哭诉何事。余观其举动，大抵系因暴动之嫌疑被捕，忽遇知交，以为神助，而哀其救也……”

“……路上到处皆有惨杀之尸体，大有血流成河之势。吾人睹此，不禁栗然而惧；而该时尸体，似皆收拾已去，嗣又见道路上有丈余地皆为赤黑人血，并有脑与脏腑杂于其间，当时附近一带，惨杀情形，大可想见。其拳大之石块，并木刀竹枪等，抛弃遍地，烬烟之余，中人欲呕，全身浸于血中之尸体，其臭难闻，惨酷诚难言状……”

“抵公园之广场时，见有三台之货车，满载尸骸，七八名之人夫向观音山右角而去。右侧之丛莽中，有十数名血腥之尸体，似新被枪毙者；而无情之鸱鸺，翱翔于上下。时夕阳已在山，时遥闻群众凄惨之喊声，且有似杀人之枪声若远若近……”

事实具在，谁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谁是人类的刽子手”，让全世界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国第三

党……老爷们自己去回答吧！

再就“放火”这件事说，在暴动方面，除了攻“中央银行”及“观音山”因军事上的必要而暂时对于很小局部用火外，其他大资产阶级的房屋是劳动者宣布没收作住宅宿舍的，当然不会烧毁的，小资产阶级及工人的房屋，更不愿焚烧的。在暴动失败前后几天内，所以东西南三方面大火者，它的来源中国各报已经回答了：

十一日大火的原因是：“中国炮舰游于江中，向江滩开炮射击……以致火药库一带于十一日发生大火，终日未熄（见十二月十四日《晨报》），“流氓借此时机，放火劫抢”（十二月十三日《大公报》）。

十二日大火的原因是：“海军反赤两舰，向天字号码头开炮，掩护李部作战，以致市内十余处火起”（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日本炮舰亦向我们猛烈射击，十二日大火就是日本炮弹所引着的！”（见叶挺报告）“海军尚服从张发奎命令，今晨（十二日）发炮攻击广州市”（见十二月十四日《晨报》）。

十三日大火的原因是：“福军自十二日夕刻至十三日晨，由炮舰掩护渡江”（见十二月十六日《晨报》）。

此后大火之原因是：反赤军占领广州后，“市内枪声时起，随处仍有焚烧杀害事件发生！”（见十二月十六日《晨报》载香港十四日合众社电）。

最后说到“抢劫”的事：

据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十二月二十三日广州《民国日报》）说，有李济琛所新委任部将袁虾九（土匪——作者注）参加抢劫；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也说，暴动时有“流氓藉

此时机纵火抢劫”；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所载，亦谓有“无赖之徒乘火打劫”。可见在暴动时有流氓、土匪、地痞乘机打劫是一件事实。

此外，在暴动时，劳动贫民当然有自动没收富人财产之事（老爷大人们所谓“抢劫”）。

中国军阀军队在任何战时战后，总是要把市民抢掠一空的；国民党军阀的军队也是不会例外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说：“追击共军入广州郊外农村之李福林军之一部，忽肆抢掠”；那末，在城内繁华街市的各军队之抢掠，当然更可想见了。

此外，在暴动开始的两点钟后，“市内秩序恢复”（十二月十三日《顺天时报》载——香港十二日东方电）。在暴动的几天内，市内还可买到食品；而据十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载——东方社广东十九日电——“商店依然未开市，阴鬱之象笼罩全市”！其他报纸亦都说“十九日广州秩序仍未恢复”！

事实俱在，谁把广州市变成“鬼城”这一问题，让全世界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回答吧！

（2）苏联同志血点滴溅流在全世界

劳苦群众心窝里

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反动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都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随时随地总想寻找机会与它为难。当反赤军攻下广州时，便一口咬定苏联领事馆与广东暴动有关系，“十五日下午四时，李福林军队分为两路，向太平路苏联领事馆署及山东领事官邸袭击……”（见十二月二十一日《晨

报》),结果“围获俄人十三名,认为须负最近扰乱之责任,中有三人被枪决,其余者于执行前围绕全城,游街示众”,“任许路人任意侮辱,结果有身无抵抗力之罪犯数人,为小刀刺伤”(见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大公报》。当“反赤军搜检俄领事时,曾有二女职员表示反抗,为军队当场击毙”(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又有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载:“广州被捕之俄人,又有五人被在公共场地执行枪毙”,“中有俄副领事及俄国妇人一名”(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据十二月十九日《大公报》载合众社广州十七日专电:“俄人被害实数,现已查知为九人!”“夫领事官与外交官异,虽在国际法上无何等之特权,然在礼仪上受相当之待遇,已成为习惯,而反共产派竟无所假借,敢于逮捕监禁苏俄总领事以下人员!”(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不仅逮捕监禁副领事及其他数人,竟在“认为须负最近扰乱之责”的罪名之下枪决了,怎不令全世界革命民众发指!!

苏联领事馆为外交机关,绝不会进行任何政治宣传煽动工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任何申辨。

至于中国各报登载,什么反赤军攻公安局时,有俄人四名,死力固守,“赤军战败前,俄人曾指挥共产党作最后之苦战”等等,好似俄人事实上曾参加作战者。现在我们假定:当暴动工人困战四周强敌时,居留广州市之外国共产党员,甚至于非共产党员的革命工人(俄人或其他国人),或有因阶级同情而个人奋起作战者,然而这并非甚么可怪之事。试一检阅各国革命的历史,那一次没有外国革命的战士参加呢?谁也不能禁止帝国主义者的“乘粤变共同出兵”(见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谁也不能禁止日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武

装帮助李福林、张发奎；同时，谁又能禁止居留广州市的外国共产党员（或革命工人）以个人资格奋勇的参加暴动呢？这都是“阶级的同情”，这都是“各阶级各行其事”！

苏联同志们的鲜血与广州暴动牺牲的中国工农兵的血亲密的流在一起，谁也辨不清那是俄国人的血，那是中国人的血，他们的血是为着同一目标（苏维埃政权）而流的！

苏联同志们的鲜血，不仅永远溅留在中国工农兵的心目中，将永远溅留在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心窝里！

苏联同志们的鲜血，不是空流的，他将化成“世界解放之花”，中国工农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苏联同志们之死，是不悲伤的，不痛哭的，不空口纪念的，不空口报答的，他们将踏着苏联同志们的血迹前进，创造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作为死难者的纪念碑和报答品！

（3）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

广州暴动唤起全世界和中国的反动阶级“末日将到”的自觉，于是进一步的加紧白色恐怖。上海方面，“闻粤变之后，龙华一带，下午（十二日）即大戒严，白昼遇可疑之人即搜检”（见十二月十三日《大公报》）。总商会发出讨共宣言，粤商允助白李军饷（见十二月十三日《大公报》）。

“军警于十五日包围商务印书馆，断绝附近交通，隔绝内外。”（见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宁国府寒（十四日）夜下令，撤消承认苏俄领事馆，勒闭其国营商业机关……。上海方面之公文，于下午五时送俄领事馆，同时，以护照给俄领事，限一星期内出境，他埠均照办……”（见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武

汉方面，“十六日早二时，胡宗铎命十九军第三师包围法租界及旧德俄英租界，断绝水陆一切交通，于三时配备就绪后，即命便衣队及武装军队，侵入俄英租界及法租界内，同时，开始搜索住户，其结果，共计拘捕共产党员及嫌疑者一百数十名，其中有断发妇女数十名……，苏俄领署亦首先被袭击，致死伤若干名……”（见十二月廿日北京《益世报》）。“苏俄总领事馆被卫戍司令部军队占领，馆员一律被拘去，俄总领事已带至司令部，此外，逮捕俄人约二百余名”，“共拘俄华党员一千一百四十余人，俄人占十之九，均解卫戍司令部。”（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十八日，“武昌有数百之教员学生及俄人数名，同以共党之嫌疑被捕，又汉口有外人廿名，华人卅名被捕，有妙龄女子五名，亦被枪决。”（见十二月廿一日《顺天时报》）在“雷厉风行”大杀共党的疯狂之下，连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詹大悲、李汉俊等也在“共产党领袖”的罪状之下被枪毙。全中国各地，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的工农学生都在“隶属共产党”，“企图仿效广东的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罪状”之下而流血牺牲！

帝国主义者不仅当“后台老板”从中指挥搜捕和枪杀革命群众的行动，并且公开的出面帮忙，“香港政府拘获由粤逃去之嫌疑人约四百二十人，内有共党委员十余，逃犯五六十。”（见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法租界于接到李福林照会后，即将乘十三日纷乱之际，逃往沙面之俄籍共产党人，逮捕和引渡（见十二月十八日《晨报》）。

汉口英法租界不但特开创例，一任中国武装军队搜捕中俄共产党员，法租界当局并把军队未曾搜得之共产党女领袖

向警予等，以相当代价，出卖于武汉刽子手枪杀！

二、暴动后之革命影响

(1) 暴动对广东之影响

任何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任何复辟后的资本家与军阀的报复，任何刽子手，都不能把广东暴动伟大的革命影响磨灭！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的赤色工人，在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仅撕去红色腕章徽章，依然潜伏市中与一般市民无异”（见十二月十六日《晨报》）。他们散布和深入到广大的工人群众里去，时时刻刻地在那里集聚力量准备再战。一部分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的号召（或者自动的）走到反动的军队当中去，他们认识了自己在暴动中的缺点，企图把自己好好地武装起来，并且把反动军队分化、破坏，以至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一部分去到农村中，实行尽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

广东所有的工人对于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仰，都猛进的增高。“许多在国民党影响下的工人”（甘乃光派的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都抱怨“共产党为什么不早些通知他们暴动的日期”，甚至机器工会下的工人，“都说共产党要的是工农政府，并不是党政府——象如今抑制我们要求的国民党政府，我们何必反对苏维埃！”（见莫斯科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出版的瞿秋白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99页）

农民方面：“佛山附近农军十四日即联合工人起事”（见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海丰苏维埃政府扩到陆丰；五华、紫金等县农民都暴动起来，企图组织苏维埃政府。琼崖数县在年底时都变成镰刀斧子大红旗统治区域。北江方面，仁化、乐

昌，有新的农民暴动起来，也成立苏维埃政府。

军队方面：溃散投奔农民军之事，时有所闻（如汕头陈济棠部等）。军队下乡“灭共剿匪”时，高呼“兵士农民都是一家人”。在与农民打仗时“向天开枪”，把军队进攻的时刻和地点，大炮射出的目标地点等，都事先告诉农民（如在海陆丰等处）。

此外，据十二月十五日《顺天时报》及其他各报载——香港十三日东方电——李福林十二日夜“在第五军本部召集部下各将校训话，当时有共产系之青年将校以手枪连向李发三枪狙击……”。无论行刺人是不是共产系的将校，虽然这三枪都未致他的狗命，然而青年将校对反动将领都表示极端的愤恨，这总是一件不可掩蔽的事实！

统治阶级在出死力压倒暴动后，依然扩大和深入着相互残杀的勾当，政治经济情形都继续着加深破产。

广东的工人、农民和兵士时时刻刻都记得：“农民耕有田”，“工人食有米”，“土地归农民和兵士”，“给民众以和平者惟苏维埃政府及中国共产党而已！”。他们时时刻刻都准备着自己的血肉生命来恢复广州的苏维埃政府！

现在的广东是酝酿着工农兵大暴动的广东，是工农兵准备着恢复苏维埃政权的广东！

（2）暴动对中国的影响

“……广州暴动的影响，对于全国无产阶级亦非常伟大，离广东很远的北方工人都说：‘这样才干得痛快’；上海工人说：‘只怕我们的力量不够’。中国革命到此便不但进于‘苏维

埃阶段’，并且是已经进到了‘苏维埃的阶段’。苏维埃的红旗成了全国工农兵士群众反抗的旗号。农民斗争的发展更加深入和扩大了。北方天津、郑州等处工人阶级的斗争更进一步的调动群众(铁路纱厂等的经济斗争渐渐发动)之中，红枪会、天门会等原始的农民暴动不但日益蔓延，并且渐渐开始分化，开始有进一步的阶级意识。如河南红枪会分化出光蛋会，赞助共产党的农民暴动。四川的‘神兵’分化成为赤化派与非赤化派。如直隶(清远?)农民成千成万的到县城示威，反抗捐税等等，差不多各省都有。甚至奉天通化的大刀会举事攻下县城，也打起红旗。山东在去年还有天门会领导的农民斗争特别声明‘不抗正税’等的现象，而现在，开始分化了——群众反对不彻底的领袖了。江苏的淮安、枫溪、青浦、黄渡等处继续着发生无数的农民骚动；江阴、无锡一带更是逐渐深入，有些乡村到最近形成割据局面。当时尤其进一步发展的，如江西万安成立苏维埃，湖北黄安成立‘农民政府’，——其余如汉川、汉阳一带游击战争盛行起来。湖南南境，到所谓西征军入湘、唐系军阀倒台的时候，湘南有二十几县在农民暴动势力之下，尤其是醴陵以下与湘赣边境。”“广州暴动不但如此的领导了农民斗争，而且是领导兵士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广州暴动的有兵士参加，工农代表会议的新政策之发现，虽则是昙花一现，然而影响到全国兵士群众。不但广州有许多暴动工人加入军队，不但广东许多地方的武装斗争中，兵士甚至民团团丁开始与农民‘联欢’，投降到工农方面来。正在崩溃的湖南军队里，兵士大批的逃跑，或者跑到农民方面来。就是江西也有这种现象发见。其他普通的兵乱和军队崩溃的现象，在军阀

继续的混乱的过程中，更是不断的发生。这种影响正在扩大起来。北方的豪绅地主也觉得军队靠不住，自己天天造堡垒防备着农民。……国民党的反动与卖国又正在一天天的‘完成’。一般的经济财政的破产与全国横征暴敛，使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日益表示不满于现状。”^①（见同上瞿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94、95、96页）

广东暴动对于全中国农工兵为什么有如此广大的影响呢？因为：“广东农工兵用自己的力量所争得的政权，告诉全国每个工人，每个苦力，每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与每个被压迫的兵士说：‘假使你们想胜利，你们必须在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奋斗！’”（见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发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大纲》）

读者或者要说，这都是共产党员“自己恭喜自己”的话，那么，让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办的《顺天时报》，反动的研究系的机关报北京《晨报》等关于广东暴动的社论上所说的话介绍给读者们吧：

十二月十五日《顺天时报》的社论（标题为《广州共产党政府成立与可注意之要点》）说：“此次广州之变，共产党忽然抬头，其势力之强弱，虽尚未可预测，然而已提供不少使吾人注意的问题焉……第四，因共产党政府之成立，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分野，已极为明显，即一为军阀势力，二为国民党势力，三为共产党势力是也。此又可分为：右派，中央派，左派也。虽然，其

^① 原引文有误，已根据中共中央1928年6月出版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订正。

应注意者，此三派之分别，不过仅类别其势力体，非右派为一团结，中央派为一团结之意也。各军阀个个分立以争势力，固属明显，即在国民党内各人，亦争势力；而在国民党内有党籍之军人，由政治势力分类观之，其不能不编入于军阀者正伙；唯共产党大体上尚有团体，可推测而知也。第五，从来张发奎动辄被人视为左派，以为彼与共产党尚有联络，因此次政变，张非与共产党有关系之人物，业已大白；吾人今后当以之列入军阀系中，无所用其躊躇，纵有谓位于国民党内之最左列，然此亦非思想上有力之问题，不过当个人的竞争势力时，与西山派及浙江诸派不相容耳。”

十二月十七日该报的社论（标题为《世界三大派别及其比较》）又说：“广州之共产党政府，虽仅昙花一现，然对于中国政界，提供不少可以注意之问题，吾人已于日前论及之矣。而其关于政治之分野，欲进一步而有所论述。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势力错杂，国民党内虽有清党运动，然两党之分别，尚不免混淆也。此次因共产党立于表面而创造政府，两党之区别，始为明瞭，于是政界上大体可分为共产党、国民党、奉天派之三党。今就此三派，一比论之：据其所标榜之主义，则奉天国民两党，为共和的国家主义，共产党则固为共产的世界主义，由此点观之，奉天国民两党，一如其自身讨赤反共之声明，以共产党为其共同之仇敌，即由共产党观之，亦有同然。虽然，奉天两派在其主义上所以不能一致者，因一系保守主义，一系急进主义也；然而奉派在其形式上采个人善政主义，实际则为军阀的地盘主义也；至国民党在其形式上，系委员专制的民主主义，实际则不免政客的争权主义也。吾人对于国民党下如

此之批评，虽情有所不忍，然实因现在之国民党，实际业已堕落，不能不认其已丧失当初之精神故也。斯奉国两派……与民众间均缺乏交涉，其不能为大众所共鸣者，即由于此也。夫共产党其主义之善恶及方法之适不适，系另一问题，而在其主义、形式及目的上似为一致也。由此点观之，共产党较之其他二派，不能不谓为尤具有公党之性质也。因是其势力有浸润于民众之可能性，而与之之为敌之奉国两派，自己之弱点即在此处，不可不察也。”

十二月十六日《晨报》的社论(标题《中国之赤祸》)说：“北方情形，今且不谈，江浙两省，富庶甲天下……然半年以来，变成何种局面？今年新棉上市，每日跌价五角，且尚无人过问，华人所办纱厂，年内(阴历)概须关闭。地主有田，不敢收租，惧被指为土豪劣绅也。佃农胼手胝足所仅得之生活费，则悉数为苛征暴敛所攫夺。工而无所获，谁肯忍耐工作？沪上钱庄，自八九月起，即已收而不放，一届年关，倒闭者必踵相接；以最富庶之区尚且如此，则其他省份可想而知。武汉情形，更不必言，试问此无数失业之游民将何往乎？若辈日皇皇焉，为生活所迫，舍附和共产党以希冀或可打通一条血路外，又有何自活之道？依吾人观察，则国民党所遵循之路径，与其谓为驱共，无宁谓为养共。医师治病，必探病源，病源既得，治疗斯易。今国民党不平心反省其病源之所在，徒呼号于众曰：‘吾誓必驱共’，此无乃类于张天师画符咒以驱鬼怪乎？”

社会现象，本为事实所反映，有此事实，乃有此现象；今不谋所以消除此事实之道，而只求遮蔽其所反映者，姑无论其为不可能，即可能，亦有益耶？举世滔滔，大都类是，苟长此因

循，则赤祸之来，期或不远！今日共党之敌人，将尽为共党之恩人矣！吾人之为此语，又岂独对国民党而发哉？”

这些帝国主义，中国买办阶级资产阶级雇佣的报馆主笔老爷们的“社论”，对于广东暴动的估计，到底是怎样的呢？他们说的话，明显可以归纳成下列的结论：

1.前此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党之独立政治面貌；广东暴动后，共产党已鲜明的展开自己的旗帜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之独立政治力量！

2.国民党与奉天派都是一样的军阀地盘主义与政客争权主义，对内是冲突不可调和，对外是与民众毫无交涉，只有共产党是有主义，有团体，有方法，有目的，而且有群众拥护的政党，胜利终归是共产党的。

3.所谓国民党左派，由汪精卫到张发奎，在广东暴动后，完全暴露了狰狞的鬼脸，“毫无踌躇的列入军阀系中”。整个的国民党已经变成腐臭的尸体，使群众认识，只有共产党是唯一的拥护工农兵贫民的利益的政党。

4.中国经济政治恐慌，有加无已，工农兵及劳动贫民为生活所逼，舍受共产党领导而走上革命的大道以外，绝无其他出路。

5.农民群众要求土地和建立自己的乡村政权，所以，“地主有田也不敢收租，惧被指为土豪劣绅”而立被农民处死！

6.无论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惨酷到什么程度，但另一方面，只是促成和加速工农革命力量的发展。“赤祸之来，期或不远”。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是一个崭新的苏维埃的中国！

由此，可见广东暴动所给予全中国的伟大革命影响，不仅无产阶级的战士充分估计到，就是最反动的“社论家”们也无法隐蔽这一真理了！

(五) 结 论

根据我们以上的所说的各种事实，及我们所有的一切材料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A. 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而且必要产物。

B. 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时的一战，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C. 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暴发源于群众英勇斗争，群众为拥护它的胜利而争斗到最后一滴血。它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

D. 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

一、广东暴动失败的原因是：

(1)准备工作不充分——工人方面：1、即赤卫队还有千人未得通知(见特委报告补充)，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政治罢工等)——如内河船工人，不能与我们一致，还为白

军作运输，我们想找几只火轮使用也不能得到（见叶挺的报告）。2. 对黄色工会群众没有准备工作，而且态度不对（见中共第六次大会中央《政治议决案》），机器工会下的工人有一千余参加镇压暴动，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下的工人对暴动守中立。

（2）农民方面：——因时间仓卒，只通知近郊农民，而且通知得也不完善（见特委报告补充）。

（3）军队方面：——1、对广州市以外的军队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或者工作非常薄弱。2、对海军完全没有工作。据中国各报所载，在张发奎未逃到河南前，虽然海军舰“呜呜作响”历两小时，但并未开炮轰击城市。且据叶挺报告：“海军李福林军最初不敢向我军射击，并有悬白旗者”。可见海军并非没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3、对革命军队工作也粗心得很，如①第四军部内有守兵五十余人，内有高级参谋是共产党员，事前未得党的命令，以致围攻半日他还莫明其妙。②“省长公署有宪兵一连是我们的同志，但事前未得到党命令，以致为教导团所缴械”（见叶挺报告）。③城市附近有一大军械局（在东山左侧、观音山右侧），防守该处一连兵的连长是共产党员，但他未有得到占领该处及如何行动的通知，直到十三日工人军队到该军械局时，该连长乃潜逃（据王君谈话记录）。④党部与青年团自己准备暴动工作不充分（见中共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

二、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泛——虽然在发动群众方面有许多的困难（第一，广州工人群众一向分裂的，不但产业工人中出了机器工会的组织，便在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于广

东总工会所属之外，还新增了所谓“左派”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第二，广州工人运动两年来都以省港罢工工人作领导……这一部分的群众不但两年来学会了一切斗争的方法，并且有很多人参加过工人纠察队的工作的，一旦罢工工人解散，领着救济费回乡的便占三分之一，留省的不过万人，在这万人中有五千人领了小贩执照，失业四五千，赤卫队的秘密组织留存在罢工工人中只得五百人——有一连敢死队是由罢工工人组织的，另一连是车夫，所以反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解散罢工工人一事，实给我们发动群众工作一个重要致命伤；不但在暴动中损失了最大部分群众，且在政治斗争中又失了广州市工人一个最好的领导者。第三，广州市革命工人组织多是行会式的……第四，工代会属下积极工人领袖多半参加了赤卫队的组织……群众发动自更少人领导了。第五，党在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群众中的组织，仍是因袭着行会的系统划分支部……”，但二百万人口的广州市，赤色工代会之下的工人便有二十万，而参加暴动的不过二万余人，店员等更未起来参加，近郊农民参加的人数也非常之少，暴动的社会基础实在不广泛呵！

三、工农行动不一致和缺乏联系——许多农民暴动在广东暴动前发生了，佛山等地的暴动则发生在暴动失败以后，近郊农民未能尽力参加暴动和实行破坏交通等的游击战争。

四、中外反革命力量联合的进攻——（1）帝国主义方面：英帝国主义把一切反革命中心人物运往香港河南组织反革命的反攻，以炮舰威胁海员工人，禁止罢工；但江门海员依然罢工了！以商舰挂英国旗代国民党军阀运兵，直接以四艘炮舰掩护李福林军进攻（据王君的谈话记录），军舰“木林”号调动

军队到城内各地(见M君论文)。日帝国主义十一日以陆战队攻入广州市,十二日用炮火猛烈轰击市面,并以陆战队在长堤游行示威。美帝国主义以小军舰恰拉门狄号亦载军队到城内各地(见M君论文)。英日法领事当十二日紧急之际(即当反革命的反攻不得手之时),调令陆战队登陆助威,暴动开始时各国领事即在沙面会议,“共同出兵”干涉计划,终于“实行非正式的武装干涉”。(2)军阀方面——以两师五团七营以上兵力的军队压迫暴动。(3)中国海军方面——连日的轰击城市掩护李军作战,隔绝占领广三路之农民与城市工人联系,使南石头一千余政治犯不能救出,某地有七千余手榴弹不能取出使用;使长堤一带,始终不能为暴动者确实占领,更不能渡河南进攻李福林军队(见叶挺报告)。此外,还加上民团,警察,武装机器工人的扰乱后方。

五、暴动者军事上的错误缺点和困难

(1)军事上的错误:1、未在暴动开始即刻包围东山,捕杀反革命的主要领袖(张发奎、黄琪翔等),以使他们不能号召和组织反革命的反攻。2、未曾在暴动得到胜利后,即刻(十一日上午占领全城后)进攻河南李福林军,以致“反攻为守”,使河南形成反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中心。“防守是暴动的死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格言,又在事实上证明一次。3、未曾即刻占领军械局和兵工厂,以致不能扩大暴动者的武装。4、未曾建立健全的集中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司令部设在公安局,赤卫队指挥处设在旧省长公署内。周文雍是赤卫队总指挥,在赤卫队中亦无普遍足够的威信;总参谋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红军总司令叶挺则表现消极怠工)。5、未曾即刻破坏和占

领最主要的交通机关(电报局、电话局),以致敌人能够打电到各处调兵,并且“市区内的军用电话未能截断,以致第四军司令部十一日上午还能与观音山之敌通话(叶挺报告)。6、未曾建筑相当的巷战防御军事。7、不能充分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退却,以致遭受极大的牺牲!王君谈话纪录所记退却情形如下:

“红军司令部于十二日(约在下午六时)接各处报告谓各方均被包围,此时暴动军政总指挥者张太雷死了,乃决定于是晚十时后,分批向东山退却,原先决定计划:1)西关部队先行撤退;2)长堤一带部队,掩护西关一带部队退却后,再行退却;3)公安局部队至晚十二时撤退;4)当以上部队撤退时,观音山部队须猛攻,候各部队撤退完了,他们才撤退向东山前进集中候命。后因情形紊乱,此决定未能传达出去,当时特委又有如下决定:1)教导团、赤卫队向北江退却(因当时朱德部尚在北江与湖南交界处),准备联络朱德部在北江实行土地革命。2)其余工人同志将枪械分藏各处引退。结果,命令仍未传达,只教导团一部分约九百人,黄埔宪兵营及警卫团一部,连政治犯共约一千一百人,于是晚十二时到东山集合。但此时总指挥部叶挺及苏维埃委员均冲散未到,至十三日早教导团自动向花江扬江退却(后经过龙门河源紫金而到海陆丰,汇同海陆丰农民与第二师红军在东江帮助农民暴动),其余各部队至十三日尚未接得退却命令,他们仍在奋勇中与敌抵抗。至后敌人逐渐增多,工人及其他兵士除逃走者外,其余四千人,均被捕枪毙。

退却极忙碌,除自使用枪枝外,其它大炮机关枪子弹及已经没收的中国银行纸票及现款,均未带走;尤其是退却时,在

观音山工人及教导团约三四千人，支持至三日，始被敌包围缴械枪毙。工人被包围缴械之原因：无子弹，前后均被敌包围故也！8、被解除武装的兵士，共约二千余人，经过一次煽动，均愿加入红军工作，当时没有人去组织及指挥他们，卒将他们送到四标营大营房禁闭着，他们未能直接为苏维埃而与反动军队争斗，‘嗣后，苏维埃失败，兵士犹有怨言’（见广东省委红旗兵士生活）。”——见王君谈话记录。

（2）军事上的缺点：1、赤卫队平时按工会单位而组织，临时改为接连组织，以致指挥上发生困难。2、通知工作和侦探工作做得极坏：暴动前四军军部宪兵连、军械处，大部近郊农民……等未得通知；十二日上午敌人已打到公安局不远的地方，拟派出的工人侦探十人一事，还未做到；十二日下午张太雷等遇敌兵一队，事先并无预报；十二夜误报敌人已至小北，十五分钟便到……等。3、赤卫队组织还嫌松懈。4、分发军械的工作作得太零乱，还有一队农军领得枪械后便回家，直到在观音山北与敌人相遇，始大败回来报告（叶挺报告）。5、征发粮食和供给粮食工作做得极坏，以致“多数兵士，因无食都跑散了，赤卫队也因无食和不能按时得食都四散去找饭吃，总司令部两天只吃一顿半饭……”（见叶挺报告）。

（3）军事上的困难——1、反动的军队数量上很多，包围了广州市的西、南、北三方面。2、在中外炮舰轰击之下，难于进攻河南。3、机器工会的武装反动工人成为心腹内之敌。4、工人军事知识甚浅，许多都不会打枪，甚至有后面人打了前面人的事发生，且各自为战，难于指挥。5、得来的大炮二三十门，最多只有五分之一曾使用，其它的炮因无炮手均不能使

用；机关枪亦有许多放置着无人会用。6、三日大火及炮火剧烈，足以动摇暴动者的情绪和增加敌人的气焰。7、海陆丰距广州市有六天的路程，即石龙打通，亦难救急于燃眉的暴动者之危。8、机器工会之反动行为——虽然我们不能说机器工会下的人都是反动的，但其中的反动工人，对于镇压广东暴动，实在有极大作用，中国各报都同声同调的赞扬他们说：“右派机器工会工人，组织敢死队，帮助白军，与克复粤垣，厥功甚伟”。他们有千余人武装帮助反动军队渡河和扰乱红军赤卫队后方；粤汉铁路的工人（李济琛把广东三大铁路原来革命工人驱逐了而代之以机器工会的会员），代李福林运兵和拍电报；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和自来水的工人，也因是该会会员，未参动暴动。

六、暴动未得到广州以外的工人的应援——因为工业城市多半处在工运低落的情况之下，所以广州暴动时，不仅上海、武汉（北方的天津、青岛等更说不上）的工人群众无任何形式的运动作应援，即汕头、香港的工人也没有鲜明应援的表示。

七、暴动者的一般错误和缺点——（1）“未充分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占据广州三日杀人不到一百，捉了的人都需要经过惩治反动派委员会审过后才肯杀，因此，退走时还关有七八十个反动派在牢里，失败后便出来引导军队大杀我们了”。（2）“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抓住广州政权两三日，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中央银行关了几百万现洋，都没有没收（据说是打不开保险柜——作者注），其他银行商店等更丝毫未动（据中国报载连大新永安等百货

公司都丝毫未动——作者注)”（见《中共中央通讯》第十九期《广东问题专号》）。（3）未向黄色工会下的工人和反动军队作“亲善”以便唤起他们的同情和赞助的工作。

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柱石的力量——工、农、兵联合大暴动的开始！它教会了广东和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兵士：为什么应该很详细很周密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暴动；怎样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暴动以及抵抗和消灭反对暴动的中外联合的黑暗势力；怎样把自己好好地武装起来和破坏、分裂敌人的武装力量，以及使它转变到革命方面来；怎样把工、农、兵的革命行动汇合与联贯起来；怎样的取得维持、巩固和广大暴动的胜利！它告诉了中国的工农、兵士和贫民：只有苏维埃政府能给人民以“衣”“食”“住”“行”与“和平”！

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

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使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前进一步；沿序着广东暴动发展下去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明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

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完。)

- 附注:1. 关于“暴动准备”一节,请参阅中夏的《中国共产党与广东暴动》一文。
2. 本文的材料,虽是在半个多月之内,经过好几个朋友的帮助搜集来的;但还总感觉到不充分,以后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确的材料时,当再行将本文修改和补充。

——作者

(载无产阶级书店印行的《广州公社》
一书,1930年12月25日出版)

广州暴动周年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罗民纳则^①

广州暴动到今年十二月十日已经过了一年了，广州伟大事件以来的历史过程使我们现在能完全客观的去估计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性质，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优点、缺点。关于广州暴动的教训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中，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者中间曾引起过热烈的政治争论，这一争论只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才告完结。现在关于分析广州军事的一切主要问题，我们已经有了权威的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在广州暴动后第二天引起争论的问题，现在都已在历史的客观衡量上评定过了和审查过了。这也就使我们现在能把在共产国际中存在很久的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一切争论作一最后的总结。

不错，我们就是现在也还没有很多关于去年广州事件经过的完备而有系统的逐日逐时的事实材料。广州暴动还在等着它的历史家，在纪念广州苏维埃革命一周年的今天，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同志们，应该记起搜集，研究并发表一九二七年

^① 罗民纳则(罗明纳滋)当时是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

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这历史时期的具体材料的不可缓的必要，如把这种工作再延迟下去，那时是难允许的。但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广州事件完备而正确的历史的叙述，然而对这些事件作政治上估计——以至于最后估计——的材料我们已搜集得十分充足。

广州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不足三昼夜。广州革命的工人与兵士的暴动，在五十八小时之内被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力量压服下去了。但这五十八小时实际上是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这五十八小时是中国革命发展最高的阶段，而同时又是急剧的历史转变。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时，在广大群众的历史的行动中第一次——经过许多过渡的阶段——走上了新的苏维埃的阶段。在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之后，中国革命不发展则已，要发展就只有是苏维埃的革命。苏维埃的口号，在广州暴动之后已经不是中国革命中理论的口号，是已经变成在实际中试验过的实行过的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口号了。中国革命已经再不能离开广州暴动而向后倒退。中国革命只能由广州暴动而更向前发展，广州暴动全世界的历史意义首先即在于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天才的理论上的原则，即是苏维埃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落后的以及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劳动群众完成革命解放基本的历史上必然的形式，这原则由去年广州事件在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广州事件指出：中国已经发展成熟到了苏维埃的形式，苏维埃制度对于中国千百万的平民群众，不仅在一般历史的意义中是逃出三重奴隶压迫及无边穷困之唯一出路，而且是在不久将来革命高潮之中解

决一切问题实际上的必需。广州暴动在历史的程序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并且证明了中国劳动群众已有解决此问题从现代中国实况的议事程序中抛出。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的事件，把中国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政治上还未十分成熟，还不能完成其独立的历史行动，还不能实现它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领导权的时期完结了。不错，中国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刚开始发展时，在它和民族资产阶级缔结联盟时，以及此联盟破坏以后从来都是进行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的，但是夺取革命运动领导权是一回事，得到此领导权又是一回事。甚至民族资产阶级根本的退出革命营垒（上海与武汉的政变）本身还不能自动的解决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群众中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在实际上证明自己已有独立的革命群众行动的能力，同时这种行动是很有力的，能打碎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势力的统治。广州暴动正是这样的行动，这是一次极重要的历史的试验，在这次试验中，中国无产阶级完全巩固了自己在在中国革命中唯一领袖与领导者的作用。广州暴动之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历史的可能变成中国革命中的事实了。

但是广州暴动之后，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浪潮重大的低落。本年春间所爆发的农民暴动，很快的衰落下去。无论如何，这些暴动现在是已经没有几个月以前所有的那种力量与发展的程度了。中国各大工业中心中，广州也在内，工人运动还没有能从消沉中恢复过来。我们对于广州事件意义的估计和这些无疑义的事实是否可以合谐呢？革命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已经不是事实呢？是否已经变成了中国将来发展的一种可能，而

且还是一种辽远的可能呢？如果我们把广州暴动不看作中国革命转到新阶段的过渡，而看成中国革命的末日，是不是更正确呢？

上面我们故意用问题形式写出的结论，就是托洛斯基主义者所公开主张的。不久以前在德国极左派的报纸上曾发表了托洛斯基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托洛斯基绝顶聪明的在嘲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责成一切共产党首先必须保护中国革命的决议；革命什么都没有了——托洛斯基毒狠的问——还保护什么呢？但是，这种理论，广州暴动是完结中国革命最后一波，在比较不明显的形式中，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有一部分同志，也是同意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首先我们对此问题应该谈一谈，此问题的如何决定，是与将来许多极重要的政治结论有密切关系的。

现在谁都不能否认这种事实，在广州暴动被压服之后，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是消沉的，从此时起，就开始了中国革命斗争长期（在革命的环境中，一年就是很长的时期！）低落的阶段。目前争论的问题只能是，此革命争斗低落过程的最高点是否已经过去。但革命波浪退潮这事实的本身，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许多中国共产党员以及别国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本文的作者）顶大的政治错误就是他们在广州暴动的失败几个月之后，还认为此次暴动是全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直接开始，同时根据此种分析，他们就主张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应该是在尽可能的广大范围内直接组织武装暴动。这种在广州暴动后极错误的估计，是由中国中部与南部自然的农民暴动的事实所形成的，在那个发展的阶段上，农民暴动发展的程度，显然

是看得过于夸张了，尤其是估计轻了工人阶级失败的范围与程度。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伟大的功绩，就是它坚决的反对了这个错误的观点，并且坚决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路线，把直接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取消了（在广州暴动后的条件下，此口号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员走上绝望的冒险的道路而完全把党破坏），而代以组织群众走上新的将来革命高潮的口号。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把广州暴动估计成中国革命第一次浪潮完结时退兵的一战，是异常正确的。但是这种估计和托洛斯基派关于中国革命完结的理论自然是没有丝毫相同。在广州暴动之后，高潮的阶段，变成了低潮的阶段了（让他甚至还是长期的低落阶段）。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停止，革命正在继续。这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以前和现在一切决议的出发点。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能用任何一种方法——反动的或改良的——解决国内浩大的那些矛盾时（中国革命正是这些矛盾产生的，养育的），那一九二七年工农革命运动所遭受的许多严重失败，一定会使中国革命的发展长时消沉下去（如果这样，那才是中国革命真正停顿）。但是从广州暴动失败起，已经过去了一年了——在革命时代的条件之下，一年就是很长的时期——一年来的经验完全肯定的告诉我们解决中国所赖以向前发展的那些主要任务的力量，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是没有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加紧了的活动也妨碍了中国革命的此种解决。在去年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作理论上的争论，现在这种理论上的讨论已由客观的实际发展之本身解决了。中国基本社会问题的解决——农民问题与工人的问题——未曾向前移动一步。这就是说这方面

的矛盾又增长了许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争取独立的观点上看来最近一年来，没有改良，而且更坏了。美国的承认南京政府，以及英国的对它频送秋波，并没有丝毫减轻中国的民族压迫，恰好相反，这就是未来的压迫增长的征兆。各方面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反动日益加强，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中国的经济情况，在过去一年中首先就是农业恐慌更加紧张了，这种恐慌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就是本年遭受饥饿的灾民有二千余万）。工业上虽然有少许完全带临时性质的振兴，同时对外贸易也有增加；但这自然不能解决国内剧急的经济恐慌。在国民党统一政权下的形式上的统一，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变更，军阀集团间的斗争，政权的性质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一年前完全一样。过去一年的经验，所有的实际事实都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稳定的条件是没有的，这种稳定在目前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并且现在这稳定的征兆都没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没有也不能变成中国革命的末日。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继续发展下去。

附注（一）现在再想起一年前关于中国实现施枪利平式农村改良之可能的争论，好象很难为情似的。

从此种观点上来看，虽然广州暴动后已经开始了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长期的低落，但它仍然不能不是转到革命新的最高的、苏维埃阶段的过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变成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了，常常有人提出一种很蠢的抽象而又表格式的论据来反对此种结论；如果已承认广州暴动后已开始了长期反动势力统治时，那还有个什么最

高阶段的过渡呢？这种论据，仅仅在初看时好象是很有理由似的。实际上，什么地方曾经证明过，由革命的一个阶段，变到他个最高的阶段时一定直接的不经过任何时间上的间隔；我们不能把革命发展的路径看作几何学上的直线。广州暴动是革命最高阶段的过渡，首先就由于这新阶级力量所实现的革命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其次就是由于它的配备（在平民大众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及帝国主义者联盟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占领导地位）。最后还由于无产阶级在没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中那样历史的自发力量，这发动力量就是将来比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规模更大的革命斗争的象征。

广州暴动的一段意义，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地位就是如此。

在共产国际的关于广州事件教训的讨论中，一部分同志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广州暴动的组织是不应时的，此外，有些人说暴动得过早，别的人说它一般在历史上看来太迟了。主张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广州暴动的失败，是事前已经决定了的，因为到暴动的时候，革命运动的力量显明的已经消耗尽，革命浪潮低落的倾向，由广州暴动以前很久，已经呈露得十分显著，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上海、武汉）工人运动的低落，广州暴动前许多农民暴动遭受大的失败（叶、贺军队暴动也在内），这些事实已经事前决定了一切武装暴动之必归失败。在这些失败条件之下，组织广州暴动是极大政治的错误。当时原不应该拿起武器的。

这个观点，重复普列哈诺夫对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暴动的估计的（普列哈诺夫也曾指出莫斯科暴动的太迟与不

应时),却和托洛斯基对于广州暴动性质的观点完全吻合,托洛斯基宣布广州暴动是盲动,是预知无望的冒险,是事前已经决定必要遭受极残酷的压迫的,因为中国革命在广州事件以前很久就日趋衰落。关于极重大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内极右派的观点吻合,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吻合指出离开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两个极端的而且反动的派别之如何接近——而且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的相接近的啊!

这种预定广州暴动命运,而实际上是少数派理论之错误。勿须来证明,这种理论首先就和事实是矛盾的。事实告诉我们,广州暴动时如果中国许多省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在以前阶级的失败中真正受了巨创,那么在广东省(人口有四千万)以及其他邻近各区,这些地方在去年十一、十二月时农民革命运动却很高涨,而且高涨得很快。广东省农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尤为宽广(广东许多县中却成立了苏维埃)。在广州,工人群众以及一部分警卫队的愤怒情绪风起云涌般日渐增长(十月十四日的游行示威与罢工,十一月七日游行示威等等)。广东自然的群众运动由下而上的发展着。否认这些已证实了的事实,无论如何都不能了。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广东组织决不能制止妨害自发的群众运动,而应该有组织的把它推往前进。走向转移时局的斗争去(所以转移时局的,因为这种运动的结局决定了全中国革命斗争未来的发展,它如果胜利了,那无疑的必然要把全中国的革命力量都提高许多)。革命发展中是否真有转变来到,能解决此问题的是斗争,也只有斗争,对此问题一切其它解决,却是致命的投降政策和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自杀。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说——首先看到革命时代之来临，就开始唤醒民众：在浅见者流，还有作忠臣孝子之美梦时，他们就击起警钟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入直接的斗争去，同时还要揭穿一切可能都完竭了的时候，近路希望的影子都没有了的时候，准备群众罢工或暴动的号召等等已显明的失掉了基础之时，只在这时候才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所以当许多革命的叛徒们向他喊叫我们比你们更进步些，我们老早就离开了革命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就是贱视他们。

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极左派的孟塞维克高叫广州暴动事前决定的失败，他把自己在广州暴动前后都认为本不须拿起武器引以自傲，列宁这些话，不是射中了他们的眉毛，而正是射中了他们的眼睛。去年广州的工人阶级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站在交叉路口上；或是应召而战，或是不战而降。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颓丧了工人阶级的精神，那些极不幸，真比牺牲任何数量的首领都大得多呵！

英勇的广州工人阶级接受了赴战的号召，而失败了，斗争使广州工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就是已经失败了广州暴动都是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而且是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成绩。就是不战而降，也不能在任何限度内保证广州不受白色恐怖的摧残，而同时又是全中国革命运动最大的不幸。

主张广州暴动过早者的论据无容细述。这种人认为迟缓几天是聪明的审慎，他们主张广州的共产党员应该再等待几个礼拜，使争夺广州的军阀们相互火拼起来，只有那时候才可暴动。这些聪明的政治家只忽略了一点，暴动的缓期，无论如

何都要使广州工人失掉了教导团的帮助(解除革命军队武装的命令十二月十日已经下了,这使共产党员起事要提早一、二天),就是说使暴动在刚开始时就是归于失败。这些战略家也没有了解革命的环境中,斗争的条件是天天、时时在变更的,放过了武装行动最顺利的时机,必然会失败的。这种人的议论,如果广州的共产党等几个礼拜再举事,那就好了,直是再蠢没有的。暴动的时期,是由客观环境替广州的共产党员们规定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依赖武装暴动问题的解决,革命的警卫队目前即有解散的危险等等)。自然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举事的某个时期。

广州工人的失败,除了有重大意义的客观原因外(这些客观原因是不能够事前决定暴动失败的),就是由暴动的指导者重大的错误所决定的。这些错误并不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基本的政治路线在广州事变中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暴动的口号,广州苏维埃的成立,苏维埃政府关于政权、土地等命令,对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凡此种种,在政变期间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方面,广州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以后应该效法的好例。广州共产党员的错误是在另一方面。第一、群众对于暴动的政治准备不充足。仅仅在广州城内,在兵士中进行过革命的工作,未曾企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广州以外的兵士群众中,这种错误的报复很残酷的落在自己身上。更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广州的共产党员从来就把黄色的法西斯蒂的机器工会中的工人,看作一种反动群众。这样,共产党员完全使自己脱离广州极重要的部分(非按其数量,而依其比重)的产业工人而孤立,并且使该工会的

反动领袖们能利用此种工人的力量来反对暴动者，在暴动时候军队的策略也是很不妥当的。暴动的指导者，没有集中全力拼命打击反动势力的主要根据地，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河南，而把武装力量分成几部在城内分头进展（这些行动是没有转移时局的意义的）。放过了出乎不意的袭击的时机，使敌人反守为攻了，这或者是在广州暴动中最大而且致命的错误，由坚决的进攻，变到保守；即是暴动死亡的表现，这是自然的事。虽然苏维埃广州的拥护者是十分英勇的。这是根本的错误。在这些错误上中国共产党员应该去学习，使将来不仅能夺取政权，而且能保持政权，这些错误，使广州的革命工人不能多支持些时候，而得应该来到的农民援军，在广东省许多区域内农民都依了广州的信号而暴动了，但没有能按时来到广州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他们能在暴动的第三天已经铁环般把广州包围起来了。

暴动指导者所犯的军事的，组织上技术的错误无疑的对于广东斗争的出路，也有很大的影响，若与上述客观的原因相比，则这些原因还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

在上面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之后，对于这种把广州暴动看作盲动的议论（虽然未用此字，但这无任何关系）是不需要多的解释的。

广东暴动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它是群众伟大的革命行动，在去年英勇的斗争中，这一点对于我们，布尔塞维克们，是最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斗争中这一方面看得特别高的。列宁关于马克思曾写过下述几句深刻的话，兹引用以完此篇关于广州的论文：

当群众暴动起来时，马克思愿意和他们同去，在斗争的过程中，和他们在一起学习，而不宣读那些公式的教训。他把工人阶级英勇的舍己的以自动的创造世界历史这件事看得最高。马克思观察历史，是站在创造历史而没有可能事前无错误的估计机会的人们的观点上；他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市侩的观点上，这种人就会讲道似的叫：很容易事前看到的……本来就不应该动手呵。在历史上有些时候为着训练群众准备第二次斗争，所以虽然为着一种无望的事件，但群众的殊死战还必须的，马克思对于这种事实也是非常善于估计的。

共产国际以前和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革命精神都是忠实的。因此共产国际很引以自傲的，而把伟大的广州公社的一切责任都担负在自己身上。

在关于广州事件的教训的讨论中，争论得最热烈的，是关于群众参加暴动的问题，此争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才最后决定，在大会的工作中，广州问题曾占了很大的地位。许多中国同志——暴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在大会所讲的话还不能消灭广州政变布朗基主义者的性质，盲动等神话。现在已经根本的证明了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是广州群众自己所干的事，关于暴动中没有群众参加的瞎谈是连根据的影子都没有的，自然如果暴动的政治准备作到更好时，则暴动的群众性质或更大；自然，广州暴动领导上的错误，妨害了最大限度的动员一切的力量去参加直接的武装斗争。但争论不在于此，争论的问题就是一般在广州暴动中有没有群众的参加，它是不是仅仅由几个共产党员上层分子所组织起来的冒险的军事阴谋，这个争论由共产国际永远宣告了结束。一部分欢喜批评

广州暴动的同志胡说乱道到某种程度，可从下面几行文字中看出共产国际第二五至二六期赖别克同志的论文。

如果我们研究红色失败的原因时，那我们就应该极严格的指出下面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了，它也就不能不失败，因为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大；广州，以及广东省胜利的暴动条件还未十分成熟；革命的与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实不利于暴动，暴动时期选择不适当（正是十二月十一日）。

暴动被敌人优越的力量打倒了，正是这一点，加上广州市——特别是近城的农民区域缺少广大的群众运动的高涨，是红色广州失败的主要原因。

（载无产阶级书店印行的《广州公社》

一书，1930年12月25日出版）

广州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上的意义

问 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英勇壮烈的广州暴动，已经到了他一周年的纪念日了。一切革命的民众们，在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都应当估计广州暴动在全世界革命的历史上有什么价值，都应当明了广州暴动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夺社会主义的斗争上有什么意义。

当广州暴动发生的第二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便大声疾呼底向全世界工人说：一切革命的战士们！都应当起来援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都应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

固然，帝国主义的通讯社，他不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消息，传达到西欧无产阶级中间去。但是西欧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他们终于是知道了，他们都受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都知道东方无产阶级与他们同在一个世界革命的战线上，正在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各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都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也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

广州暴动的一个大任务，就是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广州暴动之失败，也就是在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压

迫之下而失败的。广州暴动的战士，以及一切广州暴动的继承者——全国、全世界的革命战士，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死敌，因此，广州暴动是一个国际的阶级斗争。这是他的第一个国际意义。

帝国主义在最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时候，他的继续发展需要更加紧的剥夺殖民地，因此中国在最近所受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也特别残酷。帝国主义企图以中国工农的血汗来挽救他未来的大危机。在这种基础上便爆发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广州暴动便是中国革命发展之最高点。广州暴动爆发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大矛盾，证明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统治已经根本动摇。这是广州暴动之第二个国际意义。

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苏维埃的阶段，在广州暴动及苏维埃的组成中，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广州暴动证明了中国革命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着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取得了领导的作用，则中国革命前途的发展一定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就是最适合于这种转变的政权形式。不但如此，并且在广州暴动及苏维埃的组成中，证明了中国民权革命之彻底胜利，仅只有当着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时候，才算得着了坚实的保证。广州暴动更切实底证实了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更确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广州暴动之第三个国际的意义。

广州暴动发生的时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世界上已经建设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在压迫了广州暴动之后，立刻

便向苏联进攻。屠杀苏联的领事，拘捕苏联的人民，与苏联断绝国交。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很明显底投到帝国主义怀抱中了。因为广州暴动的伟大，他很显明底划开了世界上之革命及反革命的营寨，使着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更显明底在群众前面暴露他的真面目。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压迫了广州暴动之后，立刻抛弃了“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假面孔，现在更厚颜无耻底高唱其“中国国防在西北不在东南”的理论。广州暴动将中国豪绅资产阶级骇慌了，他恐怕“西北”这个“洪水猛兽”的怪物——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表示了阶级的援助，因此他断绝了与苏联一切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证明了中国工农的确与苏联是在同一的战线上，证明了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是中国工农之唯一可靠的朋友。他们——中国工农与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中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国民党所能以外交方法破坏的，并且经过了国民党的破坏之后，益发使中国工农群众认识苏联是什么国家，益发使中国工农与苏联要结成更密切的联系。一切革命的群众，他在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他都要回想到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要想到苏联及中国工农都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死敌。这是广州暴动之第四个国际意义。

广州暴动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决不减少他的价值。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的斗争中，过去曾经过许多的失败，但是无论有好多的失败，他终不能减少我们斗争的勇气。让反革命者庆祝我们的失败罢！我们这些失败终要换得全世界的胜利！

看呵！世界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了呵！广州暴动之战士们所流的血，是有报酬的！

（载1928年12月4日《红旗》第3期）

广州暴动的前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易 元

广州暴动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工农不但得不到资产阶级的帮助，而且在他们，完全背叛革命、出卖革命并已成为反革命队伍中的主谋者之后，在空前残酷与白色恐怖政策之下，就能够用工农自己本身的力量，组织几千几万的被压迫的贫民群众，不仅要推倒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的统治，而且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彻底去完成民权革命。

中国革命从开始到如今，都没有更变过他的性质。扫除封建势力和打倒帝国主义是他的两大任务。然而三数年间，起先也赞同革命的，现在却一批一批的变成了反革命，他们都投身到帝国主义的怀里。代表买办阶级的冯自由、陈廉伯等是第一批；代表豪绅地主的刘震寰、杨希闵等是第二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戴季陶等是第三批；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是第四批，也是最后的一批。每遇到反封建势力愈加深入，反帝国主义愈加激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摇而至于背叛。至武汉清党、南昌暴动时，所有应该反革命的都反革命去了，只有工农是始终革命的。

广州暴动便是由中国的工农自己写就的第一篇著作。虽

则广州苏维埃只有三天的寿命，然而其在世界革命史上的意义是永久不朽的；虽则牺牲了五千七百多前卫的战士，然而他们的不死的精神，却始终领导了我们的前途；虽则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然而他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广州过去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自此次伟大暴动之后，又已成为中国工农民权革命的发祥地了。

现在我们回想广州暴动之前夜，我们要学习广州工人阶级这种艰难卓绝的斗争。我们看：

李济聚在四月十五日以后，枪杀万千的工人、农民和兵士，拘囚四千余人，霸占工会会所，组织改组委员会，解散省港罢工，屠杀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空前的白色恐怖一直没有停止。广州的工人畏缩了没有？没有。

八一南昌暴动，十月初叶、贺在潮、汕失败，革命势力又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的敌人无不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赤祸”可以绝迹了；同时我们自己的阵营里甚至也有人发出“没有办法了”的叹声。这个时候广州工人也同样的失望了么？完全没有。

张、黄回粤了，汪、陈也跳[逃]回来了，他们脸上糊了“国民党左派”的官粉，还添上“保护工农”的胭脂，矫揉做作来缓和革命的空气。广州工人是否受了他们的哄骗，对他们还存些幻想呢？丝毫也没有。

十月十四日广州的海员因为工友无故被开除，举行二万人的大示威运动，他们不但只做一个复工要求，还要根本驱逐改组委员，夺取工会。示威巡行至海员工会面前，遂用群众的力量打死反动工贼五人，自动夺回工会。

但是以工贼组织的改组委员会当然不止海员，所以一般广州市的工人都起来参加运动，于是从海员反对改组委员会运动而变成广州市全体革命工人反对改组委员会、反对工贼的运动。工人代表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开代表大会并决议：“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了。最后决定二十四日总罢工，以迫于白色恐怖而中止。

经过这次斗争之后，工人并没有消沉下去，接着十一月一日铁路工人又进行复工运动，参加者四千人，向汪请愿，无结果。工人大忿，大呼“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卒遭保安队的围捕解散。

接着又有三日参加反动派的迎汪大会。宣传示威，揭破汪派的假面具。

接着七日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亦开一纪念会，虽同样受保安队的压迫，但群众仍不露畏缩。

这样接二连三的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把汪派的政治地位一降千丈，不能再用黄色领袖欺骗工人群众了；证明工人的力量并未被压抑下去；且提高了共产党的信仰，表现了共产党的力量；证明国民党已在群众中死灭；证明经济斗争之重要，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

此时不特工人阶级革命情绪高涨，广州市的小商人也奇异起来了，他们向工人说：“这两三天来，你们的红旗做得真快”。

张发奎、李济琛的冲突于十七日爆发了。工人群众对于经济斗争和恢复工会打工贼的行动，也更急剧起来。十八日

即举行一盛大的示威运动，宣布国民党是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李济琛、黄绍雄、汪精卫、张发奎是在广东执行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宣布张发奎、黄琪翔的所谓护党战争，即是与李济琛、黄绍雄争地盘的战争。号召工农兵暴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的革命政权。

到十二月初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日常的斗争加倍剧烈：海员罢工了，公共汽车工人宣布怠工，许多小企业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邮务工人已经议决罢工，工人赤卫队的秘密扩张准备等等。暴动的主张，普及了一般无产阶级的群众。

所以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的发展必然要发生的。同时外县的农民斗争也一天一天的激烈，最显著的是东江和琼崖已经有许多县份建立了农民的政权。如果没有广大的工农自四月十五日以来逐渐扩大、逐渐深入的斗争，就有三倍五倍的教导团力量也产生不出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来。

广州暴动是失败了，中国革命遭了空前的打击。一年之后的今日，中国的工农还是过他的牛马奴隶的生活。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的工业、交通、机关、银行、海关……，他们攫住中国经济的命脉，他们有很多很精的军队、兵舰可以派遣到中国来镇压革命；又不仅因为新旧军阀以黄巢、张献忠式的屠杀来对待工人阶级与革命农民；也不仅因为资产阶级出卖革命的利益，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自然，所有这些都构成中国革命的困难，但不是主要的。革命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最忠实最艰苦的革命力量自身。中国的无产阶级尚未曾形成坚强的积极队伍，未曾形成政治的、经济的坚

困〔固〕斗争之前，他就负担领导民权革命与建设工农民权独裁的历史使命。

同时，中国革命的势力发展也并不平衡，这就是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开始之时，已在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感受困疲之日。农民开始革命斗争为时较迟，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农民的革命斗争就成为剪刀形式。军阀军队里的兵士工作，尤其迟晚。

然而这决不是说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要推动几千万、几万万农民和贫民来作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自然不是几天的事。

现在无论怎样的白色恐怖，但仍是酝酿革命的环境。豪绅地主阶级愈益反动，资产阶级仍没有得到出卖革命的价值，就在形式上也不能形成中国统一的政府（你看张学良不是国府委员了么？但是东三省还挂着五色旗）。国民党已经臭烂了，谁都对他不起信仰。国民党在“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和“必须与列强联合一致，共同反对第三国际”两大政策之下，已经纯粹变成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的党了。他们现在虽则“相安一时”，不久便要“分赃合杀”了。至于工商业之破产，日甚一日；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更使被压迫的民众负担加重，痛苦不堪。农民为饥寒逼迫，已经忍无可忍了。兵士是领不到月饷的，将要很快的转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来了；整营整连的兵士转到革命农民这一边来，不是常见的事么？城市的罢工运动亦开始发展起来。最后，新旧军阀之无厌搜括，已引起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极端不满意了。以上所说，就证明现在的环境，仍然是酝酿着革命的环境。

反革命的统治决不能解决其当前的任何困难，而且又不能形式上怎样去坚固其政权组织，也不能救济财政以及工商业的破产；所有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反革命的身上。然而这决不是说，现在就可以马上号召暴动了。暴动必须是许多斗争的总汇，而且要完成许多准备工作。要解决暴动的问题，决不能勉强群众去暴动，而必须要群众自己起来暴动的。我们纪念广州暴动，我们必须加紧的从事如广州暴动前的艰难辛苦的日常工作。

（载1928年12月4日《红旗》第3期）

由广州暴动的经验联想到武装暴动的策略

问 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在我们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广州暴动的经验。一切革命的战士都应当学习这种经验，学习一般武装暴动的策略，来准备着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

当统治阶级握着政权的时候，若不经被压迫群众的武装暴动，他决不会自愿底放弃自己的政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告诉全世界的工人说，无产阶级仅只有用暴力才可以推倒资本主义的统治。我们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只有用暴力才可以推倒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广州暴动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广州暴动是失败了，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需要更正确的、更仔细的来研究武装暴动的策略。对于武装暴动没有正确的了解，决不能进行胜利的暴动。我这里想用几句最简单的话，将武装暴动的策略说一个大概。

无产阶级知道自己之最后的出路只是武装暴动，但是无产阶级在自己未得政权之前是否时时刻刻都要武装暴动呢？不是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暴动必有一定的条件。列宁告诉

我们暴动的条件说(我这里写的只是大意,没有原本,所以不能写原文):第一,当着统治阶级之政治经济的恐慌,到了十分紧张,自己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统治的时候;第二,当着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都是“已经沸腾到了极点”,不愿意继续忍受现状的时候;第三,当着群众的先锋队都决心准备进攻的时候。在这三个条件完备(只是其中一个或两个仍是不足)的时候,算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算是有了直接暴动的条件。

假使没有这三个条件,只是凭少数领袖企图造成革命高潮,没有看着群众的意识,其结果一定是没有群众的盲动,一定失败。或者当着统治阶级政权稳定的时候,即使不完全稳定而当他暂且没有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若在这时候硬要领导群众去与统治阶级战争,则仍然是冒险主义,仍然是盲动。因为无论怎样准备好了的武装暴动,他比较统治阶级之固定的组织总要薄弱,若不当统治阶级的组织自己开始崩坏的时候,则暴动群众难得胜利。但是一有了这些条件之后,一定要准备武装的直接行动,不然便成了卖阶级的机会主义。

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正因为广州暴动之前已有了这些条件。当时虽然是在革命受了历次挫折之后,但是仍然有正在发展的工农运动,统治阶级之经济的危机,政治的大破裂,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斗争的决心。当时是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不是少数人或革命政党“企图挽救革命的高潮”,这一点决不因暴动结果的失败而变更。

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就应当准备着直接的武装行动。这种准备要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各方面注意到。政治上最

主要的是要提出发动群众的口号，预先号召群众罢工、示威、开大会等来提高群众直接行动的情绪，来扩大动员群众的范围。组织上则预先要组织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的机关，暴动后的临时政府，与其他地方的联系等。技术上则要准备一切革命的武装，革命军的组织、侦探队、交通队、破坏队……等等。这各方面都需要充分的预备。

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十分圆满，这对于他暴动的失败至少有相当的关系。这种地方在群众动员的范围上来说，特别表现得明显。譬如说，暴动前没有破坏敌人的交通，号召铁路工人的罢工，其结果不仅是使反革命的军队可以自由调动，而是减少了在群众中之革命紧张的程度，使一部分群众站在革命事变之外。在广州暴动中，实在有许多客观上需要积极行动的群众，而事实上对于暴动始终没有参加。在这里就看见了动员工作的重要。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最主要的便是暴动日期的选择。暴动要择于统治阶级不做准备的时候，或是无产阶级精神最焕发的日子。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动是在苏维埃正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使着群众的精神格外兴奋。

暴动胜利之后，第一步便要实现一切暴动的口号。虽然当时革命政府还没有能力实行这一切口号，但关于这些问题的法令一定要发出去，其能以实行的，应当立刻实行，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必要无情底施行红色恐怖，来对待一切反革命的敌人。这些在广州暴动中都相当的做到了。

在暴动中应当力求胜利，虽然很小的胜利，得着了都可以提高群众之战斗的情绪。暴动占取了某个区域以后，一定要

继续向前发展，向前进攻。若只是保守防御，则暴动一定失败。但这不是说不要准备防御的工具——建筑障碍物。障碍物是一定需要的，因为障碍物不只是有一个保守的作用，他在这里能以堵塞敌人的来路，则可以抽一部分力量在别方进攻。有时候在进攻中仍有很大的作用。广州暴动中没有设置障碍物，这自然也是个错误。

还有，城市中的工人暴动，一定要与农村中的运动发生联接，然后才有胜利的保证。广州暴动没有得到近郊农民运动的帮助，这是失败中之一个最主要的教训。

列宁说：暴动是无产阶级的一种艺术，所谓艺术乃是一种极精细、极审慎的工作。在暴动中若做了很小的错误，都必要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之血与头去作代价。暴动不能儿戏的，儿戏暴动乃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一切有志革命的战士，应当详细研究武装暴动的正确策略，以准备着中国将来之胜利的总暴动。

广州暴动是中国工农群众之初次的总演习，也象一九〇五年的莫斯科暴动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总演习一样。胜利终究是工农群众的。

（载1928年12月4日《红旗》第3期）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你们记得去年的今日吗？！

去年的今日，是广州工人农民兵士和一切劳苦的民众，为要扫除帝国主义的侵掠，消灭封建残余的剥削，尤其是反抗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这一暴动震惊了全世界帝国主义，使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发抖，全国工农兵士贫民都兴奋起来，全世界劳动阶级都祷祝他的胜利！这样英勇壮烈的革命斗争，虽然只有三日，就被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压迫下去，但是的确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上，都有他的伟大的意义。他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占了最光荣的一页，而且指示了全国工农兵士贫民，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光明！

中国革命，从五卅运动，开展革命的高潮，推动了全国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经过十余万人支持十五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北伐的革命战争，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的广大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汉口九江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与封建阶级的基础。革

命将要到彻底的胜利。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惟恐革命的发展，危害了他的阶级利益，忽然倒戈，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相结合，来压迫革命。蒋介石叛变于前，武汉政府投降于后，以前革命的国民党，遂变成了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联盟——帝国主义的新工具。“青天白日”变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群众，负着革命的使命，继续往前奋斗。痛恨资产阶级的反叛，更加认识一切新旧压迫剥削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压迫剥削者的统治，建立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权，才能完成中国的独立与自由，使广大劳苦群众，都走上解放的道路！因此南昌暴动、秋收暴动，都向着这个目的继续斗争。英勇的广州工农兵士，受着全国——尤其是广东革命斗争的推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了空前的武装暴动，推翻了反动统治。广大群众的革命政权——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实现于广州。他证明了中国革命的使命，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方能担负，他证明了只有团结广大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实行武装暴动，才能推翻反革命的统治；他证明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走上解放的正确道路；他证明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是完成中国革命的（真正民主）政权形式；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到了苏维埃的阶段。他成了指示广大劳苦群众走到革命彻底胜利的灯塔，他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面前高呼着“苏维埃万岁”的口号，证明殖民地的革命是与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将要汇合走上同一的道路！

广州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虽然在他三天之短促困苦的环境中,他仍然执行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的要求,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目前政纲,他做了任何一个反动阶级政权永远不能做到的事业!

对于工人,宣布了八小时工作制,女工、童工每日六小时工作;失业工人,实行劳动保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所有各业工人,都普遍的增加工资。

对于农民,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号召全国农民以海陆丰苏维埃为模范,武装起来,消灭封建势力,建立自己的政权——农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对于一般劳苦民众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则公布没收一切军阀、官僚、买办、豪绅地主和反革命的资本家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没收一切当铺,无价发还;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

对于兵士,宣布国有土地,分给兵士及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废除军阀军队制度及一切苛虐的待遇;组织兵士委员会,管理一切军队的生活;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

对于国际关系,他宣布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收回租界……以动摇帝国主义在华压迫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族的统治,他并坚决地联合无产阶级国家苏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站在同一反帝战线上加紧他对于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

以上这些都充分证明惟有苏维埃政权,能消灭一切反动

统治的压迫剥削，能扫除帝国主义的侵掠伤害，能实现广大劳苦群众的要求，能完成中国的解放!!!

广州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既然为了中国的解放，代表了全国劳苦群众的利益斗争，他表现出来，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死敌。所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不得不暂时抛弃他们内部的冲突，互相妥协，团结一致的来进攻，现在正在利用改良口号欺骗群众的汪精卫、陈公博派，在当时便是率领白色军队首先开刀的残暴贼，于是这一中国的新生命——广州苏维埃遂在这样反革命势力大联合之残暴的敌人压迫之下失败了！许多革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广州苏维埃的代理主席张太雷同志和数千先进英勇的工农分子，都遭反革命屠杀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同志，为帮助中国的革命也遭反革命枪毙！乱刀分尸，挖肠破肚，这样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就是满清入关时的大屠杀，也没有这样残酷！革命的民众们！我们不必悲伤，革命的道路，是要“血”来洗清的呵！我们只要步着他们的血路，勇往前进，便可以完成他们未尽的使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使命，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使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都在我们面前发抖！使反动统治在我们面前崩溃消灭呵！

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失败的教训，是我们将来达到胜利的宝贵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忘记，而且要切实研究与学习：

第一，广州暴动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联合压迫失败的。暴动一开始，帝国主义的军舰便在广州的海面示威，帮助反革命军队进攻，接引反革命军队渡河，甚至在长堤登岸，开枪射击红军。反动军阀的各派，马上放弃他们内部的冲突，联

合向广州苏维埃进攻；所谓国民党的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派，便首先开刀。这是教训我们：帝国主义和一般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死敌，我们不要惧怕敌人力量如何的大，我们只有号召和组织敌人统治下、宰制下更广大的群众力量——一切工农兵的力量，一致起来，任何一个敌人就要在我们面前消灭净尽！

第二，是广州附近以及各地的农民没有能够很普遍的同时起来，援助广州的工人群众，因而不能够截断敌人的援兵，扰乱反革命的后方，解除反革命军队的武装；所以反革命军队能够很快的集中来包围我们。这就是教训我们，武装暴动，工人与农民，乡村与城市，都必须有很好的配合，有很密切的联系，造成一个总的暴动才能制敌人的死命！

第三，是工人群众没有军事的经验：夺得很多的枪械不知道使用；不知架设障碍物的巷战战术；不能有军队的作战方法，领了枪多半跑去单独作战，不知集合造成一个队伍去进攻。这就教训我们，必须在平时学习军事的技术，学习暴动的战术，尤其必须在暴动前有很好的秘密的军事组织。

第四，群众的组织和团结的力量还没有十分的巩固，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暴动前的各种准备的工作还没有充分。所以在广州以及各地的广大的劳苦群众，还没有能够一致的起来，广州黄色工会的领袖，还能够骗取少数黄色工会的会员来攻击我们；反革命的军队，也没有在伟大的暴动威力之下，瓦解崩溃。这是教训我们必须在暴动的准备时期极力加紧政治的宣传鼓动，极力加紧各种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使广大群众都一致兴奋起来，使反革命军队都望风瓦解，兵士群众投

到工农暴动的方面来。

第五，没有积极继续进攻的战术。暴动起来，偏于肃清广州内部的反革命势力，没有马上向河南进攻，并且很快就转到退守的形势。这是教训我们，暴动的战术，应该要进攻，进攻，继续进攻，每时每刻都要能获得新的胜利，才能鼓舞群众自己的勇气，瓦解敌人的军心！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的工农兵士贫民，都要不忘记这些教训，不忘记这什〔些〕经验，准备将来彻底的胜利！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劳苦群众们！

广州暴动，今天已是一年了，回想这一年来所经历的惨痛，更加使我们愤慨激昂！帝国主义更加横行无忌的向我们进攻，日本在山东满洲的暴行，英国不但恢复了他在广东势力，简直是完全统治了广东。美国也在用奸滑险恶的手段，来运用他的经济侵略，尤其豪绅资产阶级各派的无耻的投降，广东掘毁了沙基惨案的纪念碑，而遍插英国的国旗。汉口、九江劳苦群众的同胞以头颅鲜血夺回来的租界，又被反动阶级恭恭敬敬的奉还了帝国主义。宁案的解决是赔偿道歉，济案杀了中国数千人，还承认是中国的不是！这样下去，就要做洋大人的纯粹奴隶了！不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卖国的政权，中国还有解放生存的一日吗？！全国广大劳苦群众，更是过着比以前惨痛百倍的生活。豪绅资产阶级为要镇压工农的革命斗争，已经在全国屠杀三十余万人的肉体！现在还在继续他们白色恐怖的残暴政策。资本家对工人的进攻尤为凶恶，以前订的条件，所谓“共产时代的条件”完全取消了，工作加重了，工资减少了，待遇更加恶劣了，物价更加昂贵了，大批工人失业了。

广大工人群众，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状况，稍有一些反抗，即以“共匪”作乱的罪名而屠戮之，完全要置工人于死地。地主、军阀对农民无二样的，少壮的被屠杀，老弱的遭饥死，田租加重，还要赔偿地主损失：给养费、民团捐、保卫捐、田亩捐、特别捐、桌子捐、墙壁捐、猪捐、牛捐、老婆捐、人头捐……现在正开始全国的税契捐。几乎无一不捐，这样下去还能继续生活吗？！反动政府和大商买办对城市贫民的进攻，苛捐杂税繁兴，裁厘毫无希望，房租日益高涨，米粮日益昂贵，高利债的剥削，更加残酷，这样重重的剥削，不是要我们一日一日变成破产失业的乞丐吗？！军阀对于兵士的压迫，更不堪言状！许多兵士都为他们升官发财送命了，许多残废的竟无抚恤的遣散了。借口裁兵，欠饷都不发清就解散，在营的仍然欠饷累月，待遇日苛。官长更加残暴，把兵士当做牛马不如。甚么裁军费、死亡残废兵士的抚恤费，都进了军阀的腰包，娶小老婆、吃大烟、饮花酒去了，兵士快要饿死了！！！尤其是这个残酷的年关一天一天的迫近了。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已经准备着在这一年的总结束之中要向我们做一个总掠夺。他们已经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绑票匪”，他们老早布置好“冬防”，这是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武装的联合来保障他们年关的大绑票、大抢掠的胜利。我们预料绝对不能再以“避债”“逃租”或跪在富人的面前求饶恕就能够逃出这个年关的虎口。我们的劳苦群众总难免“不还租债就是共匪”的剪头机下的一个鬼呵！我们的痛苦正是四方八面交集而来呵！不推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打倒这些专吃人血、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们还有生活的余地吗？！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的工农、兵士、贫民，一致团结起来，反抗一切压迫剥削，向敌人进攻，向帝国主义进攻，向统治阶级进攻。工人向资本家进攻，农民向地主进攻，兵士向官长进攻，城市贫苦小资产阶级向大商买办进攻。汇合起来，整个的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进攻。积聚我们无数百万群众的力量，准备最后的争斗，学习广州工农兵士的英勇斗争，以武装暴动的直接行动，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广大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解放，只有这样，才是我们最后的出路！

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买办地主阶级，固然是革命的对象，我们的死敌；中国资产阶级也是同一样的反革命，屠杀我们的刽子手！现在他们为要破坏革命，为要与买办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又假装着一副“改良”的面孔，又喊出一些欺人的左的口号，这完全是“笑里藏刀”的反革命的阴谋呵！他们披上了一具好看的美女的人皮，实际上是“吃人不吐骨”的夜叉！我们不要忘记首先开刀屠杀广州暴动的工农、兵士、贫民的就是现在宣传甚么“保护工农利益”的汪精卫、陈公博以及这一类的叛徒！尤其是蒋介石更是首先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这些革命的叛徒，狡猾的骗子，正是与买办地主阶级一样的无耻，一样的残暴！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实力，把他们一起打倒，决不要再受他们的欺骗！

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的群众们！上面这些都是我们在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应有的认识和教训。最后我们决不要忘记的就是广州暴动的死者——勇敢的工农兵士群众，他们是我们的战士，是革命的先导，替他们复仇，继着他们争斗的血路

前进！

我们的口号：

广州暴动是革命的火光！

向着广州暴动指示的光明前进！

团结我们的力量，向敌人进攻！

号召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

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完成中国革命！

资产阶级是一样屠杀工农的刽子手！

反对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

广州暴动的死者精神不死！

中国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载 1928 年 12 月 11 日《红旗》第 3 期）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慕石^①

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出现的五十六年末，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祝声里，在落后的东方的“老大”中国的领土内，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用武装暴动创造了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权。这一事变证明了殖民地革命是可以建立苏维埃国家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武装暴动”这种艺术，已不仅是先进国工人阶级善用的武器，且已成为后进国工农群众解放的法宝。“夺取政权”这一斗争，已不仅是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且已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劳苦工农的直接行动。广州暴动明显的表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已走上国际革命运动的前锋，推进了全世界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印度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高涨，显然是广州暴动有力的回声！

广州暴动虽然从客观革命形势看，是革命退兵时的一战，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力量维持革命既得胜利和使革命向前发展的英勇企图。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它使革命的发展深

^① 慕石是王明的笔名。

入，它开始了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沿着广州暴动而发展下去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很明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连续到中国的“十月”！

“八七”会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共产党的独立政治面貌和独立政治主张，不能呈现在广大工农群众之前。广州暴动在事实上表现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的伟大力量，提出为工农兵本身解放的政纲，建立了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因此，不仅全中国工农兵群众因广州暴动而认识了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即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如《顺天时报》）和研究系的（如《晨报》）报纸，也不能不公开的说：“共产党是有主义、有政纲、有群众的政党”，“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独立的力量”，而深深地为“无主义、无群众”的国民党和奉系军阀担忧着“赤祸之来，期或不远”！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他成立的顷刻，马上颁布了解放工农兵贫民的政纲。对工人最重要的有：（一）工人监督生产；（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工厂工人和手工工人一律增加工资；（四）国家救济失业，设立劳动保险；（五）特别保护女工与童工；（六）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群众组织；（七）恢复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一切权利；（八）米归工人……对农民最重要的有：（一）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土地归农民；（二）废除一切租税、契约；（三）打倒豪绅地主，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四）保障海陆丰苏维埃的胜利……对于兵士最重要的有：（一）兵士月饷大洋二十元；（二）给兵士以土地和工

作……对于一般贫民最重要的有：（一）劳苦群众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身体、居住的完全自由；（二）没收资本家的房屋，分给劳苦贫民住；（三）没收当铺的物品，无代价的退还贫民；（四）废除一切税捐和欠债……对外政纲有简单的鲜明的两条：（一）打倒帝国主义；（二）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这些政纲毫无疑义的都是中国工农兵贫民解放的迫切要求，他们永远活跃在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心坎里，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正在准备和积聚更大的力量，来为实现这些政纲而斗争！

广州暴动在它经过的五十儿点钟间，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第一、武装暴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方式，暴动前一定要有各种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汇合和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第二、它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柱石——工、农、兵——通力合作的开始；从事实上证明，工农兵大联合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反动派联合的力量。第三、在群众英勇热烈的斗争情绪之前，敌人的武装容易崩溃和转变；同时，也只有以群众的武装力量，才能征服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第四、被压迫群众不仅不能利用现成的旧国家机关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不仅能彻底摧毁旧政权机器，并且能够很快的创造合于劳苦群众解放之需要的政治组织。第五、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唯一政权形式，只有群众自己的政权的创造力和活动力最伟大。第六、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马上即着手组织正式红军。

从广州暴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怎样去准备和进行将来胜利的中国工农兵革命大暴动。第一、学习在暴动前，怎样细

心的耐苦的正确的去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怎样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怎样从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去充分的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以避免“发动群众工作不充分”的错误。第二、学习在暴动前，怎样在农民群众（特别是近郊农民）和城市贫民（苦力、小贩、店员、学徒等）中刻苦工作，使他们积极参加暴动，以避免“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泛”的缺点。第三、学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正确的和技巧的在敌人武装中进行分裂、瓦解和使之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艰苦工作，以避免“帝国主义兵队、军阀兵队、民团、警察的士兵在统治阶级欺骗之下来压迫革命”的危险。第四、学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准备和实行总罢工，以使敌人没有“从附近城市运兵压迫暴动”的可能。第五、学习在暴动前和暴动时怎样联络和配合各地（至少各重要区域）革命力量的发动和声援，以免“暴动群众陷于孤立”的地位和“有些革命力量还不知道暴动发动而不参加”的遗憾。第六、学习在暴动前，怎样尽力党员军事化及工农武装的工作，以免重蹈“群众没有巷战常识”、“没有得力武装干部”、“大炮，机关枪不会使用”等的覆辙。第七、学习在暴动开始时，怎样立刻消灭反革命的主要机关和首领，以免去“反革命领袖得以逃走去组织反革命的反攻”的危险。第八、学习在暴动开始后，怎样迅速的坚决的毫无反顾的向敌人主力进攻，以免再犯“敌人得以乘间整饬武装向革命进攻”的错误。第九、学习在暴动前和在暴动时怎样艺术的组织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免受到“一日半兵士得不到饭吃”、“红军司令部连买小菜钱都没有”、“侦探队始终未能组织成功”、“有些人把枪领跑了，司令部也不晓得”……等等的困难。第十、学

习在暴动前以至暴动时，怎样在国民党影响下的工会作夺取群众的艰苦工作，以免却“平时忽视在国民党工会中的群众工作，以致还有少数工人在工贼欺骗之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现象。只有这样细心的去学习广州暴动的教训，才能使广州暴动成为最近将来中国工农兵暴动胜利的预演！

弥漫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的战云，集中在中东路上的进功苏联的战祸，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瓜分中国的危险；只有中国工农兵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指挥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是唯一正确的手段！

今年当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无疑的使广大民众感觉着反军阀战争的特别重要。广州暴动的产生，无疑又是革命群众对当时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回答。在广州暴动过去的两年中，国民党军阀战争却走到更复杂更加紧的形势。尤其在今年全国军阀混战的时候，自广东以至顺直，无一处不卷入军阀战争的旋涡。战争、戒严、拉夫、封船、加税、发公债、纸币跌价、交通破坏、米价高涨，无一样不是目前军阀战争给予广大群众的痛苦。所以广州暴动精神在今年的实际运用是反军阀战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年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周。在准备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要准备这一反军阀战争周，同样要准备用革命的群众暴动来消灭国民党的军阀战争。

广州暴动使得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力量发抖，现在的改组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在压迫广州暴动

时，三日夜（自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二时至十七日晨）屠杀广州市工人、贫民、妇女、学生、兵士达五千七百余，第三党的领袖谭平山、邓演达等更高唱“广州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的超时代政策”，“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动”……等等的理由，来赞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的“合法”！在广州暴动前改组派与第三党还能勉强说几句“革命”的口头禅，来遮盖他们反革命的鬼脸，广州暴动便把他们的假面具扯得粉碎，使他们在广大劳苦群众前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

整个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报纸，都把英勇伟大的广州暴动事实，用“少数暴徒骚乱”、“过激分子捣乱”、“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等等的几句话，轻描淡写的隐瞒下去，深恐“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变”，兴奋了欧美工人斗争的勇气；另一方面，派遣代表（汤姆）到中国来作改良主义的宣传，企图把赤色的中国工运变成黄色，邀请国民党代表出席第二国际的大会，使它深一层的与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法西斯蒂主义勾结，以便更灵巧的更残酷的压迫与缓和中国革命运动。其主要目的，便是企图使中国不再有“广州暴动”这一类的事变发生！然而中国的革命群众非常认识工人阶级的这些叛徒的鬼脸，深切地懂得，坚决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是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主要工作之一！

托洛斯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便高声大叫：“中国革命已经死亡了”！中国机会主义者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便幸灾乐祸的说：“广州暴动是盲动主义的最高表现”！他们就这样把含有国际的和历史的伟大意义的事变，由几万工农兵群众的血

汗和生命创造的事变，轻轻地一笔抹煞了！他们最近对于中国革命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早基于他们忽视和敌视广州暴动的意义和作用而来的。中国工农兵群众正努力于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任务的工作，当然不能不努力铲除广州暴动的敌人——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机会主义！

苏维埃的斧头镰刀大红旗，虽然在广州市只飘扬了五十八点钟，但它已经从珠江到白河，从黄河到长江，时常隐现于各地！闽、粤、湘、鄂、豫、皖、赣各省中现存的苏维埃割据区以及赤色的游击队，便是为广州苏维埃而英勇牺牲了的工农兵群众的伟大化身。他们能够在敌人的三番五次的“围剿”、“大举肃清”的计划和战争中，矗立不坠，主要的原因，便是一方面他们已学得了广州暴动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是正在努力继续和完成不可磨灭的广州暴动的伟大任务。这些割据和游击队的对于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及当它到来时都有极伟大的意义和作用。纪念广州暴动的真正工作，是尽力扩大以武装暴动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尤其是扩大巩固和发展现有苏维埃区的和游击队胜利的宣传和行动！

当我们纪念伟大的广州暴动时，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直接因广州暴动而英勇牺牲的七八千战士和其领袖张太雷同志，绝不会忘记为继续广州暴动工作而沉痛牺牲的苏兆征、彭湃、杨殷诸同志以及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所屠杀所监禁的三四十万工农革命的战士！我们加紧夺取群众以准备促进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工作，实行以革命群众的斗争行动，来回答以至消灭敌人的白色恐怖！为我们的死者复仇！为继续和完成广州暴动的任务而积极奋斗！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日，应当是我们战斗力大检阅的日子！我们在纪念时详细检阅我们在广东暴动以来的党内党外工作，检阅我们夺取群众工作作到的程度，检阅我们在每个工厂、矿山、铁道、轮船、兵营、学校、街道中的工作的缺点和进步，检阅我们比“五一”，“五卅”，“八一”时的发动和动员群众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有了好多的进步。同时，尽力使广州暴动的斗争方法、斗争教训和苏维埃政府政纲普遍群众化，使广大工农兵群众团结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旗帜的周围，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才能得到很大的推进！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工农的广州！

（苏联《真理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社论）

历史的飞速发展再一次粉碎了关于中国革命已“死亡”和“失败”的荒谬的机会主义预言！中国工农运动的伟大力量再次显示了出来：工人和农民已把铭刻着无数革命英雄业绩的广州占领了。

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这一胜利有力地证明，中国革命正在向前发展。革命总是辩证地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向前发展的。起初，资产阶级依靠工人和农民，“领导了”运动。后来，资产阶级调转枪口，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使他们遭受惨重失败。此后，工人和农民不断发动反对其背后有一群其他可恶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封建地主支持的中国资产阶级。

广州的这次起义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这次起义与叶挺和贺龙领导的起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次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军队和农民群众，而且还有工人群众。红色臂章在广州举目可见。“广州的共产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

工人、农民和士兵在广州起义中并肩战斗，勇敢地宣布占领的广州为“工农的广州”。他们的这种团结使这次起义永垂青史。即使反革命势力把起义镇压下去，他们也是无法抹杀

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的，因为这次起义是工农群众发动的第一次获得胜利的起义。工农群众接受了资产阶级背叛的教训，与军队中的革命分子联合起来，手持武器起来同剥削者斗争。

起义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保持胜利。工人和农民在占领广州以后，应该建立牢固的工农革命政权，无论如何不应忽视采取为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而必须采取的一切严厉措施，应该坚决地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以作为革命政权可供依靠的组织基础。革命政权应该宣布同封建压迫的一切残余开展无情的斗争，号召农民用强制手段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和按照革命的方式消灭农村中的奴役关系。这个政权应该更大胆地、更坚决地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发挥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

广州起义的力量在于：劳动群众具有与中国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和刽子手斗争到底的革命激情和决心。与此同时，只有对中国人民进行正确的领导，才应当而且能够确保起义的胜利。也只有在一系列胜利和失败中与工农群众休戚与共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保障对红色广州面临的困难斗争实行正确的领导。

敌人曾无数次“诅咒”中国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还存在，还在坚定地向前发展！心怀叵测的帝国主义世界想看到“中国烧起一场大火”，但它们也将很快从中国这个例子中懂得，工农群众革命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

红色的工农广州万岁！

（李辉译自苏联 1927 年 12 月 13 日的《真理报》）

快来援助中国革命——赤色职 工国际致各国工人书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同志们！广州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成功地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持续一年半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为首的工农政府。封建及资产阶级反动派调动了全部力量，向革命的广州进行反扑。在广州城里，以保护外国租界（沙面）为借口，停泊着法国和日本的军舰，而在珠江口附近，则有英国的堡垒（香港），它的炮口已对准了起义的华南劳苦大众。这样，中国的军阀、地主、买办、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和“左派”，同日本、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一道，将广东的工人和农民象铁桶一样紧紧包围了起来，以图将渴望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劳苦大众的这次起义血腥镇压下去。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赤胆忠心是众所周知的。夺得广州政权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证明，劳苦大众表现了不寻常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现在正同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有权指望得到全世界工人的声援和支持，因为广州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共同的事业。中国革命的敌人沆瀣一气，极力反对广东起义的工

人和农民。让我们建立起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卫我们的中国兄弟！

大家都来援助广州工农政府！

打倒中国革命的刽子手——武装干涉者！

广州公社万岁！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

1927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李辉译自苏联《远东问题》杂志 1972 年第 4 期）

反对杀害中国劳动者，捍卫中国革命 ——赤色职工国际致各国工人书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工人阶级在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斗争中遭受了无数的牺牲。从资本主义手中夺回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无产者的鲜血。但是，目前凶恶的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在所谓“文明”大国支持下的所作所为，就其残酷性和卑鄙性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的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工人和士兵在广州成功地发动了起义。起义者在农民队伍的帮助下，赶走了张发奎的部队，宣布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工农政权的领导人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苏兆征，担任各部部长的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会领导人。工人和农民高喊着“给农民耕地，给工人大米”的口号，夺取了政权。饥寒交迫的广州苦力生龙活虎地同武装士兵进行搏斗，几乎是赤手空拳占领了全城。但是，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总共只坚持了二天。张发奎和李福林的部队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重新夺取了广州。广州公社被镇压下去了。几千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牺牲了。得手的反动派依

仗向广州派去军舰的“文明”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支持，犯下了闻所未闻的暴行：把被俘者成批地捆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大街上活活烧死。他们象追捕野兽一样追捕共产党员，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了河。白色恐怖的可怕程度甚于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革命工人和农民所受的折磨简直难以描述，他们成千上万地被活活烧死，受拷打，挨绞杀，被淹死。广州的大街上，被折磨死和被砍头的工人战士的尸体堆积如山。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丧心病狂的军阀们制造的，而指使他们这样干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世界帝国主义，名列前茅的则是由高贵的、信奉基督教的伯爵、企业主、工厂主和商人们组成的英国政府。目前中国正在实行的猖狂镇压，其矛头是针对苏联的，这种镇压证明，中国军阀是代表谁的意志，执行谁的命令。世界帝国主义可憎的强盗面目，过去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暴露得这样淋漓尽致。

各国工人们！你们要记住，中国无产者的事业就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事业。我们的中国兄弟不光是为了自己，不光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在流血牺牲，他们是在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们是全世界劳动大军的最优秀的战士。但愿他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能成为鼓舞我们的榜样。全世界劳动大军的每支队伍一时一刻也不应停止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将资本家的走狗从自己的队伍中赶出去，这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中国兄弟的最好援助。

光荣属于在斗争中牺牲的中国公社社员！

同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展开殊死斗争！
中国工农万岁！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

1927年12月20日于莫斯科

(李辉译自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72年第4期)

附录一：国民党的电文

一、广州事变前后汪兆铭等与广州往来文电

(甲)事变前：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青电

广州陈公博先生、张向华(发奎)先生、朱晖日先生均鉴：密。弟等以反对特委，恢复中央党部，与诸兄共同努力。惟迭据报告，暨第四军政治部所出《灯塔》，则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如此不但各方反对，弟等为党义及人格计，亦难隐忍。拟恳向华兄英断，请琪翔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如承许诺，则弟等必与诸兄共同负责，临电无任迫切之至。汪兆铭。青(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佳电

广州陈公博先生、张总指挥①、李军长②均鉴：密。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深可痛恨，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此为目前要着，乞速行为荷。兆铭。佳(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青电

广州陈公博先生、张向华先生、李登同先生、朱晖日先生同鉴：密。同人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主张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主张相同，一致

① 张总指挥是指张发奎。

② 李军长是指李福林。

努力。对于反共，既经中央决议，于前，全体同志自应一致力行，无有异趋。诸兄迭次来电，郑重声明，决无容共复活之事实，同人深为相信，一切谣诬，无不力为辨正，以明真相。惟近来广州容共复活之声浪日益嚣张，揣其由来：（一）由于第四军政治部所出《灯塔》第三、四期，其中言论绝无反共语气，甚且有维持容共之疑似。（二）由于苏俄领事署藏匿共党，名为外交及商务之机关，实则为阴谋煽乱之机关，贿买乱民，激动暴动，实为心腹大患。同人等一致决议请兄认真纠察，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恕，贻误无穷。并飭军警严拿匿迹苏俄领事署内之共党；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以上两事，务求诸兄英断，于得电后立见施行。至于贺、叶残部现在东江，因陈济棠不加剿办，有死灰复燃之势；近竟在海丰、陆丰、五华、紫金、惠来等处建立苏维埃，屠戮良民，制造恐怖，尤堪痛恨。请诸兄严飭陈济棠迅即剿办，并派兵合剿，务绝根株。合词吁怨，亟盼裁断。汪兆铭、陈树人、陈璧君、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王乐平、潘云超。青（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蒸电

广州陈公博先生、张向华先生、李登同先生、朱晖日先生均鉴：密。今日预备会议议决，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职，正式会议开会地点，俟蒋同志布置安全，再定日期；并议决密令兄等围捕苏俄领署内共产党徒。弟因黄琪翔同志掩护共党，例如著名共党廖尚果竟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灯塔》第三、四期容共有据，痛苦殊甚，已决引退。请兄等坚决反共，勿为敌人所笑，为亲厚所痛。如反共见之事实，则各方谅解，必能有效也。兆铭。蒸（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乙）事变后：

李章达报告汪兆铭文电

汪清卫先生鉴：此间接青电后，连日密议，遵照进行一事，为共党所悉，先期发难，现在混乱状态中，诸同志生死未明，容后详。李章达。

文(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张发奎等报告汪兆铭等元电

汪精卫、蒋介石、何香凝先生转中央各执监委员、各党部、各报馆、各社团均鉴：真(十一日)晨，共逆乘我主力军队分驻郊外，窃据省垣，杀人放火，肆意淫劫。至将各机关卷宗及中央银行焚毁，其他民房亦惨被毁灭，燃烧三天，为广州空前未有之巨劫，粤民何辜，遭此涂毒。此事为俄人主使，勾通农工、土匪及一部分军队，乘我军出发各路，谋夺政权，危陷本党；并发出打倒中国国民党种种口号，实属罪恶贯盈。我军为解除人民痛苦及拯救本党之危起见，经即飞电各军，分路进剿，业于本日拂晓，尽将广州共产党余孽，一概肃清。此皆本党忠实同志，各军将士奋勇杀贼之功。仍望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此后我国只有惟一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更不容许有其他谋害本党的政党发生，更不容许有不忠实同志的勾通逆党，谋危本党之企图。尚望全国同志，一致团结，领遵一般民众，努力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达到国民革命成功。中国幸甚，本党幸甚。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叩。元(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汪兆铭给张向华等寒电

广州张向华、李登同、黄琪翔、陈公博诸先生均鉴：元电敬悉，诸同志齐心并力，迅扫逆氛，为之稍慰。惟有广州省城，经此次焚劫，绸缪善后，刻不容缓。窃意宜集合各界公正人士，共谋补救，共党余孽，必去之务尽；即浮薄少年，好为偏激之论者，亦宜痛斥，不可录用。民众运动，在中央未确定方针以前，宜停止进行。农工运动中，尤易杂入莠民，不可不防。此次虽由共产贼徒乘虚窃发，然亦由于平日过事宽大，以致变生肘掖，为地方人民大患。惩前毖后，愿与诸同志共勉之也。汪兆铭。寒(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载《革命文献》第十七辑，罗家伦编，台北正中书局民国四十六年六月出版)

杨教育长再致本校同志一封信

张副主任、潘主任、各处长、各大队长并转各同志鉴：弟未返校维持，一因教导团被匪勾结，无颜见各同志，一因已发表叶剑英，则继任有人事。近闻因特务营及其他官长逃跑，对弟有不谅解，再将事变时弟之行动向各同志声明之：自到校后，屡次声说，学校乃是党校，一切人员等俱是党内的人，决不可看作那个人私自机关，所以对旧任人员，除不能谅解逃跑或自动请假外，未更换一人，开除一人，以致别人作用的人大不满意，造出谣言种种，已乃明令去职。至留校服务人员十分之九是本校学生，以为本校造就学生不用是不对的，概未因他原因用一私人，即秘书王侃予亦是本校学生，用他可以接引同学来校服务，那知该员倾向共产（因弟到校亦只十余天，对该员乏开考察），诱迫特务营逃，强杀宋大队长及其他官长，可恨已极（已逞请在大新公司前枪毙）。至举乱夜，弟因星期检查住宿黄埔，闻信后，即与第三师第一团李团副（住黄埔者）晤商，黄埔戒严，并各炮台准备发射，及午正十二时，闻省枪声仍未停止，知非调兵不足以靖乱，乃会同李团副往虎门见陈团长闵诏（即黄埔要塞司令），即决定由沈司令（虎门）派员乘船往肇庆给 26 G（廿六师）送信，陈团长一面派员往石龙给 25 G（廿五师）送信，一面准备船向省城输送。李团副往黄埔维持，弟则往香港通消息，临来虎门时，命特务营与驻黄埔第一团三营取连络，李团副回时，并携同手令，特务营与其他部队不得误令。熟料自弟走后，特务营竟被匪类威迫而去，以致将很忠实之宋大队长及其他官长枪毙，殊深痛心，此是事变时弟之经过。总之，这次变乱，前未能阻止，被匪勾结，实罪不容辞，若谓事后附和叛乱，且誓死不承认，有事实可考，请诸同志原谅。校事已促新教育长速到差，望官长、学生同志在校安心，不日即有人来负责，勿再象从前乱跑，因各处搜查十分严紧，致遭不便。

再教导团参谋长（朱勉芳）以下不赞成匪谋者，在起事已被枪决百余人，亦可见非整个附共。如有他事或交代等需弟来校，仍可来与诸同志晤面，并答复一切。

弟杨澍松 上 十二月十八日

(载《黄埔日刊》第 487 号、

民国 16 年 12 月 24 日)

二、杨澍松给黄埔军校的信

杨教育长致本校各同志一封信

张副主任、宋、卞、罗、李、欧阳、陶各大队长、吴营长，并转告各同志，弟离校后，即往虎门，与陈团晤商军事，弟之职务，已见明令解除，一切事务，由新任负责，但在新任到来以前，请兄等暂时极力维持，不可令学校乱分毫秩序，弟在此事变，事前未能消弥，事后又无队可带以扑灭，实惭愧万分，更无颜以见诸同志，只得数日后，(在此做间接工作)再趋前请罪，其他一切，由柳副处长代答。弟杨澍松十二月十三日。

(载《黄埔日刊》第 482 号，民国 16 年 12 月 17 日)

附录二：广州起义期间国内外通讯社 的部分新闻、电讯

广州城红旗蔽天——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工农留守兵士联合大革命

张发奎与黄琪翔只身逃亡

市中惟有手执锄斧之农工

香港十二日“东方社”电 昨日粤垣事变，完全系共产军发动，夺取广州市。先是，午前四时，市内枪声大作，公安局前之观音山枪声最紧。至上午十时，枪声尚未息，此系武装农民、工人、革命军，得一部分

军队协助，袭击广州，解除公安局守卫武装，将该局占领。市中警察权已入共产革命军手。现市内秩序已恢复，同时粘贴布告如下：

广州苏维埃革命事实报告：依农民工人兵士联合之革命势力，夺取广州政权。参预此次革命者，大部分为广州留守兵士。于此赤卫军指挥之下，十一日午前四时十五分，工人赤卫队五千人先占领公安局，解除警卫武装。同时将一切反革命的机关占领。我等所占领者，为第四军总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党部、财政厅、军事厅、电报局、中央银行、各车站等机关。

现市内商店一律闭门，市中除腕缠红带之武装工人、农民，及手持锄锹斧头之农民外，绝无行人。市中贴有各种宣传标语，其所标为“打倒农民、工人的仇敌李济琛、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农民耕有田，工人食有米”、“能予民众以和平者唯苏维埃之农工兵士而已”等口号，下午，在第一公园举行劳工大会，商议组织苏维埃政府（按广东已有五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参加此次革命者，为共产系农民军、总工会纠察队、第四军教导队等。共产军所以成功如此容易者，因广州军队几已全部开至西江，广州市中兵力单薄，留守军队先加入共产军而自行组成赤卫军，张发奎、黄琪翔仓皇逃入军舰，仅以身免，公安局长朱晖日已不知去向。

（载北京《晨报》，1927年（丁卯）11月20日）

广州大暴动纪要

——摘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至十五日上海各报记载

（一）暴动前革命空气之紧张

记者

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宣布“护党”以后，省内外形势为之震变：东、西、北三江及南路，固卷入战线之内。广州市则工人向罢工会、总工会等处抛掷炸弹，罢工工人纵火焚烧各商店，纸币价格迭生风潮，米柴及各物价值同时飞涨，四乡水陆交通大都停顿。……

公安局近据报，有“反动分子”欲乘此军事时期，进行捣乱，其属工

人方面，经会同农工厅派员密查，其在市面，亦由侦缉员分头侦察。五日，曾在省河截获私运军械数十桶之驳船一艘，捕蛋妇一口，据供此项军械，系由日本商船运来，尚有一大帮在沙面被留。至附近广州各地，如石龙市农民协会日昨开成立大会，意张贴“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实行焚烧田契债券”、“杀尽土豪劣绅地主”等标语，虽经市政府取缔，惟仍不断活动。又如军事要区之长洲，亦有共产党由海道侵袭之说。张、黄、陈等处此新环境下，由七、八两日起，派“雷震”、“雷兑”等鱼雷艇，另派浅水巡舰，担任省河警戒，并梭巡由白鹅潭至三山一带；长洲则由长洲要塞司令部恢复警戒状况，河面泊有军舰两艘，日夜升火巡弋；其虎门、鱼珠、车歪各炮台，均一律宣布戒严，检查船只。陆上方面，河北由薛岳之一部及公安局保安队担任警戒，河南由李福林部维持，并在花地、芳村、石围塘、河南尾各地，增派队伍，以期周密。惟张发奎仍嫌市区兵力薄弱，复由北江抽调黄琪翔部军官教导团，入市协防，且亲到该团演讲，谓不使广东为灰色，打倒腐化投机分子，不恶化，不右倾，奋斗到底；但该团分子大部分为邓演达任总政治部时之政治工作人员，多经邓演达所训练，该团既驻防广州，市内赤色空气，乃愈浓厚矣。（十二月九日〈申报〉广州通信）

（二）大暴动的爆发

十一早，广州共党突然发难，占据各机关，现全市已入混乱状态。事前由共党运动四军教导团成熟，决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以东山俄领署为大本营，苏兆征为总指挥，罗绮园为农民指挥，黄侠生为工人指挥，邓演达为军事指挥^①。十一日上午三时，由教导团发难，向东郊之莫雄部^②缴械，同时东、西、南方农军蜂拥入城。工人由俄领署领械出发^③，扑攻各机关。是时，枪炮声与手榴弹声极密，喊杀连天，震动全市。工人

-
- ① 广州起义时苏兆征不在广州；罗绮园是否参加广州起义无材料证明；黄侠生是工人赤卫队联队以下的队长；邓演达根本没有参加广州起义。
 - ② 莫雄当时驻西关陈家祠，起义时，该部没有被缴械。
 - ③ 工人赤卫队使用的武器，大部分是他们自制的刀、剑、木棍等，并无从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领过武器。

攻进公安局，将卫兵数名枪毙，尽释各囚犯，各警区保安队均被缴械。局长朱晖日率二十余人冲锋而出，逃往河南。警察全体罢岗。全城店户闭门，路上行人极少。全市工人总罢工，奉工农兵联合会办事处^①令，参加夺取政权运动。报馆全停。各轮船工人亦奉令登陆，赴公安局领械作战。故是日各轮，均停开行，只有“西安”一艘，由英海军驾驶来港，搭客异常拥挤。是日，广州发生火头十余处，中央银行被工人洗劫后，付之一炬。两旁店户，多被波及。各机关均高竖红旗。战事至今未止，以东北郊枪声最密，间杂炮声。海军全体宣布反赤，闻朱晖日率领两炮舰开炮，向天字码头共党轰击，至十二早未止。“江大”舰巡弋省河，以白布书主席张三字。共党在各马路遍贴红色标语，“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劳农政府给工人衣食住”、“八小时工作”、“工人监督生产”、“没收土地”、“打倒资本家”、“农工兵联合起来”、“组织劳农政府”、“打倒蒋介石、汪精卫、李济、张发奎、黄琪翔”等条，张、黄亦逃往河南。（十二日下午八时）

张发奎接沪汪电令防共后，拟围捕广州苏俄领署共党，事机不密，故共党先发起事。（十二日下午五时）

此次共党暴动，事前各要人均无所知，至十一日上午一时，始由黄琪翔通知朱晖日，朱当时在公安局，即召集保安队弹压，人未集而共党已攻至，战至天明，即被攻入，朱率一队逃往河南，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亦狼狈逃往河南，张对逐李、黄事，深表悔意，欲就此下野，但各人坚劝，徐图恢复，张即下舰，调各江军队返省讨共，但广三、广九、粤汉三路，均为共党占据，火车不通，运兵颇不便。（十二日下午九时）

此次共党得手极易，因防军空虚，黄琪翔一困，又受运动，与共党死战者，只有新由肇调省之韩汉英守备军一团，该团刻仍力战。（十二日下午九时）（以上均见《申报》香港电）

共产党乘广州防军尽调西江，向当局要求释放清党被拘工友，帮助当局打倒桂军，当局开紧急会议，黄琪翔、陈公博赞成，张发奎无表示，朱晖日极力反对，李福林未出席，卒无结果，共党谓朱晖日通敌，请黄琪

^① 应是革命军事委员会。

翔攻朱，黄由北路调教导团一团回省，真(十一)日晨四时，该团有两营联共，与工会纠察队及东郊农民发难，一营不肯附从，尽被枪毙，随分头收缴警械，围攻公安局，掷炸弹八枚，炸毁该局，占据全市各军政机关；教导团与莫雄部则战于东郊。张、黄逃河南，请第五军派兵靖乱，朱晖日乘铁甲车逃出。红军号称五千，四出放火，全市共有五十余处起火，中央银行及日本博爱医院被焚，长堤先施右邻之火，文(十二)日晨未熄。共党分据各街口开枪，死伤无数。商店多被抢，银号纷将现金运入沙面。居民雇艇分向四乡避难，“西安”轮真(十一)夕载千余人赴港，船员已离去，由英海军驾驶，“泰山”轮文(十二)日午后一时抵港，亦载有一千六、七百人。朱兆莘、邹敏初、何卓贤等均在内，市内各工会奉农工兵联合会令，真(十一)日总罢工，参加夺取政权运动，故工人一律停工，报纸亦停刊，三铁路停车。各商店因警察未照常出勤，文(十二)日仍停业。(《时事新报》香港十二日下午九时电)

(三)巷战的激烈

东方社十一日香港电 香港广州间之连络船，今晚未开回香港，据轮船公司谈，因黄埔炮台附近正在激战，故轮船不能在其前面通过。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 广州此次共产革命之谣言，于数日前即已频传，公安局亦正从事警戒中，在沪之汪精卫，曾电致张发奎，告以有此项谣传，请其警戒，张发奎特召回出征肇庆中之黄琪翔，与其共商应付办法，詎知未及准备，而共产军已先发制人也。公安局虽有所准备，然只注意及于农民军及纠察队，而未知第四军教导队为之内应之事，故遂受此根本的打击也。河南方面，由李福林之军队完全维持秩序。朱晖日似亦逃往该处，广州市内起火之处十余所，电灯亦全熄，闻市内之一部曾遭抢劫，新闻工人已罢工，一切消息机关完全停顿。海员组合亦奉命罢工，业已离船，广州香港间连络船全部停驶，因避难者甚众，故由停泊于沙面之英舰上调用水兵多名，驶行华船一艘，已于昨晚深更抵港，闻此次共产军事事实上之指挥者为有名共产主义者、前武汉政府工人部长苏兆征，及前海员组合首席何来二人①。沙面方面一切与外部禁绝交通，宣布临时戒严令，其前面则用英、日军舰警备中。目下共产军之本部置

于前公安局，内外揭农工兵联合办事处之招牌。昨报莫雄被缴械之说，乃莫雄军队在南冈附近与农民军交战之讹传也。广九铁路被农民军拆毁。一般华人咸料此共产势力不能长久维持，然视此次不仅系农民军之一骚扰者亦有之。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 昨晚应到港之连络船，今晨由广州开出，现已到港，据其乘客云，广州市现尚为共党占领，对岸河南之李福林军欲将其夺回，现在夹珠江交战中云云。临珠江之中央银行，闻因炮火被焚，又连络船不能靠码头，仅停于海面，故多数避难之三等乘客，悉未携家财，而仅以身免。西江、北江方面出征中之黄琪翔军队，已全师返粤，拟夺回广州云。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 据归自广州者之谈话云，李福林军夺回广市之攻击，昨晚最为猛烈，其一部分军队，已于今晨渡珠江，直逼广州市，唯已夺回公安局之说不确。交战时，市内起火灾者，有一百数十处之多，台湾总督府所设之博爱医院，亦于正午被延烧，归为乌有，看护妇及住院病人，虽已无事救出，然前往援救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冒猛烈之炮火，现在似尚无损害，居住中国街之日侨之生命如何未详，因在交战中，故难以拯救。海军尚在张发奎指挥之下，今晨已向市内开炮攻击。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 广州市内各街道所贴各种告示，现由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周恩来、黄平、苏兆征、何来等约十二三人署名^①。据本日正午消息，广州市南半部已被李福林军夺回，其北半部尚在共产军掌握之中。

东方社十三日香港电 今晨二时为止，英海军无线电所接到消息，昨日正午，朱晖日一度夺回公安局，嗣忽又被共产党夺去，朱晖日部复退至河南，午后七时许，又图作第三次之夺回，双方争战不已，广州全市，似尚未全部夺回。

东方社十三日香港电 传言李福林、朱晖日军本日将夺回广州市，

①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是张太雷。苏兆征当时未到广州。何来是广州苏维埃经济委员。

② 以苏兆征、张太雷、黄平、叶挺署名发表的只有《苏维埃告民众》，但没有周恩来。

但据今日傍晚之确实消息，谓昨晚李福林军向广州攻击，全部遭击退，李福林军无一兵得入广州。又云，广州市面珠江之沿岸已完全配列机枪及大炮等，武器充实，势力甚厚，故二、三日内，决不能夺回。张发奎因此将召回在江门之薛岳军，已乘军舰急赴江门，据外人方面之消息，共产系农民军约三千人，昨夜由江北抵广州，共产系更占优势。华人方面消息，一说昨晚李福林正在第五军本部，召集各将校训话时，忽为共产系青年将校，怀手枪狙击李福林，三发未命中，但确实未详。

(四)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申报〉十二日香港电 十一日下午红军发一赤色布告，宣布广州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为政治上最高机关，职员名单如下：主席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人民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以赵自选代理)、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

〈申报〉十二日香港电 共党昨在省发苏维埃人民政府布告：一、没收银行钱庄；二、没收大商店；三、拿阔佬屋宇给工人作宿舍；四、当押无条件将物件交还贫民；五、给罢工工人权利。

路透社十三日香港电 广州已按苏俄政府制设立国民委员会^①，其委员之一，即海员工会首领，其人甚仇视香港；鲍罗廷前秘书长任海陆军委员。上流社会中人避难香港者，络绎不绝。据确讯，前广州反赤政府之大员多人曾存巨款于香港银行，昨日广州无线电称，外县外人纷来香港，共产党现仍握权，开枪纵火事，时有所闻，惟尚无排外之形迹。

路透社十三日香港电 广州可靠消息称：共产党首领已出示令，残灭地主，销毁地契，没收田产、房屋。又称，广州城市秩序有不日恢复之望，英副领事昨乘英炮船往救东山外人出险，计救回英人十一名、美人十五名、德人五十五名，均安抵沙面。该炮船曾受北岸共产党猛轰，幸无死

^① 应为平民委员会，即广州苏维埃政府。

伤,东山外侨未全离境,有英人及他国人约五、六名,不肯同行,但迄今尚未闻共产党扰及外人。

广州共党发一宣传品曰《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农工兵联合的革命势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州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工,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这次暴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军,用手枪、炸弹、长枪等占据一切反动政府的机关,许多革命军队占据了广州市一切军事要隘,现在我们已经占据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省党部,电话、电报、电灯、邮务各局,中央银行及粤汉、广三、广九车站,其他重要机关,尚在肃清中。又标语云:“工人要饭食,农民要田耕,大家要太平,谁给与我们,唯有农兵苏维埃。”又写“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李济琛、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十二日香港电)

路透社十二日香港电 共产革命领袖发布示文,谓工农联合军已占据广州,参与革命者多系内防军,隶属于赤军之劳工赤团共五千人,已于今日晨四时占据公安局,继而尽占各行政机关。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 市内商店一齐停业,市外唯见臂缠红布之武装工人、农民,与手持锄、锹、斧头等物之农民,除此而外,途无行人,市内贴有各种宣传传单,其中如“打倒农民、工人之敌李济琛、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打倒反革命之国民党”及“耕农民以田,食工人以米”与“民众以和平者,唯苏俄农民、兵士,唯中国共产党”而已等文字。红军有组织,不可轻视,今日开始派面包。(十三日香港电)

保安队驻所改为红军临时编队处。(十三日香港电)

今日共产党在中央公园开大会,议决杀资本家,人心大恐怖。(十三日下午六时四十分香港电)

(五)帝国主义者帮助国民党

电通社十二日广州电 自广东赤军与反赤军发生市街战后,日本即开军舰“宇治”停靠码头,使陆战队登岸,赤军发枪猛射,军舰则以机

关枪应战，掩护陆战队，得悉日侨全部无恙，始收容陆战队开回沙面。

〈申报〉十四日香港电 叶、贺共军昨乘外轮抵省河，但领团①不准起岸。（〈申报〉十三日）

〈申报〉十三日香港电 沙面领团昨警告李福林等，谓全城百万生灵，已陷赤色恐怖中，请急设法拯之水火，如有相需渡河之处，则愿尽力帮助等语。

路透社十四日巴黎电 某法报谓共产党在广州起事，已因苏俄政府对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少有成功，乃殊为失望所致，吾人对于苏俄政府采纳与西方列强合作善法之假意，不可存有幻想云。

路透社十三日巴黎电 〈小巴黎人报〉评论广州事变，谓少数赤党在他处失败，乃至广州复仇，此变由俄国煽乱者数人及中国军界数员运动工会及赤党而成，但广州之烧劫残杀，不能更改南方之命运，因军备不足之共党，难望战胜得富庶中等社会赞助之国民党也。

〈申报〉十四日北京电 使团对粤变，如有排外行为，即以剿海盗办法，直接行动，决不犹豫，又英、法、日、美义和所组之审查南海海盗案委员会，因粤变而更促剿办案之成立。

〈申报〉十四日北京电 使团得广州俄领被捕息甚快，谓在中国充领事参预内乱，应以中国法律惩办云云。

上海报载：蒋介石演说：谓必须与各帝国主义者联合以反对第三国际。

（载〈布尔塞维克〉第9期）

粤军四路攻夺广州经过(节录)

〔广州特约通讯员执中〕

此次共产党发难，起自深夜，只闻枪炮声连绵不绝及喊杀之声而

① 指沙面帝国主义领事团。

已，故一时无法探访，前讯谨得其大概，兹再将两日来所得消息，详述如下：当共产党未起事之前，即十日下午十一时许，广州市内形势，忽趋严重，武装汽车，络绎出巡，警察则三五成群，站立各处路口，一般市民，尚以为执行检查枪照，且此种戒严状态，久已见惯，并不以为怪。实则公安局长朱晖日对于此次事变，经已微有所闻，唯不料其发作如是之速耳。因该局搜获手枪甚多，悉系俄械，闻尚陆续偷运入口，乃严加戒备。迨万籁俱寂，逐步闻四面枪响，声繁且密，夹以巨响，詎知大祸即由是而兴。共产党竟运动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市内激烈派工人及城东、城北之农军，分头起事。广州防军已尽数出发西江、南路，只留少数部队驻守市区，且事起仓卒，遂无法应付。军政各机关先后被攻入，公安局及全市各警察区署枪械，均被缴去。同时，火头凡十余处，……火势最猛烈之处，为南堤之中央银行、大新街、高第街、小市街等，公安局亦被烧去一部分，局长朱晖日，为军界中人，每夕均在局住宿，是晚突被共产军围攻，即率保安队抵御。但保安队因地方不靖，连夕均奉派分赴各处巡查及调驻各区署，兵力不能集中。共产军则愈来愈多且抛掷手榴弹，保安队不敌，朱乃乘铁甲车冲出。有人目击其速往西堤，沿途被击，迨至西堤，电油箱已被击穿，朱氏率同卫队冒险冲出，下兵舰渡河，共产军既攻入公安局，即尽将囚犯释放，故日前因事被押之粤路局长李作荣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王苇航，均得脱逃来港。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则由寓所逃往河南福军（即第五军）大本营，朱兆莘、邹敏初、袁晴晖等则逃往香港。广州市遂于十一日午，完全落于共军手中。当混战时，有俄人十余名参加指挥，市内青年团男女学生，亦提新式驳壳加入作战，军委会政治部及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均在队指挥。十一时以后，市面尚有枪声，时发时停。闻工人相率往各反共工会复仇，如机器总工会所属各分会，广东总工会等悉被捣毁。至十二日早三时半，南堤与东堤复发生战事，枪炮之声，比十一日共军发难时尤密，因李福林部五军以炮舰掩护，由河南渡河反攻也。闻冲锋四次，俱被共军击退，未能登岸。至八时以后，枪声渐息，但仍时发时停，两军尚互以枪炮隔河袭击。张、黄等乃与李福林商议，决定军调江门之薛岳部、台山之潘枝部、黄埔之黄慕松部、虎门之许志锐部回师靖难，定期十三早向河北总攻。十二夕，小市街、

十七甫所有之金铺，大新街之玉器铺，十三行、太平街、西荣巷等处之银号，十八甫之洋货店等，均被劫去七八成。火头比昨日更多，南关之麦栏街、新城之大新街、卖麻街，西关之太平南路等，几尽成瓦砾之场，为广州开城以来未有之巨劫。及十三日黎明三时许，所调各军均已抵步，休息整编约半小时，即奉令开始渡河进攻，分四路前进：一路由五仙门；一路由油栏门；一路由西濠口；一路由猎德。每路分配千余人，各以两炮舰掩护，由张、黄、朱、李四人亲在舰上指挥。八时，四路同时冲锋，共军则据长堤河畔叠沙包为垒抵拒，互战至十时许，市内有机噐工人千余名，齐出响应省军，向长堤一带共军攻击。共军前后受敌，遂不能支，省军分途登岸，搜捕共军，共军仍与巷战，直至二时许，始向小北及东郊退走，其余小部分及红带工人，纷将红带、枪枝抛弃，改装潜匿。五时许，全市已算肃清，张、黄、李等已用军事委员会名义布告安民，各警察经恢复站岗，令开门营业，秩序可逐渐恢复，唯城内各商民仍怀恐慌，一时未敢开市耳。

(十三日)

(载北京《晨报》，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港警大捕共党(三则)

香港十四日国闻电 十四日午，港警在码头，捕获有共党嫌疑者卅九名。

香港十五日东方电 香港政府对于避港难民之身体检查极严，因有共产党员之嫌疑而被逮者，百有余名。

香港十五日路透电 为预防计，刻警察实行逮捕由广州来此图谋煽动罢工之赤党煽乱人犯，散布传单及贴粘布告之人，及企图鼓惑电车工人者，均在被捕之列云。

粤军四路迫城下

广州赤气黯然收

三日政府悲昙花

尸骸狼藉满街市

(广州特约通讯员执中)

各路大军回师反攻共党，十三日即克复广州，当时战况，略见昨讯。惟所述者，仅十三日四时以前之事。且未能详尽，兹再将两军作战经过及最近情形，继录如下。查共军此次窃据广州，其初只得三四千众，然有作战能力者，则唯黄琪翔部之第四军教导团及第十二师炮兵一连（原驻燕塘，被教导团迫降），余皆所谓农军、赤军，皆属乌合之众，不能称之为军。但其枪械极为充足，每人皆有新式长枪或短枪与手榴弹。此项枪械，乃由俄国最近秘密运入广州，存储于东山苏俄领事署者。占领广州后，陆续召集地痞、流氓及北路农军加入，人数已逾万。张发奎、朱晖日、李福林等，以共军势力日渐扩大，如不迅速进剿，势将蔓延。特别是第五军留守河南之部队，仅有一团，兵力实未充实，非大集各路援军，不能奏功。遂由李福林立电韶关，调周定宽、陆满两团，沿粤汉铁路南下，以攻广州市之北。电台山调潘枝团，由水道回河南集中。张亦电飭驻公益、江门之薛岳两部速即回师。薛、潘两部，即雇用轮拖，星夜由江门赶返。十二日已至雀河，由南石头登岸，计约三千人，合原驻河南之第五军，已在四千人以上，乃定十三日晨四时大举反攻。其作战计划，仿照年前平杨希闵、刘震寰时办法，共分四路：第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河，进攻西濠口；第二路，由广三驳轮运兵至黄沙登陆，以接应由北路南下之周、陆两部，此两路均由第五军担任；第三路，由土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由薛岳部担任；第四路，由猎德渡河，沿广九路进攻，向东堤夹击，由驻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黄慕松部担任；海军各舰则分队发炮助战，掩护各军渡河，另以机器工人千余名，组织白军，协助官兵作战。先是十二晚，由北路南下之周、陆两团，已抵城北，陆团首占观音山，与共军及教导团彻夜激战。十三早，周团又占领黄沙车站一带，搜索西关共党。拂晓，河南各军同时发动，步枪与水旱机关枪齐施，炮声隆隆，硝烟触

鼻，流弹横飞，纷如雨下。所有附近各处完全断绝交通，路上绝无行人，即居于屋内者，亦因火线太密，屏息不敢稍动。剧战约点余钟，黄沙方面之共军，因前后受敌，首先不支，退入西门。长堤方面，亦为第五军占领，共军分头散去，所悬之红带，亦抛弃满地。拿获就地枪决者百数十名。又当第五军占领西濠口时，有少数共军退入嘉南堂，仍由楼上开枪扫下。第五军人数至多，乃分一部绕入二马路，将嘉南堂包围，共军不敌，即被第五军攻入，战擒甚众。第五军遂分途东进，先由一德路及长堤沿途东向，共军节节败退，复由维新路追击，至公安局，占据该局之共军，以人数颇众，仍起而顽抗。第五军当即迎头痛击，卒将其逐入惠爱路。同时薛岳部进迫东堤，亦已得手，转入永汉路一带搜索，径进至财政厅。及至正午，全市已次第收复，共军纷纷由东路退却。时全市已贴有军事委员会安民布告，市民欢呼之声，有如雷动。但共军仍有四军教导团及十二师炮兵连与农匪等，不下三四千之众，退出东门，正欲从事集合，不料黄慕松部斯时方进至东较场，闻市内共军已经失败，预知共军必由此路退却，乃暗伏于此，准备兜截共军，遂被伏兵一击，毙命者不计其数，余众分别潜逃，一向车陂、乌涌等处，一向龙眼洞方面，沿途仍为民团所截击，想已不能为患矣。然共军俱系便装，只颈挂红带一条，弃去即与平民无异，战败后抛去红带、枪枝，潜匿于市区者甚众。各军以伏莽堪虞，遂会同机器工人，四处搜索，自午至夜，捕获无算，皆一律就地枪决。迨十四日，仍继续搜捕，计是日第二师枪毙百余人，公安局枪毙三十一人，内有俄人五名，其他各处亦均有执行枪决者，致尸骸遍布各马路，计天字码头百余，观莲街口俄人一，省澳轮船码头二，十三行二，普济桥二，丰宁路二，丰宁大益巷口五，三区分署四，西门口四，维新路口四，纸行街一，大北直街口教导团兵士十五、工人三，永汉路三，公安局二十余，调查未及者，尚不知凡几。且每枪决一人，附近必有爆竹声，足见市民对共党之深恶痛绝矣。

(十二月十五日)

(载北京《晨报》，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广州苏俄领事被捕(二则)

有已执行枪决说

共党连日被杀者约千人

香港十六日路透社电 岭南《晨报》广州通讯员十四日电报称：受有苏俄指使而焚劫广州之共党，刻多已受其应得之刑罚。反共军入城即有多人被执，驱至公安局附近之大空场内，枪发五次，五人依次应声而倒地。十四日午后，军士一队，闯入俄领署，则总领事已于星期日离开广州，置其同僚于不顾。所有华俄男女，上至副领事，下至书记，均受胁迫，随兵士至公安局。前此冠冕堂皇，盘据要津之高等官吏、教师等，今竟垂首丧气，整队步行于尘土积满之街市上。白云苍狗，为之黯然。且各人腕上均以绳索为缚，而军士则左右两面翼护之。据称，至少有一俄领馆员，被执死刑，但尚无官方之证实。由广州逃来者称，共党十人游街示众，其肩臂上贴有犯罪详细条目，观众得任意施以殴辱。其妇也数人，竟被小刀刺伤，而于抵刑场之先，已饱受羞辱矣。

尚待证实之消息称，苏俄总领已就擒，昨日已执死刑。俄副领事则在部局内被逮，与枪决之众俄人同其命运。广州情形，殊可悲悯。全城至少有三百尸体横于街，房屋被毁者不计。肃清赤党，正在进行。

广州十五日东方社电 李福林军夺回广州后，大捕共产党，捕获后立即捆缚枪决，现被杀者达千人，街市尸骸累累，惨象不忍入目。

(载北京《晨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东方通讯社香港分社调查广州事变之遗迹

《东方通信社》香港分社社员亲赴广州调查此次事变之遗迹。据所见火灾之烈，被劫之惨，殊非想象所能料及者。街头路隅，至今尚有烧成黑炭之尸骸，横置地上。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尚不下百人，被抢之家，四壁萧然，不遗一物，实呈稀有之奇观。被焚之屋，尚有余烬，乞丐三五，于残垣断瓦之中，将灰抓取，似有所觅，恍惚当年东京之大震灾复见

于此地也。继至东山访劳农领事馆^①，则昔高树赤旗，政府要人及男女学生等之所麇集，门庭如市，层楼巍峨之领事馆，今呈惨淡之状况；闻为白卫军^②所袭，继以掠夺，屋内不遗一物，器具全无，仅于庭前附近见纸片、家具散积遍地，有秽如豚豕之白卫军兵士多人，足登草履，盘据其内，夙有盛名美丽之花坛庭前，置有中国军队特有之大釜，作为炊事之所。记者尝于门前发见涂有秽物之劳农陆军旗帜，对之实不禁感慨系之也。截止十五日前，公安局门前置有被枪决之劳农领事馆馆员尸骸十余具，闻一任众人侮辱，以泄仇恨；副领事被枪决说，系事实，总领事则似被拘禁，闻其曾请求将彼之妻孥五人，予以保护云。综合各种可靠之说，此次之纵火与攻袭各机关，似系共产党之预定计划。至于其后之掠夺强奸惨杀等之恐怖政策，乃苦力、车夫及无赖之徒，趁火打劫之所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产党员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殆不能不归罪于自称白卫军之李福林军、薛岳军与右派工人会之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之复仇的与报私愤行为也云云。现在共产党退后，被枪毙最多者，乃如上述趁火打劫之车夫。又追击共军入至广州郊外农村之李福林军之一部，忽肆抢掠，其与共产军孰优孰劣，殆无所择云。现尚有工人多名，以共产党员之名，被击于右派工会员之手，随分受私刑之处分。不论何国，革命之际，必有反动的恐怖时代出现。故截止昨日，市民尚未开店，交通机关不通，谣言甚盛，其不安状态，与十一日并无少异。昨日广州盛传黄琪翔军与李福林军将近冲突，故逃避赴港者又行激增。各市民震于谣言，广州城充满惨怖之空气。

东方通讯社香港分社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载《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

① 指苏联领事馆。

② 指国民党军队。

附录三：国民党反动派将领逃脱记 及暴行录

广州暴动之回忆*(节录)

张发奎

.....

犹忆民国十六年六月，我正在河南北伐途中，忽奉命班师回武汉，被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第二十军。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所辖各军负责人员如下：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
参谋长	谢婴白
秘书长	高语罕
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兼党代表)
第四军军长	黄琪翔
参谋长	叶剑英
第十二师师长	缪培南
第二十五师师长	李汉魂
第二十一师师长	富双英

* 本文原题为《卅年前广州暴动之回忆》，作者张发奎是针对叶剑英同志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写的。

第十一军军长	朱晖日
参谋长	吴 涵
第十师师长	蔡廷锴
第二十四师师长	叶 挺
第二十六师师长	许志锐
第二十军军长	贺 龙

当时正是联俄容共时期，高语罕、郭沫若、叶挺都是著名的共党分子。叶剑英则是部队移驻到鄂南南浔线后才升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大家当时都不知道叶剑英是共党分子。这时候，共党眼见北伐即将成功，就在各处运用阴谋作起乱来。他们自参加国民党后，本已一再违背诺言，曲解主义，此时更变本加厉，鼓动阶级斗争，随北伐军胜利所到之处，假借革命之名，各处掀起农民暴动，以致湘、鄂、赣诸省都陷在恐怖的流血惨境。针对这一情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决议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检查各该省之党部，各级政府，省民众团体之行动言论。

到了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我们又查获了第三国际给共党之文件，指示共党暴动，其大意是：

- 一、土地革命，主张无须政府命令，而以暴动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 二、改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加农工领袖为委员。
- 三、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
- 四、利用国民党的领袖，组织革命法庭，制裁反共军官。

由于上述发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在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决议，实行取缔共党，解除鲍罗廷等俄国顾问职，并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清党问题，在未开会前，先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之言论与行动。但七月十六日武汉市面发现共党传单，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惟共产党员之已加入国民党者，则不退出。

七月二十日又发现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之传单，对国民党肆意攻击，至此，国民党乃决心分共。一面由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政府机关，一面则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飭国民革命军各部长官，将共产党人

一律遣去。我当时奉到命令，即先将各级政治部改组，严行检举各级政治部所发出之言论，并加倍严密各级官兵之管教，以防共产党乘机蠢动。

且共产党阴谋层出不穷，邓演达、高语罕、郭沫若等又来包围我。邓演达当时对我说，请我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请我继续革命，但我知道他们所谓革命，实际上就是祸国殃民，就是替苏俄当走狗。我当时认为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是不应该再联俄，是不应该再容共的，所以当即严予拒绝，并坚决执行政府的分共命令。

共党此时知道他们企图利用我的想法已落空，于是共党分子叶挺就勾结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于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晨在南昌实行暴动。他们在南昌高揭红旗，并在南昌组织苏维埃政府，占据省政府等机关，围缴南昌防军、警察枪械。我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当时亦驻在南昌，叶、贺亦欲协持蔡廷锴一同叛变，但叶、贺自南昌撤退时，蔡率部向浙江上饶方面单独离去。我仍以为迅即击溃叶挺、贺龙之叛变实为当时最紧要之事。所以，一面呈报政府，一面就亲率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及第十一军之第二十六师，由九江分向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准备在南昌及其附近歼灭叛军。

八月七日，我各师到达南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方面逃遁，我除了招抚安辑外，当即指挥各师紧向叶、贺两部叛军追击，等我追到抚州的时候，叶、贺又窜向宜黄，而有由宜黄南下窥粤之势。

后来，叶、贺叛军果然窜广东直趋潮梅，政府为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起见，乃令我追剿，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亦派前第四军党代表陈可钰来赣，洽商清剿计划，因此，我就决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趋广州，以增强广州防务，必要时，再移广州之师东向潮梅，予以截击。

我回广州后，为充实革命力量计，特将第十一军军部取消，军长朱晖日调充公安局长，以增强广州市的力量。原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则拨归第四军建制，我为了防剿叶、贺，为了维持各地的治安，并为了应付当时广东内外的各种复杂事情，将各部队分别调至肇庆、都城、惠州、江门等地驻扎。

叶剑英于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①说我当时“大举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说我捕杀残暴成性的共产党员，那是不错的。至于说我镇压工农运动，则不确实。因为对于任何正当的工农运动，我素来支持，如果是地痞、流氓冒充正当工农乱搞，或者是共党分子煽动暴动，我才严惩。

叶、贺南昌暴动后，他们本来很想在南昌立足，但因我及时进剿而未成功。后来他们流窜到广东潮汕，也终于在潮汕被击溃。

不过，他们在潮汕被击溃后，却仍企图继续活动。当时叶挺、彭湃等又潜入了广州，以苏联领事馆作掩护，并接受其接济及指使，再由叶剑英等在我军作内应，秘密策动我广州驻军，以及广州市之一部分工人连同地痞、流氓，准备暴动。

十二月正是冬防期间，我军大部既已出防各地，市内只驻有教导团一团及第四军特务营一营，加上广州市公安局之警察保安队而已。在这种情形下，共党认为广州防务空虚，机会难得，遂以教导团之一部，杂以一部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及印刷工人，再加上地痞、流氓，号称红军，并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晨举行暴动。

广州暴动发生于十二月十一日晨二时。当时我与黄琪翔、陈公博都住在东山。十一日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忽然接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的电话，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大概是共产党开始暴动了。

我也判断那是共产党暴动了。当谢婴白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中断，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所以我立即约同黄琪翔、陈公博（陈公博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三人一同到二沙头颐养院找广州商会会长邹殿邦，找到邹殿邦时，时间已经早晨四点多钟。为了便于策划和指挥乱，我们四人由邹殿邦借了一艘电船从二沙头到河南海幢寺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河南是第五军的防地。找着李福林时，天已亮了。天亮时，我率同江防司令冯肇铭乘“江巩”兵舰沿河巡视了一番，跟即派人到沙面以无

^① 指叶剑英同志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发表的《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

线电下令驻防广州外国的各部队回师广州勤乱。

共产党这时所策动的部队，原只教导团之一部，不过，当时广州市内驻军不多，所以共产党虽只煽动了教导团之一部，也就成了共党广州暴动的主力。

教导团原是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改编的。团长杨澍松原系武汉分校教育长。改编后，政府命令归我指挥。共党这次策动教导团，确只一部分人参加，这从事后发现教导团许多官兵暴动时被囚被绑可以证明。事前，我们本有计划将教导团解散，这是叶剑英所知道的。

至于第四军特务营营长梁秉枢，叶剑英在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说梁当时是警卫团团长的，那是不确实的。当时只有把特务营改编为警卫团的计划，但尚未正式成立。所以梁秉枢并非警卫团团长的，而是特务营营长。事后知道梁秉枢也是共党分子。不过暴动时，特务营虽辖三连，但其它两连分驻各处守卫，梁手边只一连人，梁当时自己也知道要指挥其它两连参加暴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梁只叫那两连人缴械了事。

至于共产党广州暴动原定十二月十三日，忽提前于十一日晨举行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风闻共党企图暴动后，广州即宣布戒严，公安局长朱晖日并在广州市人力车总工会及印刷总工会搜出了一部分枪械，拘捕了一部分人。于是，他们提前举行了。

共党暴动时，所谓红军及参加暴动之分子皆佩悬红带。他们攻入公安局后，立被改为“工农兵联合办事处”^①，除散发传单，自吹胜利外，并在各马路悬出红布标语，如：“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八小时工作”、“劳农政府供给工人衣食”、“工人监督生产”等。

共党所散发之传单，题为《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原文如下：

“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实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州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都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了这次的暴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了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释放了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

^① 应为广州苏维埃政府。

军用手枪、炸弹、长枪等占据了政府一切反动的机关，许多革命军队占据了广州市内一切军事要隘，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粤汉、广三、广九车站，其它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

事实上，各师留守处的兵力虽只一排或一班，但共党暴动分子屡经攻击，却并未被占。第四军军部亦未被占。所以这一传单内所说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种夸大的宣传。

又印刷工人散发所谓《广东印务总工会罢工宣言》，原文云：

“工友们罢工，一致参加大罢工，干政治的大暴动、大斗争、杀尽一切买办阶级的工贼，管理一切的生产机关。农友们、工友们，要一致起来，推翻几千年来压迫和剥削你们的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没收一切土地。兵士们、警察们，你们和我们痛苦都是一样，你们要一致联合起来，把你们反动的长官反射，所以要一致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李济琛、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打倒国民党反动的统治，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工农联合起来成立工农兵政府，工农兵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联苏俄！反对帝国主义！”

在上面这些口号、标语、宣言、传单中，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谋利益，但他们在广州举行暴动后，却四处劫掠，奸淫掳抢，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当时中央银行、财政厅、东堤、南关、西关等处就各有火头十余起。全市都陷于恐怖状态中。

至于所谓“广州苏维埃组织”，那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在中央公园^①开会决定的。他们把公安局改为“工农兵联合办事处”后，苏联人即在内指挥。成立所谓广州苏维埃，也是根据苏联人的命令。

共产党当时曾在广州市内发出一种上印《红旗》的布告，公布了所谓“苏维埃革命职员名单”如下：

主席	苏兆征(未到由张太雷代表)
人民内务委员	黄平

^① 应在丰宁路西瓜园。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	杨 殷
人民土地委员	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 以赵自选代理）。
人民劳动委员	周文雍
人民外交委员	黄 平
人民司法委员	陈 郁
人民经济委员	何 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	张太雷
秘书长	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 挺
工农红军总参谋	徐光英

从上列名单可以看出叶剑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重要分子，仅潜伏在我军内干策应工作而已。共党在广州暴动后之次日，即成立所谓广州苏维埃，说明共党是企图长期占有广州的。但我当时把广州市内共党实力冷静估计一番之后，已经确定可以迅速予以肃清。严格说来，共党此次暴动之所以能够暂时占据广州，不过乘我广州市区驻军空虚而已。若我将各路驻军调回一部，即足以勘平广州之乱，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所以我决定乘兵舰赴肇庆，转江门，指派一部分部队回省平乱。我当时下达命令如下：

一、十一日共逆乘省城空虚，纠集工人暴动，纵火焚劫，我海陆空军现扼守河南南石头一带。

二、我军为迅速肃清广州共逆，决将东江交陈军长铭枢接防，西江固守肇庆，南部固守江门、单水口之线。

三、我军各部队之移动任务如左：

- 1、东江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即率部回广州，扑灭共逆。
- 2、西江十二师全师，第二十六师除派出第七十八团回广州讨共外，余仍留驻肇庆，统归许师长志锐指挥，扼守肇庆附近，对广西方面警戒。

3、南路教导第一师之第一、第二两团，着邓副师长龙光率领回南石

头附近，与讨共各军协同作战，归黄军长琪翔指挥（黄军长现在河南指挥讨共各军）。

4、南路教导师之第三团，及第五军之第四十五团，第四军独立团，统归南路指挥部胡参谋长铭藻调遣，扼守单水口、江门及铁道①沿线。

这时候的第四军，已于回广东后重新编组，共辖五个师。军长仍为黄琪翔，第十二师师长为缪培南，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教导第一师师长薛岳，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所以这一命令中，包含有关教导师的话。

命令下达后，我即乘舰返广州指挥，十三日拂晓，教导第一师邓副师长龙光，已率领第一、第二团，到达河南车尾炮台附近，第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团长林祥亦率领所部到达石围塘。我即令教导第一师由靖海门渡河，第七十八团由黄沙渡河，驻在省河南岸之第五军亦于同时渡河，分途向广州之敌猛烈攻击。而原驻西村之教导一师第四团莫雄部亦已占领观音山一带，共党知我援军已至，即退守维新北路之广州市公安局一带，扼守街口，仍图顽抗。我军乃将敌三面包围，激战至下午五时，毙敌甚多，敌不支，乃向燕塘、龙眼洞方面溃窜。我当即下令追击，将敌尽歼，以免继续流窜。追至龙眼洞附近，卒将敌大部包围，并即予以缴械。所以，这次共党广州暴动，自十二月十一日晨起，迄十二月十三日止，为时只有三天，便被完全扑灭了。

对于这一役，叶剑英在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指挥部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区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

① 指新宁铁路，抗战时期已被拆毁。

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经三昼夜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把在广州暴动的共产党迅速肃清了。

至于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却并没有和共党部队冒险继续作战，当他们的同志被我军围攻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已化装偷偷逃到香港去求安全了。

叶剑英在去年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又说：“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这一段话，从头到尾，可以说全是谎话，因为当时击灭广州暴动的主力是我从广州外围调回来的勘乱部队，而不是市内的什么“反革命部队展开了猛烈的反扑”。我军当时驻在市内的部队不多，除教导团与特务营外，就只有各军师驻省办事处的留守排或留守班而已。他们强烈抵抗暴动分子是真的，说他们在“帝国主义”掩护下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则谈不上。因为英、美、日、法等国当时根本没有用军舰或海军陆战队帮助我们，当然更谈不上替我军作掩护。我记得十二月十一日晨，我准备派人到沙面用无线电命令广州外围各部队回师勘乱，但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外国人住的沙面去拍发无线电报，还是请托商人谭礼庭先生出面才拍发出去的，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外国的帮助。（下略）

（载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第六部，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

广州共党的暴动(节录)

陈公博^①

……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是在十六年十二月的十一早上，我记得那时我的职务在军事方面是广州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在政治方面是省政府的民政厅，我为什么把这些衔头写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依着责任来说，疏于防范的罪名，我不独不想逃避，还愿意等待裁判。那时我的住宅是在东山，而暴动那夜我却住在广九铁路旁边的“葵园”，“葵园”的主人是香港商人一位陈先生，汪先生在宁汉复合之后，曾到过一次广东，那时“葵园”就是省政府向陈先生借来作招待所的，汪先生北上开四中预备会议，那时“葵园”便空着。我因为每天办事过于疲劳，而又怕见许多宾客，一个星期中倒有三四天躲到“葵园”去夜宿和避器。“葵园”面对着珠江，而又是东堤马路的末端，就是要到东山，也要弯过一度木桥，真是日无宾客之迹，夜无汽车之声，不止是座幽静的住宅，还是一所很好的疗养院。

十日夜，我回家已是十二时，刚上床不久，约莫两点钟便听到很远已有几声枪声，接着，不断不续仿佛从北方发来无数密集的子弹。我想又是有变故吧，不过那时广州没有多少兵，四军的军队，李汉魂一师是防卫惠州和石龙，许志锐一师是坐镇西江和肇庆，薛岳的新编第一师是追击敌军到南路的江门，还有缪培南一师更远在西江的防卫线，这样只有燕塘的教导团^②。据我所知，教导团不久之先已被缴械，枪还没有发回，剩下防卫广州的只是四军的警卫团了。共产党打算在十二月十五日暴动是我们早接有报告的，接连在初七以后，公安局破获了不少机关，那时我们不只知道共产党暴动的日期，并且知道了他们召集四乡农民的计划。

① 广州起义期间，陈公博任伪广东省政府主席。

② 教导团的团部是在四标营。

这次暴动，俄国领事署是策动中心的机关，连夜东山的俄领事署都有会议，都有不三不四的人出入。我们侦探不但搜了许多材料，还且试过两三次在他们会议时候，就躲在会议厅后的洗手间门缝。俄领事署内驳壳枪的数目，我们也有报告，并且他们用红蓝铅笔画着四乡农民暴动的地点，我们也抄了一份底稿。这样无疑地是他们恐怕机关破的太多提前暴动了，但仅是失业工人的土匪暴动，镇压下去并不困难。

我打普通电话到黄琪翔家里，电话已不通，那时黄先生是四军的总指挥，张发奎先生早已把总指挥的职务交给他代理，自己仅当一个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常务委员，也同时住在他家的楼上。普通电话既不通，我便打军用电话到四军军部。四军军部正驻在长堤的广西会馆^①，在电话回报也说消息不明。至于黄总指挥的电话他们也叫不通，他是否还在东山，军部也不知道。四军军部已派人出去打听，有什么消息，再用电话报告我。

到了四点钟，枪声更密了，北方的枪声渐渐响到长堤，四军军部始终没有电话来，我再用电话唤那参谋说话。

“现在事情怎么样，情况明瞭了吗？”

“还没有明瞭，现在已有几十个人在外面攻军部，我们士兵正在门前接火”。

“什么人？”

“夜里看不清楚，大概是工人。”

“有穿军服的没有？”

“好象有些穿军服的。”

“军部能够支持多久？”

“不要紧的，他们断断攻不入。”

说到这里，电话便渐渐由模糊而中断了。暴动的人们既从城里出到长堤攻军部，当然他们在城里已占领了一些机关，最低限度他们也正在分袭各机关，工人里头更杂着穿军服的，自然最少有一部分官兵叛变。不过既来攻一个军部，当然不会仅来了几十个人，这样他们的力量

^① 四军军部是在长堤肇庆会馆。

还是脆弱，我判断军队还没有全部都变。

我那时慢慢把衣服穿好，虽然有这样肯定的判断，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军官，没有直接指挥军队之权，心想张发奎和黄琪翔到底在那里，难道这些枪声他们都没有听到？最少他们当中应该有一个到军部，同时也最低限度应派一人来我这里报告。军用电话的铃声时时冷冷作响，可是拿起听筒来听，一句也听不出。这是什么一回事？我打算推到天亮，自己到军部看看。

广东天气虽然正在隆冬，到了六点钟，东方已微微现点曙光，那时散漫的枪声已渐渐迫到东堤的东桥，而且远远更不时听到几声迫击炮。这时我知道这次暴动不会马上便能镇压下去，因为第四军部是军事的总枢，如果能够镇压下去，就是电话不通，也会派人来通知我，军部始终没有人来，必然还在被围攻，而张发奎和黄琪翔两位必然没有到军部。由我那里到军部还得越过两度桥，还要走一条长的堤岸，我手下只有四个卫兵跟着我，“葵园”门口虽然有一小排宪兵，但宪兵的战斗不强，而且我既疑虑是兵变，那小排的宪兵分子怎样，和外间兵变有没有暗通消息，都值得考虑。我立刻派了一个勤务往东桥侦察，他的报告是东桥顶上竖了一面红旗，但守着桥头不过只得十来个人，那些人都穿着便衣，里头不象有一个兵士。

“葵园”门口的宪兵那时全都起身了，可是谁也不武装，消消散散站在门首四周观望，似乎不愿意作一些准备，我知道军部是不可以再去，而此地也难以久留，我把四名卫兵留下“葵园”，身上带了五十颗子弹，一枝手枪，换了棉袍，带着一个勤务便离“葵园”往河边去。河边泊着十几个渡人过河的沙艇，摇船的旦家婆（这是广州船娘的通称）个个也似刚刚起身，面上布满了忧疑。我已决定过河南找第五军，因为我听得河南方面没有一声枪声，或者可以由河南调集军队过河来平乱。

我记得那次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用暴力，我走到河边，船夫不肯开船，他们说若果走到半河遇着兵舰开枪的话，他们保不了生命，而且这种事情是他们经验过的，广州每次有战事，船都不能开。我不管他们说什么，跳下一艘沙艇强迫他们开船，我从身边掏出十块钱，同时也取出身边的手枪，这十块钱是过河的渡钱，若果还不肯过河，我就得开枪，好

在行船我也有些经验，用不着靠船夫行驶。那船夫立即变了脸色，愿意即刻开船，我的船刚刚离岸不久，东堤的枪声更密了。我看河内有两三艘小兵舰很潇洒的泊在中流，烟窗里面一些黑烟也没有，我断定兵舰还不至于叛变，遂放心命令船夫摇向康乐岭南大学的码头。那时天色还是迷茫，远见码头有五六个人站着向这边遥望。船渐渐拢岸，见五六人当中有两个第五军的士兵，他们背着步枪，异常的萧闲向着这几个闲人交语。我知道河南这面是没有事，登岸之后，便问这两个士兵：

“昨夜河南这边没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一个士兵随意的回答，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河北怎么样？为什么有许多枪声？”另一个兵士见我从河北来，很急的追问。

“听说是有些工人暴动，第四军正在镇压，大概快平静了”。我也很安闲的向着这几个闲人宣传。

河南是到了，但怎么办？我起初的念头想先入岭南大学，打个电话到第五军军部，通知军长李福林先生。后来想想不妥，如果我先入岭南大学，最少使一群教授和学生起了骚动，而且在电话里也不能详细把我该讲的话说完。与其不需要的多入一次岭南，倒不如直捷先去军部。

河南那时是没有马路的，而且由康乐到海幢寺的五军军部，路不止弯曲而且很长。犹幸我在育才书社读书时候，河南的道路我差不多认识了十之八九。平时读书固然可以应世，平时多多走路也未尝不可以临时应急，我心想十几岁时的游荡街衢，今日居然可以自当响导，天下之事，本来不可逆料，真合着“闲时学来急时用”的谬语了。

我到达五军军部，天色大明，不过那夜李福林先生不住在他的军部，而住在他的乡里大塘村，军部的人告诉我，他们已报告了李先生，他就起程出来，听说还有黄琪翔也在大塘和李先生一起。这可奇了，为什么琪翔早到了大塘？我问军部的人们，他们也说不出底细。

钟刚敲过七点，军部的守卫传呼李军长到了。我步出办公厅，头一个入来的是张发奎。

“怎么你也来了？”

“我和琪翔一起来的”。

跟着张发奎后面是黄琪翔，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还有财政厅长邹敏初，他们的衣服似乎没有穿好，黄先生穿的是西装，没有打着领带，邹先生穿的夹短衣，把一件长衫夹在左臂间。我们坐下谈起，才知道他们两点多钟便离开了东山，据他们判断，不独教导团变了，连警卫团也变了。防卫广州就是两团人，这两团人全变了，已无兵可调，只得过河向第五军调兵镇压。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教导团既已缴械，怎么又发回了枪枝？我问起缘由，才知道这是参谋长叶剑英的主张，而当时那位叶先生又兼了那个教导团的团长。军队有了异动分子已经很可虑，而高级将领就是共产党，尤其无法可以预防。怪不得我们一方面由公安局破获无数共产党的机关，仍然没有方法预先消弭这次事变。原来我们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就是共产党，警卫团的团长梁先生也就是共产党！

说到此地，我想趁一点空闲补述教导团的历史。这个教导团原本是由广东黄埔军校迁到武汉的学生，那时革命军队已到达长江，军校也由广东迁汉。当时委员会的制度极盛一时，连军校也采了委员会制度，委员会是无法管事的，只有设一个教育长，委了一位杨澍松先生，杨先生虽然名为教育长，可是大权已旁落到政治部主任的恽代英手里。武汉军校几乎全包在共产党的氛围，不接近共产党的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就是不自动离开，也慢慢被淘汰。

武汉将要分共的时候，我又被命赴江西，因为江西那时已先武汉发动，请共产党自动离开。朱培德先生以分共在即，军队还不至于有什么问题，至于农工和学生方面，希望中央能够派一个人协同处理。我留在南昌没有两个星期，武汉又电召我回程，那时邓演达先生对于分共不大主张，有自己离开武汉的表示。我在船上还没有到汉口，邓先生已和俄国顾问铁罗尼走了西北循陆路赴苏俄，武汉方面要我速归，就是要我接邓先生的政治部。

我再接政治部时，首先注意便是这一班军校学生，当军队纷纷东下到安徽，我主张这班学生还须留在武汉，慢慢设法检查和处理。不知什么缘故，军委会又准了这班学生编入四军作教导团，并且和四军一起向九江开动。南昌的事变到底来临，我又提出这个教导团应该撤回重驻

武汉。军委会准了我的提议，并且命令政治部派人接收，及至我派人到九江接收这个教导团，四军又说已得了军委会命令依然准这个教导团随军回粤。当日经过南昌的巨大事变，而且宁汉复合的消息又布满上下游，各人处事都有点乱而且忙，这个教导团忽而命令政治部接收，忽而准他随军回粤，竟成了一宗疑案，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

我不过是军委会一个委员，而且政治部又隶属于军委会，命令的理由我是不能问的，命令的执行我有服从的。不过当日的教导团也的确经过几次检查，还有一班学生自动出首谁是共产党，谁是接近共产党，开除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但党团的潜伏，始终不能清除。这是这次教导团叛变的由来，也是这个教导团经过的历史。

这次兵变，自然是教导团主动，而警卫团不过附和，这个团人数并不多，他们没有战争的经验，并且我也不相信全体都变了共产党。我主张五军急即调兵过河，我个人愿意往前线。我判断变兵是没有战斗力的，他们正在急于攻击各机关，我们假使有两营人过河，先占广九车站，分路向城内进攻，不难以半日以内即可扫平叛变。

“登哥^①，请你速派两营人过河，我和向华（张发奎别号）都可以指挥，我可以担保半日之内，就可以把暴动镇压下去。”李先生的别号叫李登同，大家素来都赶着他叫登哥，当时我就这样提议。

“潘枝那团兵远在北江，目前河南实在没有许多兵可调。”李先生十分的踌躇着。

“难道河南一两营兵都没有吗？”大家立即着急。

“有也很单薄，并且战斗力很差。万一出个岔子，连河南也会保不住。”李先生这样更加沉默。

我和向华焦急万分，但军队是在李先生手里，而且他是军长，对于兵的强弱自然他比我们知得清楚。这个提议讨论了一个钟头，都未得赞同，倘若共产党还有潜伏在河南，这个仅有的根本也会摇动，善后更棘手。我是苦闷极了，但我手下实在没有兵，耳听对岸的枪声，我们讨论得不着一些结果，心里比火烧还更难受。

^① 李福林又名李登同。

第一步棋子既然不能走，只有走第二着了。我和张发奎草拟了两个电报，一个打给肇庆的许志锐，一个打给江门的邓龙光，叫他们马上回师，扑攻广州。虽然时间稍长，但除了这着，已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海军处长冯肇铭先生也过了河南了，他报告我们海军并没有变动，并且各舰长他可以担保。这样我们是不能安坐军部来听枪声的，我们得分配工作吧。我们当时决定李福林先生的任务是守卫河南，并断绝河南北的交通，发奎，琪翔，肇铭和我四个人先登军舰作战。那时大小军舰也早已上西江，留下省河的只有“宝璧”和“江大”两艘。

我们从士敏土厂上了“宝璧”，就拿“宝璧”作了旗舰，冯肇铭先生招呼了“江大”泊过来，他和琪翔两位便驶着“江大”沿着东堤，用排炮和机枪直扫下去。……

那早我们发出肇庆和江门调兵的电报，始终等不到复音，我很怀疑不是那两封电报不能通，就是两地都或者有变故。那天早上的电报不来就不是由长堤电报局发出，因为长堤电报局附近布满了变兵。那两封电报是派人乘船往沙面电报局发的，到底能否到达，倒是一个严重的疑问。如果第一次电报不通，再发也是没有用。我们难道就在河南呆等不成？我和张发奎商议，不如我们自己走一次。我们向五军军长李先生借了一艘差遣小轮，等到七点钟天色入夜便出发。

夜色侵袭了珠江，两岸灯火都不明，只见东边余火还未熄，烈火夹着浓烟还是向着天空乱喷，这样焚烧到那时才停止？我们心里的愤痛，比北岸的火还更烈，烟还更酷。那夜我们在船上始终未曾合过眼，轮流着眼瞪瞪的望着来船。但凡遇着来船比较大的，都大声喝问是不是新编第一师，疑心以为他们一得电报，立刻回师援省。

这样一路问下去，已到了黎明，江门已到了，遥见沙滩上约莫有一团兵士在那里集合。那是第一师了，那是第一师的集合了，这样至少证明江门没有变故，至少证明他们已得到了我们的电报。

那时邓龙光先生还是第一师的第一团长，他告诉我们电报是收到了，但是对于情况还不大明。因为那封电报不是素用的密码，况且只有调兵命令，没有告诉他详细情况。他没有梦想到教导团、警卫团两团都

叛变,更没有梦想到我们连军部都不能去。他原来接到电报,以为更有后命的,等了半日还没有第二个电报来,这一团兵士的集合,在他的意思以为不管有无后命,始且先调兵再说。其实我们何尝不想打第二个电报,但打第二个电报更比第一个电报困难,由河南到沙面,那时水上交通本来就不大安全,而且沙面也戒严,小船更无由泊岸。好在这团兵既已集合,马上做了早饭便可动身,但是第一师是不可以全调的,南路的敌兵退了未久,若不留驻两团人,我们倒有被人后袭之虑。

我们商议了一阵,以为江门之师既动,我们也不必随师返省城。我们既已到了江门,何妨再到肇庆一走,江门既对广州情况不明,想来肇庆也恐怕有着同一疑虑。我们在师部都食了早饭,看着一师动了身,便又原船和张发奎朝着肇庆出发。

这次行程的心境倒比初来时安静了许多,我们不怕兵力不够,只怕共产党不待兵来便先向东北两江逃。我们在船上讨论些善后问题,又商议些整理军队的计划。入夜船头的瞭望兵报告,说有两艘小火轮拖着四船兵东下,“那一定是许志锐的军队,把他们叫住。”张发奎很兴奋。那两船相离太远了,大声呼喊也不闻。我们叫轮机手不停鸣着汽笛,并大声喊着“张总指挥在那里。”

东下的船终于停住了,隔船回答那是林团长林翔的兵。林翔先生知道我们在这艘船上,用舢板渡来相见。据他们报告也和江门一样,只接电报,而情况不明,这次先驶这团人下来,也是打算驶到广州再算。我们草草告诉他河南是安全,军部还在固守,并且告诉他江门已动兵,最好会合一起,由东沙登岸扑攻广州,先截共产党东去北逃的路,这样才可一鼓歼灭。我们不便再详谈,商议只有十分钟,林翔先生便下驶,我们也即西上。

.....

我们船抵肇庆的时候,天色还未明,码头上巡哨的兵士也没有几人,很不象戒严,事实可以证明这里还没有得到广州共党暴动的真实报告。巡哨兵是认得张发奎的,一直带了我们去师部。许志锐先生知道我们到达,倒吃了一惊。赶快披衣起床,他以为广州已完全失守,不然我们怎会跑到此地。

肇庆这边也同江门一样，我们的调兵电报是收到了，但他以为我们还有第二个电报。许先生对于广州的情况不大明，初意很踌躇，他后来终于调林翔那团人东下，也因为不能再等后命，只有先行调兵再说。

……天色平明之后，我们又匆匆开船回广州，我们那时已知赴援广州已有几团人，共乱是不是平，但江门和肇庆之师怎样会合，怎样进攻，也得要一个计划。那日下午六点多钟，我们便回抵河南，及到五军军部时，我们军队早在那天恢复广州的秩序。不但江门之师早到，肇庆之师也到了，五军在北江的潘团也到了。共产党已全扑灭了，仅有零星残余二三百人沿途逃往东江。（下略）

（载陈公博《寒风集·军中集记》，
1945年7月第6版）

陈璧君之粤变内幕谈

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女士甫由广东回沪，末数日而粤省共产党乃大暴动，陈君对于粤方情形，当较他人为明瞭。本报记者特于昨晚六时至善钟路汪宅，晤及陈君，叩以粤变之内幕。据称我这一次回到广东，一半是替汪先生拿文件，一半是含有调查共产党最近之状况及第四军有无共党之使命。一到广东就觉得共产党要跃跃欲试，不过当局的人，因为一天到晚要开会，忙得没有工夫可以考察共产党暗中的活动，我就对张发奎一班人说，叫他们要暗中防备，不要让共产党暴动起来。后来我又知道他们对于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很过不去，要想打倒他，所以我也知照朱晖日叫他留意，不要为共产党所逞。我因为广东共产党的形势很紧张，我就急急跑回上海来，向广东各委员商量，要想把广东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乃由汪先生及各委员致电广东陈公博等，叫他们包围俄领事署捕拿共产党。大约这个电报泄漏了，他们先发制人，所以暴动起来，据闻珠江流域共产党暗中设五个苏维埃政府，可见他们早有一种阴谋的计划。记者（问）张发奎、黄琪翔究竟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答）张发奎确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从前因为十七日之变，大

家都疑信他是共产党,可是现在很明瞭的他是一个反共分子了,黄琪翔虽不是共产党、但是他处处以为有制服共产党之可能,所以对于共产党没有下严厉的对付,不料竟酿成共产党的暴动。(问)共产党在广东的实力究有若干?(答)详细的情形不知道听说农民军号称有二万人,二万人当中还有五千常备军,不过共产党向来是说大话说惯的,或者实力上没有这许多,亦未可知。(问)第四军教导团何以作内应?(答)第四军教导团所以内应,就是因为黄琪翔未能严厉的对付共产党,共产党遂将教导团煽惑内应。不过教导团还在训练的时期,并没有什么作战的能力,前一次第四军教导团打夏斗寅,竟会自己人向自己人乱打一阵,可见得他们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本领,所以他们加入共产党暴动,也不足为虑的。(问)张发奎、黄琪翔现在到底在那里?(答)张现今确在河南^①。(问)广东的共产党容易打平否?(答)容易打平的。张发奎反共已很显明的了,他的军队素称铁军,部下勇猛非常,张发奎自己喜欢到火线上,也没有一次作战不亲到前阵的。他现在已在河南向广州进攻了,我想不久共产党就可以打平的。(问)陈女士对于这一次的粤变观察何如?(答)我以为这一次广东共产党起事,倒可以使广东的问题得一根本解决。人家疑心张发奎、黄琪翔是共产党,也可以就此不攻而自破,不过所可虑的是共产党退到东面去,联合起来,那末声势就要大一些,然而共产党始终是要失败的。所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国民党的领袖大家互相猜疑,互相攻讦,使得共产党有隙可乘,这倒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象这一回广东共产党的变乱,也何尝不是广东的军事当局,恐怕先出兵打了共产党,后面被人来袭击,因此互相牵制,共产党遂乘机大肆暴动。共党唯一的本领,就是利用双方在相持之下,做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而注意的。(问)汪先生对于这一次广东共党暴动,有什么感想?(答)汪先生自我广东回来之后,得到了共产党恶劣消息后,他就主张打电回去,要把广东苏俄领事馆包围起来,捕拿共产党。本来预备把这个情形宣布出来,后来汪先生以为时机尚未到,外面虽有竭力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仍愿忍耐几日,因将来上面的情形宣布过后,自然可以大白。不料忍耐了几天,共产党居然先暴动起来

^① 河南是指广州市珠江南岸市区,以下相同。

了,汪先生今天已致电张发奎等请他们不要顾忌什么,先把共产党肃清后再作道理,汪先生极愿将广东共产党在最短时期内扑灭净尽的。(问)外间以陈女士此次赴粤后返沪未多日,广乱即起,颇多怀疑。不知女士对此亦作何表白否?(答)此次广州事变,中外各报所载,真相已明,外界推测,自不足为信。不过南园所发表徐景棠的电报,完全与真相相反,说我这次回广州,乃系携归一切计划云云、尤不值一辩云云。(问)广东在沪的几位委员,听说已躲避起来,确否?(答)其中王法勤、潘云超两先生因为前天晚上有人到他客寓中去查抄书籍疑心他也是共产党,他们为谋个人的安全起见,暂时易地而居。(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答)我不知道。(问)听说陈树人君已回广东去了,确否?(答)陈先生确已回广东去了。他这一次去是受在沪各委员之嘱托,到广东去调查共产党暴动之真相。因为各同志生死未卜,不能不有人去慰问一下。听说甘乃光先生亦同去,不过甘先生到底动身了没有,我不敢确定。(问)汪先生现在何处?(答)汪先生已于前日进医院养病了。末后陈女士并谓共产党所以痛恨陈公博、陈树人、顾孟余等就是恨他们会作反共的文章。共产党最怕以学理来驳斥他们,所以造作许多谣言,中伤他们,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明瞭的。谈至此、记者以为时过久、遂兴辞而去。

(原载《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

广州起义期间“江大”舰的活动

谢作屏^①

广州起义前两日,不知起了什么风云,军队纷纷移动,广东江防舰队(包括“江大”“江汉”等舰以“江大”为队首舰)也奉命出发,直驶江门、北街河面抛锚,谢婴白(南路正指挥)由卫士护卫登陆,各舰自择锚位。翌日由“江大”舰舰长(陈启耀)分配各舰分段防守,“江大”驻守北街,居中指挥。同日下午入黑之后,薛岳乘小轮船一艘,匆匆驶来,即命“江

^① 谢作屏为当时“江大”舰电报官。

大”舰开行驶回广州，到达省河，在东堤广西会馆对开河面寄泊，薛岳则偕三五卫队登岸而去，尚有十多名卫队留舰。是夜三时左右，陆上人声鼎沸，继之枪声卜卜，间有炮响，舰长事前没有奉到什么通告或密令，因而不明究竟，只有下令员兵各站回炮位严密戒备，旋即亲驾小艇到河南士敏土厂舰队司令部请示。黎明后，舰长回舰，即下令起锚，并将他带回新制的黑白两色旗帜扯上桅顶，并对员兵说：司令官（即冯肇铭）、张军长（张发奎）等已登“宝璧”舰座驾指挥，黄副军长（黄琪翔）到我舰指挥，颈系红带者就是敌人。动员全舰各站炮位，部署后与黄琪翔同登上吊桥发号施令，“江大”舰于是由东向西疾驶，到增沙大巷口中央银行门口，发现有红带者甚众，即发排炮扫射，再到肇庆会馆前，见四军司令部被革命军围攻危急，黄琪翔喝打之声不绝，“江大”助战历约一小时多。解四军司令部之危后，到沙面附近，转头东驶，来往游弋，是夜寄泊在白鹅潭，收缴留舰卫队武装，听其自由登陆。是日，南堤无线电局已被革命军占领，报务人员星散，来往韶关、江门、肇庆电报，俱由“江大”舰收发。翌日黄琪翔派员到福军司令部，着令派队渡河，但不见福军有所动静，只在河南一带戒严，第二日有军队回师，到达沙河、白云山一带，这时才见福军鱼贯渡河，此时黄琪翔亦离舰返回“宝璧”，下午四时左右，见薛岳身穿蓝布长衫，偕同妻室到来，知福军人员已出动，离舰旋掉头而去。

广州起义之役广东机器工会的暴行

梁桂泉

广州起义时（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在李福林第五军修械厂内当车工，是广东机器总工会的会员，对于这个反动工会及其他方面配合国民党军队合围进攻广州起义的情况，记忆犹新。兹就我所知道的追述如下，供作参考。

广州起义前数月（约在五、六月间），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在广州配合“四一五”清党，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屠杀之后，想进一步运用当

时反动工会的势力,继续破坏工人运动,迫害进步的工人组织与搜捕革命工人骨干,李福林的谋士江孔殷是广州河南著名的土豪,又是广州沙面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他与广东机器总工会(以下简称广机)主席李德轩关系甚密,认定工贼李德轩具有一套煽惑工人群众的本领(李一贯喧嚷“机器食人”的论调^①,愚惑会员,用以维系其在广机的领导地位),大可以作为李福林的好帮手。经过江从中勾搭,两李紧密配合摧残工运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广机内部原来有个“体育队”的组织,队员约三百人,其中有自置左轮、曲尺或驳壳手枪的三十多人。李德轩就把这些带有手枪的“体育队员”组织起来(详细的组织分工情况不详)。归李福林指挥,由李福林部发给臂章,上用蓝药水电印“机工干”三个字,时佩时藏,视为虎符在身;时而三五过市,时而分散匿迹,随时听候李德轩的召唤,到处配合军警通水引路,作恶多端。“机工干”中属于电灯厂的有文佳、谭铭、朱维、戴灿、邓英等,属于兵工厂的有罗斯福、靓仔成、梁基等,还有铁路方面的伍英,电船司机崔四、胶厂的邹德等人,其余各厂也有个别参加,广机经过这番组织和两李的勾搭,遂如虎添翼,从此更为嚣张跋扈,直接成为反动军队的御用工具。

广州起义时,李福林第五军军部据守广州河南海幢寺内(今之海幢公园),其所属部队分布市郊石井和省属各地。正当事发的第一天,公安局长朱晖日为起义军包围,后爬越后墙逃跑出来,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等更是狼狈不堪,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逃避到五军军部里面来,在幢泽堂内开会,商讨对策。当时电信断绝,交通阻塞,李福林提议由李德轩派出联络人员,潜往石井各地传递命令,调动救兵回击广州。这一提议,李德轩当下点头会意,说是既能寄予重任,誓当图报犬马。他便在广机会员中作了三番四复的选择,最后挑选到他最理想的心腹,这个人(忘记姓名)世居石井地方,又在石井兵工厂工作多年,对于那里的交通道路,乡情土语甚为熟谙,受命后便绕道送达。

当国民党军队驰援未到期间,两军隔河(河北、河南)作战约两天。

^① “机器食人”的说法:机器发达,工人失业,要工人不失业,就不能让工,利用机器进行生产。——作者原注

枪声时疏时密，没有激烈战斗。当时省河各型船只，在起义军冲进市内的时候，早已驶离北岸，致使起义军没有船只利用去进攻河南。当时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各国军舰，又都相率脱下炮衣，炮口对准广州市内起义军所据要点，明目张胆地支持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两军对峙阶段过去了，国民党第五军分为东西两路回击广州。东路由岭南大学渡河，向大沙头、东山方面反击；西路从如意坊方向突入；另一路闻说是许志锐部从石龙方面驰援广州，构成合围的态势。河南正面仍留各乡地主武装扼守。出击队伍则由李德轩的“机工干”负责驶船引路。就在这时，“机工干”这些人马，便在广机门前集合，乘坐广机二号电船（是过去向广三铁路借来的），驶赴河北电厂附近码头登岸，协同国民党军队沿维新路直取公安局，沿途没有接火。“机工干”的任务是：（1）维持其所谓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2）搜捕可疑的“敌人”。他们四处出动，矛头首先指向过去属于工人代表会方面的基层工会（是共产党组织的组织），如车仔（即人力车）工会、酒楼工会等，这些工会的会员被捕杀害者不少。其中旅业工会的一个会员李吉棠，就是当时被弦索工会温少棠率同机器工会二人前去搜捕，押解五军军部杀害，在押赴刑场经过市街时说他是共产党员而加以杀害的。

这班“机工干”轮回不停地出动了数天。他们每次出动都搜刮有电风扇及其他财物，堆放在广机之内，后由李德轩出主意给他们拍卖，说是作为“机工干”茶水费的开支，这也算是反动的“论功行赏”罢了。记得有次晚上，他们搜捕完毕回来聚谈时，说西堤二马路有间旅店住上一对富有的夫妇，在行李箱内搜出港币数万元，决定第二天再去搜捕，但在他们再度前去时，这对夫妇早已离开，他们空走一场后，回来互相埋怨说：“真笨，当契弟去啦（没有可捞意思）！”

1962年9月10日

（载《广州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62年10月版）

附录四：帝国主义者有关广州起义 的日记、电报

粤海关日记(译文)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昨晚十二时许,在广州的共产党武装起义,警察局首先被进攻和占领,所有囚犯都被释放,并且给予他们武器。激烈的战斗从城市的东部开始,上午,第四军军部和警备司令部均被占领了,武装警察部队及市内各个警察所都被解除了武装。中午,中央银行总办事处被夺取了,并且予以焚毁。张发奎、黄琪翔以及警察局长朱晖日全都逃到李福林保护下的河南去了。海军船只是忠于政府的,他们在这个城市面前沿河来回巡逻,偶而向市区那边的赤党开火。共产党兵力是由最近解散的罢工工人,师长莫雄部下新招募的土匪军队^①以及来自广州市郊的农军。李福林控制下的河南是安全的。但是,由于兵力过少,河南也是处于被市区赤党进攻的危险之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广州市区几乎完全掌握在赤党手中,所有的政府和机关均被占领了。

按照市区那边发布的《苏维埃革命通告》,表明赤党军队总共约有五千人。他们的标语是:“没收所有资本家的资本和财产;为实现真正的农工兵政府;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假革命派”等等。

警察局已经变成了“农工兵政府”办公地点。据闻,新近任职的民

^① 应是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

政厅长李章达被选举为总司令，^①前罢工委员会主席苏兆征^②和海员工会负责人何来担任战地指挥员；前广州工人代表联合会领导人黄侠生被任命为警察局长^③。

但是，由于海军船只是反对赤党的，而且，所有民船和汽艇都离开了市岸，因此，赤党没有办法渡河到河南去。况且，在李福林的军队从江门和佛山调回来之前，河南乡间的“民团”全都出来援助李福林进行防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

李福林的增援部队昨晚到达，发布了总攻势的命令。清早，李福林的部队分三路向市区派遣——一路从水泥厂；一路从黄沙铁路站；另一路从珠江河的前沿。上午九时许，李福林的人马借助于海军船只的协助，成功地登上了市区，堤岸上的赤党稍作抵抗，到了中午，战火就逐渐停息下来。据报告，赤党已经被逐出城市。但是，广州市区与河南之间，河道交通仍然戒严停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据说，前几天骚乱期间，大约一千人被杀，七百间房屋被烧掉。大街上的大商店，约有百分之八十被抢。在市内的每个地方都看得见尸体，特别是在北门街。直到昨天下午，这些尸体还没有被搬走。今天，警察和兵士仍然搜查隐藏在公共旅店或工会楼层的各赤色工会人员和共产党煽动分子。昨天，约有七十名赤色分子被枪毙了，其中包括四个苏俄人。

自从前个星期一，即十二日以来，方言报纸就停刊了。要使报社恢复工作，尚需时日。广州印刷业总工会在骚乱期间，充当了“赤色宣传机关”，并且没收或毁坏了所有各家报社的印刷所。

① 纯系讹传。

② 起义时，苏兆征不在广东。

③ 黄侠生是工人赤卫队联队以下的队长。

粤海关英籍税务司贺智兰^①
给北京海关总署税务司的电报(译文)

“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暴动,今天已平定,政府军队复克城市,现市区平静。海关生命财产安全。贺智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卅分”。

(以上两件载粤海关旧档案卷 1599 号)

① 贺智兰的英文名为R.T.Chedgland。

广州起义大事记

1927年8月—1931年12月

1927年

8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8月11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和闽南等地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南方局设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主任，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8月19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武汉到达香港。

8月20日 张太雷向广东省委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议一致接受“八七”会议之决议案；还详细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会上，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准备发动各地暴动。

8月22日 张太雷写信给中央常委，报告广东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的情况。并附上省委接受“八七”会议决议之决议案、省委委员名单和省委制订的暴动计划、口号、军事编制与暴动工作大纲等，请中央审查批准。

9月9日 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的暴

动计划；同时指示省委在准备暴动时要参照两湖暴动计划。

9月21日 广东省委向全省各地发出通告第九号——《目前暴动策略应注意的十件事》，要求全省各地迅速举行武装暴动，配合叶、贺军南进广东。

9月23日 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对于省委报送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农军作战方法》及《告广东、闽南民众书》等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指示省委不要等待叶、贺军到达广东才发动群众。

9月26日 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另加入李立三为委员，以罗绮园任秘书。

9月29日 张太雷自汕头给广东省委写信，指出：“张发奎部队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要积极进行。”

10月 中央写信给南方局暨广东省委，要求广州起义后，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建议由苏兆征、周恩来、郭沫若等担任常务委员。

10月12日 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求做好叶、贺军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并要求“省委对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改为集中力量做好发动、组织工人的工作。

10月13日 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回到香港。

10月15日 南方局及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香港召开，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教训。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

同日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十四号——《最近工作纲领》，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做好暴动的准备。

10月 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经过情

形,以及改选后南方局、省委成员名单。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

10月中旬 改选后的广东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肯定广州市委领导十月十四日海员示威运动的正确;由于因敌人已有准备,同意停止执行预定在十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广州全市罢工计划。

10月19日 张太雷离港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

10月22日 张太雷从汕头抵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

10月23日 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指出:“太雷带来的暴动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央已决定另行起草一个寄给你们。”并决定撤消南方局,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福建决定南北合并改组成一临委,直接由中央指挥,而二十五师(即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转战湘粤边的南昌起义部队)则设一特委,归广东省委指挥。

11月8日 张太雷在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他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破坏南昌起义的罪行。会后,太雷留在上海,参加研究制订广州起义计划。

11月17日 粤桂战争爆发。同日,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中央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利用粤桂战争形势,发动工农兵起义,夺取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

府。

11月20日 张太雷从上海动身回香港。

11月22日 张太雷在香港给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准备情况，并决定亲赴广州，处理广州市委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曼关于广州暴动要不要争取张发奎参加的争论问题。

11月25日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二十五号，要求“全省各县农民应在这军阀战争，交冬租，年尾还债时期一致起来暴动。要从各地各个暴动，发展到联合成一总暴动。各地农民暴动要与广州工人联合成夺取全省政权的总暴动”。

同日 广东省委发表《为反对两广军阀战争告兵士》，号召兵士们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创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11月26日 张太雷从香港到广州，并在此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研究广州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成立暴动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任总指挥。

11月28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指出：“我们决定奋斗到底，反对强盗李济回来广州。我们保护广州，用我们最后的力量去攻打李、黄的军队。”

同日 张太雷写信给在香港的恽代英、张善铭、沈宝同，告诉他们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情况以及决定组织广州暴动计划。

同日 教导团党团召开组长联席会议，积极酝酿暴动工作。

11月29日 广东省委将张太雷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的计划转报中央。

11月底 太雷在财政厅前附近的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党团骨干会议,进行发动工作。还召开了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了起义有关决定。

12月1日 广东省委发表紧急通告第二号,要求各地立即准备暴动,实行夺取政权;并做好配合广州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日 张发奎在广州召开所谓“护党”大会,当他和黄琪翔上台演讲时,汇集在四周的数百工人,当即拿出红旗,包围会场,提出“恢复工人权利”、“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张命令兵士捉拿工人,但兵士不从,后张只好命令他的卫队捕去几个工人。

12月4日傍晚 教导团、警卫团以及黄埔特务营等单位革命骨干分子二百余人,在广州东郊黄花岗举行秘密会议,张太雷代表省委作起义的动员报告。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省委关于组织广州暴动的决定,誓死为工农革命而奋斗。

12月5日 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粤桂战争爆发后的广东政治状况及党的策略。指出:“省委在事变前便决定要广州以暴动手段摇动破坏广州市敌人军队,并加以全省农民整个暴动解决全部敌军,建立广东工农兵政权。”

同日 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对十一月廿九日上报的广州暴动计划,表示赞同。并提出暴动时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的发动工作。

12月 广州市委和中国共产青年团广东省委分别散发传单和宣言。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政府。”

12月初 太雷又在财政厅前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警卫团的骨干分子会议,具体部署起义事项。

12月7日 广东省委在越华路附近一间戏院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起义政纲、口号,决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起义。

12月8日 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目前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决定将省委从香港全部迁省,香港只留一交通处,由张善铭、沈宝同负责。

12月9日 汪精卫在上海获悉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接连电告张发奎,要其迅速解除教导团武装,搜查苏联领事馆,镇压各职工会。

12月10日 黄琪翔从西江前线回到广州部署镇压革命,伪公安局亦宣布特别戒严。

同日 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张太雷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研究敌我情况,决定提前十二月十一日起义。会后,省委向中央写了紧急报告,指出:“省委认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还要求中央迅速派周恩来来广东指导工作。同时,张太雷、周文雍等还分别召开教导团以及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部署起义工作。

12月11日凌晨二时半 张太雷偕同恽代英、叶挺以及工人赤卫队代表到四标营,领导教导团革命官兵誓师起义。张太雷作起义动员报告,并任命教导团各级指挥人员;接着,恽代英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分三路出发。与此同时,警卫团第三营也分两路出发。在

广州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在听到起义信号后，也纷纷出击。黄埔特务营的官兵也举行了起义。天亮前，除少数敌军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

同日上午6时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后，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公布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同日 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出版号外，庄严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职员名单。起义指挥部还印发大量《苏维埃革命纪实》、《工人武装起来》等传单，报导了广州工农兵暴动战况。

同日 广东省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告工人、农民》，广州苏维埃政府也发表《苏维埃告民众》，宣布起义胜利，号召群众继续奋斗，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

同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发表《告青年兵士、警察及保安队书》，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张发奎、朱晖日及其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会议政府。

同日中午 广州苏维埃政府准备在第一公园召开工农兵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后因敌人向观音山起义军阵地进行反扑，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前往战斗，会议决定改期举行。

同日晚 张太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局势。决定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基础，迅速扩建工农红军，将战线推移到郊外等。

12月12日早 广东省委秘书处给省内各地党部发出通告。指出：“广州暴动已经爆发，各地接此消息后，望即普遍宣传，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向着广州进展，保护广州暴动的

胜利!”

同日晨 驻河南地区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两路渡河，向猎德和长堤反扑，四次被起义军击退。与此同时，起义军对珠江河北岸地区敌军残余据点继续进行扫荡。

同日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通知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迅速调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

同日 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发布向商人借取粮食的命令；还委任凌津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其任务是在粤汉路沿途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

同日中午 广东工农兵群众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名单、起义政纲、《广州苏维埃追悼死难烈士宣言》。

同日下午 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再次渡过珠江，从东郊猎德进攻大东门；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的敌军，联合驻西村敌军薛岳部，从大北门攻占了观音山起义军部分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军民奋起反击，敌军狼狈逃窜，我军重新收复了观音山。张太雷参加了广东工农兵群众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后，返回总部不久，闻敌人向起义指挥部扑来，就急忙与第三国际代表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同日黄昏 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和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到财政厅天台观察战况，分析形势。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决定撤出广州，并分头向起义队伍下达撤退命令。

同日晚上十时 起义部队主力从市区撤出，至黄花岗集中，经太和圩向花县撤退。

12月13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工农的广州！》的社论，支持广州工农的革命。

同日 敌人以十数倍兵力围攻广州，珠江南岸敌军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陆续登上珠江北岸。起义军主力撤出广州后，来不及撤退或准备就地隐蔽的工人赤卫队及革命士兵，坚守街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忠骸遍地，血流成河。从十三日至十九日，被杀害的起义战士和市民达五千七百多人。

1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二十三号，指出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

1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一致起来拥护这一胜利，扩大这一胜利。

12月14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发表《告工人书》及《告农民书》，指出广东工人、农民的胜利，就是全国工人、农民胜利的开始，广东工人、农民得到的解放，就是全国工人、农民得到解放的开始！

12月14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广州暴动，发表《告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青年》，号召青年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革命的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拼命与敌人争斗！

同日 赤色职工国际发表题为《快来援助中国革命》的致各国工人书。

12月15日 共产国际为广州暴动发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赶快起来，赞助中国的苏维埃！

12月16日 撤出市区的起义主力部队在花县城立高级小学进行整编，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公推叶镛为师长，袁裕为党代表，下辖三个团。红四师成立后，即转向海陆丰，与彭湃率领的海陆丰起义武装汇合；另一部几十人撤退至韶关，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转战湘粤边的南昌起义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还有一部分队伍分批转到广西左、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十一、十二存在两天的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争斗，直至博得胜利的标帜。”

同日 中共广东省委、共青团广东省委通告各地党团组织，号召他们组织工农兵群众继续暴动。

12月18日 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

同日 广东省委向东江特委及所属各县县委发出通知，对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江各县的任务作了具体布置。

12月19日 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经过、对暴动意见以及暴动失败后的善后工作等。

12月20日 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对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目前工作的指示。

12月20日 广东省委向北江特委发出通知，对广州起义失败后北江各县的任务作了布置。

同日 赤色职工国际发表题为《反对杀害中国劳动者，捍卫中国革命》的致各国工人书。

12月21日 广东省委将上日省委会议讨论的目前广东工作情况的意见报告中央。

12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二十四号，反对对俄绝交及国民党屠杀压迫的宣传示威。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政府对俄绝交宣言》。

12月2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广州暴动和对俄绝交发表《告全世界无产阶级》。

12月28日 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向中央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广东情况、目前策略以及当前的工作。

12月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发表号召全省《工农兵士继续暴动宣言》。

1928年

1月1日——5日 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全体(扩大)会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教训。通过了《广州暴动决议案》。

1月 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认为“广州暴动虽然暂时的失败，但是就全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革命潮流并不因此而低落，反是继续高涨。”

1月3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总结广州暴动问题，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1月8日 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指出：“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万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市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

1月10日 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关于省委全体会议通过对广州暴动中几个中央委员的政治纪律问题，请中央批准。

1月上旬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一号，介绍省委全体会议的经过。

1月上旬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二号，介绍省委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主要精神。

1月13日 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报告广州暴动后，红四师由广州来海丰之经过。

1月16日 广东省委常委讨论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会议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动的领导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三十一号，提出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的办法。

1月16夜 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省委派□□□常委前来报告广州暴动问题、省委全体会议经过以及对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意见。

1月16晚 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向中央临时政治局报告，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与当时的事实不符，把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提议中央应根据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

决议案重新进行讨论修改。如已发出，即须更正。

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广东同志书》，指出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根本精神和其指示的前途都极不正确，极其动摇”。同时对省委全体会议的讨论精神和省委决议案的要义的省委第一、二号通告亦表示不能赞同，认为省委决议案中的政治纪律根本不能成立。

1月13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原则上同意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的决议案，但指出“这一决议案还不能满足广东今日全省预备的发动暴动的需要。”

1月23日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又作出《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重新评价广州暴动的意义，同时并总结暴动失败的存在问题。

1月25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信，指出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错误；同时介绍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主要精神；并指出广州暴动主观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25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信，嘱其即往上海与中央面谈《广州暴动决议案》的分歧问题。并决定广东省委书记一职由邓中夏代理。

2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对中国革命问题》，对广州起义给予正确评价，同时，对其不足的地方也提出了意见。

2月26日 中央发出通告第三十五号，对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又作了补充的说明。

7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正式决定广州暴动(十二月十一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每年党要纪念它，号召千百万

的劳动群众纪念它。”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七十六号，提出广州暴动纪念的工作方法。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州暴动宣传大纲。

12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告：“广州暴动日(十二月十一日)应作为全国工人阶级永久纪念日，在这一日中国工人阶级应举行热烈的纪念，高举红旗，停工、示威，纪念广州暴动死难的烈士，并反抗敌人白色恐怖的惨杀。”

12月11日 中国共产党发出《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

1931年

1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订的《劳动法》第五章规定：“每年十二月十一日为广州暴动纪念日。是日，一切机关停止工作，集会纪念。”

(林鸿暖整理)

封面
目录
正文